

黃英哲 著

# 浮城

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Diaspora and Border-crossing:  
Intellectuals Moving across the Strait

黃英哲 著

# 漂泊與越境

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Diaspora and Border-crossing:  
Intellectuals Moving across the Strait

臺大出版中心



Handwritten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結學" and "日方本".

臺大出版中心

獻給逝去的雙親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 序：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

二十世紀東亞紛擾動盪，中國、日本和臺灣的關係尤其錯綜複雜。1945年8月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臺灣經過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重回中國懷抱。但臺灣的回歸只是世紀中期另一波東亞政治史的序曲。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權撤守臺灣必須在更大的歷史脈絡裡理解。從東西冷戰到美軍駐日，從韓戰到中共與蘇聯的分合，無不牽一髮而動全身。

在這個時代裡的中國人——或曰華人——如何找尋定位，因此成為艱難的挑戰。所謂定位，不僅限於國籍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歸屬，也包括社會關係的重整，文化脈絡的清理，以及自我主體的安頓。更重要的，因為時代動亂，許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越境的境況，做出種種無奈或隨機選擇。這些選擇不再能以簡單政治論述歸納，而必須由識者以豐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細膩描述。

《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作者黃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學者，目前任教愛知大學。黃教授專治中日文學交流史，對戰後臺灣的文化轉型尤其有精深研究。專書《「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堪稱臺灣史的第一本有關戰後文化重建的專著。黃教授根據大量一手資料，探討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教育制度、國語政策、文化傳播的種種措施，並思考因此產生的社會反應及政治後

果。戰後臺灣夾處在殖民現代性、民族主義，以及本土情懷之間，確是探討後殖民現象的重要教材，更不論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以及一九四九年的大分裂。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從制度史面觀察臺灣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轉型，《漂泊與越境》則更進一步，叩問置身其間的個人何去何從。當此之際，曾經奔赴祖國的臺灣子弟有了不如歸去的感嘆；三〇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輾轉來到國民黨最後據點；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島上經歷一場或去或留的鬥爭；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為戰後中日關係裝點門面。這些文化人的經歷有的驚心動魄，有的不堪聞問。他們以各種文本——自傳或日記，小說、戲劇或雜誌——留下珍貴記錄。一個甲子之後讀來，在在要讓讀者感嘆世事多艱，個人生命的流離顛簸，紙上文章哪裡可以道盡？

《漂泊與越境》共分為四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以個案方式描述這段期間文化人的歷程。「故鄉與他鄉」介紹深受五四洗禮的張深切在大陸的啟蒙、革命歷險，以及戰後回歸臺灣，重起爐灶的過程。與張相對的則是較不知名的楊基振。楊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後赴滿洲國工作，戰後曾滯留華北，最後返臺。正因為楊不屬於文化圈，他在東北華北所見所聞才更為彌足珍貴。張楊以臺灣人的背景闖蕩中國大陸，他們的身分——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每每成為焦點，也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然而峰迴路轉，張深切回臺後成為臺灣戰後話劇電影業的先驅，楊基振更投身臺灣民主運動，與自由主義理想共相始終！這樣的轉折，應是黃教授著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是本書最耐人尋味的部分。黃教授以魯迅名篇〈藤野先生〉與陶晶孫的日文創作〈淡水河心中〉兩個文本，討論語言翻譯、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過程的糾結。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發行雜誌《新聲》，選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關係。唯此作以摘錄形式發表，文本的刪節編輯意外引發如何詮釋魯迅——以及如何詮釋魯迅投射出的中日歷史經驗——的路線之爭。〈淡水河心中〉則是由彼時任職臺大醫學院的陶晶孫根據一樁殉情案寫成。陶在日本成長接受教育，三〇年代曾是左聯成員，戰後來臺，未幾因白色恐怖威脅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聞在五〇年代初轟動一時，陶的改寫有意無意間引發官民、族群、性別、語言、媒體重重權力關係運作。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複雜度亦由此可見一斑。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焦點是五四文化人許壽裳。許為魯迅摯友，戰後應陳儀之邀來臺參與文化重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許的任務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事實卻遠較此複雜。許早年留日，深諳日本近代學術成績，因此在編譯館任內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傳統。除此，許呼應魯迅精神，將戰後重建工程導向魯迅所謂批判的中國國民性改造，因此與官方意識形態產生嫌隙。許壽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殺而客死異鄉，他在臺灣的工作也功虧一簣；他所示範的兼容並蓄的精神，求諸今日，反而不可復得。

本文最後一輯「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分析施叔青寫於香港回歸前的「香港三部曲」。與前三輯相比，本輯在歷史時間與文本選擇上可能稍顯突兀。黃教授的用意應是借此喻彼，以香港殖民故事以及作者游離歷史、文本內外的立場，對照臺灣的殖民經驗。香港



的故事完而不了，是正正投射臺灣的故事也是仍待繼續？從殖民到後殖民，千絲萬縷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凡此都需要論者以更包容的態度，更細膩的批判方法來面對。

《漂泊與越境》投射的空間格局極為繁複。帝國與殖民地，祖國與家鄉，國民黨與共產黨，世界冷戰布局與東亞地區嬗變此起彼落。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面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也必須不斷改造身分、文化與政治認同的關係。黃教授無意迎合時髦的後殖民、再殖民理論，也不汲汲於轉型正義口號。他理解離散與漂泊所帶來的創傷，但更認為這一課題不必局限在控訴或撇清的無盡循環裡。在檢視歷史暴力的同時，他思考「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意義，從而理解越是亂世，越有思辯文化建設的迫切性。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親中、親日還是親臺，都必須從文化脈絡中理解並反省自己——與他者——的執著與盲點。用黃教授的話來說，大變動「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都帶來新難題，也帶來新的契機。張深切、楊基振的大陸去來，許壽裳、陶晶孫的臺灣經驗，無不皆然。

黃教授全書以陳蕙貞的例子作為開場，因此特別值得我們深思。陳蕙貞祖父因參與西來庵事件而死，父母輩卻與日本有不解之緣。陳本人生於日本。陳父是左傾民族主義者，熱愛中國，戰時卻避居日本，戰後返臺，歷經二二八事件終於率全家回到大陸。輾轉日本、臺灣、中國大陸間，1946年陳蕙貞出版《漂浪的小羊》，年方十四。這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外，現代臺灣文學另一重要源頭。陳家幾乎經歷所有現代臺灣與中國的激情與災難。陳蕙貞多年廁身中國廣播業，晚年卻在日本成就中日文化交流事業。

任何一種自命清潔的國族主義論述容不下陳蕙貞這樣的遭遇。但也唯其如此，陳更體現同代人不凡的嚮往和挫傷，以及臺灣現代經驗重層的、移動的複雜性。黃教授以陳的例子作為《漂泊與越境》論述的起點，無非說明面對歷史我們所必須持有的悲憫態度，並以此作為思辯何為正義的開端。

當代臺灣又面臨新的一輪歷史挑戰，在各種壁壘分明的意識形態糾結中，《漂泊與越境》這樣著作的出版可謂此其時也。黃教授的研究提醒我們各種主義立場的局限性，並且暗示如果上個世紀中期的文化人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猶能形成各種跨越畛域的可能性，當代臺灣知識界就更沒有作繭自縛的必要。我認同黃教授的觀點，謹誌數語，聊表個人對他多年治學的敬意。

臺大出版中心

## 後記

2000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我接到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的訪學申請。此前我與黃教授並不相識，但有感背景相同以及他問學的熱誠，因此歡迎他的來訪。

黃教授次年來到紐約，正好撞上九一一事件，其他遭遇又接踵而來。那些日子的甘苦，黃教授恐怕始料未及。但也因此我們成為好友，加上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客座的廖炳惠教授，那真是難忘的紐約一年。

黃教授旅居日本多年，處理漂泊與越境這樣的題目，想來不乏感同身受之嘆。他筆下人物的哀樂歌哭也觸動了我們，因為我們從

中看到生命的不得已與韌性。黃教授的領域橫跨中、日和臺灣，他治學有日本式的細膩認真，又不乏個人丰采，而他處理的時代如此錯綜複雜，尤其見證他個人歷史關懷的深刻與周延。我們期望看到他更多學術成果！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王德威

2016年2月

臺大出版中心

# 目次

序：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 ————— 王德威 v

序章 ————— 1

## 故鄉與他鄉

### 第一章 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自傳作品所呈現的人生軌跡

一、張深切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中之定位 ————— 23

二、關於民族意識之覺醒 ————— 24

三、「臺灣自治協會」時期 ————— 28

四、「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時期 ————— 29

五、戲劇活動與政治運動 ————— 31

六、「臺灣文藝聯盟」時代 ————— 33

七、《中國文藝》時代 ————— 36

八、返臺與歸隱 ————— 39

九、結語 ————— 41

### 第二章 楊基振及其時代：從日記看一位臺灣知識分子從戰前到戰後的心理轉變

一、楊基振與他的時代 ————— 47

（一）學生時期 ————— 47

（二）滿鐵時期 ————— 49

（三）華北時期 ————— 52

（四）歸臺後 ————— 57

二、日記的歷史書寫 ————— 58

（一）戰時華北地區臺灣人的交往圖譜與生活景象 — 59

（二）戰爭時局的認知情形與戰後經濟的動盪 — 60

（三）日本敗戰後華北國軍、八路軍與日本軍的角力關係 63

(四) 戰後旅居大陸臺灣人的財產問題與歸臺經過	65
(五) 「光復」後的臺灣諸般世態：二二八事件前後	67
三、結語	69

##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

### 第三章 〈藤野先生〉到臺灣：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

一、前言	79
二、魯迅的臺灣傳播	81
三、關於日文雜誌《新聲》月刊	89
四、「友好的象徵」：節譯版的〈藤野先生〉	95
五、結語	103

### 第四章 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像

一、前言	109
二、從一件殉情事件談起	110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117
四、致命的吸引力：當臺灣女子邂逅大陸男子	126
五、戰後臺灣社會像書寫：〈淡水河心中〉	132
六、結語	141
附錄、陶晶孫〈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情〉）	145

##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

### 第五章 國民性改造的構想：許壽裳與臺灣，1946-1948

一、前言	163
二、許壽裳的赴臺	164
(一) 教育文化背景	164
(二) 和陳儀的關係	166
三、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	170
(一) 臺灣省編譯館之設立及其目的	170
(二) 臺灣省編譯館的撤廢	175
四、許壽裳與臺灣文化協進會	177
(一) 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立與目的	177
(二) 許壽裳與協進會的關係	180
五、許壽裳與臺灣的魯迅傳播	182
(一) 許壽裳的魯迅研究	182
(二) 許壽裳的魯迅傳播	187
六、結語	190

## 第六章 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

一、前言	197
二、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之設立	198
(一) 陳儀的臺灣接收與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構想	198
(二) 許壽裳的赴臺及其臺灣研究構想	201
三、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成果	203
(一) 許壽裳的臺灣文化認識	203
(二) 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	207
(三) 臺灣省編譯館的廢止與臺灣研究組的成果	212
四、臺灣省編譯館撤廢後臺灣研究組人員的去向	219
五、結語	224

## 不在場の後殖民狀況

### 第七章 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一、前言	233
二、異鄉客的香港史：城市地圖的銘刻	234
(一) 由島至島：施叔青眼中的香港	236
(二) 虛構與歷史：重建百年香港	241
三、「日不落國」的殖民幻影： 施叔青的後殖民寫作策略	245
(一) 東方想像：蝴蝶的誕生	245
(二) 上帝／女王：信仰的絕對性	250
(三) 主導／宰制	254
四、文學史的位置：臺灣？香港？	258
五、結語	261
後記	265
參考文獻	271
索引	295

序章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2005年1月6日，日本《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不約而同登出一則訃聞，《讀賣新聞》的訃聞內容是「陳真（原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局播音員），4日因胃癌逝世北京，享年七十二歲。原籍臺灣，日本出生。1949年返回中國，長年以日語播音員活躍於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局，同時也擔任中國語講座，對促進日中相互理解貢獻很大。此外，也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日本NHK電視與廣播的中國語講座講師等。」《朝日新聞》的訃聞內容是「陳真（原NHK電視中國語講師），4日逝世北京，享年七十二歲。從1991年到2000年，受NHK之聘來日從事中國語教學。歸國後，發現罹患胃癌，多次住院治療。〔陳真〕係臺灣著名言語學者，與哲學家谷川徹三至交的陳文彬之次女，出生於東京。戰後前往中國，擔任日語播音員，也曾執教北京大學。」看完訃聞後，關於這位逝者引發我極大的關注，陳真到底是誰啊！沒想到過沒多久，即收到關西學院大學野田正彰教授寄來的新著《陳真——戰爭與和平的旅途》一書，才知道陳真原來就是戰後初期被稱為天才少女作家的陳蕙貞（1932-2005）。<sup>1</sup>

陳蕙貞1932年生於東京荻窪。父陳文彬（1904-1982），臺灣岡山人，為著名語言學者，母何灼華，嘉義人，日本東京的昭和醫學專門學校畢業。陳文彬祖父因牽涉西來庵事件被日警逮捕拷問致死，陳文彬於臺中一中畢業後，即留學上海復旦大學，習古文字學和語言學，畢業後留校繼續研究古文字學，自始至終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其後因與中共地下黨有接觸，接受潘漢年的領導，被汪精衛南京政府特務組織察覺，乃逃往日本，任法政大學中

<sup>1</sup> 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

文講師。1945年，日本戰敗，隔年陳文彬舉家返臺，在臺灣大學擔任教職並兼任建國中學校長，陳蕙貞隨父母返臺，插班臺北第一女中初中部。時值蘇新擔任《人民導報》總編輯，公開徵稿，陳蕙貞以〈日本歸來〉（日文）一文應徵，蘇新大為讚賞，立即於1946年3月7日、8日的《人民導報》上分兩天連載其文。<sup>2</sup>同年10月，在蘇新的呼籲下，集資成立「陳蕙貞文藝出版後援會」，印刷陳蕙貞從日本返臺前夕，利用等船期間寫成的半自傳式日文小說《漂浪的小羊》，並於正式出版上市之前應徵《中華日報》的小說徵文，獲得首獎，陳蕙貞因此被譽為天才少女作家。在《漂浪的小羊》中，陳蕙貞寫下了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經驗與見聞。可惜因同年國民政府廢止了新聞日語欄，故未能在《中華日報》連載，使得該書的流傳非常有限。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文彬被官方逮捕，九死一生，幾經輾轉，一家於1949年先後經天津抵達北京。其後，陳蕙貞改名陳真，長期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擔任日語播音員，文革期間，夫馬忠泰被下放西域，父陳文彬被下放湖北五七幹校，母追隨父親而去，一家四散，陳蕙貞獨留北京，繼續日語相關工作。文革結束後，一家才又團圓。1991年赴日，擔任NHK電視臺和廣播臺中國語教師。2005年病逝北京。

陳蕙貞返臺之前即開始日文寫作，返臺前夕她曾投書新聞《讀賣報知》，1946年2月14日、15日的《讀賣報知》上刊出其日文投書〈吶喊——從一位中國少女〉，文中陳蕙貞沉痛地指出：

<sup>2</sup> 陳蕙貞，〈日本より歸りて〉，《人民導報》（1946年3月7日、3月8日）。

漫長的血戰終於結束，我們中國獲勝了。眾所周知，蔣主席立刻指示全體中國人：「切勿以暴易暴」。但日本人真的把中國人當作戰勝國國民嗎？戰爭期間，我一直被日本人侮蔑為「清國奴」、「支那廢物」等等。但我一直確信著，我們中國榮獲最後勝利的日子終究會到來，想著直到那天，我們就不必再受此屈辱，因而忍辱負重至今。到了去年8月15日，這個輝煌的黎明終於降臨。

孰料，在日本戰敗後，我仍數度聽到「清國奴」的罵聲。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天我搭電車時，聽到一個日本人看到我衣服上的徽章，就偷偷跟他的同伴說：「支那人以為他們打贏了，就這麼囂張」。我當下義憤填膺地想要上前抗議，又想到跟這樣孤陋寡聞的笨蛋一般見識沒有意義而作罷。我並非有意強調特權意識，只是中國人佩戴青天白日徽章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日本人似乎大多認為日本是敗給美國，而非敗給中國吧？身為中國人，我對日本人的態度可說瞠目結舌。<sup>3</sup>

而被蘇新大為讚賞的日文徵稿〈日本歸來〉，陳蕙貞寫下她返回臺灣後的第一印象：

在我被喜悅的淚水模糊的眼中，最先映入眼簾的故鄉景象是什麼呢？竟是穿著破爛衣服，赤著腳，蓬頭垢面地在路旁賣東西的可憐孩子們，也就是和我同年紀，不，甚至是比我還小的孩子們拉著手推車的窮困場景。他們努力地大聲叫賣。

<sup>3</sup> 陳蕙貞，〈叫び——中國少女より〉，《讀賣報知》（1946年2月14日、2月15日）。轉引自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頁54-55。（筆者譯）

讓我感覺到，眼前的這副光景，就是曾受帝國主義極端壓迫之下的升斗小民之姿。<sup>4</sup>

陳蕙貞被譽為天才少女作家的半自傳式日文小說《漂浪的小羊》的時代背景，設定在 1936 年中國對日抗戰前夕到 1945 年日本敗戰為止的九年間，小說場景設定於東京與疏散區的山梨縣與新潟縣，以及極短暫的臺灣返鄉描寫。<sup>5</sup> 故事的主軸是書寫陳蕙貞一家父母姊妹四口人在東京生活的半自傳式小說，當然細節上有虛構的部分，但是在描述被歧視的部分毋寧是真實的敘事：

有一天放學後，姊妹倆並肩回家的途中，慧如突然聽到後面傳來奇怪的聲音，便說：

「那是什麼聲音啊？」

慧真也停下腳步：

「好像真的有什麼聲音呢？」

說著說著，聲音越來越大了。

「喂！喂！」

「咚咚咚！」（注：「田」姓日語發音諧音）

「廟會大鼓咚咚響！」

兩人發現他在取笑她們的姓氏，但覺得「不碰則無事」，於是加快了腳步。而那體型最壯碩的男生以頭頭的氣勢，拿著

<sup>4</sup> 陳蕙貞，〈日本より歸りて〉。（筆者譯）

<sup>5</sup>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陳蕙貞文藝出版後援會，1946年）。筆者手上的《漂浪的小羊》複印本是任教嘉南藥理大學的王耀德教授於 1998 年夏致贈筆者的，在此謹致謝意。此書經過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與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的努力，2005 年 4 月由臺北南天書局復刻出版。

棒子大喊：

「清國奴！」

那些欺負人的孩子，聽到這句可以罵人的話，便紛紛喊起：

「清國奴！」

「支那人！」

「沒用的支那人！」

「清國奴！」

「清國奴啊！」

被叫「咚」都還忍氣吞聲的慧真，一聽到「清國奴」，就像是被這句話刺中心窩一般，立刻反唇相譏：

「為什麼要叫我們清國奴？中國人有什麼不對？」

比較溫和的慧如，拉住妹妹的書包帶說：

「別說了，小不點，不趕快回去，只會繼續被他們欺負。」

眾人沉默了半晌之後，帶頭的孩子跳了起來：

「你們是在囂張什麼？給我打！」

話聲一落，欺負人的孩子們又開始鼓譟，並且紛紛拿起石頭丟向她們。慧真這時歇斯底里般地想衝過去反擊，卻被姊姊拉住了。為了不讓等她們回家的父母擔心，只好悻悻地咬著牙走回家。石頭只是落在她們身後跳躍著。此時，慧真開始覺得：「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是如此野蠻與殘忍，且無情而傲慢的國民」。日本如此不自量力，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強國，也是文化水準第一的國家，於是便開始驕傲自滿，接著從中國開始，陸續出兵侵略各國，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想法已經深深鐫刻在慧真幼小的心靈中。這並不是別人教她

的，而是一個中國少女對於日本人的客觀觀察。如果日本人明確地說日本是最優秀的國家，這是巧妙的自欺欺人，也是可怕的詭辯。但日本人恐怕會否定這個說法，這是因為日本人缺乏冷靜思考與準確觀察事情的眼光。<sup>6</sup>

小說中對日本國家體制與日本國民性的反思隨處可見，這些反思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可供借鏡。筆者長年關注戰後初期前後的歷史議題，陳蕙貞及其家人的經歷，可說是二十世紀臺灣人生命史的類型之一。截至今天，關於反覆於臺、日、中二十世紀臺灣人的離散與回歸——回歸中國，或回歸臺灣，或繼續漂泊——有其多元性與複雜性，在歷史的翻弄過程中，不容易在複雜的近代國家過程中形成的身分認同對錯是非的問題，給出一刀切的分明答案。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臺灣的離散經驗。<sup>7</sup>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臺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

<sup>6</sup> 陳蕙貞著，王敬翔譯，《漂浪的小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頁87-88。

<sup>7</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25-27。

下的普遍現象。」<sup>8</sup> 因此，臺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臺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分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臺灣十八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筆者過去曾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一書中，討論戰後臺灣在戰後初期的政權轉移過程中，從原先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轉變成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的文化重建政策。然而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變遷與新的文化政策，不單單只是國籍改變、領土重整，以及人民的再民族化而已，制度上的變遷，落實在具體的人民生活中，牽動的是具體的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乃至重新學習的過程。認同的形成或是身分的轉變，也留下了種種的疑惑與糾葛。歷史中的生活者，在大社會的政治結構變遷中，個人進退出處之際，存在著多方的路徑，以及各種離散又回歸的人生經驗。這也是本書希望能在先前的制度分析之外，進一步透過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的轉譯與流通，文化意義的

---

<sup>8</sup>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2013年），頁33-47。



生產與歧異，在場與不在場的參與，探究在二十世紀屬於臺灣的離散與漂泊、入境與越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本書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在「故鄉與他鄉」內，我分別以橫跨戰前與戰後的文化人張深切與楊基振的人生軌跡，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在1920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臺灣文化身分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臺灣，更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臺語電影創作者。在政治活動與文化工作之間的抉擇，在臺灣與中國南北之間的遷移，竟也與其政治上的活動相次交疊。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臺籍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洲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我們用以分析張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而已，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他們又如何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則是以兩個文本在戰後臺灣的登場，呈現戰後臺灣的存在在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中歷史與文化的糾結。其一是魯迅的名著之一〈藤野先生〉，摘錄登載在終戰初期待遣返

日僑刊行的雜誌《新聲》，所引發的日僑之間對原先代表中日友好的〈藤野先生〉摘錄問題的責難與批評。魯迅的作品，戰前早已被介紹到日本與臺灣，但是在 1945 年戰爭剛結束之際，此一文本卻引發了在臺灣的日僑內部關於戰爭責任問題與未來新歷史要如何展開的討論，在反省戰爭的同時，卻存在了在新歷史展開之際，如何面對過去歷史問題，似乎仍可見之於今的兩種態度——面對真實的過去，即便可能對當下造成困擾也要呈現完整的歷史；或者為了建立當下的友好關係，有必要遮蔽令人不愉快的部分歷史。魯迅的文本在戰後初期的時間點上，意外地在臺灣成為日僑之間關於未來歷史的批評素材，輻射了未來的兩種新歷史的路線。魯迅文本的越境，與其意義再製，也令人不禁想要進一步思考當代表中日友好符碼的文本產生效果之後，臺灣的位置何在的延伸問題了。另一文本是由曾經參與左聯的陶晶孫，戰後來臺，任職於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之際，取材社會新聞所創作的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中文題為〈淡水河殉情〉）。陶晶孫本身就是一個漂泊的人物，從中國到日本再回到中國，戰後來臺幾年後為躲避白色恐怖的網羅，逃往日本，最後病逝於日本。陶晶孫所取材的男女殉情故事，在 1950 年代的臺灣，引起了從官方媒體到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種種解釋，這些社會賢達們也借題發揮，使之成為國族文化說喻教化故事。陶在小說中設定了代表一般臺灣人民間輿論的場所產生的對應版本，巧妙地用小說呈現了當時戰後臺灣交織的官民、族群、性別、語言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文本的越境，從社會事件到新聞事件，再到小說文本，竟也有了一重又一重的文本意義的衝突與疊合。呈現出多重意義的小說文本，似乎也與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疊合與葛藤，若合符節，互相呼應。

如果魯迅的文本〈藤野先生〉曾經在戰後臺灣初期的日僑中間，引發關於未來可能性的辯論，那麼戰後系統性地介紹魯迅，並試圖推廣魯迅的精神作為戰後臺灣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內涵的，則不能不進一步討論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了。在「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單元中，筆者分別討論許壽裳戰後來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以下簡稱編譯館）時，在具體的工作背後所具有的思想，以及其所採用與延續的日治時代的臺灣研究業績。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推動的文化政策，除了「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外，當時負責陳儀政府重要教育文化政策的編譯館長許壽裳的構想，主要是將臺灣的戰後重建，整體性地納入魯迅曾經提倡的中國國民性改造的構想中。因此，許壽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也是魯迅思想與作品的重要推動者，在許多文化、教育與宣傳的場合，皆再三強調魯迅精神的人道主義與戰鬥的現實主義。若與等待遣返的日僑的魯迅文本閱讀並置，魯迅成為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不在場的參與者，呈現多重的意義。雖然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以再中國化為主要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曾經留學日本的許壽裳，深知日本近代學術的成績，在編譯館的工作中，增加了「臺灣研究組」，聘用、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知識性與科學性的臺灣研究。而此一傳統，在1947年中編譯館撤銷改編、許壽裳於1948年在家中遭難之後，仍有所延續。

最後在「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閱讀與分析，藉由施叔青在小說中重建的香港史中的性別、殖民與慾望的交織，以及小說作者的在場與不在場，作為同樣有著殖民經驗的臺灣與之相互參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糾葛，即便小

說比歷史更真實，最終小說家還是遠離了。不在場，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到過往歷史的繁華或頹圮，甚至說故事的人，都不在了。在人事皆非之後，舊地重遊，舊事重提時的不在場狀況，或許最終是充滿著離散經驗的前殖民地，在殖民結束之後的最典型後殖民狀況。

臺灣的歷史，交會在近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的擴張中，以及位處於不同國族國家的交涉互動的大小板塊之間，在重層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重的邊界，也因此造就了多線的路徑。這些歷史中形成的境界線，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實體的、有象徵的。政治經濟領域的國境線，與文化身分的認同邊界，彼此交錯。重層的歷史與多重的邊界，形成了生活在其中的，擁有越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觀意願的文化資本的知識人，其生命史展開的多元路徑。

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他們在分裂動盪的時代，或為求學之故，或因政局因素，漂泊異鄉，也使原先可能固著的文化產生流動。這些文化人的際遇呈現了近代東亞離散經驗。而在這樣的大變動時期，卻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均可見一斑。一方面，雖然國民國家的文化政策試圖將文化國族主義化，建立文化上的國界以及民族界線。但同時，從文化傳播的路徑來看，自願或他力導致的移動或離散，卻也產生打破地域壁壘劃分的可能性。東亞城市如上海、北平、大連、重慶、延安、臺北、東京，甚至延伸至南洋諸地，無不因為人的遷徙、文本的傳譯而串聯起了一個交混又密集的文化網絡。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可以說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在臺灣、滿洲國、香港、臺北、北平，不受一地所侷限。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他們的出身各異，其中有來自臺灣的張深切、楊基振，有中國的陶晶孫與許壽裳，也有在臺日僑。然後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然後終戰後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有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了越境的軌跡，前往陌生的地方，發展了事業。他們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 故鄉與他鄉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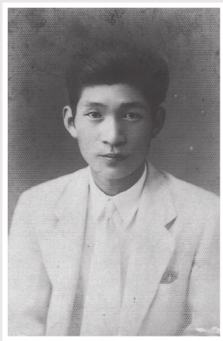
臺大出版中心

## 第一章

# 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 自傳作品所呈現的人生軌跡

臺大出版中心





1-1 1931年，張深切赴上海前夕留影。  
（「文經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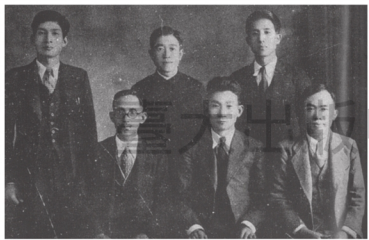
1-2 1932年3月，張深切（立者右3）與上海《江南正報》社長山田純三郎（前排右3）及同仁合影於報社前。（「文經社」提供）



1-3 1935年，張深切與「臺灣文藝聯盟」重要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張深切、作家妹妹張碧珮、吳天賞；後排左起：楊遠、張星建。（「文經社」提供）



1-4 1936年5月，張深切（後排右3）與文友合攝於「臺灣文藝聯盟臺北支部發會式」。前排：張星建（右3）、吳瀛濤（右4）。（「文經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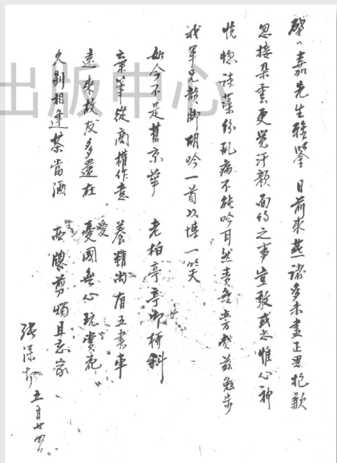
1-5 1936年12月，張深切與文友和來臺訪問的中國作家郁達夫合影。坐者左起：林文騰、郁達夫、張星建；立者左起張深切、臺灣總督府特派員、李獻璋。（「文經社」提供）

1-6 1939年，張深切於北京藝術專科學校任教時期的留影。（「文經社」提供）





1-7 1939-1940 年間，旅居北京  
時期的張深切留影。（「文  
經社」提供）



1-8 1940 年代初期，張深切致楊  
肇嘉的親筆函。（「文經社」  
提供）



1-9 1943年，張深切與友人於北京合影。左起：張深切、佚名、楊基振、楊肇嘉、吳三連。（「文經社」提供）

##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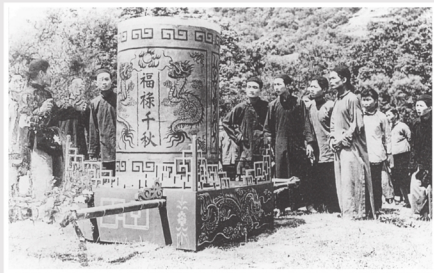
1-10 1938-1945年間，張深切（前排右1）與張我軍（後排左1）、洪炎秋（後排左2）等友人合影於北京。（「文經社」提供）



1-11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張深切與家人祭拜養父張玉書墓。左起：妻洪愛月、張深切、子張孫煜、妹張碧珮。（「文經社」提供）



1-12 1957年，拍攝電影《邱罔舍》時的張深切。（「文經社」提供）



1-13 1957年，電影《邱罔舍》劇照。主角邱罔舍做假大砲欺騙村人。（「文經社」提供）

## 一、張深切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中之定位

張深切（1904-1965）是臺灣日治時期活躍的政治運動家之一，<sup>1</sup>1924年於上海參加「臺灣自治協會」，1927年在廣州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從事抗日運動。後來轉向文化運動，1930年在臺中組織「臺灣演劇研究會」，1934年擔任「臺灣文藝聯盟」委員長，發行《臺灣文藝》。中日戰爭期間再度前往中國，1939年在淪陷區的北京創刊《中國文藝》。日本戰敗後返回臺灣，就任臺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被誣告為共產黨首腦而避難於山中。雖然後來證實無辜，卻對公職喪失興趣，之後就專注於著述。他於戰前戰後留下的許多著作，現已成為研究戰前臺灣政治運動及文化運動之珍貴資料。

眾所周知，民族意識可以說是顯示殖民地統治下知識分子立場的重要標幟，張深切曾承認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另一方面，日本學者木山英雄也曾指出，文藝對張深切而言，似乎始終止於政治運動之外衣。<sup>2</sup>然而，政治與文學對張深切而言，到底是什麼呢？這是頗耐人尋味的，本文試圖透過張深切的自傳作品加以解釋。

日治時期之臺灣知識分子，因當時之教育背景，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傳統型知識分子，即受中國之傳統教育的人。日本據臺初期主要教育機關的書房，即是培養傳統型知識分子的地方。書房教師多數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因此，書房學生當然也受中

<sup>1</sup> 關於較完整的最早張深切傳記先行研究，有林載爵，〈黑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碑〉，《夏潮》第18期（1977年9月），頁65-76。

<sup>2</sup>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の周作人》（東京：筑摩書房，1978年），頁181。

國之傳統教育。1898年是書房教育的全盛期，當時臺灣共有書房一千七百零七所，教師人數為一千七百零七人，學生人數為兩萬九千八百七十六人。<sup>3</sup>臺灣總督府於同年發布公學校令，在各地設立公學校，收容臺灣學生，其學生人數至1904年始超過書房之學生人數。<sup>4</sup>

傳統型知識分子基本上受中國傳統教育，有根深柢固的中華思想。因此，他們對日本人之統治自然懷有不滿，卻沒有反抗的勇氣。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似乎也不使他們具備從事政治運動的能力和動機。因此，他們都將自己置身於政治運動之外。臺灣知識分子之第二種類型為新興知識分子，即其大多數接受日本教育，與以往知識分子不同類型，他們是具備近代教養之知識分子。<sup>5</sup>新興知識分子是殖民地新教育所孕育的階層，一般而言，都是覺醒於民族意識的人。在抗日運動中，他們都充分發揮了知識分子的文化性、社會性、政治性功能。1920年以後，臺灣抗日運動的主要旗手正是這群新興知識分子，張深切即是屬於這種新興知識分子。

## 二、關於民族意識之覺醒

張深切於1904年出生於南投。五歲過繼給在南投廳草屯支廳

---

<sup>3</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刊行，《臺灣省通志》卷5〈教育志〉（1970年），頁142-146。

<sup>4</sup> 弘谷多喜夫、広川淑子，〈日本統治下台湾朝鮮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の比較史的研究〉，《北海道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2號（1973年），頁22-26。

<sup>5</sup>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年），頁24。

經營樟腦館的詩人張玉書，張家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1914年，臺灣民族運動開路先鋒的臺灣同化會成立，這是曾擔任自由黨總裁的板垣退助，接受林獻堂等人之邀請來臺，大論特論「日支親善之橋樑」，主張內臺同權而誕生的組織。張深切之父親張玉書亦是臺灣同化會之一員。

張深切七歲屆學齡時，他的父親依照傳統送他入書房，使他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到十歲時才把他送到公學校。晚年的他曾經有如下之語：「我到十四歲的時候，還不曉得國家是什麼？民族是什麼？昏昏沌沌過了日子。」<sup>6</sup>

當時日本在臺灣採取的初等教育政策是雙軌制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學校分為只收臺灣人之公學校與只收日本人的小學校。直到1941年發布「國民學校令」後，小學校與公學校始被合併而改稱為國民學校。初等教育畢業後，日本人與臺灣人間之教育依舊有差別，以臺灣人為對象的中等教育之學校，數量極為有限。當時的臺灣人有產階級望子成龍之風氣極盛，因為聽到「在內地之母國人對遠來之人非常厚遇」的風聲，所以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一時蔚為風氣。

1917年8月，張玉書聽從好友林獻堂之建議，讓張深切負笈日本（東京）。在東京，張深切被編入傳通院礫川小學校，並且寄寓於礫川小學校教務主任長塩的家。入學礫川小學校後的張深切，在親切的老師和同學們的圍繞之下，不到半年之間，不要說外觀，

---

<sup>6</sup> 見張深切，《張深切全集》卷3《我與我的思想》（臺北：文經社，1998年），頁64。以下全集出處同，只略寫其書。



連精神上都變成了道地的日本人。晚年的他在自傳中也承認：「自民國六年至八年之間，我不但在形式上做過日本人，就是在精神上，也確實忘掉了我是個黃帝的子孫」以及「我覺悟我應該做日本國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學習日本人的民情風俗習慣，除此之外，不能有別的奢望。」<sup>7</sup>當時的張深切可以說相當受到日本民族意識的浸透。

1919年，張深切升入豐山中學，這次也是寄寓於日本老師的家。當時日本的臺灣學生逐年增加，到1915年時已達三百餘人。自1916年春起，以治療胃病為目的，前來東京長期居留的林獻堂，開始與這群留學生有所接觸。1918年春天，期望撤廢〈六三法〉的留學生組織了啟發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1919年時，韓國發生三一獨立運動，中國則發生五四運動，對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有極大刺激和影響。當時張深切只有十四歲，而且一直都是住在日本老師家中，因此，他與當時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界是有一段距離，如果說他會參加學生運動，倒是令人匪夷所思。他自己也於晚年承認，當時「事實上什麼都不曉得」。<sup>8</sup>但是，不久即發生使他在思想上產生極大轉變的事件。

這一年的某日，正在學校練習劍道時，他與教練發生爭執，並且被罵為「清國奴」。此外，中學有「東洋史」這門課，使他有了認識中國史的機會。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讀了祖國的歷史，好像見著了未曾見面的親生父母，血液為之沸騰，漠然的民族意

---

<sup>7</sup>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頁74。

<sup>8</sup> 張深切，《里程碑》（上），頁182。

識，變為鮮明的民族思想。」<sup>9</sup>

1920年，張深切由日本人家庭遷移到高砂寮，高砂寮位於東京小石川區的茗荷谷，是臺灣總督府於1912年為臺灣留學生蓋建的宿舍。高砂寮是臺灣留學生時常聚集的地方，也可以說是當時東京臺灣學生運動的搖籃，張深切在這裡認識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型人物。當時對東京臺灣學生運動贊助基金的人，除了林獻堂以外，尚有蔡惠如。蔡為漢民族主義者，對當時的留學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時常規勸留學生學北京話，使用中國年號以及將中國稱為祖國。張深切也是受其影響的留學生之一。

1922年，張深切轉學至青山學院中等部。晚年的他承認，當時自己已經算是個民族主義者了。那時正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激烈活動的時期，此外，以推進文化啟蒙面之實踐活動為目的的臺灣文化協會，也於一年前成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之活動，除了提高臺灣青年關心民族問題與社會問題之外，更帶動了前赴中國大陸留學的熱潮。1920年赴中國之臺灣留學生只有九十名而已，但是到1923年則激增為二百七十三名。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分析其原因是：

文化協會活動之結果，〔使台人〕將中國思慕為民族祖國，以中國四千年之文化傳統為傲且對之憧憬，期待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發展與成功，並且普遍瀰漫著臺灣脫離日本統治之日將為時不遠的見解。此一情勢徵諸彼等之

---

<sup>9</sup> 同上，頁166。

言動甚為明顯，而此風氣之抬頭為其最有利之原因。<sup>10</sup>

### 三、「臺灣自治協會」時期

1923年底，張深切懷著對祖國中國之憧憬，由臺灣前赴上海。張深切對初抵上海一事，晚年做如下之述懷：「初踏著祖國的大地，覺得異常溫暖，滿腔的熱血沸騰了。」<sup>11</sup>

當時上海有許多臺灣青年，其中最為活躍者有蔡惠如、謝廉清、彭華英、蔡孝乾、許乃昌等人。1923年10月12日，蔡惠如、許乃昌、謝廉清等人聯合居住於上海的十餘名臺灣留學生創立「上海臺灣青年會」，其會員人數不久之後就達五十名。「上海臺灣青年會」高唱「臺灣獨立」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24年3月，寄寓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羅豁家的彭華英等人與朝鮮人呂運亨等人，匯合許乃昌等人創立共產主義系統之「平社」。另一方面，活動一段時期後陷於停滯的「上海臺灣青年會」，自1924年5月起以蔡孝乾為中心開始致力重建。同年5月，與「上海臺灣青年會」之重建平行，該會一部分幹部與「平社」之臺灣人聯合創立揭櫫「臺灣民族」獨立自治的「臺灣自治協會」。

張深切是「臺灣自治協會」創始者之一，該會重要幹部還有蔡孝乾、林維金、洪緝洽、謝雪紅等人，張深切和上述同志在上海務本英文專科學校舉辦演講會，批判臺灣總督府政治。同年6月，

---

<sup>10</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本文引用復刻版《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風林書房，1969年），頁174。

<sup>11</sup> 張深切，《里程碑》（上），頁242。

「臺灣自治協會」、「上海臺灣青年會」及朝鮮臨時政府人員約一百三十名，聚集舉行「臺韓同志會」成立儀式，高喊「臺韓民族」之自決。

如上所述，當時在上海的臺灣人組織可以說相當激進。綜觀臺灣人這些團體，他們無論是哪一個組織，全都反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消極運動，主張臺灣獨立與自治。對上海時代之經驗，張深切雖然自道：「我逗留上海的時間，沒有讀過什麼書，研究過什麼學問，胡鬧胡混，只跟青年們參加一些運動，學會了社會運動第一課。」<sup>12</sup> 但是，他確實在上海踏出社會運動之第一步。

#### 四、「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時期

張深切於1924年10月底，暫時回到臺灣從事演劇活動，到1926年才再度前赴上海。此時的張深切以經商為目的，曾經往來南京、蘇州等地，似乎沒有投入任何政治運動。但是，他的生意不久即血本無歸，身無分文，遂前往廣州投身革命。「身上金盡，又沒有面目重返家鄉，歸不得，也留不得，迫不得已只好投廣州去參加革命」，他曾經有如此之述懷。<sup>13</sup>

張深切抵達時的廣州，是中國國民黨之根源地，且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當時聚集於廣州的臺灣青年只有四十人而已，他們大部分就讀於黃埔軍官學校或中山大學。張深切與當時臺灣青年中較為活躍的張月澄、郭德欽等人，合力組織「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但是，不久後由於內部日趨複雜化，且發生主導權之爭奪，因而在

<sup>12</sup> 同上，頁268。

<sup>13</sup> 同上，頁309。

張深切的提案之下，於 1927 年 3 月 27 日將聯合會改組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這個新團體徹底批判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消極理論，並且排斥對日本帝國主義之任何妥協，逐漸顯露臺灣獨立之主張傾向，其後更揭起了臺灣獨立革命運動之旗幟。

1927 年 4 月，張深切返回臺灣籌措資金時，適逢臺中第一中學校發生學生運動。他參與這起學生運動，成為學生運動作戰委員會之領導者。另一方面，蔣介石於這一年的 4 月發動清共，青年團於 6 月間被認定為左翼團體，遂被命令解散。據說，當時日本官憲準備於 1927 年春進行檢舉，因而派特務人員到廣州。6 月，日本官憲到廣東對青年團鎮壓後，於臺灣、上海、門司等地大肆檢舉四散的青年團成員。此際，張深切也因參與臺中一中學生運動事件而遭逮捕。至 8 月時又有一次大檢舉，而這一次被檢舉的人數達六十四人。1928 年 2 月 21 日，張深切等人以觸犯治安維持法罪名被起訴。同年 12 月 4 日，張深切於一審被判三年徒刑，後來於 1929 年 4 月 15 日二審被改判為二年徒刑。他於戰後說，雖然於繫獄期間曾經被要求「轉向聲明」（聲明思想轉變，特指有左翼思想者），但他斷然拒絕。戰後，張深切回顧廣州時代的往事，承認「在廣州所醞釀的思想，雖然很幼稚，而且還帶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尤其是各種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殘渣留存不少」。<sup>14</sup>

張深切的上海、廣州時代，參與了他一生中最初且實際的政治運動。然而，他為何人在中國而主張臺灣獨立呢？關於這一點，他後來所做的說明是：「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

<sup>14</sup>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頁 80-81。

成功，夢也做不到中國會戰勝日本而收復臺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句口號的目的，第一是要順應民族自決的時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臺灣人絕對不服從日本的統治，無論如何絕對要爭取到臺灣復歸於臺灣人的臺灣而後已。」<sup>15</sup>意即因為臺灣「回歸祖國」是絕無希望的事情，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張臺灣獨立。

### 五、戲劇活動與政治運動

1930年8月，張深切出獄後，創立了「臺灣演劇研究會」戲劇團體。依據統計，1923年至1936年之間，由臺灣人設立的戲劇（新劇）團體約有十多個，其中當然含有不以政治活動為目的的純粹劇團。

「臺灣演劇研究會」會員共有二十七名，由陳新彬擔任研究會委員長，張深切雖然只擔任委員，實質上卻是指導者。依據他自己的說法，「臺灣演劇研究會」創立之動機是：「這一劇團的組織是根據我過去常在報紙上主張『文藝大眾化，須從演劇做起』的理論拿來實踐的。因為只在文學上論文藝大眾化，舉不出多大效果，需要透過演劇，從舞臺上喚醒民眾與文盲，才能通俗普遍化。」<sup>16</sup>「臺灣演劇研究會」成立這一年的11月，他在臺灣樂舞臺上演出自己編寫劇本的《暗地》和《接木花》。依據張深切的回顧，當時的狀況是：「開幕前，便擠滿了觀眾，警察署加派警察和『臨監官』各帶劇本嚴陣以待，警告我們不得超出劇本臺詞，否則即時中止。我們演出的有《暗地》《接木花》及其他數齣節目，……演完後第二

<sup>15</sup> 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頁95。

<sup>16</sup>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524。

天，警察署傳我到高等課說話，問我編《暗地》和《接木花》的用意何在？……他們看穿《接木花》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sup>17</sup> 由此可見他成立「臺灣演劇研究會」，並不是完全出自於藝術至上主義。遺憾的是這些劇本迄今未見傳本，因此無法做較深入之分析。

張深切對戲劇產生興趣是於留學日本期間。依據他在 1935 年及 1961 年的前後回顧，他說：「彷彿記得，當在 1921、22 年的時候吧！我們曾在東京發表過一次遊藝程度的演劇。……演《金色夜叉》，到這時候我的印象還異常深刻。我也記得那時候我們最受日本文學的刺激，大概是《金色夜叉》與《不如歸》兩作品，或德田秋聲、德富蘆花與有島武郎、夏目漱石等一些作品的程度耳。」<sup>18</sup> 以及「我得了這次（上述於東京之戲劇活動）的經驗，對演劇漸感興趣，後來在故鄉組織文化劇團，配合文化運動巡迴公演。又（民國）十九年（1930）出獄後，在臺中創立臺灣演劇研究會。……這一連串的演劇關係，究其淵源，可以追溯至東京中華青年會館的演劇為濫觴。」<sup>19</sup>

由以上敘述得知，張深切對戲劇產生興趣，應該是在 1921、1922 年時，也就是他轉入青山學院中等部以後的事情。關於青山學院時代，他晚年曾回憶說：「平時我上課的時間，很少聽講，只

---

<sup>17</sup> 同上，頁 526。

<sup>18</sup> 張深切，〈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收於《張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頁 177

<sup>19</sup> 張深切，《里程碑》（上），頁 200。

是垂頭讀文學作品，很想把所有的文學作品讀破為快。」<sup>20</sup>由此可見他當時對文學極大關心。當時亦是民族意識覺醒的時期，他的民族意識與文學、戲劇興趣之覺醒，在時期上可以說互為相通。

而在當時的臺灣，利用戲劇活動從事文化啟蒙工作，意味的是利用戲劇活動從事政治運動。1921年10月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是以從文化啟蒙面推進實踐活動為目的，成立大會舉行時，參加人數有一千零二十二人。文化協會廣收各派系之人才，巡迴各地舉辦演講會。「臺灣文化協會」於1923年10月舉行第三屆定期總會時，曾經決議「為改弊習，推展高尚趣味起見，特開活動寫真會、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sup>21</sup>暫時由上海返回故鄉草屯的張深切，立刻與同鄉前輩、臺灣文化協會理事長洪元煌合力組織文化協會外圍團體「草屯炎峰青年會」，又於翌年7月創立以利用戲劇啟發民眾思想為目的之「草屯炎峰青年演劇會」。該團曾經演出由張深切編劇之《改良書房》、《鬼神末路》、《愛強於死》、《舊家庭》及《人》等劇。但是，遺憾的是迄今無法取得劇本，因而無從知道其內容如何。

由以上敘述可以窺知，張深切於1930年組織「臺灣演劇研究會」，絕對不是偶然的。至少在1924年前後，他應該已經思考到文學活動亦可以作為政治活動的手段。

## 六、「臺灣文藝聯盟」時代

1920年代後半，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急速高漲，1927年「臺

<sup>20</sup> 同上，頁232。

<sup>21</sup> 蔡元培等撰，《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1987年），頁294。



灣文化協會」也左傾改組，被新文協逐出的民族主義左派與右派人士遂組成「臺灣民眾黨」，1928年「臺灣共產黨」成立，1930年「臺灣民眾黨」內部之穩健派重新組織了「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處在這種情勢下，農民組合以及勞動組合之組織化也有所進展，但是在臺灣總督府的鎮壓下，「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共產黨」都陷於潰滅狀態，「臺灣民眾黨」也在1931年2月被禁止結社。在這種狀態下，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1931年時，臺灣之政治、社會運動完全潰滅了。

但是，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之數年間，卻是臺灣人文學成果極為豐碩的時期。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NAPF）的影響之下，臺灣人與日本人於1931年合作組織「臺灣文藝作家協會」，並且創刊機關雜誌《臺灣文學》。1932年則有完全由臺灣人成立之文藝組織「南音社」，同時創刊雜誌《南音》。許多文學藝術團體以此為契機，陸續成立。1933年，在東京之臺灣人留學生組織「臺灣藝術研究會」，並且創刊雜誌《福爾摩沙》。受其觸發之居住臺北的學生團體，遂於臺北成立「臺灣文藝協會」，並且創刊雜誌《先發部隊》。至1934年時，作為全島性組織之「臺灣文藝聯盟」更於臺北成立，同時創刊機關雜誌《臺灣文藝》。

「臺灣文藝聯盟」成立後，「臺灣藝術研究會」與該聯盟合流而改名為「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臺灣文藝協會」也准許會員以個人身分參加聯盟，因而不久就被聯盟吸收。

關於「臺灣文藝聯盟」之結成，根據張深切的回顧：「民國廿三（1934年），賴明弘和幾位朋友勸我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代替

政治活動。我看左翼組織已經被摧毀，自治聯盟也陷於生死浮沈的田地，生怕臺灣民眾意氣消沉，不得不決意承擔這個帶有政治色彩的文藝運動。」<sup>22</sup> 因此，由當時的政治狀況來看，「臺灣文藝聯盟」可以說是臺灣之政治、社會運動被破壞後，作為最後之據守點的統一陣線吧！

「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時，當初是推賴和當委員長的，但賴和沒有接受，因而改推張深切為委員長。從參加臺灣文藝聯盟的名單來看，當時傑出的臺灣作家，幾乎全都聚集在這個統一陣線的旗幟之下。「臺灣文藝聯盟」成立後發表的宣言，充分顯示他們成為文學運動發起人之主要動機：

自1930年以來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地深刻下去，到現在，已經造起舉世的「非常時期」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得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墜在困窮的深淵底下；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圈的一角的咱們臺灣，也已經是受著莫大的波及了。大家若稍一回頭去把咱們臺灣過去的文化狀況一看，便得明白多麼的落伍了。<sup>23</sup>

這個宣言反映的是，當時臺灣作家對臺灣本身之認識。他們認為在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之下，臺灣已經淪於谷底。臺灣社會陷於大變動時，臺灣的文學活動腳步已經遠遠落於人後了。

「臺灣文藝聯盟」同時提倡臺灣作家之創作精神，必須以臺

<sup>22</sup> 張深切，《里程碑》（上），頁609。

<sup>23</sup> 賴明弘，〈臺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臺北文物》3卷3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4年），頁60。

灣社會為主體，張深切就極力主張：「臺灣文學不要築在於既成的任何路線上，要築於臺灣的一切『真、實』（以科學分析）的路線上，以不即不離，跟臺灣的社會情勢發展而進展，跟歷史的演進而演進。」<sup>24</sup>

然而，統一陣線之「臺灣文藝聯盟」卻於1936年分裂。這是張深切與楊遠在意識型態上之不一致所帶來的結果。《臺灣文藝》創刊後，楊遠成為日文部門之編輯。張深切在意識型態上是民族主義者，認為臺灣社會之不公平，全都起因於日本帝國主義之壓迫。此外他主張的是，所有的作家必須站在同一聯盟陣線上。而楊遠在意識型態上是社會主義者，他所看到的是臺灣社會內部之結構性矛盾，階級壓迫遠在民族壓迫之上。因此，他主張的是，必須支持農工運動，文學作品則必須以無產階級為立足點。楊遠後來退出「臺灣文藝聯盟」，創刊《臺灣新文學》。以楊遠、賴和、賴明弘為首的許多左派有力文學者退出後，「臺灣文藝聯盟」遂逐漸弱化，《臺灣文藝》於1936年8月出完3卷7號、8號合併號（通算16號）後，停止發行，聯盟本身之活動也趨於消滅。

## 七、《中國文藝》時代

《中國文藝》是1939年9月於日軍占領下，在北京創刊的雜誌。這本雜誌雖然是由日本軍方出資，擔任主編和發行人的卻是張深切。

1937年爆發的中日全面戰爭，對臺灣人而言具有雙重意義。大部分臺灣人的祖先都是從中國大陸移住臺灣的，在這場戰爭中，

<sup>24</sup> 張深切，〈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頁168-181。

臺灣人應該為哪一方出力呢？另一方面，日本人不會因中日戰爭而敵視臺灣人嗎？臺灣人可以說陷於進退兩難的處境。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張深切，大概多多少少也面臨這種處境吧！

「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後，張深切對於臺灣的一切行動都被特高（「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專門取締思想犯）監視。他即使表面上放棄政治活動，從事「臺灣演劇研究會」以及「臺灣文藝聯盟」之文藝活動，仍然無法脫離特高之監視和干涉。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對臺灣的文化活動之取締更趨強化，張深切在臺灣可以說絲毫沒有動彈的餘地。結果，他只好決心離開臺灣前赴「淪陷區」的華北。由於當時臺灣人擁有日本國籍，因此，前往日軍占領下之「淪陷區」，實際上沒有什麼困難。何況在當時的「淪陷區」，屬於「漢族出身之日本帝國臣民」這種特異存在的臺灣人身份，因為被視為「中日橋樑」的關係，所以在謀職上相當容易。1938年3月，抵達北京後的張深切，很快就謀得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訓育主任的職位。

關於《中國文藝》的創刊，依據張深切之回顧，他是經由日本美術評論家一氏義良之介紹，而認識華北最高司令部高級參謀堂ノ脇光雄中佐。堂ノ脇有出版文藝雜誌之計畫，有意讓張成為其副手。張深切與軍方之關係始自何時，這一點無從查考。但是，此事可視為日本當局在「滿洲國」所行的文化工作之延長線，因此，如同「滿洲國」各機關之起用臺灣人，張深切由於有能力扮演「中日橋樑」的角色，而且又是一有文筆才華的臺灣人，因而被重用。

依據張深切的回顧，當時他曾經對堂ノ脇提出四個條件：

1. 編輯方針和內容不受任何干涉。
2. 雜誌裡絕對不刊登任何宣傳標語。
3. 保持純文藝雜誌的形態，不作主義思想的宣傳。
4. 不加入其他新聞雜誌社所結成的團體做政治活動。<sup>25</sup>

據說，堂ノ協對之全部允諾。事實上，張深切主編時期的《中國文藝》僅刊登散文、隨筆、小說、詩以及有關中國戲曲、繪畫文章，是一綜合性文藝雜誌，幾乎沒有任何政治色彩。此外，張深切回憶說，《中國文藝》創刊之際，周作人曾經暗中有所參與。<sup>26</sup> 張與周作人結識，似乎是經由在周作人周邊的臺灣同鄉張我軍以及洪炎秋等人之介紹。<sup>27</sup> 周作人和張我軍後來每期都發表文章於《中國文藝》。

張深切在《中國文藝》創刊號「創刊詞」上宣稱：「水雖善能活人，同時也善能殺人，文化也是一樣，苟不善融洽而治理之，即文化之流毒也，不下於洪水之禍害。整理舊文化和創造新文化的確是目前的急務，但是這並非空談得以實現，必須要有實踐而後能見效的。吾人創立本刊的意義與目的也只在此而已。」<sup>28</sup> 於創刊號「編後記」中又說：「吾人不怕國家的變革，只怕人心的死滅，苟人心不死，何愁國家的命脈會至於危險，民族會至於淪亡？」<sup>29</sup> 從上

<sup>25</sup>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658。

<sup>26</sup> 同上，頁 720-730。

<sup>27</sup>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の周作人》，頁 181。

<sup>28</sup> 張深切，〈創刊詞〉，《中國文藝》創刊號，收於《張深切全集》卷 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頁 215-216。

<sup>29</sup> 張深切，〈編後記〉，《中國文藝》創刊號，同上，頁 216。

述能夠理解，張深切雖然有自民族主義本身退後一步的姿態，同時也有絕對要固守文化這個民族最後一線的決心，但是，對張深切而言，編輯《中國文藝》其實是精神苦悶的象徵，這可以由他所發表〈戰爭與和平〉短文看出。他在這篇短文中說：「據過去與現在的情勢觀之，戰無甚益，和無甚損。我們何必執拗抗戰徹底？……我們從今須知和平才是建國的唯一方略，尤其是我們文化人，須本我們的天職來為東亞與世界的和平繼續奮鬥努力的。」<sup>30</sup> 大力主張中國必須謀求和平，這好像是站在日本人立場而言的話。

1940年，具《中國文藝》監護人身分的堂ノ脇參謀奉調至東京參謀總部，張深切成為北京出版界內部中傷以及占領軍當局懷疑之對象，因而被貼上「御用」、「反日」等等標籤。8月於發行《中國文藝》2卷6期後，他被當時華北出版界之幕後黑手，特務出身的山家亨強迫辭職，《中國文藝》在逼迫下被受山家庇護之中央公論社接收而繼續發行。由張深切負責編輯的部分，前後共有十二期。1945年4月，張深切被密告為抗日分子，遭日軍一四二〇部隊三谷支隊逮捕，險遭不測，幸得助脫險。

## 八、返臺與歸隱

1945年8月，日本戰敗。1946年，張深切返回臺灣。時洪炎秋出任臺中師範校長，請他去擔任教務主任。戰前，張深切即活躍於中部地區，戰後，重返臺中後，除擔任教職外，同樣也活躍於文化界，從事文筆活動，當時中部的大報《和平日報》即偶有其評論

---

<sup>30</sup> 張深切，〈戰爭與和平〉，收於《張深切全集》卷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頁251-253。

與追憶文章登出。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洪炎秋被免職，張深切因其上海時代與謝雪紅相過從及係活躍分子之故，被當時臺中市長黃克立指為共黨首腦，乃逃亡隱匿於南投中寮山。其後真相查明，確定與共黨無關，始結束將近半年的逃亡生活。但也從此對於公職不再感興趣，遂完全脫離政治運動，沉溺於中國古代哲學世界與文藝創作、著述活動。

張深切晚年的活動中，值得注意的仍是他的戲劇活動，這是一生從早年到晚年，始終未能忘情的活動。

1957年，他與劉啟光、何永、郭頂順、林快青等人合組藝林電影公司，取材閩南一帶及臺灣地方家喻戶曉的人物邱罔舍，拍攝他自己編導的電影《邱罔舍》。當時臺語片還只是在起步階段，由舊劇（歌仔戲）與新戲（改良戲）轉變而來，在編導《邱罔舍》時，張深切即在報上公開表示：「我改編邱罔舍的故事，卻另有動機和目的。不單為介紹邱罔舍的幽默哲學才執筆的。臺灣的所謂臺語片，可以說是華興廠攝製，由何基明先生導演的《薛平貴與王寶釧》為嚆始，自從這部片子拋磚以後，才引出了許多片子來，形成今日的臺語片的製作狀態。就中最值得記錄的是《雨夜花》，因為《薛》片如果可以說是歌仔戲搬上銀幕的第一部片子，那末《雨》片也可以說是改良戲轉變為電影的第一部，……自《薛》、《雨》兩片出現以後，一般的臺語片大體都模仿著這兩部片子的樣子製作出來，造成了臺灣特殊的影劇。臺灣文化界為了臺語片的特殊作風，異常悲觀憤慨，認為長此以往，勢若有不堪設想的後果將要發生，有的竟以看臺語片為恥辱，極端厭惡臺語片的出現。……我編導《邱罔舍》的動機，是妄想要改革臺語片，使臺語片納入電影的軌道為目

的。……我們的目標是：①戲不隨便做。②話不隨便講。③服不隨便穿。④樂不隨便配。⑤歌不隨便唱。⑥景不隨便採。」<sup>31</sup>

張深切明確反對將電影事業只讓歌仔戲班和改良戲班去經營，故自組公司，自己編導電影，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由此也可知其對戲劇的熱情與「寓教於樂」的信念，始終有其一貫性。《邱罔舍》的劇本獲得臺灣第一屆影展最佳故事金馬獎。但電影卻是叫好不叫座，未幾，藝林電影公司因人事糾紛與影片賣座不佳，結束營業。此一時期張深切還完成有《人間與地獄》、《生死門》、《婚變》、《荔鏡記——陳三五娘》等劇本。

晚年，張深切在臺中市開設一間純喫茶的「古典」咖啡沙龍。1965年11月8日，在鬱鬱中死於肺癌，享年六十二歲。

## 九、結語

張深切的民族意識覺醒，前赴中國之動機以及對文學興趣的萌芽，都是於留學日本期間形成的。而且他的民族意識與文學興趣在其覺醒萌芽階段就有連帶關係，換言之，其民族意識與文學關懷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對張深切而言，最遲在1924年以後，他是絕對相信文藝有可能鼓舞人心以及啟蒙民眾的，這也是他終其一生的信念。因此，在客觀環境無法從事政治運動時，他自然轉向文學活動。結果，張深切之文學活動始終沒有超出作為政治活動替代品之範疇。而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臺灣政治運動家之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可以說是極為微妙。他們的想法是：「臺灣住民因是在日

<sup>31</sup> 張深切，〈我編導《邱罔舍》一片的動機與目的〉，收於《張深切全集》卷7《邱罔舍》，頁293。



本統治之下，所以是日本帝國之臣民或國民。但是，同樣是日本國民，日本人是統治者，臺灣人卻是被統治者。就另一方面而言，臺灣人是存在於中國的漢民族之一支流；雖然中國為臺灣人之祖國，臺灣人卻非中國國民。」<sup>32</sup>張深切也和其他政治運動家一樣，其國家認同並不十分確立，充其量只算是一位漢民族主義者，這對他的政治活動與文學活動雙方面帶來極大影響。

## 臺大出版中心

---

<sup>32</sup> 黃昭堂，〈台湾の民族と国家—その歴史的考察〉，《國際政治》84號（日本國際政治学会，1987年2月），頁70。

## 第二章

### 楊基振及其時代

從日記看一位臺灣知識分子從戰前到戰後的  
心理轉變

臺大出版中心



2-1 1931年，楊基振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畢業時留影。（楊基振哲嗣楊宗義提供）



臺

2-2 1934年，楊基振（右5）與同事攝於新京（現長春）火車站。（楊宗義提供）



2-3 1934年，楊基振就職滿鐵總公司時留影。（楊宗義提供）



2-4 1934年，楊基振（第2排左6）於奉天（現瀋陽）火車站與同事參拜奉天神社時留影。（楊宗義提供）

2-5 1935年，楊基振擔任大連列車區車掌時留影。（楊宗義提供）



臺大



2-6 1936年，楊基振（左2）攝於新京（現長春）火車站前。（楊宗義提供）

2-7 1937年，楊基振（後排右3）升任新京火車站貨物科副科長。（楊宗義提供）



2-8 1942年，楊基振（第2排右4）調任設於北京的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副參事、運輸局貨物課運費率主任時與同事合影。（楊宗義提供）



2-9 1945年，楊基振（第1排左2）轉任啟新水泥公司唐山工場副場長兼業務部長與同事合影。（楊宗義提供）

## 一、楊基振與他的時代

### （一）學生時期

楊基振，1911年出生臺中清水，為遺腹子。父楊紹喜，母楊梁氏雙。幼年曾就讀漢學私塾，八歲（1919年）進入清水公學校，十四歲（1924年）考進臺中師範學校。臺中師範設立於1899年，以培養臺籍日語師資人才為宗旨，1902年一度廢止，與臺南師範合併，擴大招收日籍學生，直到1923年重新開辦。該校採用嚴格的斯巴達式教育，規定臺籍學生與日籍學生都要住校。按楊基振本人遺稿，共同生活期間，臺灣學生與日本學生之間紛爭不斷，即使錯不在臺灣學生，日本教官們還是會本著民族優越的心理，逼臺灣學生一定要向日本學生道歉。這樣的差別待遇看在楊基振眼底，自尊心與理性大受打擊，到了第三年開學前，他無法忍受，終決定離開。<sup>1</sup>

1926年，楊基振自動從臺中師範學校休學，遠赴東京，寄宿東京市小石川區武島町七番地堂兄楊肇嘉宅，先就讀正則補習學校，隨即轉學插班進入郁文館中學就讀。兩年後，報考當時第一志願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戰後改制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不幸落榜，改進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現早稻田高等學校）就讀。

這時期的楊基振，對未來志向已有明確的方向，決定要進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部（系）。根據楊本人遺稿，當時他意識到要解放臺灣的殖民地現狀，非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不過，單單只有

---

<sup>1</sup> 詳參〈楊基振自傳〉，收於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下）（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680-724。

臺灣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要借助中國之力才有可能。因此，首要之務便是要引起中國的注目，積極參加中國革命，努力活躍於中國。楊基振開始對中國種種懷抱興趣，沉迷於三民主義研究，並決定學習北京話，<sup>2</sup>努力與中國留學生打交道。1930年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由臺灣基隆出發前往上海，旅行蘇州、杭州、南京、北平等地三個月。

1931年，楊基振自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畢業，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系）就讀。他對中國大陸的興趣漸深，滯留北平的時日愈來愈長，大學一、二年級的前兩個學期都待在北平，每年第三個學期才回到東京準備學期考試。這樣兩地往返的生活，直到三年級為專心準備畢業論文才不得不停止。

遊學北平期間，楊基振請當地女大學生教他北京語，並到北京大學當旁聽生，熱心研究中國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北平每天都有各大學的學生示威遊行，楊基振本人在北京大學旁聽左派的陳啟修教授講述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全貌，點燃他對日本大陸政策的濃厚興致。<sup>3</sup>1934年，楊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參加日本銀行、安田保善社、三菱商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就職考試皆合格，當時大學方面建議他進入安田保善社工作，但本著想進一步了解日本在大陸建設的實情，最後他選

<sup>2</sup> 當時臺灣知識青年主動學習北京話者不在少數。日本京都帝大法律系畢業、後赴滿洲國任公職的蔡西坤曾表示，自己於高等學校時期有感於日本對臺灣統治不會長久，並認真考慮到中國統一問題，而主動利用課餘時間到臺北一處練習所繳費學北京話。詳見許雪姬訪問，《口述歷史5——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161-193。

<sup>3</sup> 《楊基振日記》（下），頁680-724。

擇進入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前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俗稱滿鐵），於大連的滿鐵本社鐵道部任職。

楊基振從學生時期即對文藝活動相當有興趣，1933年於早稻田大學在學期間，曾參加在東京臺灣留學生組織的「臺灣藝術研究會」，並於該組織機關誌《福爾摩沙》創刊號中，以〈詩〉為題，發表中文詩歌。他所發表的〈詩〉為中文白話文作品，以奔放的文筆與情感描寫對詩的痴狂與無邊熱情。這種將情感完全投射於文字表現，盡情揮灑當下情緒的性格，也可以從他日記的筆觸中探得一二。不過，繼這篇處女作之後，楊基振沒有再公開發表其他作品，只有偶爾在日記寫寫新詩。直到1964年吳濁流創刊《臺灣文藝》，他才又重執作家之筆，發表許多詩歌，內容多是悼念初戀情人月嬌與病故唐山的元配詹氏之作。

## （二）滿鐵時期

滿鐵，為日俄戰爭下的產物。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後，依日俄講和條約與北京條約獲得中國東北地方的主控權，其中包括關東州的租借權、長春至旅順·大連間的鐵道經營與相關權益、安東至奉天的鐵道經營權、鴨綠江流域的木材砍伐權。其中為因應鐵道相關權益，1906年設立滿鐵，並請來曾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擁有在臺灣推展國有鐵道計畫經驗的後藤新平，擔任首任滿鐵總裁。<sup>4</sup>對當時日本政府而言，經營東北地區的最大收穫不在鐵道本身，而在其周邊附帶事業利益，特別是煤礦開採、周邊土地不動產的利用，以及水運業與倉庫業的發展。當時擔任滿洲軍總

<sup>4</sup> 詳參西澤泰彥，《滿鉄—「滿洲」の巨人》（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0年）。



參謀長的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皆認為，要徹底把握鐵道附屬地的經營權，唯有在租界地上設立國家機關、將鐵路事業收為國營事業才是長久之道。但兒玉與後藤的國有鐵道計畫被外務省（外交部）與大藏省（財政部）極力反對，認為在清國領土內建造日本國有鐵道不但違反日俄講和條約與北京條約的成文內容，還擔心此舉會招來提倡門戶開放的美國或在清國內部擁有諸多權利的英國不滿。<sup>5</sup>最後決定以俄國與清朝共同經營東清鐵道為範本成立民間株式會社，一半為民間集資，另一半則由日本政府出資，名義上為民間機構，實際上則由日本政府操控。<sup>6</sup>自此也確立了滿鐵的初、中期性格：表面上是鐵道公司，背後則是大張旗鼓地發展各項建設事業，成為支配東北地方的最大機關。<sup>7</sup>

1907年，滿鐵總公司由東京移至大連，擴增組織，在總裁底下設置總務、調查、運輸、礦業、地方等五部，並增設大連醫院與撫順炭坑兩獨立性極強的組織。之後經過多次改組，除了內部編制擴增外，更陸續建立相關子公司，如設立「大連汽船」海運公司，開拓以大連為起點，開往安東、天津、青島、上海、新潟、敦賀等地的定期航路；建設大連市內路面電車，並成立「大連電氣鐵道」子公司託其掌管；另陸續成立供應大連與鐵道附屬地城市電氣與瓦

<sup>5</sup> 詳參蘇崇民著，山下睦男等譯，《滿鐵史》（福岡：葦書房，1999年）。對於是否應當在清國領土上蓋國有鐵道，日本政府最後決定否決的原因，並非此舉是否侵犯中國人民權益，而是因為顧忌英、美、俄的虎視眈眈。

<sup>6</sup> 詳參西澤泰彥，《滿鐵—「滿洲」の巨人》。

<sup>7</sup> 後藤新平在滿鐵成立前便曾在〈滿洲經營策梗概〉中提到，戰後經營滿洲唯一要訣，在於表面上裝成鐵道經營，私底下卻實施百項建設。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2卷（東京：勁草書房，1965年）。後來滿鐵經營發展方向，確確實實也是依此方針前進。

斯的「南滿洲電氣株式會社」與「南滿洲瓦斯株式會社」。<sup>8</sup>除此之外，還包括周邊高級飯店與倉庫經營、大連港營運管理、理工農學等研究開發、經濟政策立案、高等教育等，並積極在附屬地進行巴洛克式的都市建設，以刺激經濟資本發展。<sup>9</sup>其中也有不計血本的投資，例如設立直營的連鎖高級飯店。當時，飯店的部分經營常出現赤字，但對企圖掌控歐亞交通樞紐的滿鐵而言，建立方便舒適的住宿供歐美人士使用是絕對必要的，故陸續在大連、奉天、長春等城市建造雄偉華麗足以與歐美匹敵的「大和飯店」。該飯店也成為高級人士的聚會場所，並在楊基振的日記中不時登場。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於隔年 1932 年擁溥儀即位，於東北與內蒙熱河成立「滿洲國」。隨著滿洲國的成立，滿鐵的組織出現大幅度地更動。滿洲國政府發布「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將經濟開發重點放在國有鐵道建設，揭示十年後鐵道總長一萬公里，最終目標為二萬五千公里的發展目標，並將滿洲國國有鐵道經營權交由滿鐵經營。由於滿洲國行政編制的出現，加上鐵道事業的大幅增加，滿鐵裁撤原本的鐵道附屬地經營，逐漸走向專業鐵道事業的模式。

楊基振進入滿鐵公司後，1935 年 10 月擔任大連列車區車掌，1936 年 4 月轉任大石橋車站副站長，1937 年 4 月又轉任新京火車站（滿洲國首都，現長春）貨物科副科長。在滿洲國政府的高級官僚養成機關——大同學院受訓一年後，<sup>10</sup> 頂著高級官僚的待遇活躍

<sup>8</sup> 西澤泰彥，《滿鐵—「滿洲」の巨人》，頁 24。

<sup>9</sup> 同上，頁 107-111。

<sup>10</sup> 大同學院位於滿洲國首都新京（現長春），為日本代「滿洲國」訓練高級幹部的地方，專門訓練通過考試的大學程度以上學員成為滿洲國的文官。

政經兩界。當時臺灣人前往滿鐵、滿洲國政府層級單位中謀職者，多為畢業於日本內地各大學的菁英分子。就當時社會整體價值而言，一介殖民地出身平民要在宗主國行政體制中出人頭地，並非易事。因此，不少臺灣人寧可放棄待在臺灣或日本與日本人競爭，選擇赴升遷機會較平等、待遇較佳的滿洲國謀職。<sup>11</sup>

1938年2月，楊基振趁休假回臺灣相親，認識第一任妻子詹淑英。詹淑英出身彰化高女，楊對她一見傾心，由於楊還需趕回滿鐵，兩人認識不到兩週便結婚，到日本蜜月旅行後，一起回到新京。

### （三）華北時期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滿鐵派遣許多員工前往華北進行日軍占領地的鐵道管理與修復作業。此時，楊基振也帶著新婚妻子調離新京、轉赴天津。於1938年5月轉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天津鐵路

---

學員有滿洲人、蒙古人、朝鮮人、臺灣人與日本人，以日本人最多。受訓內容包括各種戰術、騎馬、射擊等，且有「滿洲國」邊區視查的機會。

<sup>11</sup> 根據曾在滿洲國任職的楊蘭洲（1907年出生，1932年赴滿）談到自己赴滿經驗時表示：「臺灣人在公家機關就職，最多只能做到課長，想再往上發展根本不可能，因此很多有志向的人都往外求發展，或去大陸，或去美國。是時日本國內又經濟不景氣，就職困難；而日本在滿洲事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半年即成立『滿洲國』，正迫切需要許多人才，故選擇『滿洲國』發展。」據他回憶，滿洲國採五族共和，不分民族待遇一律平等，因此同樣職務在臺灣公家機關月薪只有五、六十元，可是在滿洲卻可以領到一百七十元，薪水之好，讓許多臺灣人都嚮往到滿洲國。此外，曾於滿洲國任外交職務的吳左金（1901年出生，1932年赴滿）提到不願意留在日本的原因：「當時許多臺灣人在日本的地方大學畢業後，即留在當地的小機關任公務員，其實做公務員也不錯，並不會受日本人的壓迫，但我們和日本人無法競爭的，除了考試及格之外，別無他途。」相較之下，那時臺灣人被視為中國人，能講一種外國語即可應考「滿洲國」職務，加上具有日語能力，因此考試比較容易。詳見許雪姬訪問，《口述歷史5——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46、頁99。

局貨物科長。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進占華北，在接收中國工廠、軍用品管理、委託日本企業經營等一系列的行動中，原本是由日本國策會社——興中公司扮演幕後推手的工作。<sup>12</sup>1938年以後由於華北戰事擴大，興中公司不論在資金或技術上，皆已無法繼續獨力支撐大規模戰事下所需求的經濟體系，日本政府基於戰略上考量，期望盡早完成「日滿支經濟圈」，因此於1938年11月7日成立規模更巨大、機制更完整的國策會社——華北開發株式會社。<sup>13</sup>華北開發株式會社（以下簡稱華北開發）資本額為三億五千萬日圓，由日本政府與民間出資各半，主要營運內容在於投資與統合交通、運輸、港灣、通信、發送電、礦產、食鹽製造販賣利用等相關事業。隔年4月，最大子公司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資本額三億日圓，中國方面出資三千萬日圓，以下簡稱華北交通）成立，管理華北開發旗下最主要也最大宗的鐵道交通事業。

華北交通的人事，乃由日本政府與1937年12月14日成立於北京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為王克敏）各推派代表擔任。<sup>14</sup>雖然華北交通成立的計畫是日本政府一手操控，且日本資本占多數，但以王克敏為首的臨時政府積極主張中國人與

<sup>12</sup> 「國策會社」意指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期間，在日本政府援助與指導下所設立的特殊性質公司，其目的多為支配、開發殖民地或占領地。

<sup>13</sup> 范力，《中日「戦争交流」研究—戦時期の華北経済を中心に》（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頁228。

<sup>14</sup>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於1940年3月，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

日本人各半的人事安排。日本方面也考慮到實行上需要臨時政府的協助，且華北最重要的治安維持問題還需要中國方面的密切合作，因此不得不做某種程度上的讓步。最後雙方多次協商結果，決定總裁為日本人，副總裁為中國人、日本人各一，理事為中國人、日本人各四名，維持表面上的平等。<sup>15</sup>

臨時政府面對日本政府成立華北開發與擴張子企業等行動並未阻止，甚至還從旁協助，此舉在戰後的抗日史觀中受到嚴重批評，被認為其行徑形同賣國、坐視日本奪取中國資源。然而中國學者范力則提出細部分析，他認為，當時臨時政府看起來或許不如衝鋒陷陣的抗日運動者勇敢，但在協助日軍開發的同時，也存在著「利用」日本、將中國方面的損害降至最低的柔性抵抗。<sup>16</sup> 這種藉由與日本的合作來幫助中國本土近代建設的開發，並暗中守住中國利益的行為，實為「曲線救國」，故不能單純地將其全部歸於漢奸之流。<sup>17</sup> 從這個角度看來，這種協助日本開發華北的矛盾心情，或許也能理解楊基振早年為何如此積極地投入日本的對華開發上。

楊基振於 1940 年被指派回華北交通的北京本公司任職，1942 年升任副參事，擔任運輸局貨物課運費費率主任。據他本人遺稿中回憶，與淑英結婚後任職華北交通的近八年間，是一生中最光輝的

---

<sup>15</sup> 范力，《中日「戰爭交流」研究—戰時期的華北經濟を中心に》，頁 232。

<sup>16</sup> 同上，頁 265-267。

<sup>17</sup> 這種臨時政府企圖保住中國方面利益的例子不少。例如華北電信電話會社的理事本來內定為只有日本人，後來在臨時政府委員長王克敏的積極爭取下，始獲得日本方面的讓步。

歲月。<sup>18</sup> 升任副參事後，他僅花了兩年時間便完成華北八鐵道的運費統一。當時許多人都認為貿然將運費全部統一會對地方經濟造成嚴重影響，至少要維持臨海地帶與內地地帶兩種不同的標準，但楊認為，運費統一與否是「國家經濟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因此力排眾議，提出運費改正案。<sup>19</sup> 除此之外，還包括推動塘沽港的開工、規定火車禁止超載的實行條例等，對於戰爭中的經濟開發與民生問題有相當大的貢獻。<sup>20</sup>

華北交通的最後幾年，楊基振同時參與民間企業啟新水泥公司的營運。戰爭期間，中國本土出現不少中日合資的企業，其中中國方面的資本也有逐漸增多的傾向，但大部分仍屬政府層級的投資，真正的「民族資本」——足以與外國資本企業對抗的中國民間資本企業仍然十分少見。中國民間企業的不成熟，除了起因於本身的高利貸式、商業資本式，以及買辦式的傳統性格外，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戰爭時期中的經濟統制。<sup>21</sup> 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在於追求利潤，但是在市場與利潤上綁手綁腳的經濟統制，形同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喪失自由競爭的權利。<sup>22</sup> 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楊基振積極投入民間企業啟新水泥的營運，運用自己與日本官方的人脈，努力在人事上

---

<sup>18</sup> 〈楊基振自傳〉，《楊基振日記》（下），頁 680-724。

<sup>19</sup> 同上。

<sup>20</sup> 同上。

<sup>21</sup> 范力，《中日「戰爭交流」研究—戰時期的華北經濟を中心に》，頁 265-267。

<sup>22</sup> 這種對經濟統制的抱怨也出現在楊基振的日記之中。見 1944 年 10 月 6 日日記，《楊基振日記》（上），頁 30。

排除日本人的介入，維持中國人主導的局面，實不簡單。<sup>23</sup>

同一時間，華北交通內部日漸複雜的人事問題，也讓楊十分困擾。1944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想盡早辭去交通公司的工作。每次去交通公司，不但心情很不平靜，也會深感人性之虛偽，相當不愉快。」<sup>24</sup>1944年11月底，楊雖然得知獲得升遷運輸局主任，最後仍決定主動辭職，「今天交通公司的年終發下來了。沒甚麼好高興，也沒甚麼好難過。現在每天光想著要如何辭去交通公司的工作就已經夠煩了。」<sup>25</sup>1945年3月底他離開華北交通。5月專心轉任啟新水泥公司唐山工場副場長兼業務部長，直到抗戰結束。

1945年8月，日本戰敗。9月，自重慶派來的國民黨接收部隊現身唐山。楊相當興奮，為慶祝國民黨接收主動捐獻金錢，還開放工廠倉庫作為先遣隊的宿舍，並提供轎車、住宅、日用品給接收人員，但此舉反而為他招來不幸。楊基振在日記中透露當時自重慶派去的官員甚為腐敗，以為楊是出手闊綽的財閥，為謀奪楊的家財，特意羅織漢奸的罪名，企圖逮捕處刑他。<sup>26</sup>

1945年12月，楊基振離開唐山，前往北平、天津處理公務，卻因傷寒生了一場大病，在他滯留天津期間，接收部隊包圍他唐山住家，企圖以漢奸罪將之逮捕。楊為避風頭，再也無法回唐山。這

---

<sup>23</sup> 關於啟新人事問題的運作，在楊基振1944年10月到11月日記裡有詳細的記述，《楊基振日記》（上），頁28-59。

<sup>24</sup> 《楊基振日記》（上），頁44-45。

<sup>25</sup> 1944年12月7日日記，《楊基振日記》（上），頁62。

<sup>26</sup> 同上，頁212-213。

期間，元配淑英不幸因肺病病逝唐山。從病危、逝世到葬禮結束，礙於特務人員的監視，楊始終不克出現。楊對此相當自責。無法陪愛妻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痛。1984年，楊曾前往唐山尋找淑英的遺體，但唐山在大地震之後重新改建，要找回以前市街的記憶已不可能，最後終究徒勞無功，留下楊一生的遺憾。對於元配詹氏的懷念、追憶、自責之情，以及當年被國民黨錯認為漢奸而不得不遠走他鄉的憤恨不平，日後不時浮現於楊的日記或詩文之中。

#### （四）歸臺後

1946年5月，楊基振舉家輾轉歸臺，期間雖無意外，但一路風霜，飽嚙人情冷暖，被楊認為是生平最狼狽的一段。

回臺後隔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楊基振本人並沒有受到牽連。反倒經人介紹，被拜託搭救當時任律師卻無辜被逮捕進高雄軍事監獄的張旭昇。楊憑借著自己過去的中國經驗與流暢的北京話努力為張奔走，先將張從軍事法庭轉到司法法庭，再透過自己與法律界的人脈，最後使張旭昇獲得不起訴的結果。這段期間，他並與張旭昇長女張碧蓮相知相戀，日後結為夫妻，這段經歷在楊的日記中有詳細的描述。

1947年，因時任臺灣總商會會長陳啟清的推薦，楊任職臺灣省政府交通處，之後轉任省政府鐵路局，直到退休。

楊基振於1950年代後半到1960年代初，與雷震、齊世英、蔣勻田等人來往頻繁，並在1957年參與臺中縣長選舉，惜落選。楊基振以自己本身競選經驗，於《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對當時臺灣



地方自治與選舉、民主政治的看法。1960年6、7月間，楊基振積極出席《自由中國》雜誌社的組織反對黨座談會活動，但後來因9月初雷震、傅正等人的被捕入獄，反對黨的籌組中斷，楊基振因此極為鬱悶。他在9月4日的日記上曾寫下：「17點英石兄來報，雷震、傅正、馬經理、劉子英4人被捕，對反對黨的成立受到莫大的打擊，尤其與雷震先生的友誼使我精神極端懊惱。」在10月5日日記上寫下：「三日雷震先生受公判，看他的申辯書頗受感動，這個冤獄必將成立，我不但為雷震先生悲，也為做中國人的命運悲。」<sup>27</sup>

1976年楊基振自鐵路局退休，1977年移居美國，1983年取得美國籍。1990年2月病逝美國加州，享年八十歲。

## 二、日記的歷史書寫

楊基振生前一直保持寫日記的習慣，目前保存於家屬手上的日記，有自1944年10月1日開始至1990年病逝前為止的手本。目前我細讀的日記年分是從1944年10月1日至1950年底、抗戰末期至國民黨來臺初期為主，此時正是中國、臺灣政治轉變最為激烈的歷史關鍵時刻，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加上楊基振本身的資歷經驗，該日記內容在史料上顯得格外有意義和價值。關於國共戰爭、二二八事件、戰後初期臺灣社會與經濟狀況等時局描述，在日記中多以感想的方式呈現，是否真能代表大時局下的整體情形雖有待考證，但若當成時代的見證或佐證，史料價值仍然不低。

楊基振日記內容多為自己職場、生活交友圈，以及家庭瑣事

---

<sup>27</sup> 1960年9月4日日記，尚未公開。

的記述。由於工作緣故，文中不時會出現原料交易的繁雜數值、略顯枯燥的公務行程與商談經過，或是一次多達十餘個人名的冗長贅述，這些或許會讓讀者初接觸時，感到枯燥且難以親近。但楊基振本身文筆十分精練流暢，往往短短幾句話便將當下心境與人際關係記錄得十分傳神，故若能仔細玩味，仍可嗅出潛藏於文字背後的社會情況與人際關係。

### （一）戰時華北地區臺灣人的交往圖譜與生活景象

戰爭期間，滯留於華北地區的臺灣名人不少，如吳三連、楊肇嘉、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黃烈火、張星賢、吳金川、陳重光、李金鐘、蘇子衡等人。楊基振不論在公事上或個人交情上，都與這群人有相當的來往，這些名字不時在日記中登場。除了人際往來的紀錄，日記還忠實反映出交往過程當下的的心境，足以一窺當時「淪陷區」臺灣人私底下的日常生活與彼此間的交往圖譜。

例如，對於臺灣作家張我軍於抗戰末期的私生活，楊有著不同於正史的描述。「晚上被我軍兄招待，這群過去最讓我喜愛的夥伴，如今卻熱中賭博，讓人不想與他們為伍。對麻將厭煩，也對他們的友情厭煩，有空時寧願多讀點書。幸好最近快搬家了，商賈之流究竟與自己本性不合」（1944年10月5日）、<sup>28</sup>「離開公司後被我軍兄邀請，故到洪炎秋家拜完年後就到我軍家。但他找來的盡是些討厭的人。會後與謝化飛、洪某、周壽源等打麻將，但生平頭一次輸這麼多，大敗三萬圓。後悔之餘，覺得與我軍兄交往經常碰到不

<sup>28</sup> 《楊基振日記》（上），頁30。

順的事，打牌徹夜覺得十分勞累」（1945年2月13日）。<sup>29</sup>

另外，楊基振喜好追逐流行，愛看電影與跳舞。曾於華北期間投資「明星」戲院，<sup>30</sup>並曾拜託李香蘭女士登臺演出，後未果。日記中偶爾可見他抒發對電影、藝文活動的觀後感。例如1944年10月17日的日記寫道看過西蒙娜·西蒙（Simone Simon）主演《綠色花園》（*Les Beaux Jours*，1935年）一片的觀後感：「不論重看幾次，仍會熱淚盈眶，片中滿是青春期的年少感傷，特別是人心的柔軟讓人感觸至深。」<sup>31</sup>另1945年3月4日的日記：「早上幼呈來訪，一起共進中餐，之後與淑英三人去看《希望音樂會》。這部電影是以1936年到1939年戰爭下的德國為背景，比較當時希特勒的不可一世與現在的一敗塗地，真是感慨萬千。」<sup>32</sup>

透過日記中的諸多描述，可一窺戰時大陸平津地區上流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狀況與茶餘飯後的休閒喜好。

## （二）戰爭時局的認知情形與戰後經濟的動盪

楊基振日記的另一個特徵是不時出現對時局的認知與解釋。

例如對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績與戰事發展，楊有以下記述：「三天來東京遭到連續空襲。儘管雷伊特島（Leyte）日軍戰果

<sup>29</sup> 同上，頁91。

<sup>30</sup> 「明星」戲院後來鬧出經營糾紛，在吳三連、張我軍、洪炎秋等人調停下勉強解決。這段詳細記述於1944年12月到隔年6月的日記當中。《楊基振日記》（上），頁61-160。

<sup>31</sup> 《楊基振日記》（上），頁35。

<sup>32</sup> 同上，頁99。

輝煌，但一般看來還是情況緊急」（1944年11月30日）、<sup>33</sup>「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轉眼過了三年，今天進入第四個年頭。今天在雷伊特島展開激戰，日美之間快要一定勝負。雷伊特島的日美決戰正是支配世界大戰的重要關鍵吧」（1944年12月8日）。<sup>34</sup>

另外，日本敗戰前，其風聲傳入華北地區時，楊在日記中表現出一介知識分子的合理懷疑：「早上到工廠，聽到重慶放送局發表昨天日本以維持天皇制為唯一條件無條件投降，全廠的和平來臨有望。我無法辨別其真偽」（1945年8月11日）、<sup>35</sup>「日本投降一事我仍然抱懷疑問，晚上第一次聽到夏威夷的廣播，不由得逐漸懷疑日本投降的新聞帶有很大的宣傳性質」（1945年8月12日）、<sup>36</sup>「日本的命運到底變得如何，晚上又聽了夏威夷廣播，但越來越讓人覺得宣傳色彩過重，忍不住迷惘起來」（1945年8月13日），<sup>37</sup>直到8月15日日本正式發表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才獲得證實。

而戰後華北動盪的社會經濟現狀與物價起伏，在日記中也有詳細的敘述。「日本敗戰，大概是因為蘇聯宣戰，使得戰情得以明朗，本想把金子銀子換成啟新的股票，但因工廠雜務過多，等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金價銀價暴跌，股票暴漲，才剛搬到唐山來就遭到

---

<sup>33</sup> 同上，頁59。

<sup>34</sup> 同上，頁62。

<sup>35</sup> 同上，頁178。

<sup>36</sup> 同上，頁179。

<sup>37</sup> 同上。

莫大損失，與淑英悲嘆時運之不濟」（1945年8月11日）、<sup>38</sup>「今天趁公務前往天津北京出差。猶豫是不是該將麻袋等得到的錢共計160萬圓，換成股票或其他東西，決定研究天津、北京情勢後再作打算，這也成為我出差的目的之一。火車過十二點從唐山出發，下午到達唐山〔天津〕，經過合豐找三連兄、甲斐兄，驚於情勢之瞬息萬變。和平的到來，物價跟著暴跌，別說是合豐行，就連一般商人也遭到莫大打擊，實際上倒閉者不在少數。過去業績輝煌的合豐行如今也受打擊，實在是遺憾萬千。……12日早上與袁、陳總協理具體報告8月15日以後工廠周邊的治安狀況，以及治安工作。研究討論解散華系警備隊、以及如何處理日本警備隊、還有煤炭不足下的工廠生產方針。總協理看起來與平常大不相同，稍稍顯得消極。之後才知道袁總理苦於日本敗退後的政治立場，擔心自身難保。聽說陳協理則是把從開發拿到的金子，全投去買股票，對公司造成莫大的損害，使他難過得無精打采。氣氛少了往日的溫暖。晚上造訪李金源，得知啟興也遭到龐大的損失，這才查覺到一切商業都告失敗」（1945年9月11日至9月17日）。<sup>39</sup>

不過對當時楊基振而言，由於世界和平終於到來，故鄉從此解放，一想到重回故鄉懷抱一日近在眼前，他對於眼下物價波動與經濟不振似乎也頗能釋懷。<sup>40</sup>

---

<sup>38</sup> 同上，頁35。

<sup>39</sup> 同上，頁185-186。

<sup>40</sup> 同上。

### （三）日本敗戰後華北國軍、八路軍與日本軍的角力關係

日本戰敗，身在華北的楊基振相當興奮，他於日記記述著自己的心境：「年少以來對日本的仇恨心讓我寧願前往大陸，今天還得以親眼見到日本投降的一天。如此一來，故鄉臺灣事隔五十餘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如作夢般，我流下欣喜的淚水」（1945年8月15日），<sup>41</sup>他並寫道，計劃年末攜眷返回臺灣。然而，這樣欣喜的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地被戰後華北混亂的接收狀況與國共的角力關係浮現所衍生的焦慮所替代。

日軍戰敗到國軍正式接收前，華北治安相當混亂，特別是八路軍在日軍戰敗後對廠內軍需設備的虎視眈眈。關於戰後唐山治安，日記記述得相當詳盡：「廠附近還有日軍，武裝解除以前，日軍依然擔負維持治安責任，可要求日軍援助維持治安，同時保衛軍可借槍彈以補廠裡警備力量，今天一切的消息都說唐山四圍為八路軍所包，十分緊張」（1945年8月20日）、<sup>42</sup>「細雨又是滴滴地下，今天在馬尼拉日本河邊大將已經口字投降，和平應該和秋陽一齊上來，然而唐山的四周倒而一天加累一天，夜裡郊外又是槍聲又是大雨」（1945年8月21日，口為原文無法辨識者）。<sup>43</sup>戰爭雖然結束，但離真正和平的到來，卻似乎遙遙無期。

此時的啟新工廠只能倚靠已戰敗且尚未歸國的日軍，來稍稍

---

<sup>41</sup> 同上，頁 180-181

<sup>42</sup> 同上，頁 182。

<sup>43</sup> 同上。

制衡、抵抗八路軍的襲擊，楊在日記中有以下深刻的描述：「看房後四個人談唐山周圍之八路軍的情勢，下午七點唐山西南方槍聲甚殷，小槍、機關槍、手榴彈，砲聲聽的很清楚，馬上派警備隊安排於適當位置，同時與高射砲隊連絡，請他保護，到了十一點槍聲方息，聽說是治安軍與八路軍的衝突」（1945年8月22日）、<sup>44</sup>「整天談廠裡治安問題，外面又加緊張，蔣委員長正巧電召毛澤東被拒絕，八路軍又想進駐瀧海線以北包括平津，今天陰雨瀝瀝的下，晚上又是槍聲」（1945年8月23日）、<sup>45</sup>「十一點八路軍□□在小水泉打聽巡役（1）廠裡有何種人，多少人擔當警備。（2）廠裡有多少槍、子彈，可是沒敢進來，馬上報告各機關，下午三點郊外槍聲□□整夜八路軍與先遣軍打通宵，據濱田隊長說，日本軍將要取中立態度，對於今後唐山的治安覺得相當悲觀」（1945年8月24日）、<sup>46</sup>「昨夜九點八路軍也到新石坑摘走兩個馬達，來的有七、八十人，也無法抵抗」（1945年9月22日）、<sup>47</sup>「早晨七點，八路軍混著工人進來十個，命令巡查科，日系警備隊都武裝，如果對方放槍擾亂，我方也武力抵抗，同時連絡1414部隊，唐山防衛司令、唐山警察總隊、第四分署，不久各關係機關都派兵警，一共三百多人來廠，然而匪人經早已逃走了」（1945年9月23日）。<sup>48</sup>楊的日記，將當時八路軍在唐山的行徑做了詳實的記錄。

---

<sup>44</sup> 同上。

<sup>45</sup> 同上，頁183。

<sup>46</sup> 同上。

<sup>47</sup> 同上，頁187。

<sup>48</sup> 同上。

到了 1945 年 10 月、11 月以後，隨著日軍與國軍陸續交接，日軍離開，盟軍進入唐山，原本的日軍與共軍相互制衡的情形演變為國軍與八路軍的對抗。「下午三點新任劉灤榆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公司來訪，最近共產黨的交通破壞，各城市地盤的鬥爭愈顯的厲害，中國的全面內戰也就展開出來了，真不了解毛澤東先生的意思，八年來的痛苦，已經夠受的了，現在應該破壞轉為建設的時期的」（1945 年 11 月 17 日）。<sup>49</sup>

從抗戰結束至國共內戰，楊基振身在唐山見證許多歷史的時刻，這些見證一一如實地記載在日記上。

#### （四）戰後旅居大陸臺灣人的財產問題與歸臺經過

旅居北平、天津的臺灣同胞於抗戰勝利後不久，便組織「北平臺灣同鄉會」，主持順利遣返被日軍徵用來華北的三千位臺胞回臺的計畫。該會執行委員有梁永祿、洪炎秋、林朝榮、張我軍、張深切、吳敦禮、洪耀勳，監查委員陳天錫、蘇子衡。該會除了協助臺胞返鄉，並積極投入平津臺胞的北京話教學與文化運動，並於隔年 2 月發刊《新臺灣》雜誌，這是在戰後華北社會情勢不穩中可以為臺灣人發聲的事務機構。

戰後，在國民政府政策規劃不良下，曾與日人有合作關係的臺人經濟狀況面臨崩盤，不但公司倒閉，連房屋也充公或被中國人侵占。1946 年 1 月 14 日，平津各報刊登北平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1）朝鮮及臺灣之公產均收歸公有。（2）

---

<sup>49</sup> 同上，頁 200。



凡屬於朝鮮及臺灣人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臺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憑證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它罪行者，經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sup>50</sup>

這個消息轟動平津兩地臺胞，對於國民政府錯將同文同種的臺灣人比照朝鮮人辦理，且被當成日本特務處理，如要平反還需要提出反證，這讓當地臺灣人錯愕萬分，感到十分受辱。對此《新臺灣》創刊號上刊登了許多抗議的文章，〈關於處理臺灣人產業之意見書〉、〈為臺灣人提出一個抗議〉、〈關於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等文中，在在指出臺灣人在日帝壓迫下投奔祖國，如今卻被錯認為漢奸的憤怒與無奈。<sup>51</sup> 楊基振本人也在這波產業處理的危機中遭受莫大損失，這段在 1945 年 12 月 16 日到 1946 年 1 月 31 日的日記中有著完整的紀錄。

在戰後滯留華北的一年間，楊基振面臨人生最低潮，不但家財盡失，而且被指為漢奸，<sup>52</sup> 妻子淑英又因肺病過逝唐山（1946 年 3 月 28 日），萬念俱灰、走投無路下，楊決定舉家坐船返臺。日記中他如此記述著這段心情：「往臺灣的船隻終於於 6 月 16 日出航，生平頭一遭睡在甲板上，抵達臺灣前還下大雨，我用身體為璃莉、

---

<sup>50</sup> 〈關於處理臺灣人產業之意見書〉，《新臺灣》創刊號（北平：新臺灣社，1946 年 2 月 15 日），頁 5。

<sup>51</sup> 詳見《新臺灣》創刊號。

<sup>52</sup> 詳見 1945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6 年 1 月 31 日日記，《楊基振日記》（上），頁 205-215。

宗仁擋雨，悲傷後悔交集。啊！當中國人竟是如此悲慘。想到光復時還歡天喜地成為中國人，更毋寧令人覺得可笑又瘋狂。成為中國人所帶來的現實苦惱，竟是如此深痛。」（1946年回顧）<sup>53</sup>

#### （五）「光復」後的臺灣諸般世態：二二八事件前後

楊基振於1946年初夏回到臺灣後，隔年遇到二二八事件，雖然他本人沒有直接參與，但在日記中有他就第三者的眼光所做的詳細敘述（1947年1月1日至4月9日）。另外，他還曾就自己滿洲國的經驗與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來臺時的統治情況做以下比較：

回顧滿洲國成立後不久，我剛好人在滿洲，與同窗學長、同事等人，不辭零下數十度的嚴寒、不畏盤踞各地的義勇軍、土匪，帶著一大堆資料與地圖，不分晝夜地投入滿洲國的建設，那種認真的態度正如今日的他們一樣！但今天臺灣官吏徒居高位、尸位素餐，滿腦子淨是自己的榮達富貴與貪念私利，想想異族日本人對漢民族的態度，再看看身為同民族的外省人對待臺灣同胞的模樣，兩相對照，不禁感慨無量地掉淚。政府官吏的無能與貪污，工業生產機器被破壞，加上農業經濟因為缺乏肥料而衰退，貿易局專賣局與各公共事業所被獨佔而造成官僚跋扈，這些必然的結果更讓民間工商業停滯，連帶使海外歸國者失業連連，造成社會全面性貧瘠，臺胞忍無可忍，最後終於挺身而出。但是，這些領導人缺乏政治認知，尤其是不懂中國官僚的狡猾，3月9日發生前所未有的慘劇，醜惡的鮮血染紅了美麗的鄉土。3月8日夜裡，

<sup>53</sup> 同上，頁243。

國內派遣兵一到，便直接宣布戒嚴，9日一早，官兵們見民房就毀、見人就殺。這是何等的詛咒啊！別說是事變相關人員，就連一直以來對政府抱持善意建言的一流紳士們也全被逮捕，連法判都沒有就直接被殺了。林茂生、陳炘、宋斐如、林桂端、林旭屏、鄭倉、林連宗、王添燈……等等，啊，我連寫起來都覺得駭人。政府官兵如惡魔、政府官吏如狂人般地殘殺台胞。這就是祖國的模樣嘛？全國輿論雖對臺胞寄予無限同情，但終究是無能為力。到了3月14日，白崇禧國防部長來台，終止屠殺。但白部長以政府代理者之姿廣播放送，將這次事變原因歸究成五十一年來奴化教育下的無賴行徑，17日聽到這則全國廣播，看到臺灣各團體都礙於當局之令或為明哲保身，曲解真正原因，甚至還有陳儀留任請願運動，以及不顧事情原委地發電全國要向政府謝罪，忍不住感慨萬千。（1947年1月1日至4月9日）<sup>54</sup>

雖然對國民政府充滿不滿，但另一方面，楊歸臺後卻積極謀求官職。對此他有他自己一套特別的認知：「想當官，為的不只是讓中國社會一角的臺灣好，是評估後發現臺灣人崇拜官吏的習性，我現在當前的問題就是想早點結婚，當官是解決婚姻問題的捷徑。面對這種低級政府——這個害死淑英的政府，我根本無意參與。當然，我也希望臺灣政府變好，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我無意身先士卒推動改善。若當官，最好是輕鬆、地位高，換言之，我希望是個地位誘人到足以讓人想與我結婚。一旦結了婚，就算辭官也無妨。在理想的政府成立以前，我還是希望在野。在野可以多與民眾接

---

54 同上，頁 252-253。

觸。」（1947年1月1日至4月9日）<sup>55</sup>

這樣的說辭看起來既無奈又現實，恰也忠實地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的價值觀。

### 三、結語

概觀而論，從楊基振所遺留下的日記內容看來，他一旦面臨世事不順，便會在日記上大吐苦水，似乎是個易受環境變動而心情動搖的人物。

法國近代文學評論家貝埃緹斯·狄迪耶（Béatrice Didier）曾經在《日記論》中，分別從社會歷史、精神分析，以及文學性質三種角度詮釋日記的意義，細緻且豐富地闡述面對日記時種種視覺面向的可能性，展現她對日記體裁進行分析時的獨到見解。她曾說：「就文體而言，日記與自傳具有根本性的差異。日記屬於不連續的記述形態。而記憶則把自傳有機性地組織、並賦予充滿特色的節奏感。」<sup>56</sup>或許就是因為這種不連續的記述方式，使得日記裡常常會浮現日記作者優柔寡斷、迷惘不前的性格。此日記作者形象，狄迪耶稱之為「還不會說話的小嬰孩」，<sup>57</sup>是一種仍然滯留於前語言期、前文字期，無法用標準的話語與意念完整地訴說的片斷式表現。

無獨有偶，楊基振的日記裡也有這種前後不一、無法決斷的

---

<sup>55</sup> 同上，頁 253。

<sup>56</sup> 貝埃緹斯·狄迪耶（Béatrice Didier）著，西川長夫、後平隆譯，《日記論》（*Le journal intime*）（京都：松籟社，1987年），頁 6。

<sup>57</sup> 同上，頁 123。

矛盾性格。特別是出現在 1944 至 1946 年在唐山工作時，他的政治認知與對當時時局的看法，以及返回臺灣後心境上的轉變。關於這點，可以分成日本人、中國人、共軍與國民黨四個角度來看。

楊基振出身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又曾赴日本求學，但他在日記裡，時常流露出對日本人的不滿，甚至可以說是厭惡的。例如日本戰敗後日人退出啟新工廠一事，楊在日記中便毫不掩飾地直呼痛快：「今天日本軍隊的米軍（美軍）命令全開走了，從此工廠一個日本人也沒有了，很痛快，與日本人在滿鐵、華北交通做十一年，因不喜歡日本人跑到啟新來，又有甚麼中平顧問、潮顧問、甚麼甚麼日系警備隊，還有甚麼大使館情報課三原課長特派的華東警備隊，一四一四部隊中島隊長特派的特務隊。日本投降以後，先把兩個顧問解除，又遣散華東警備隊、日系警備隊、特務隊，後來只剩日本駐軍，今天以後可沒有日本人了，工廠明朗了。」（1945 年 11 月 14 日）<sup>58</sup> 但同時，他自己也有幾位要好的日本友人（金子與古屋，1945 年 10 月 28 日），或是日本人中也有讓他感到敬重的人物（例如濱田隊長，1945 年 10 月 28 日），<sup>59</sup> 且不時對日人戰後的處境流露同情。換言之，「日本」這一意象，在楊基振的認知中是一個沒有特定指稱的集合體，它有時可以是日中戰爭下令令人髮指的日本政府，有時又可以是同情亡國好友的可憐代表，有時還可以是抵抗八路軍的正義化身。楊基振眼中的「日本」，無法用單一的是非黑白來論斷。如此錯綜的矛盾情結，其實也代表了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的心境。

<sup>58</sup> 《楊基振日記》（上），頁 199。

<sup>59</sup> 同上，頁 195。

另一方面，楊基振對於「中國」這塊土地與土地上的種種人事，又是另一種複雜的心情。正如先前曾提到的，楊基振從戰前到戰後，一直都對中國懷有相當大的願景。從他日記中慷慨激昂的語句裡，在在都可嗅出對「祖國」的熱情。甚至在經過二二八事件後，他依然對中國帶有相當的關心，這可以從他有一次在日記中寫道：「晚餐後帶碧蓮看《明天遺恨》去，想給她貫注中國歷史。」（1948年4月15日）<sup>60</sup>看得出來，此時的楊基振對於中國這塊土地，依然懷抱著一定的情感。

但隨著時空移轉，每每想到元配淑英是被國民黨間接害死，楊基振對國民黨可說是深惡痛絕。弔詭的是，一提到主席蔣介石，楊所表現出來的尊敬卻是始終如一。「國民黨間接殺死了我的愛妻淑英，雖然對蔣主席十分尊敬，但我仍不得不對國民黨抱持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完全無意積極支持這個由國民黨組成的臺灣長官公署。」（1947年1月1日至4月9日）<sup>61</sup>

同時，在他日記中也曾提到他在華北期間與八路軍交手的一些經過。就維護廠內利益而言，八路軍其實是狡猾而需防範的。楊在日記裡不只一次表現出對八路軍的猜忌與防備，楊甚至寧願搬出自己痛恨的日本兵當救兵，也不願與八路軍妥協。不過同時，在私底下接觸八路軍的幾位幹部並深談之後，楊卻又對於共產黨的理念相當激賞（1945年9月26日、9月30日）。<sup>62</sup>只是等到之後發現八路軍來煽動廠內工人時，楊既是惱怒又是懊悔，認為自己錯信他

<sup>60</sup> 同上，頁370。

<sup>61</sup> 同上，頁253。

<sup>62</sup> 同上，頁188、頁189。

人。這樣的心理轉折，除了涉及前段已論及的社會背景——當時國共之間的利益關係與政治角力，也正好再度突顯日記中楊的性格：在現實與理想間，楊總是顯得怯懦、矛盾又反覆不定。

狄迪耶曾如此評論日記的功能：「作家寫日記，是因為有迷惘才需要將自己的苦惱化成白紙黑字？或是把日記當成證人，藉由反覆書寫來期待自己最後能當機立斷下定決心？」<sup>63</sup>不，或許都不是。她提出另一種看法：「會顯得優柔寡斷，正是因為寄託日記的緣故。」<sup>64</sup>正因為這種將優柔寡斷訴諸片斷式的日記型態，讓日記作者得以在文字間游走，重新在現實與理想中反覆不停地自我辯證下，延伸出新的自我。

由此可知，日記裡穿梭在多重角色下的楊基振，其性格具有如此的浮動性與不連續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不固定的多元思維，不是出於被煽動，而是來自於他本身的理智判斷與情感歸依，是真正的自我表現。

這種多重的人格表現與個人觀，打破了過去以來慣以單一身分認同的絕對屬性，來為人物劃分政治取向的單面向思考模式。配合日記體裁本身的可信度與閉鎖性，讓讀者可以從「個人」為主體，重新出發，一窺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到大陸變色這一連串動亂中，一位出生臺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大時代種種政治問題與社會紛亂時，所呈現的多元思考面向與自主性。而這種多重式的認知，或許也正代表了臺灣人某種身分認同的原型。

<sup>63</sup> 貝埃緹斯·狄迪耶著，西川長夫、後平隆譯，《日記論》，頁 123。

<sup>64</sup> 同上。

文本越境 · 意義再製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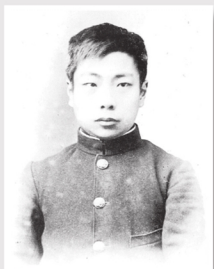
臺大出版中心

### 第三章

## 〈藤野先生〉到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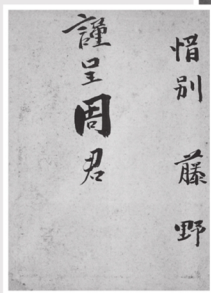
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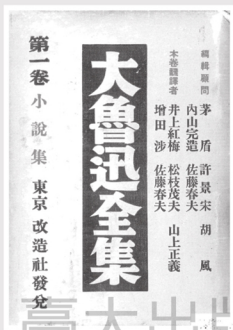


3-1 1903年，魯迅告別東京，入學  
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前夕留影。

3-2 1906年，魯迅自仙台醫學專  
門學校退學，離開仙台前夕  
藤野先生送給魯迅的紀念照  
片。（前北京魯迅博物館館  
員蕭振鳴提供）



3-3 1906年，藤野先生送給魯迅  
的紀念照片背面的簽字。（前  
北京魯迅博物館館員蕭振鳴提  
供）



3-4 《大魯迅全集》（東京：改造社，1937）第一卷封套。



3-5 1945年，魯迅小說〈藤野先生〉刊登於《新聲》創刊號，圖為封面。



## 一、前言

1926年10月，魯迅於廈門大學短期執教期間，寫下了名文〈藤野先生〉，懷念他留學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的日本恩師藤野嚴九郎（1874-1945），當時距魯迅告別仙台，告別藤野先生已整整二十年。〈藤野先生〉最初發表於1926年12月10日發行的雜誌《莽原》（第1卷第23期）上，其後收於1928年9月由北平未名社所出版的〈未名新集〉之一的《朝華夕拾》。雖然魯迅此文在1930年代中期，曾經以選文的形式，分別收入岩波文庫《魯迅選集》（岩波書店，1935年）、《大魯迅全集》（改造社，1936年）中，並透過日本的臺灣之書籍市場，在臺灣流通並擁有一定的讀者。但是〈藤野先生〉第一次在臺灣發行的雜誌上刊行，亦即，雖是重刊但以單篇文章的形式，出現在臺灣的公共場域上，卻並非於殖民地時期，特別是1920年代在臺灣人主辦的雜誌刊物上，曾有過的轉載魯迅文章的熱潮中，反而是在日本戰敗，臺灣重歸中國版圖之後，且其刊載之語言也不是以中文形式，而是以日文譯介姿態出現在等待遣送的日本僑民雜誌《新聲》月刊創刊號（1945年12月26日發行）之上，此雜誌《新聲》的編輯兼發行人，為戰前《臺灣時報》的編集長植田富士太郎。

本文旨在透過〈藤野先生〉這一文本，討論在1945年日本敗戰的時間點上，臺灣這個儼然已成為「舊」殖民地之特殊場域，由敗戰之民日本人所主編的雜誌，企圖透過〈藤野先生〉表達或展示何種的「文化符碼」？此一文本在戰後當下的時間點上，在臺灣的日僑雜誌上登場，雖然是戰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日僑政策的直接派生產物外，日人主編在以待遣返的日僑為對象的刊物中，選擇魯

迅此一文本，應該也是具有目的性的文本選擇。透過〈藤野先生〉此一文本的重刊與編輯，其戰後的時間點與臺灣此一空間場域，必然使此一文本，具有了多重層次的意涵在。透過〈藤野先生〉到臺灣此一文本旅行的討論，本文意圖討論文本的再生產與傳播過程中，如下的幾個層面的問題：（1）在臺灣的魯迅傳播受容史中，〈藤野先生〉此文登場的意義。（2）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日僑政策，特別是針對日僑的文化政策，提供了〈藤野先生〉文本旅行的歷史可能性。（3）日人編輯特別選刊〈藤野先生〉，呼應了行政長官公署的日僑政策，試圖透過〈藤野先生〉傳達對未來中日親善的期待。而選刊此一文本，亦具有對於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特別是戰前日本的中國觀，提出反省意涵。（4）〈藤野先生〉刊出後引發的日僑投書，也表達了部分在臺日人如何透過此一文本，對於日本敗戰的檢討與對未來的期待。針對〈藤野先生〉選文的刪改提出批評的投書，主要針對魯迅原文重刊中，被日人編輯刪改了代表魯迅「國民性」批判以及戰前用語「支那」的部分。而從此一編輯上微妙的刪改及讀者反應，似乎也顯現了敗戰之後的日本人，如何面對戰前日本的自我批判的不同態度。

總之，透過〈藤野先生〉到臺灣的討論，我們發現戰後臺灣此一文本的登場，是同時建立在對於「過去」的繼承與斷裂上。繼承的是，在臺灣從1920年代以來既有的中日文魯迅文本傳播的背景。事實上〈藤野先生〉早就來過臺灣了，但是敗戰後的殖民地臺灣重新提起〈藤野先生〉，讓文本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產生新的意義；斷裂的是，滯臺日僑的魯迅文本傳播轉譯選擇中，對於「過去」的日本帝國中國觀的拋棄，以及在對於未來日本的民主主義與中日親

善的期待上，作為出發點的對於過去軍國主義的告別。

## 二、魯迅的臺灣傳播

魯迅在臺灣的傳播共有兩次高潮期。第一次高潮期是在殖民地時期的 1920 年代，而第二次魯迅傳播的高潮期，則在戰後初期的 1946 年到 1948 年。<sup>1</sup>關於殖民地時期到戰後初期的魯迅作品在臺灣轉載和出版的情形，茲列表於下。

表一：殖民地時期到戰後初期魯迅作品在臺灣轉載出版情形

年	月日	作品名	刊載刊物名	卷/號/期	備註
1925	1.1	〈鴨的喜劇〉	《臺灣民報》	3：1	
	4.1	〈故鄉〉	《臺灣民報》	3：10	
	4.11	〈故鄉〉	《臺灣民報》	3：11	
	5.1	〈犧牲膜〉	《臺灣民報》	3：13	
	5.21	〈狂人日記〉	《臺灣民報》	3：15	
	6.1	〈狂人日記〉	《臺灣民報》	3：16	
	6.11	愛羅先珂〈魚的悲哀〉 (譯)	《臺灣民報》	3：17	
	9.6	愛羅先珂〈狹的籠〉(譯)	《臺灣民報》	69 號 <sup>2</sup>	
	9.13	愛羅先珂〈狹的籠〉(續)	《臺灣民報》	70 號	
	9.20	愛羅先珂〈狹的籠〉(續)	《臺灣民報》	71 號	
	9.27	愛羅先珂〈狹的籠〉(續)	《臺灣民報》	72 號	

<sup>1</sup> 詳細請參考陳漱渝，〈坍塌的堤防——魯迅著作在臺灣〉，《魯迅研究月刊》1990 年 8 月號（北京：魯迅博物館）；北岡正子、黃英哲，〈《許壽裳日記》解說〉，《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研究中心，1993 年）；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sup>2</sup> 《臺灣民報》於 1925 年 7 月 1 日第 59 號開始，期數由卷期改為總號。



1925	10.4	愛羅先珂〈狹的籠〉(續)	《臺灣民報》	73 號	
	11.29	〈阿 Q 正傳〉	《臺灣民報》	81 號	
	12.6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2 號	
	12.13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3 號	
	12.20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4 號	
	12.27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5 號	
1926	1.10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7 號	
	1.17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88 號	
	2.7	〈阿 Q 正傳〉(續)	《臺灣民報》	91 號	
1929	12.22	〈雜感〉	《臺灣民報》	292 號	
1930	4.5	〈高老夫子〉(上)	《臺灣新民報》	307 號	
	4.12	〈高老夫子〉(中)	《臺灣新民報》	308 號	
	4.19	〈高老夫子〉(下)	《臺灣新民報》	309 號	
1932	3.14	愛羅先珂〈池邊〉(譯)	《南音》	1: 5	
	9.27	〈魯迅自敘傳略〉	《南音》	1: 11	
1933	1.1	〈高老夫子〉(上)	《新高新報》	354 號	
	12.30	〈無題——上海新夜報所載民生疾苦詩選〉	《福爾摩沙》 (フォルモサ)	2 號	
1935	6	〈孔乙己〉 〈風波〉 〈故鄉〉 〈阿 Q 正傳〉 〈鴨的喜劇〉 〈肥皂〉 〈高先生〉 〈孤獨者〉 〈藤野先生〉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講演) 〈上海文藝之一瞥〉(講演)	岩波文庫《魯迅選集》		佐藤春夫、增田涉譯，岩波文庫《魯迅選集》(日本：岩波書店)。

1936	4	〈藤野先生〉	《大魯迅全集》	卷 2	《大魯迅全集》全 7 卷（東京：改造社）。臺灣人與在臺日本人廣泛閱讀《魯迅選集》和《大魯迅全集》。
1945	12.26	〈藤野先生〉（節譯）	《新聲》	創刊號	上杉一男〈文化人的信義——請問日文雜誌《新聲》編者〉（文化人の信義—日文雜誌《新聲》編集者に問ふ）一文於 1946 年 1 月 9 日在《新生報》刊載，質疑節譯〈藤野先生〉的動機。
1946	6.10	〈孔乙己〉	《華語自修書》	卷 4	香坂順一，《華語自修書》卷 4（臺北：掬水軒）。

1946	10.21	〈兒時〉	臺中《和平日報》副刊「新世紀」	70期	
	11.1	〈魯迅舊詩錄〉	《臺灣文化》	1:2	謝似顏輯， 《臺灣文化》 (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
1947	1.15	《狂人日記》			王禹農譯註， 《狂人日記》 (臺北：標準國語通訊學會)。
	1	《阿Q正傳》			楊遠譯，中日文對照《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
	6.10	〈鴨鴨的叫〉(〈鴨的喜劇〉之節錄)	《國語自修講座》	卷1	張我軍編著， 《國語自修講座》(臺中：聯合出版社)。
	7.1	〈美女蛇〉(〈從百草園至三味書屋〉之節錄)	《國語自修講座》	卷2	
	8.15	〈澆花〉(〈馬上日記〉之節錄)	《國語自修講座》	卷3	

1947	8	《故鄉》			藍明谷譯， 《故鄉》（臺北：現代文學研究會）。
	11.1	〈定局〉（〈祝福〉之節錄）	《國語自修講座》	卷 4	
	11	〈鴨的喜劇〉	《初級國語文選》		臺灣省教育廳編輯，初級中學適用《初級國語文選》（臺北：臺灣書店）。
	11	〈看戲〉（〈社戲〉之節錄）	《國文》		臺灣省教育廳編輯，1947年臺灣省各縣市小學教員暑期講習講義之二《國文》（臺北：臺灣書店）。
1948	1	《孔乙己·頭髮的故事》	《現代國語文學叢書》	第 2 輯	王禹農譯註， 《現代國語文學叢書》（臺北：東方出版社）。
	1	《藥》	《現代國語文學叢書》	第 3 輯	
	3.25	〈剪辮〉（〈頭髮的故事〉之節錄）	《國語自修講座》	卷 5	

資料來源：殖民地時期部分，參考中島利郎，〈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新文學と魯迅（上）（下）—その受容の概観—〉，《聖徳学園岐阜教育大學紀要》第 24 集、第 28 集（1992 年、1994 年）。戰後部分是依據筆者的調查，經過確認者。

第一次魯迅傳播高潮期的 1920 年代，臺灣因受到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思潮與世界民族自決風潮影響，政治上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文學上則引發言文一致的白話新文學運動與臺灣話文運動。當時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臺灣民報》除了介紹新文學理論、刊載各種新文學主張之外，亦不時轉載胡適、魯迅、郭沫若、周作人等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其中以魯迅的創作（包括譯作）轉載最多，其理由是因為魯迅的文筆（譯筆）非常老練，可以作為語體文的模範。<sup>3</sup>

1937 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日本當局為了加強對臺灣言論、思想之管制，廢止漢文報紙的發行，臺灣的白話新文學運動因政治介入而遭到阻礙，當時主要介紹中國新文學的傳媒——報紙，直到日本戰敗前，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新文學作品之轉載幾乎不可能。同時，當時日本已統治臺灣四十餘年，日本語教育也開始顯示出成效，臺灣的文化界可以說從原本的漢、和交融情況，逐漸轉由日本語獨占，日本語的讀書市場開始形成，日本語比漢語在當時臺灣社會更具有重要影響力，臺灣人之日本語文學創作也在此時期日漸成熟，因而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熱潮已呈減退趨勢。但是，回到日本內地來檢視的話，則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光景。1935 年，岩波書店出版了由佐藤春夫、增田涉合譯的岩波文庫《魯迅選集》，1936 年，改造社也出版《大魯迅全集》，從中可以看出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依然受到矚目，臺灣的殖民地社會雖然面臨漢文的萎縮，但是否就此斷絕了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聯繫必須進一步探究。筆者以為日文讀書市場的興起，可能因此將在日本

<sup>3</sup> 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頁 53。

內地以日文形式出版的魯迅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文學養分再度回傳殖民地。而從龍瑛宗留下的藏書中有《魯迅選集》<sup>4</sup>與楊逵的回憶中提及接收了日本警官友人入田春彥的遺物《大魯迅全集》，<sup>5</sup>戰後活躍於日本的評論家尾崎秀樹也曾在回憶二戰中臺北的學生生活，提及《魯迅選集》是他愛不釋手的寶貝。<sup>6</sup>由此可以得知魯迅之影響不止臺灣知識分子，連在臺日本人也都在閱讀岩波文庫《魯迅選集》和《大魯迅全集》，而且從當時臺灣高等學校的學生幾乎爭相購讀岩波文庫系列的書籍，<sup>7</sup>可以知道岩波文庫《魯迅選集》的流傳、閱讀肯定勝過《大魯迅全集》，透過岩波文庫《魯迅選集》和《大魯迅全集》的傳播也證明了魯迅並沒有完全在臺灣消失。至於臺灣的第二次魯迅傳播高潮期，則到戰後初期才發生。

二戰後，臺灣復歸中國。當時統治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sup>4</sup> 龍瑛宗的藏書現存於臺南市的臺灣文學館。

<sup>5</sup> 楊逵，〈臺灣作家の七十七年—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文藝》第22卷第1號（東京：河出書房，1983年1月）。

<sup>6</sup> 陳映真主編，《迎回尾崎秀樹》（臺北：人間出版社，2005年），頁17-18。

<sup>7</sup> 1943年《臺灣藝術》雜誌社曾召開「戰爭下的讀書界諸問題」座談會，出席者有臺灣貿易振興會社長貝山好美、總督府情報課情報係長奧水武、興南新聞經濟部長陳逢源、評論家黃得時、小說家龍瑛宗等人。座談會上有以下發言。「貝山：最近的學生不像以前的學生用功。黃得時：但是也有學生一聽到書店有新的貨物到，馬上奔向書店熱心幫忙卸下貨物。貝山：雖然如此，現在學生確實不如以前學生用功。黃得時：最近學生似乎有一種信仰，只要是岩波出版的什麼都好。例如只要是岩波文庫一進貨，不論是哲學也好或是科學也好，每一種類馬上訂購一冊。奧水：前天有一書店進貨時，學生們比我先趕到書店，熱烘烘的。陳逢源：大稻埕的書店只要岩波文庫一進貨，馬上賣光。……最近岩波文庫賣得很好，經常看到高等學校的學生排隊買。」見〈戰時下における読書界の諸問題〉，《台灣芸術》第4卷第10號（台灣芸術社，1943年10月），頁4-5。（原文日文，筆者譯）

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所採取的文化政策是由許壽裳主導，並極力稱揚宣傳魯迅精神，意圖透過魯迅的傳播，在臺灣掀起一個「新五四運動」，達成戰後臺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工作。<sup>8</sup>此外，活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本地作家楊雲萍、楊遠、龍瑛宗等人對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之譯介也是不遺餘力。因此，五四時期的中國新文學又再度大量在臺灣被翻譯介紹，除了魯迅之外，還有茅盾、郁達夫、沈從文、老舍、豐子愷等人作品，但是上述作家皆止於零星介紹，不像魯迅那樣被盛大的系統介紹。

從上述的列表中，我們能夠得知〈藤野先生〉一文，在戰前並未被重視，一直到日本敗戰後才出現在臺灣的公共場域——日文雜誌《新聲》上，其被刊載的時間點正是在臺灣的第二次魯迅傳播高潮期的前夕，因此出現的時間點相當值得玩味。關於〈藤野先生〉此文之刊載，戰前即已在臺灣流傳的岩波文庫之《魯迅選集》和《大魯迅全集》都收有〈藤野先生〉，二者不同的是，岩波版的〈藤野先生〉是增田涉所翻譯的，改造社版的〈藤野先生〉則是松枝茂夫所翻譯。因此，早在日文雜誌《新聲》轉載〈藤野先生〉之前，肯定已有不少臺灣知識分子及在臺日本人從岩波文庫《魯迅選集》和《大魯迅全集》中閱讀了〈藤野先生〉。令人不解的是，在戰前曾掀起熱潮的魯迅文學作品，根據筆者的調查結果，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後初期臺灣的報紙或文藝雜誌所發表的文藝批評，皆沒有直接言及〈藤野先生〉這篇作品，即使是戰後初期出版的中日對譯魯迅作品單行本中，也沒有〈藤野先生〉，甚至於民間編輯或政府編輯的

---

<sup>8</sup> 詳請參照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

國文教科書中也都沒有採錄「藤野先生」，反而在日本人編輯之日文雜誌《新聲》上出現了〈藤野先生〉這個文本，並且在日本人之間引起熱切討論，值得進一步探討。<sup>9</sup>

### 三、關於日文雜誌《新聲》月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臺灣重歸中國，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僑民包括軍人約有四十九萬人，這批日本僑民從12月下旬開始，到隔年1946年2月初，分批被遣返日本。當時等待遣返的日本僑民，得到當時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長官公署的許可與援助，創刊雜誌《新聲》月刊。

日本戰敗之後，將近四十九萬人的僑民當中，包含普通民眾約有三十二萬人，軍人約有十七萬人，之後為了戰後臺灣重建工作，而留用了一批技術人員和教育人員，包含家屬在內共約兩萬八千人。長官公署設立了「日僑管理委員會」，負責傳達國民政府和長官公署關於日本人管理的命令和訓示、遣送日本人的業務、整理留用日僑身分關係，以及在臺日本人社會的秩序維持等業務，可說是在新舊政權交替中的重要窗口。其中特別關於「留用日僑管理工作

---

<sup>9</sup> 何以〈藤野先生〉雖然早在1930年代即已在臺灣傳播，但不論戰前戰後，似乎沒有引發臺灣人的共鳴？而〈藤野先生〉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的臺灣，在日僑的雜誌上再度登場，似乎是日人主動提出的作為期待（未來）中日和平的代表文本。換言之，這一文本的重刊，設定的兩方是中國與日本。至於臺灣是不是有被納入此一中日和平的構圖中，或是直接等同於「中」方之一部分，這似乎值得進一步討論。另外，賴和曾寫過類似〈藤野先生〉的反省師生關係與殖民被殖民關係重疊的作品，比如〈高木友枝先生〉（遺稿，1943年登載於《臺灣文學》3卷2期）。類似的回憶、情緒與反省，似乎也是臺灣人所熟悉的。但是沒有出現臺灣人針對〈藤野先生〉的評論，也頗堪玩味。



要項」的相關法規中，長官公署指示「日僑管理委員會」，對日僑採取的方針是「倘欲使留用日僑儘量發揮其具有之技術經驗，則須在物質上給予十足薪津以除生活不安；在精神上灌輸其使命之嚴重性以向中華民國國策興奮盡瘁。」此外，更要求其採取的措施要重視啟發宣傳工作：「俾留用日僑蟬蛻其卑屈感，而切身懷抱中日兩民族互相提攜所以興起東亞之基礎，並覺悟臺灣就為其嘗試地區。故受命留用參加新臺灣建設工作極為榮譽，凡振起此種精神非涖啟發與宣傳不可，然而此種啟發宣傳情事，如放任由留用各該機關以次要事務辦理之，則不能獲得預期成效，是以則應留用之根本意義，檢討其具體方策，向留用日僑予以指示以期管理日僑之完善與綜合統一整齊。」<sup>10</sup>並進一步在「日僑管理工作要綱實施要領」中，具體指示日僑管理委員會：「本會除了利用雜誌《新聲》作為啟發宣傳機關之外，還努力在其它各新聞雜誌經常刊載日僑的消息。」<sup>11</sup>

因此可知《新聲》的刊行有其政治性的任務，主要是為啟發當時仍滯留臺灣等待遣返的日本人和被留用的日本人「蟬蛻其卑屈感」，並宣導戰後中日需互相合作、友好的宣傳刊物，是在長官公署的許可下，接受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指導並監督的日文雜誌。《新聲》於1945年12月創刊。當時臺灣雖然已經重歸中國，但六百萬的臺灣人口中，日本語的使用人口至少占百分之七十，因此《新聲》的閱讀人口，除了日本人之外，當然也有一定數量的臺灣

<sup>10</sup> 〈留用日僑管理工作要項〉，《台灣引揚·留用記錄》第2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頁22-34。（原文中文）

<sup>11</sup> 〈日僑管理工作要綱實施要領〉，同上，頁35-38。（原文日文，筆者譯）

讀者。<sup>12</sup>

《新聲》月刊的編輯兼發行人是戰前臺灣總督府機關誌《臺灣時報》的編集長植田富士太郎，雜誌的創辦目的與期待可由其內容窺見，「創刊號」（1945年12月26日）的目次如下：

創刊の辭

「新聲月刊」發刊に寄せて	夏濟聲
中國之命運（第一章）	蔣中正
私は中国のお正月が好き（英文譯・大澤）	林無双
蘇東坡の逸話から	林語堂
小説 藤野先生	魯迅
冬二題 ▽華北の冬	T・T
▽華南の冬	T・O
日本の動態—世界の放送と新聞から—	編輯部編
世界通信（世界の放送と新聞から）	
在臺日本人に関する輿論とその動向	
中國語講座（序・國語の窓）	小田信秀
婦人欄・二十三歳の校長先生	
臺灣の文學界	
フアブルの言葉から	
讀者文苑募集	
編輯後記	

<sup>12</sup> 筆者手上的《新聲》創刊號為一位曾接受日本教育的高齡臺灣老前輩所提供，《新聲》是否有再繼續發行，筆者還在調查中。《新聲》創刊號上有刊出次號預定內容是：「一、臺灣省經濟建設方途。二、在台日本人諸君へ。三、隨筆四題。四、中國短篇小說集。五、日本の動態。六、明るい日本人前進運動。七、中國語講座。」，頁45。

《新聲》創刊號共有六十頁，堪稱是一本綜合雜誌，其中有宣導性文章，如〈中國之命運〉（7頁）；有中國語學習講座（1頁）；時事報導的篇幅最多，如〈日本的動態〉（25頁）、〈世界通信〉（3頁）；也有文藝性文章，如〈我喜歡中國的新年〉（私は中国のお正月が好き）（4頁）、〈自蘇東坡的逸話〉（蘇東坡の逸話から）（1頁）、〈冬二題〉（4頁）；另外還有〈小說 藤野先生〉（4頁）、〈婦人欄〉（1頁），呼籲日本婦女要外出工作，強調婦女的動態關係國家的興亡，並在以編輯部之名發出的〈關於在臺日本人的輿論及其動向〉（在臺日本人に関する輿論とその動向）（5頁）文中，呼籲在臺灣的日本人至少還不至於完全歸零，故應該懷抱服務、感謝的心情，同時也冀望中國人對日本青年打開心胸，予以指導援助。《新聲》內容多樣豐富，但是主要還是偏重在對當時滯留臺灣的日本人之日本本國資訊傳達，以及軟性的政策宣導。

《新聲》的「創刊辭」以感激的口吻說：

過去四個月，我們日本人總算在敗戰的現實下生活了下來。

這段期間，因處境與立場的關係，而有了種種不同的感覺和體驗，我們一直感激中國政府的寬大方針與本省人的理解態度，這種感動我們銘刻在內心深處。

今後我們會在被允許的道路上前行，經常反省並自我警惕，點燃些微的希望，繼續努力。

此回得到行政長官公署的溫暖同情，允許刊行日文的月刊雜誌《新聲》，成為我們今天生活中的一線光明。我們將據此學習中國文化的一端，了解本省諸多事情和母國的動靜，我

們想抱持著新的真正意義進入生活。

我們寄望大家能夠明察行政長官公署的意圖，支援本雜誌。<sup>13</sup>

當時負責監督指導《新聲》的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夏濤聲在〈寄「新聲月刊」發刊〉文中，批評日本軍閥與軍國主義教育及受其影響的日本人民，並譴責日本人民對中國和臺灣抱持優越感，缺乏正確的中國認識。文中最後指出：「《新聲》月刊的使命，一方面是在對日本人的再教育，肅正其侵略思想，培養其民主思想，使日本人認清這回戰爭失敗的原因和真相，徹底清算過去的錯誤；另一方面介紹中國的文化思想及一般的進步狀況，更正並增進日本人的中國認識。」<sup>14</sup>

從《新聲》的目次和內容來看，確實如「創刊辭」所言，《新聲》的創刊目的是希望當時還滯留臺灣之日本人，透過閱讀《新聲》「學習中國文化的一端，了解本省諸多事情和母國的動靜」，「抱持著新的真正意義進入生活」。此外，也正如夏濤聲在〈寄「新聲月刊」發刊〉中所言，希望「使日本人認清這回戰爭失敗的原因和真相，徹底清算過去的錯誤；另一方面介紹中國的文化思想及一般的進步狀況，更正並增進日本人的中國認識。」即所謂的啟發日本僑民。但是，筆者認為，《新聲》的名稱本身就意味深長，在雜誌內容中，最值得注目、意味最深長的文章有二篇，一是〈臺灣的文

<sup>13</sup> 〈創刊の辭〉，《新聲》創刊號（臺北：新聲月刊社，1945年12月26日），頁1。（原文日文，筆者譯）

<sup>14</sup> 夏濤聲，〈《新聲月刊》發行に寄せて〉，同上，頁2。（原文日文，筆者譯）

學界〉，另一即是〈藤野先生〉。<sup>15</sup>

〈臺灣的文學界〉的撰稿人署名「U」，筆者推測極有可能就是《新聲》的編輯 Ueda Fuzitarou（植田富士太郎）。這篇文章可以視為在日本敗戰，臺灣復歸中國後的「時間點」上，一位日本編輯對五十年間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創作之文學作品的總檢討和看法。在文章的開頭，U 便直接地指出，「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文學界，可以說還沒有出現一位像魯迅的作家就結束了。」文章的最後表述了「衷心期待能夠擔負臺灣省建設任務，生氣勃勃的『民族自覺』之創作活動從明年的春天開始展開。」<sup>16</sup>從這篇《新聲》的編輯所撰寫的短文中，我們可以理解日本編輯還是認同魯迅為近代中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的權威地位，同時也能理解其刊載〈藤野先生〉的理由應是：

1. 他認為「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文學界，可以說還沒有出現一位像魯迅的作家就結束了。」因此刊載了〈藤野先生〉，意在呼籲臺灣需要再重新好好閱讀魯迅。
2. 〈藤野先生〉可以作為今後臺灣需要展開之「生氣勃勃的『民族自覺』之創作活動」的範本。
3. 編輯一方面似乎想透過〈藤野先生〉一文，對尚滯留臺灣的日本人訴說在中日的互動網絡中，還有如同藤野先生這種胸襟開闊的日本老師，對於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特別關懷照

<sup>15</sup> 魯迅，譯者未署名，〈小說 藤野先生〉，《新聲》創刊號（1945年12月26日），頁47-50。

<sup>16</sup> U，〈台灣的文學界〉，同上，頁13。（原文日文，筆者譯）

願，意在使日本人「蟬蛻其卑屈感」，作為敗戰之民也不需過度自卑。另一方面，也想以〈藤野先生〉作為中日友好的象徵，將此位〈藤野先生〉轉為中日友好的文化符碼，向中國人（臺灣人）昭告中日親善的一面，並期待透過藤野先生的形象，以扭轉日本人身為侵略者的軍國主義形象。但是，如前所述，《新聲》上所刊登的〈藤野先生〉並非是岩波文庫的《魯迅選集》或改造社的《大魯迅全集》譯本，而是不知譯者的節譯版本。

#### 四、「友好的象徵」：節譯版的〈藤野先生〉

關於〈藤野先生〉的節譯版之問題，在此文登出後的隔年，即1946年1月9日的《新生報》上，隨即有日本人上杉一男（生平經歷不詳）的讀者投書〈文化人的信義——請問日文雜誌《新聲》編者〉，全文如下：<sup>17</sup>

我已經在本報中指出，日日月刊雜誌《新聲》創刊號，在日本報紙的編輯上完全沒有定見，也沒有政治性。此外，我還想針對魯迅先生的小說〈藤野先生〉，請教編者二個問題：（一）為什麼沒有事先說明，就刪除魯迅先生原作的部分文章？（二）編輯是否知道被刪除的部分是原作的重點？在此，先為一般讀者說明問題的開端。首先，《新聲》所刊登的〈藤野先生〉，是從「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的文章開始的。原作在這段文章之前，還有

---

<sup>17</sup> 上杉一男，〈文化人の信義—日文雜誌《新聲》編集者に問ふ〉，《新生報》第4版（1946年1月9日）。（原文日文，筆者譯）

十幾行文字描述當時住在東京的清國留學生的生活。第二，《新聲》四十九頁下段第十四行和第十五行之間，漏掉了下面這段文章：「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摘自改造社《大魯迅全集》）<sup>18</sup>

問題就出在這裡。標榜「介紹中國文化」是主要任務之一的《新聲》，在刊登中國的世界級作家的作品時，可以擅自去頭挖軀體嗎？而且中間這段被刪除的部分是文章的重點，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對日本」的命運縮圖。刪除了這個部分，這篇作品就完全喪失生命。魯迅先生放棄醫學而離開仙台的理由，根據《新聲》的文章，似乎完全是因為留學生之間無聊的紛爭；可是看看被刪除的部分，就明白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日本的軍國主義令人作嘔，以及領悟到醫學救不了

<sup>18</sup> 投書者上杉一男引用的日文譯文出自鹿地亘等譯，日文版《大魯迅全集》卷2（東京：改造社，1936年）。而這段中文則是筆者引用魯迅的原文。

中國，這是促使魯迅先生捨棄醫學的二個理由。一如這篇作品中所寫的，一如未亡人廣平女士所說的，魯迅先生終其一生對藤野老師敬愛有加，但是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則是極端厭惡，徹底抨擊。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有很多感情融洽的朋友或是有師生關係的人們。然而，中國人總是排斥日本人，最後終於上演這場以今天悲慘的日本大敗戰宣告結束的大衝突。總覺得日本的侵略性軍國主義是唯一的原因，魯迅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想說的不外乎這件事。也許編者是因為篇幅的關係而刪除，果真如此，也還有其他很多地方可以刪除吧。（擅自刪除的作法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實在無法想像編者是有心刪除這段文章的，這麼一來，編者的頭到底是朝向哪一邊？民主主義？軍國主義？

《新聲》的編者要求在臺日人民民主主義化之前，應該先換換自己的腦袋。

上杉一男文中指出《新聲》的〈藤野先生〉被刪除的部分為〈藤野先生〉一文開頭的部分，這部分正是魯迅吐露出對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的失望，離開東京前往仙台的原因：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sup>19</sup>

其中最重要的脫落部分，也就是上杉一男在投書中所抗議的，為便於讀者理解，刪除內容再引用一回：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sup>20</sup>

這段文字正是魯迅關於著名的「筆記事件」（日本學生懷疑藤野先生在還給為魯迅刪改的筆記裡，把考試題目洩漏給魯迅，因

---

19 魯迅《朝華夕拾》（北平：未名社出版部，1982年），頁117-118。

20 魯迅《朝華夕拾》，頁126-127。

此魯迅得了好成績)與「幻燈事件」(中國民眾麻木不仁歡呼圍看日軍處決為俄國做間諜的中國人)的描寫。讀者上杉也認為被削除與脫落的部分是原作的重點，憤怒地認為是編輯植田富士太郎有意偏袒軍國主義，或不敢正視日本的軍國主義。上杉的意見讓我們一方面得以理解在臺灣面臨新舊政權轉換的時間點上，一位身為敗戰之民的日本知識分子對〈藤野先生〉的解讀，以及〈藤野先生〉作為一個中日友好象徵的文本，日本人方面的接受與回應。上杉除了譴責日本在敗戰結束殖民統治後，還有日本人心中保存著軍國主義思想(即指沒有署名的〈藤野先生〉之譯者與已知的《新聲》之編輯植田)，而且同時譴責編輯植田對此思想的姑息心態。我們也可藉此理解〈藤野先生〉之文本因角度與立場的迥異，每位讀者各有不同的領悟與解讀，由此也可看出以〈藤野先生〉作為一文化符碼的接受樣貌。此處因〈藤野先生〉的刪節問題所引發的上杉發言，這問題牽涉了過去殖民者一方的意識問題，對脫殖民地後的臺灣而言，實有其複雜的現實問題，值得再深思探究。

上杉在投書中所指出的脫落部分是引用了收於改造社《大魯迅全集》的〈藤野先生〉之譯文，而《新聲》的〈藤野先生〉之譯文出自何人之手呢？根據筆者的調查，發現它是轉載自岩波文庫《魯迅選集》中所收錄的〈藤野先生〉，但是編輯植田作了小小的更改。

以下將《新聲》〈藤野先生〉與岩波文庫的《魯迅選集》〈藤野先生〉(1935年6月初版，對照的版本是1938年1月第6版)的譯文相異處列表於下，並在相異處底下畫線：

表二：岩波文庫《魯迅選集》〈藤野先生〉、《新聲》〈藤野先生〉譯文對照

岩波文庫《魯迅選集》〈藤野先生〉 (1938年1月第6版)	《新聲》〈藤野先生〉
僕はそこで <u>仙台の医学専門学校</u> へ行った。	僕は <u>東京を去って仙台の医学専門学校</u> へ行った。
また、 <u>支那</u> からの留学生はなかった。	また、 <u>中国</u> からの留学生はなかった。
幾人かの職員はまた僕のために <u>食宿の心配</u> をしてくれた。	幾人かの職員は <u>また食宿の心配</u> をしてくれた。
僕は宿屋が囚人の食事差し入れを兼務にしてゐるからとて僕に関係のないことなどは考へたが、	僕は宿屋が囚人の差し入れを兼務にしてゐるからとて僕に関係のないことなどは考へたが、
けれども好意は無下に却け難く、	けれども好意は無下に <u>斥け難く</u> 、
解剖学は二人の教授が <u>分任</u> してゐた。	解剖学は二人の教授が <u>分擔</u> してゐた。
一抱の大きささまざまな書物を持ち込んだ。やがて書物を教壇の上に置いて、	一抱の大きささまざまな書物を教壇の上に置いて、
中には <u>支那</u> の訳本を翻刻したものもあった。	中には <u>中国</u> の訳本を翻刻したものもあった。
決して <u>支那</u> に比べて早いとは云へなかった。	決して <u>中国</u> に比べて早いとは云へなかった。
先生は人骨と数多の <u>単独の頭骨</u> のまん中に座つてゐた。	先生は人骨と数多の <u>単独の頭</u> のまん中に座つてゐた。
そして今後毎週提出して看せるやうにと言つた。	今後毎週提出して看せるやうにと言つた。
<u>支那人</u> は大へん靈魂を敬重するといふから、	<u>中国人</u> は大へん靈魂を敬重するといふから、
先生は <u>支那</u> の婦人が纏足してゐるとは聴いてゐたが、	先生は <u>中国</u> の婦人が纏足してゐるとは聴いた <u>みたが</u> 、
僕はその時はマルがつけてあるのが可笑しいと思つたけれども、	僕はその時はマルがつけてあるのが可笑しいと思つた <u>けれど</u> 、
幹事はまた懸命に運動して、	幹事は懸命に運動して、

だが先生がどうも <u>凄然</u> としてみられるのを見て、	だが先生がどうも <u>撫然</u> としてみられるのを見て、
多年写真をと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	多年写真をとらなかった。
それを云へば先生を失望させ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し、	それを云へば先生を失望させ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僕が僕の師と仰ぐ人々の中で、	僕が僕の師を仰ぐ人々の中で、
小にしてはこれ <u>支那</u> のためであり、	小にしてはこれ <u>中国</u> のためであり、
すなはち <u>支那</u> が新しい医学を有つことを希望されたのであり、	すなはち <u>中国</u> が新しい医学を有つことを希望されたのであり、
すなはち新しい医学が <u>支那</u> へ伝へられることを希望されたのである。	すなはち新しい医学が <u>中国</u> へ伝へられることを希望されたのである。
これを <u>永久</u> の記念としようと思つて、	これを <u>永久</u> の記念にしようと思つて、
運送局に探すようにと責問したが、	運送店に探すようにと責問したが、
今になほ僕の北京の寓居の東側の壁に、	今だに僕の北京の寓居の東側の壁に、
いつも夜間に <u>倦んじ</u> 疲れて、	いつも夜間に <u>倦み</u> 疲れて、

二者譯文相異處其實不算多，最明顯的部分是將帶有鄙視意味的「支那」一詞全部改為「中國」，其他相異處只是日文語法表現的不同，日文的意思是相同的。在歷史轉折的時間點上，《新聲》的編輯植田（同時也是〈藤野先生〉的轉載者或譯者）將「支那」改為「中國」，並刻意刪除具有軍國主義象徵的部分，很有可能刻意要將此文本修飾成為符合中日雙方標準之形象的考量。

《新聲》中〈藤野先生〉削除的部分，恰恰是以往被認為導致魯迅棄醫從文的生涯轉折事件中對於圍觀同胞被槍斃的看客心態反思的回憶。對於「看客」在內的國民性批判，也是魯迅在鐵屋中吶喊的內部批判的重要源頭。因此，為了中日友好，削除魯迅針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自我批判，保留對藤野先生的懷念。或是為了中日

友好，更應該如實地呈現魯迅在〈藤野先生〉中顯現的內部與外部批評的複雜性，就變成了《新聲》編輯植田與讀者上杉之間，對於在敗戰之後，日本人在展開「抱持著新的真正意義進入生活」（《新聲》「創刊辭」）之際，如何面對過去，以及展望未來的日本，所呈現的微妙的差別了。可以判斷《新聲》編輯植田與讀者上杉應該都會同意，敗戰之後的日本，必須告別「過去」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中對中國的侵略與歧視。但是，未來的日本的「新的真正意義」，意即「民主主義」，是否應該存在即便是具有良好意圖的指導性的「削除」呢？魯迅雖批評日本軍國主義，也終其一生對藤野先生敬愛有加。同時對「看客」國民性自我批評亦絲毫不放鬆。上杉代表的是對於這種複雜性的重視，而對於削除的抗議，似乎也暗示著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不應該是指導性的民主主義，這將只是軍國主義時代總動員體制的借屍還魂。甚至，如果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的內涵，包含了對以往中日關係的調整改善的期待，也不應該為了中日親善友好，就忽視了中國的自我批評（看客），及其根源（日本軍國主義）。另外，如果將「支那」改成「中國」的編輯修改也一併納入考慮的話，似乎《新聲》編輯與讀者之間，還存在著新的時代如何面對舊時代的問題。是否只是在新的時代中修改名字即可呢？或者，名字的修改替換，包括對於文本重點的削除，也同時遮蔽了新時代的日本對舊時代的日本更徹底的自我批評的可能性呢？〈藤野先生〉在日本敗戰之際，在臺灣日僑刊物的重新登場引發的編輯削除以及修改的批評，似乎也顯露了敗戰後的日本人對於未來中日關係的想像，以及在中日關係的期待中，所反向折射回來的對於日本自己以敗戰為界的新舊歷史的連續性與斷裂性，在戰後民主主義起步之際的糾葛了。

## 五、結語

魯迅的〈藤野先生〉到臺灣的文本旅行，顯示了文本再生產中，包含的多重層次的文化的與歷史的意義。從《新聲》的轉載〈藤野先生〉與上杉一男的《新生報》讀者投書，更加證明了從戰前到戰後初期，岩波文庫《魯迅選集》與改造社《大魯迅全集》在臺灣之流傳與閱讀層的廣大，此對臺灣第二次的魯迅傳播高潮期也起了一些作用，臺灣第二次魯迅傳播高潮期中，龍瑛宗與楊逵對魯迅的相關論述中即明顯受到《大魯迅全集》「解說」的影響。<sup>21</sup>〈藤野先生〉雖然早就透過日文書籍市場來到臺灣了，但是在戰後的再度登場，卻因為日本戰敗的歷史背景，以及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表現的內容，而使得文本有了新增生的意義。特別是對戰後的殖民地日本人來說，〈藤野先生〉的文本再生產，以及讀者反應，讓此一文本折射出許多魯迅原文以外的意義。

隸屬於長官公署管理下的「日僑管理委員會」，在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監督許可下，為了安撫並啟發這些等待遣返日本的日僑而發行了日文雜誌《新聲》。《新聲》中轉載〈藤野先生〉，其意圖可說是相當明顯，欲以〈藤野先生〉作為戰後中日友好的親善象徵，並「俾留用日僑蟬蛻其卑屈感，而切身懷抱中日兩民族互相提攜所以興起東亞之基礎」。從刪節版的〈藤野先生〉之文本中

<sup>21</sup> 龍瑛宗刊載於《中華日報》第4版「文藝」（1946年5月20日）的短文〈名作巡禮 阿Q正傳〉（日文），楊逵翻譯的中日文對照《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1947年）之序文〈魯迅先生〉（日文），《大魯迅全集》（東京：改造社）第3卷（1937年3月）〈解題〉（增田涉撰）、第7卷（1937年6月）〈傳記〉（鹿地亘編），比較這幾篇作品即能看出。此點蒙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尾崎文昭教授指點，特致謝意。

可以看出為了討好國府當局，因此編輯植田有意識地將魯迅在文中關於中國人的負面描寫加以刪除，並藉藤野先生的形象，扭轉日本人的侵略者之軍國主義形象。

戰後的臺灣，在中日政權的轉換期間，將〈藤野先生〉一文作為戰後中日友好的「文化符碼」加以使用。但是弔詭的是，卻是由當時在臺的日本人所提出，而非由國府來提倡，當然這是得到長官公署的許可，換言之，是經過國民政府的默認才加以刊載，其中與當時國府的戰後對日政策有深刻的關連。當時國府是採所謂「以德報怨」政策，《新聲》封底也清楚地印著「不以怨報怨，而樂與為善」。《新聲》的發行和〈藤野先生〉的刊載即是某種程度體現了戰後初期中日雙方的思維。

然而就殖民地的日僑而言，在〈藤野先生〉的文本再生產中，卻顯現了不同的反應。雖然可能都同意作為中日友好的文本，在敗戰的當下時間點，具有相當的意義。同時，對於敗戰後的新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展開，要如何面對戰前的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以及與之不可切割的中日關係，〈藤野先生〉一文在《新聲》編輯的削除與用語修改所引起的讀者反應中，卻微妙地顯現了不同的立場。這兩種立場，作用在〈藤野先生〉文本上，使得原來是雜誌重刊魯迅舊文的編輯作業，變成了「軍國主義」與「民主主義」在敗戰後對於新日本的期待，以及對未來新日本應有的中日友好的期待中，在舊歷史與新未來之間的連續性與斷裂性的互相糾葛的場所。

## 第四章

### 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

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  
社會像

臺大出版中心





4-1 陶晶孫於1931年任職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時留影。

**中央日報**

### 淡水平邊水門下

#### 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情書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

【本報訊】昨天，上海淡水河邊水門下，發生了一宗令人痛心的殉情案。一名年僅二十歲的少女，因無法與心愛的男子結婚，竟在淡水河邊水門下，用繩子勒死了自己。警方在現場發現了兩封遺失的情書，信中詳細敘述了少女與該男子的愛情經過，以及她因無法與該男子結婚而絕望自殺的原因。據悉，該少女姓陳，名素卿，家住上海某處。她與該男子相識多年，感情深厚，但由於種種原因，兩人未能結為連理。少女在信中表達了對愛人的深深思念和對未來的絕望，最終選擇了這條絕路。警方在接到報案後，迅速趕到現場，將少女的屍體救起，並對現場進行了初步調查。目前，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此事，以查明少女自殺的具體原因。

### 名陳素卿

【本報訊】淡水河邊水門下，發生了一宗令人痛心的殉情案。一名年僅二十歲的少女，因無法與心愛的男子結婚，竟在淡水河邊水門下，用繩子勒死了自己。警方在現場發現了兩封遺失的情書，信中詳細敘述了少女與該男子的愛情經過，以及她因無法與該男子結婚而絕望自殺的原因。據悉，該少女姓陳，名素卿，家住上海某處。她與該男子相識多年，感情深厚，但由於種種原因，兩人未能結為連理。少女在信中表達了對愛人的深深思念和對未來的絕望，最終選擇了這條絕路。警方在接到報案後，迅速趕到現場，將少女的屍體救起，並對現場進行了初步調查。目前，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此事，以查明少女自殺的具體原因。

### 士壯送舞戲歌戲

#### 名英簽唱邊跳邊

【本報訊】昨晚，上海某處舉行了一場精彩的歌舞表演。多位知名藝人登台獻藝，吸引了眾多觀眾到場觀看。表演內容豐富多彩，包括民族舞蹈、現代舞、歌唱等，贏得了觀眾的一致好評。現場氣氛熱烈，掌聲不斷。主辦單位表示，此次表演旨在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展現上海藝人的才華。未來將繼續推出更多高質量的文化活動，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娛樂選擇。

### 兩入相識

【本報訊】上海某處發生了一宗令人驚異的相識事件。兩名素不相識的男子在街頭相遇，竟能談話自如，彷彿認識多年。據悉，這兩名男子分別來自不同的地方，但他們在談話中展現出了驚人的默契和共同語言。這一事件引起了當地居民的廣泛關注，大家紛紛猜測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特殊的聯繫。目前，警方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以查明這兩名男子相識的緣由。

### 兒男好贊慶

#### 電兩交拍可

【本報訊】上海某處舉行了一場慶祝活動，表彰在某一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兒男。活動現場氣氛歡愉，掌聲雷動。獲獎者表示，他們將繼續努力，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主辦單位表示，此次表彰活動旨在激發廣大兒女的愛國情懷和奮鬥精神，推動社會事業的發展。

### 刊兩封二版畫

【本報訊】本報今日在第二版刊出了兩封情書，內容感人至深，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這兩封情書分別來自於淡水河邊水門下自殺少女的遺失信件，信中表達了對愛人的深深思念和對未來的絕望。讀者在閱讀後紛紛留言，表示被信中的情感所打動，並對少女的遭遇表示同情。本報將繼續關注此事，並為讀者提供更多相關信息。

4-2 1950年1月14日《中央日報》第4版刊載少女陳素卿殉情的新聞。陶晶孫根據這件戰後臺灣發生的殉情社會新聞，改寫而成小說《淡水河心中》。

——(一) 威人的壯士入營

【本報訊】威人壯士入營，此舉在軍事界引起極大震動。據悉，該壯士在戰場上表現英勇，多次立功，現已正式加入某部營中，擔任重要職務。此舉不僅顯示了軍隊的包容性，也反映了威人對祖國的深厚感情。

李彌余程萬 飛返滇南指揮

【本報訊】滇南戰事激烈，我軍將領李彌、余程萬率部飛返滇南，重新指揮作戰。兩將領在戰場上展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鼓舞了士氣，為我軍取得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搜獲經古物資 年來進口數量

【本報訊】政府近日搜獲一批經古物資，此類物資的進口數量在近年來有顯著增加。政府表示將加強對進出口貿易的監管，以維護國家經濟利益。

家庭阻授緝緝黨盟 悲憤自殺水保純潔

【本報訊】一名青年因家庭阻礙其參加革命組織，悲憤之下選擇自殺。其家人表示，他們對此事感到極大悲痛，並呼籲社會各界給予關注和幫助。

陳素卿致張白帆純潔

【本報訊】陳素卿女士近日致信張白帆，表達其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和對純潔生活的嚮往。信中充滿了對未來的信心和對理想的追求。

蔣夫人返國

【本報訊】蔣夫人近日返回祖國，此行旨在考察國內建設情況並慰問將士。她在旅途中多次發表談話，表達了對祖國發展的信心和對同胞的關懷。

五中全會召開在即

【本報訊】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即將召開，屆時將討論國家重大政務。與會代表將就當前形勢下的各項政策進行深入探討和決策。

致父母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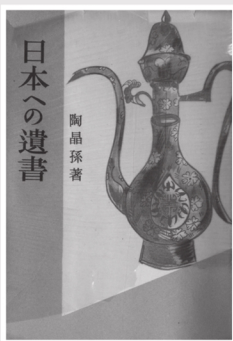
【本報訊】陳素卿女士在信中向父母表達了對革命事業的決心，並請求父母理解和支持。信中充滿了對親情的珍視和對理想的堅持。

4-3 1950年1月14日《中央日報》第2版刊出陳素卿寫給張白帆和父母的兩封遺書。



4-4 陶晶孫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發表於1951年7月號的《展望》雜誌。

臺大出版中心



4-5 1952年，陶晶孫逝世後，日本友人整理其晚年在日本發表的文章，題名《日本への遺書》，由東京的創元社出版。

##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東亞世界在傳統帝國的瓦解與新興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興起並固著的過程中，產生了劇烈的變化。當傳統秩序的邊界面臨瓦解的同時，新興秩序的邊界也逐漸形成，從政體、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文字各層面，幾乎都朝向民族國家化的方向發展。在以民族國家為邊界的新興秩序固著的過程中，也伴隨著產生了各種跨越邊界的跨界者。正因為邊界的存在，才有跨界者的產生，同時跨界者也親身體證（embody）了邊界的存在，以及更加弔詭地，封閉邊界的不可能性。本文所討論的陶晶孫，即是這樣的跨界者，在其跨界的生命歷程中也見證了戰後初期游移在日本、臺灣及中國之間的種種跨界現象。陶晶孫一生的經歷，跨越了諸多具體化的有形政治邊界，同時也跨越了各種語言邊界，此外，在其社會位置上，也跨越了醫者與文學家的邊界。甚至在本文所分析的〈淡水河心中〉這篇小說中，更跨越了真實與虛構的文本邊界。在戰後臺灣被施予「再中國化」的再一次民族國家教化施作的過程中，跨界者陶晶孫以其跨越語言、社會位置、文本文類的介入，在〈淡水河心中〉這篇小說中，有意無意地，除了以小說逆寫新聞事件外，也一併地描摹顯現了戰後臺灣的社會像，從其虛構的文本中可以窺見其跨界視野下的臺灣實像。

本文欲透過陶晶孫的小說〈淡水河心中〉之分析，討論其中所顯現出的戰後臺灣社會像，並進一步探討當時期臺灣民眾於時代變換中的心理糾葛。〈淡水河心中〉是陶晶孫根據戰後臺灣發生的一件殉情社會新聞所改寫而成的小說，以日文發表在日本的文學雜誌上。許多關於陶晶孫的相關討論文章中並未對於此篇小說多所著

墨，然而，小說中卻生動地記錄了關於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種種矛盾、磨合與對立樣貌，筆者認為在陶晶孫的文學作品中，〈淡水河心中〉這篇虛構性質的小說有其特殊性，不能加以忽略。透過〈淡水河心中〉，陶晶孫以小說形式逆寫了陳素卿與張白帆的新聞事件，利用虛構的方式如假似真地改寫了殉情新聞，從中再現了另一種真實。在逐漸被重重文字包裹裝飾成的新聞事件之教化虛構中，陶晶孫的虛構小說，卻又再度顛覆了殉情事件的新聞真實，並揭示了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複雜圖像。

## 二、從一件殉情事件談起

1950年1月14日《中央日報》第4版有一則社會新聞，標題是「淡水河邊水門下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書信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內文如下：

【本報訊】昨天，上午六點多鐘，正是好時光，好天氣，在淡水河邊，十三號水門下，發現一個豔麗女屍年齡不到二十歲，燙髮，穿白衣貼身背心，燈心布襯衣，黑黃細花旗袍，外罩紅毛線外套，（略）。頸緊纏有已斷的童軍用的麻繩半條，（略）。在屍體的堤顛，仍繫有已斷的麻繩半根。

此豔屍係於上午六時許，經附近居民發現後，即報告迪化街派出所，呈報市警第一分局，立報地檢處，派檢察官率同法醫及書記官蒞場檢驗，係屬勒斃。同時在她身上，檢出三本書：「中國語言教授法」、「中國語言語文學」（以上均係日文）和王西彥寫的「春野戀人」，兩封遺書，一封白信封，普通信紙寫的是給父母的，另一封是用粉紅色信封洋信箋，

寫給她的愛人臺灣廣播電台張白帆的。另外一個小皮包，內有九十元新臺幣和身份證，她名陳素卿，十九歲，臺北縣人，住樹林鎮西園新德里三十二號，桃園女高畢業。（略）警局根據遺書到廣播台找到張白帆。他聽到這一消息，當時雙淚直流，趕到現場，（略）。

據張白帆說：他是廈門人，今年二十四歲，三十七年入閩臺日報任副刊編輯，此時陳即在該報任會計。兩人相識，張愛好文學，陳也受其影響，兩人遂漸相愛。十二月間，張到臺灣廣播電台兼任廣播員，到三十八年一月，張轉到電台專任編輯工作，而陳也因報社結束回家，但情感並不因分離而減低，兩人相愛甚熱，曾數次同居一室，仍非常純潔，而情感也因之更堅。但陳的父母，絕對反對女兒和張結婚，屢經請求及託媒，都不得許可。

在此情形下，張的朋友，以女方父母既反對結婚，長此下去，徒增痛苦，乃勸張設法結婚，以斷女念，並為介紹廣播電台女同事北平人徐冰軒認識，相認祇兩個多月，便發生了關係，因此在三十八年六月間結了婚，現在且已有孕。林（筆者按：張）徐結婚後，陳仍盼與張保持純潔友誼，時相往來，但遭到張妻徐冰軒的冷眼和痛罵，陳無可奈何，常到張的辦公室偷偷看張，以慰一片戀情。一月前並要張同她去照了一個相，此時即已決心自殺。十二日的下午，張又接到陳自樹林來的一個電話，堅請他一定於七點半的北上車到達時去臺北車站接她，張屆時到站將她接下，她說有事到中正東路外祖母家去，張陪她走到中山路口她又說還沒有吃飯，兩人又

去吃了飯，她又說不想去看外祖母了，要張送她上車回樹林。兩人在候車室中，陳又重提往事，伏在張的肩上，微微輕泣。張婉加勸慰，陳要將手上的一隻錶送張，張以留下徒增痛苦，也予婉拒，但陳說機器略壞，請他代送去修，他才收下，然後她送他上七路公共汽車上班，即成永別。到十三日上午九點鐘，便忽接她已死的惡耗。<sup>1</sup>

同一天的《中央日報》第2版又全文刊出死者陳素卿寫給張白帆和父母的兩封遺書，標題是「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在留給張白帆的遺書中，陳素卿寫下：

我心愛的張：這是最後給你的一封信，但是你不要傷心，我要在這封信裡對你說很多的話，我從前都不敢對你說我痛苦，我現在都要告訴你了。（略）

張！我不怨恨你，我只怨恨自己的命運，恨自己的家庭，如果我父母當初答允我和你結婚，現在你也不會給那人佔去，我也不會走上自殺這條路，我怨恨我的家庭為什麼要那樣仇恨外省人，我不知道他們的前生前世是不是受了外省人怎樣的欺侮。（略）你教我說國語，學國文，教我怎樣做人，怎樣做朋友，怎樣孝順父母，怎樣愛祖國，怎樣努力讀書，你告訴我許多我從來沒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覺得人生是怎樣有意義，使我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很值得我來敬愛你。

<sup>1</sup> 詳細內容請參照報導〈淡水河邊水門下 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書信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4日）。

(略)

我不怨恨你，我只恨我的父母為什麼不答允我嫁你，我真恨死了，我也恨我為甚麼要有良心，為什麼不忍把你搶回來，但是我恨那個狐狸精，為甚麼把你搶去了，又不讓我和你做朋友，還要迫我去自殺呀！（略）張！我是永遠愛你的，如果人死了真會變鬼，等我們都做鬼的時候，你再愛我嗎？但是，張！我要你很幸福的活下去呀！

愛你的人素卿書<sup>2</sup>

另一封寫給父母的遺書寫下：

爸爸！媽媽！

我現在要和您們永遠告別了；但是請您們不要傷心。您們把我養得這樣大了，我不能永遠在您們身邊服侍您們，這是我很大的不孝，所以我現在要走這條路心裡也是十分的傷心。

(略)

我的心很痛，我沒有話說了，我只要求您們不要傷心，也不要害張先生，張先生是很好的人，我到死的時候也是愛他，請您們千萬不要去害他，他不是亂來的人，他說有對不起我，我們的愛情到現在都十分清白，這一點我可以對得起您們，請您們千萬不要害他吧！我也要求您們以後不要再仇恨外省人，外省人有壞的，也有很多比本省人更好的，如果

<sup>2</sup> 遺書詳細內容請參照報導〈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第2版（1950年1月14日）。



素娟妹妹將來也愛了像張生這樣的外省人請您們不要再阻止吧！最後敬祝您們健康。你們不孝的女兒素卿上。<sup>3</sup>

此則新聞與遺書登出後，市井頓時議論紛紛，繪聲繪影，成為備受矚目的一大社會事件，媒體持續追蹤報導，民眾也爭相為文、投書表示己見。<sup>4</sup> 由此事件引發的瞬間騷動中也可窺見戰後初期牽動臺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對於新來統治階層的好感、疑懼乃至於嫌惡等複雜心理，因為此事件的發生而瞬間爆發並且持續發酵，更甚的由私人事件一轉成公眾注目的話題。陸續的相關報導中提到「在家屬們初到的時候，都悲憤交集，他們疑心她不是自殺，而是被殺。他們覺得遺書寫得那麼長，那麼好，不會是她自己寫的。警局當叫他們去找她所寫的其它文件來與遺書對筆跡，並介紹他們去見法醫，由法醫從學理上分析驗斷她是自殺的理由。」<sup>5</sup> 但旋又報導說「死者親屬消釋誤解，囑張繼續保持情誼。」<sup>6</sup> 從為文與投書的內

<sup>3</sup> 同上。

<sup>4</sup> 報導〈殉情女化癡情灰 陳素卿遺體昨已火葬 張白帆今日為她開吊〉，《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5日）；報導〈殉情女灰置法藏寺 致祭靈堂雖無弔唁悼聯 但有更多的眼淚與嘆息〉，讀者景白和王白之投書〈陳素卿死得有價值嗎？〉，《中央日報》第4版（16日）；達妮〈愛情，你怎樣處理？——從陳素卿之死想起一個故事〉，《新生報》「新生副刊」（17日）；未署名〈人性的控訴——哀陳素卿之死〉，《新生報》「新生副刊」（18日）；報導〈傅斯年等昨發起 補葬陳素卿女士 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中央日報》第4版（19日）；音〈陳素卿之死〉、天嘯叟鄭烈〈弔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20日）；言采薇〈陳素卿死有遺憾乎〉，《新生報》「新生副刊」（23日）；齊如山〈兩個理由——關於改葬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24日）。

<sup>5</sup> 報導〈殉情女化癡情灰 陳素卿遺體昨已火葬 張白帆今日為她開吊〉，《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5日），並同時刊登出兩人熱戀時合影。

<sup>6</sup> 報導〈殉情女灰置法藏寺 致祭靈堂雖無弔唁悼聯 但有更多的眼淚與嘆

容可以發現當時社會上不同角度的評斷與波紋，其中有從社會現實角度切入認為：（1）陳素卿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2）陳素卿是地域觀念的犧牲品。（3）陳素卿是三角悲劇的犧牲品。至於造成陳素卿自殺的最大因素，當然是由於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隔膜。<sup>7</sup>也有從單純的兩性關係進行討論，認為「她與他的內幕情形我雖不知，即憑遺書看來，張先生不能否認自己沒有罪過，從前一切的愛如果是真實的，而單為了她父母稍有歧見即拋棄了她，張先生實在太對不起她，辜負了她。」<sup>8</sup>

此社會事件不止引起一般市民的關心，連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也寄予關心，同情陳素卿遭遇，與臺大文學院長沈剛伯、臺灣出身的心理系系主任蘇薌雨、中文系教授毛子水聯名發起募款補葬陳素卿並投書《中央日報》：

編輯先生：

連日大報載陳素卿女士死事，及其遺書，同人相逢皆談此事，不勝傷懷，何感人之深也。陳女士之死，或論其值得一死否，或歸咎於社會制度，此皆淺乎言之，而不達性命之道也。陳女士之才，見乎其文，粗學二年，有此天成之作，此豈為遺名於後人乎？而精靈之誠，遂成此文，老師不逮。老師非不能文，無此情之真也。……世之以身殉道者，或自外

---

息》，《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6日）。

<sup>7</sup> 未署名，〈人性的控訴——哀陳素卿之死〉，《新生報》「新生副刊」（1950年1月18日）。

<sup>8</sup> 王白之，〈看陳素卿遺書感想〉，《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6日）。

礪，人曰可貴猶若同懷者之情也，陳女士則殉赤子之靈心耳，猶若有勝焉。漢末焦仲卿夫妻之事，事本尋常，舊來婚姻多有，然二千年流傳不已。今陳女士之遭逢，極世間之矛盾，則舍命不渝矣。昔冤禽銜石以填海，遂成巨洲，望帝思歸而羽化，乃託杜鵑，詩人詠之，不達其義；好古者錄之，未著其解。今見此事，昧昧思之，則遠古神話，頓識其義矣。我等棲遲島上，以書代耕，愧無巨筆以傳奇，深憾無力於補天，頗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葬陳女士於山水清幽之所，塵囂不染之間，題其碣曰：「同情者共葬陳女士於此」，庶幾陵谷變遷，文字隨劫而遺盡，宇宙不滅，精靈緣意而不亡。

大報如以為然，敬祈登出此信，以來應者，感幸何似。

敬頌 撰祺

傅斯年 沈剛伯 蘇錦雨 毛子水

一月十八日<sup>9</sup>

此投書立即得到其他學者的呼應，著名大陸來臺戲劇學家齊如山在此投書刊出之後立即表明贊成，主張不但應該改葬，而且進一步將其事跡編入教科書，至少也要編入民眾讀物。<sup>10</sup> 傅斯年與毛子水同是五四運動健將，提倡白話文，反對封建主義，支持自由戀愛。1950年代，國府剛播遷來臺，剛由日本殖民體制解放的臺灣社會，

<sup>9</sup> 報導〈傅斯年等昨發起 補葬陳素卿女士 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9日）。此文收於《傅斯年選集》第9冊（文星書店，1967年），頁1595-1596。

<sup>10</sup> 齊如山，〈兩個理由——關於改葬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50年1月24日）。

在長期渴望脫殖民地的期待下，對「祖國」懷抱著極大的幻想，然而，前來接收臺灣，代表「祖國」榮光的軍隊及統治階層與已被日本化的臺灣社會卻存在著根本的鴻溝，除了「族群意識」之外，更深刻的是兩者間無法跨越的語言問題。因此，經過光復最初期的興奮之後，逐漸冷靜下來的臺灣民眾與新來的祖國「同胞」之間緊張感日漸高升，在臺灣本地人士與大陸來臺人士之間屢有齟齬的情況下，加上國語運動的推行也正方興未艾，陳素卿的遺書事件所展現的為自由戀愛而殉情、努力學習「國語」、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流暢的中文遺書及其傳達的「外省人」正面形象和以死呼籲不要再仇恨外省人的作法，很容易得到學者們的共鳴，可以說，此事件儼然成為一種具有正面意涵，馴化臺灣民眾的社會教化之最佳教材，特別是本省籍女子之殉情，除了浪漫色彩之外，也滿足了這群暫時來臺的統治階層的自大心理，此外，學者們也樂於透過此事件解消日漸對立的省籍情結。此轟動臺灣一時的殉情社會事件，不僅在當時成為話題，日後也成了中國著名現代文學作家陶晶孫日文作品〈淡水河心中〉的題材。

###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本文所討論的陶晶孫，這位游移中國、日本、臺灣的「跨界者」在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中可說是被完全遺忘的一位，然而臺灣卻成為他文學作品中的一頁被記錄著。陶晶孫，本名陶熾，又名熾孫，筆名晶孫、陶藏、烹齋、冷孤原等，1897年生於江蘇無錫，祖父曾任官太平天國，父陶廷枋，曾中秀才。幼時在家鄉廷弼小學就讀，1906年和姊隨父移居日本東京，先後於東京的錦華小學、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就讀。1919年入學九州帝國大學醫學

部，低郭沫若一級，入學九州帝大後，對文藝熱愛日深。1921年春和郭沫若、郁達夫、何畏等人共創同仁誌《綠》（グリーン），陶晶孫在第二期發表其日文短篇小說處女作〈木屋〉，郭沫若大為折服，勸陶晶孫譯為中文發表，郭沫若在讀了中文版後，讚嘆：「每個國家的國語有其獨特的美，此篇小說的中文版遠遠不及日文原作特有的深層韻味。」認為陶晶孫的日文表達優於中文。同年7月，陶晶孫與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創造社」，提倡「為藝術的藝術」。1923年4月，九州帝大畢業後，轉入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學教室就讀，同時也在醫學部生理學教室從事電氣生理學實驗，課餘並組織交響樂團，擔任指揮。翌年和郭沫若日籍夫人佐藤をとみ之胞妹佐藤操結婚，並屢屢在《創造季刊》、《洪水》等中國的文學刊物發表短篇小說。1926年，陶晶孫取得醫師證書，移居東京，任東京帝大醫學部助手，又兼東京帝大附屬泉橋慈善醫院醫師，1927年，代表作短篇小說集《音樂會小曲》，由上海創造社出版，日後被稱為是中國最初受到日本新感覺派文學影響的作品。

1929年，陶晶孫告別寓居二十三年的日本返國，從九歲的小留學生，一路經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九州帝大、東北帝大的薰陶已成為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戰前的高等學校和帝大是日本培養統治階層的高等學府，陶晶孫在此高等學府接受了當時日本的西歐式高度教養主義教育及專業訓練，培養了其音樂、文藝等藝術素養使其兼具了科學家與文學家的身分。<sup>11</sup>陶晶孫的返國，

---

<sup>11</sup> 戰前日本舊制高等學校的「大正教養主義」教育與陶晶孫人格、學養的形成，詳細請參考嚴安生，《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もう一つの中国人留

意味著他必須面臨再一次的國境與語境之跨界。返國後，陶晶孫任上海東南醫學院教授，同時繼續創作活動，並且日益關心左翼文藝和戲劇運動，特別是對木偶戲的注目，他先後翻譯描述農民出身的日本士兵之覺醒的反戰劇作〈勘太和熊治〉、德劇作家漢斯·沙克斯（Hans Sachs）的劇作〈傻子的治療〉、木偶戲的解說等，並在雜誌發表，後於1930年集結成《傻子的治療》一書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同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般簡稱「左聯」）成立，陶晶孫為盟員之一，8月，返回故里無錫開設厚生醫院。1932年，厚生醫院停辦，回上海東南醫學院擔任教授公共衛生學之教授，並兼任日人創辦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寄生蟲學等調查研究。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東南醫學院遷移重慶，8月，上海發生「八一三事變」，夫人攜三子暫離滬赴日，陶晶孫體弱多病，獨居上海，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衛生研究室主任。1941年，夫人攜子返滬，1944年5月，散文集《牛骨集》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日文《陶晶孫日本文集》由華中鐵道出版，11月，以上海市代表身分，出席在南京舉行的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陶晶孫與東南醫學院院長郭琦元等人奉派為接收專員，前往南京接收日軍陸軍醫院。1946年赴臺，擔任臺灣大學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兼衛生學研究室教授，其時長男與次男皆在日本求學，故僅帶著三男陶易王和夫人赴任。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陶晶孫的連襟郭沫若擔任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

席。1950年代初期，韓戰爆發前夕，中國隨時準備「解放」臺灣，如驚弓之鳥的國府積極追捕彈壓所謂的「共黨分子」，過去身為「左聯」一分子的陶晶孫處境之艱難可以想像，1950年年初，陶晶孫從擔任國民黨祕密警察的遠房姪兒張延生處得知三男因參與學運名列黑名單，遂決意逃離臺灣。同年4月，以赴日參加學術會議之名，一家三口從臺北抵日本，居住東京郊外的千葉縣市川市，陶晶孫再度重返度過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的日本。其後約在1951年初獲得永久居留權，4月，受東京大學文學部倉石武四郎教授之邀，擔任文學部兼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並以寄生蟲學的研究論文取得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此時也開始應《文藝》、《展望》、《歷程》等文藝雜誌之邀稿，恢復日文創作，漸受日本文壇注目，除了與舊識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詩人草野心平、評論家河上徹太郎、文化人內山完造相往來外，也與著名詩誌《歷程》同仁時有交遊。

1952年2月，因肝癌於千葉縣市川市國立國府臺病院逝世，享年五十五歲。同年10月，日本友人整理其晚年在日本發表的文章，題名《日本への遺書》，由東京的創元社出版。<sup>12</sup>

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迄今皆沿用其三男的說法：陶晶孫參加了接收臺灣的舊臺北帝國大學的工作，推薦他承擔這一工作的是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衛生部長的羅宗洛。陶晶孫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

---

<sup>12</sup> 陶晶孫的生平參考以下諸文撰成。鄭仁佳，〈陶晶孫（1897-1952）〉，《傳記文學》70卷5期（1997年5月）；伊藤虎丸，〈解題 戰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陶坊資，〈陶晶孫年譜〉，收於張小紅編，《陶晶孫百歲誕辰紀念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

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sup>13</sup> 根據筆者的調查，1945年10月，國民政府委派羅宗洛以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派員身分（該委員會的委員有梁龍元兼祕書、杜聰明、蘇步青、劉光華、陳建功、馬廷英、蔡邦華、陳芳之、陸志鴻，專門委員林忠、瞿絡琛），赴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羅宗洛於10月17日抵臺，11月15日正式接收臺北帝大，並代理臺灣大學校長（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sup>14</sup> 此後，一直到1950年陶晶孫離臺為止，臺大的校長依次是陸志鴻（1946年8月至1948年5月）、莊長恭（1948年6月至1948年12月）、傅斯年（1949年1月至1950年12月）。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其三男的說法恐怕有誤，因為當時陶晶孫並不是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的一員，羅宗洛也不是國民政府衛生部長，而且從羅宗洛遺留的〈羅宗洛回憶錄〉、〈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接收臺灣大學日記〉（1945年10月17日至1946年6月3日）<sup>15</sup> 三份書誌中從沒有出現陶晶孫的記載。

三男的回憶中提及「保存下來的國立臺灣大學的聘書上則留有陸志鴻校長的署名和公章」，<sup>16</sup> 據此可以推測陶晶孫是在1946年8月，陸志鴻到任臺大校長以後才任臺大教職，至於為何任職臺大則待進一步的考證。此外，其三男指稱其「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一事也是疑點很多。1946年的「熟（筆者按：

<sup>13</sup> 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頁16。

<sup>14</sup> 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頁114-118；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下）（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頁179-180。

<sup>15</sup> 均收於《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

<sup>16</sup> 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頁16。



熱之筆誤)帶醫學研究所」職員錄上寫著「所長代理杜聰明」,<sup>17</sup>職員錄上並沒有陶晶孫。1947年1月的「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上寫著「教授兼所長洪式閻 浙江 到校 35.8」,此份職員錄上已出現陶晶孫的名字,職員錄上寫著「陶熾 上海施高塔路施高塔里2號」,沒有註明籍貫和到校時期。<sup>18</sup>同年8月的臺大教職員名單上,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也有陶晶孫,寫其本名陶熾,所長是洪式閻,此外陶晶孫還是醫學院衛生學研究室教授。<sup>19</sup>1947年和陶晶孫同時在熱帶醫學研究所任職的副教授鄭翼宗也曾回憶傅斯年到任後,洪式閻所長即離任返回大陸,從1949年新年開始,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由邱賢添擔任。<sup>20</sup>因此陶晶孫擔任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說法值得商榷。陶晶孫於臺灣時代的活動,目前能夠確定的部分列於表三。

熱愛文學創作的陶晶孫,臺灣時代都專心致力於臺灣公共衛生學方面的研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學活動的軌跡,同時期和他在臺大共事的大陸來臺著名學者與作家有文學院長錢歌川,中文系教授許壽裳、魏建功、臺靜農,共同科教授黎烈文、李霽野,副教授雷石榆,<sup>21</sup>其中雷石榆還曾參與「左聯」東京支部的活動,他們都未曾

<sup>17</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頁217。

<sup>18</sup> 〈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第一張),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7年)。

<sup>19</sup> 《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1947年8月),頁36、頁34。

<sup>20</sup>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226-227。

<sup>21</sup> 《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1947年8月),頁27、頁36。

表三：陶晶孫於臺灣時代的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1946.8	抵臺北，任臺灣大學醫學院衛生學研究室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
1947.11.15-16	出席臺灣醫學會第四十屆總會。
1947.11.16	在總會單獨報告〈Metorchis 屬兩種吸蟲研究補遺〉（熱帶醫學研究所陶熾），共同報告〈鄉村社會衛生研究（一）：鄉村飲用水調查（臺北附近）〉（熱帶醫學研究所劉萬福、王長流、陳拱北、陶熾）。
1949.10.28	中英文調查報告提要〈臺灣鄉村之社會衛生學的研究（三）：臺北附近鄉村常食調查〉（熱帶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科陶熾孫），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48 卷第 9 至 10 號。
1949.12.18	出席臺灣大學 38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1950.2.18	中英文共同調查報告提要〈臺灣鄉村之衛生學的研究（一）：臺北近郊鄉村飲料水水質調查〉（熱帶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科陶熾孫、陳拱北、王長流、劉萬福），〈臺灣鄉村之衛生學的研究（三）：臺北近郊鄉村常食調查〉（陶熾孫、陳淑瓊、葉根在），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49 卷第 2 號。
1950.4	與夫人、三男從臺北抵日本。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37、38、39 學年度校務會議紀錄。《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47 卷第 1 號（1948 年 2 月 28 日）、第 48 卷第 9 至 10 號（1949 年 10 月 28 日）、第 49 卷第 2 號（1950 年 2 月 18 日）。

留下任何與陶晶孫的交遊紀錄。此外，陶晶孫和臺灣本地人士的互動也非常有限，上述和他一起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共事過的臺灣本地人士杜聰明和鄭翼宗的回憶錄中，也未留下任何與他相關的隻字片語，反而是同時期在醫學院隸屬解剖學研究室的著名體質人類學家金關丈夫，留下了對他的個人回憶：

昭和21年（筆者按：1946年）在臺灣第一次和陶熾博士見面，……直到我離開臺灣為止，共交往了三年多。當時陶博士是臺大醫學部的衛生學教授，沒有自己的講座（筆者按：金關的記憶有誤，陶晶孫隸屬衛生學研究室），並兼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當時大學的研究條件不差，但是薪水很低，來臺的教授們和從大陸撤退來臺的人一樣，理應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多來臺教授過沒多久從外表上即可看出其生活非常充裕，陶熾博士是少數生活一直很清貧的其中一位。有一天，醫學部前面的大馬路上，有一位個子很高的男子披著一件黑色綿袈裟，稍微彎著身子，飄然走過。走近一看，原來是陶熾先生。我看到了他的清貧身影。<sup>22</sup>

而臺灣本地人士唯一有關他的記述是在他逝世將近半個世紀之後，臺灣大學教授柯慶明的個人回憶：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醫部的先父柯源卿先生，在光復後攜眷（我當時未滿週歲）返臺。在臺北偶遇，早期為創造社成員，作品入選《新文學大系》的陶晶孫先生，陶先生與郭沫若是連襟，因為自身是九州帝大醫學部畢業，後來又在東北帝大研習，受業同屬日本帝大系統，對先父不免惺惺相惜。……

小時候父母以日語稱呼的「陶先生」，在家裡似乎是一個莊嚴神聖的存在。跟我有關的是「陶先生」送了一雙灰褐色造型摩登典雅的小孩皮鞋給我，在戰後那百物匱乏的年代，顯

<sup>22</sup> 金關丈夫，〈陶熾博士のことども〉，《福岡医学雑誌》1952年12月號，收於氏著《南方文化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7年）。本文引自《南方文化誌》，頁34。（原文日文，筆者譯）

然是彌足珍貴的「寶貝」。<sup>23</sup>

臺灣時代的陶晶孫為何在文壇上噤聲呢？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六百萬人口中，日語的使用率保守估計高達百分之七十，臺灣基本上仍屬於日本語文化圈，<sup>24</sup> 因此對他而言，臺灣雖然陌生，但不會是隔絕的「國境」與「語境」。從他對〈淡水河心中〉一文的主角智芙的介紹中，可以得知這位和作者陶晶孫有著相同背景年輕學者，因具有日文能力所以能夠跨越語言的藩籬進入臺灣社會，因此具有相同背景的陶晶孫應該能夠容易地進入臺灣。筆者僅能從當時的氛圍進行推測，當時正是國府剛收復臺灣之際，整體而言，社會氣氛緊張加上文化出版方面限制頗多，除了禁止雜誌、報紙使用日語外，能發表中文作品的園地也相當有限。此外，作為文學家的陶晶孫，在戰爭期間以陶晶孫之名曾在上海參加日偽組織「中日文化協會」並出席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活躍於上海。戰後初期對於「漢奸」相當敏感，曾為「偽政府」工作或者加入「偽組織」的人很容易被認為是漢奸或者協力者而遭到不測之禍，這些不甚光彩的前歷可能是他到臺灣以後，選擇作為科學家的「陶熾」，而不是作為文學家的「陶晶孫」的主因。然而，這位在臺灣幾近噤聲的文學者，在抵日本之後卻以陶晶孫為名用文字記錄了臺灣，在其文學中留下了臺灣的「跨界」印記。

<sup>23</sup> 柯慶明，〈五四：印象與體驗〉，《文訊》總 283 號（2009 年 5 月），頁 85。

<sup>24</sup>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38。

#### 四、致命的吸引力：當臺灣女子邂逅大陸男子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著名作家龍瑛宗寫下「八月十五日是世界人類史上最可紀念的劃時代的一天，殘虐和破壞的鐵鎖既告解斷，自由和平瀰漫世界，普照全民。我臺灣亦受歷史餘波，從被壓迫和黑暗中解放」，<sup>25</sup> 這種解放不只意味著全體臺灣人從異民族的壓迫中解放，同時也代表著新社會中的臺灣女性之解放，隨著就職機會的增加，臺灣女性的社交圈也隨之擴大，在時代的氛圍下，每個人都有了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可能，這種久違的自由風氣也成為戰後初期的臺灣女子社交活動的轉換契機。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開始接收臺灣，戰後來臺的大陸男性最初多半是公務員或技術員，其中有已婚者也有未婚者。透過各種機會，臺灣女性得以認識大陸男性，進而相戀、結婚。當時記者將此現象戲稱為：「隨著臺灣光復，女人們的桃花運處處展開。」<sup>26</sup> 但是，這些處處開的桃花中也潛藏著爛桃花的可能性。吳濁流就親眼目睹了此怪現象：

這些接收人員不但向日產，甚至向女性也進軍了。從菊元的姑娘起，歌手濱田小姐，我知道的作家室的女孩子也被接受了。其他不限於日本人，就是本省相當有地位的姑娘，有不

<sup>25</sup> 龍瑛宗，〈最近文學界一瞥〉，《東寧新報》旬刊（1946年1月21日），收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6冊（臺北：南天書局，2006年）。本文引自《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6冊，頁258。

<sup>26</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頁209。

少落入「欺騙的結婚」的陷阱。他們威風堂堂地立個媒灼人，正式結婚，但是底牌一揭開，大部分都是當姨太太。<sup>27</sup>

當臺灣女性初次邂逅大陸男性後，諸如此類的欺騙、玩弄事件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層出不窮，這種現象的發生除了本省女性受到外省青年所表現出來的翩翩風度吸引之外，另一存在於當時臺灣社會的「戰爭姑娘」問題也必須加以注意。由於「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等戰事不斷的緣故，許多的臺灣女性在戰爭時期被動員加入「勤勞挺身隊」、「桔梗俱樂部」、「大日本婦人會」等皇民奉公活動，這些女性因為戰事的長期化因而耽誤婚期，其中也不乏因未婚夫或男友成為「志願兵」或被強制徵召入伍前往南洋而死於南方的「未亡人」，這群婦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上被視為麻煩與包袱，雖然有工作但仍飽受不公平的歧視與嘲笑，因此對這群女性而言，婚姻是她們再度正常化的最佳途徑。吳濁流在 1948 年出版的日文小說《波茨坦科長》（ポツタム科長）中對於這類婦女的社會觀感有此描述：

戰爭姑娘真是麻煩啊，就像賣不掉的蘿蔔，深怕爛掉，所以最近拼命的向阿三阿四強行推銷起來了。……那並不是我們青年的錯，而是因為她們太過於便宜，聽說最近某銀行或某公司，我記不大清楚了，那裡就滯留了很多的戰爭姑娘，年紀也都二十七八了，全是落花有意之輩。<sup>28</sup>

<sup>27</sup>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188。

<sup>28</sup> 吳濁流，《ポツタム科長》（臺北：學友書局，1948年）。此處採用張良澤譯文，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32。

這群錯過了正常婚配年齡的戰爭姑娘，其中也有不少是在日治時期受過高等女學校教育的菁英女子，在戰後初期的解放氛圍中，一方面因青春年華不再而焦急，一方面對於理想對象的要求也高於一般女性，當這類的臺灣女性在職場中遇見從大陸來的青年，往往投射了自己對理想對象的幻想，容易陷入愛河之中，然而因男女交往而釀成的悲劇也常見於現實之中。

1946年，一位彰化臺灣女性投書《民報》專欄「自由談論」，致函「外省來的領導者們」，氣憤地指出受過「日本封建主義教育的臺灣女性，就如同剛從籠中釋放出的鳥涉世不深」，質問「外省來的領導者們」，為何「不想誠懇的啟發女性，反要利用女性的弱點？」<sup>29</sup>就在這一年，陶晶孫抵達臺灣。

究竟為何大陸男子對臺灣女子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對此現象有很深刻的描繪：

在這個時候，突然在喫茶店遇見那個男人突然來訪。她自然不會知道他就是由大陸逃過來的范漢智。他現在已改名，把過去隱藏起來，以范新生的名字居然官拜某某局會計科長，這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事。

玉蘭很高興地歡迎他，因對祖國憧憬的情緒無意識中搖撼著她，由心中產生好感，這就是她心底深處發生的無聲息的思慕情愫凝結的一個形態，是一種使她不能了解的……而且茫然的一種情愫。

---

<sup>29</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頁144。

「前幾天很失禮，剛到此地人地生疏，星期天沒有地方去，所以今天很冒昧來拜訪妳。」

用流暢的國語，范新生說明來訪的動機，那種老於社交的風度，梳得光亮的頭髮，畢挺的西裝，今天更顯得瀟灑出羣，而那慎重謙讓的談吐，尤其對女性親切的口吻，粗線條的臺灣青年那裡比得上，所以使她有可親可靠的感覺。不但如此，豐富的話題對她而言都是珍異的，尤其是說起新時代上海女性活躍的狀況，特別使她羨慕。……

范漢智辭出玉蘭的家後心裡想：臺灣女性沒有技巧，率直得可愛，可能對情感很脆弱，可是純真，純真所以單純，單純所以能隨心所欲。<sup>30</sup>

從上述吳濁流的描述，透過主角玉蘭的視角所呈現的「范新生」這位理想的祖國青年像，不僅展現了臺灣青年所欠缺的紳士作為，親切的態度以及清晰流利的「國語」，其言談舉止中所散發的祖國青年魅力都讓初次接觸的臺灣女性怦然心動，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大陸男子對臺灣女子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原因。

臺灣光復後，臺灣女性和臺灣男性一樣，對首度正面接觸的父祖之國——中國充滿好奇與好感，她們認為中國男子的舉止溫文有禮，能講純正中國語的中國男人都是來自中國的社會菁英，是值得敬愛信賴的。我們可以再證之陳素卿留給張白帆的遺書中也再三強調「你是一個純潔的青年，我們兩年的日子，來往那樣親密，你從

<sup>30</sup> 吳濁流，《波茨坦科長》，頁 12-13。



來也沒有對我要求要做的那樣事情，我也從來沒有看出你有要求的意思，……我常常不相信你們外省人會這樣老實。」「你是那樣的誠實，那樣的用功，對人是那樣的和氣，這一切都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是這樣的，……你告訴我許多我從來沒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覺得人生是怎樣有意義，使我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很值得我來敬愛你。」<sup>31</sup> 張白帆對陳素卿就是這樣的具有致命吸引力，因此最後導致陳素卿臨死前對張白帆留言：「你實在太偉大了，你把我教育，又離開了，使我覺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你這樣理想的人，所以我只有自殺了。」<sup>32</sup> 除了如陳素卿這類的菁英女性與外省男子的戀愛外，出身平凡的臺灣女性在遭遇外省青年時也必須面對社會位階迥異的現實而不得不屈服於現狀，呂赫若在戰後撰寫的小說〈冬夜〉中便明白地體現了這點，主角彩鳳在戰時經歷了一段僅維持了五個月的婚姻，丈夫便因戰爭而被徵召為「志願兵」，最後戰死於菲律賓，因為丈夫的死亡而被夫家徹底拋棄的彩鳳，只好返回娘家，為了維持生計而在酒館陪酒，就在酒館中邂逅了從中國來臺的外省男子郭欽明：

碰到郭欽明就是在那個酒館裡的。……只是聽了同事說他是個XX公司的大財（才）子，浙江人，年紀差不多二十七六歲。他來館的時候，都穿著一脫很漂亮的西裝，帶著一個笑臉，很愛嬌地講著一口似乎來臺以後才學習的本地話，使女

<sup>31</sup> 報導〈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  
《中央日報》第2版（1950年1月14日）。

<sup>32</sup> 同上。

招待們圍繞著他笑嘻嘻地呈出一場熱鬧。<sup>33</sup>

這位外表亮麗且多金的男子一面對彩鳳獻起殷勤，一面伴隨著這種殷勤而來的強硬的占有欲也逼迫著彩鳳不得不委身，他說道：

假使你不肯接受我的愛，那麼，我們現在一起在這裡打死好不好。彩鳳睜開眼睛看了那支手槍，便耳管裡轟轟地響起來，又有些黑星在眼前跳來跳去。她想起自己娘家的情形，就無聲低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sup>34</sup>

戰後初期的臺灣，在這種軟硬兼施的態度之下與外省男子婚配的臺灣女性也不在少數，從中呈顯出此時期的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在社會位階上的不平等，以及大陸來臺的男子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所占有的優勢位置。

然而臺灣女性與大陸男性的通婚，隨著層出不窮的大陸男性之欺騙、玩弄事件，使得願嫁大陸郎的臺灣女性逐年遞減，這種現象一開始雖然與省籍因素有關，但還不至於像二二八事件之後普遍將這種問題與省籍因素互相連結，<sup>35</sup> 陳素卿的殉情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50年是二二八事件過後的第三年，臺灣本地人士對這場悲劇記憶猶新，對「外省人」的憧憬也轉換為複雜的憎畏感，二二八事件中引爆的省籍情結，成為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戀愛中無法

<sup>33</sup> 呂赫若，〈冬夜〉，《臺灣文化》2卷2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2月5日），頁26。

<sup>34</sup> 同上，頁28。

<sup>35</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頁209-210。

跨越的鴻溝，可以說，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緊繃省籍情結早就昭告了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悲劇。

陶晶孫是在 1946 年抵臺，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因出差上海，短暫離臺，返臺之後對於社會的奇異氛圍應有深刻的感受。1950 年 1 月發生的陳素卿殉情事件，讓存在的省籍問題浮上檯面，不只轟動全臺，甚至震驚到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此事在臺灣社會引起的迴盪，即使在陶晶孫東渡日本之後，肯定仍留下深刻印象。陶晶孫以此社會事件為藍本，混和他將近四年的臺灣生活所感，寫下此篇既紀實又虛構的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

#### 五、戰後臺灣社會像書寫：〈淡水河心中〉

陶晶孫所遺留的臺灣書寫〈淡水河心中〉，不僅記錄了作者的臺灣觀察，同時也藉由這篇小說揭露當時赴臺文人學者的心境，可以說，這篇跨界者陶晶孫的跨界觀察濃縮了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氛圍，同時也展現了各個層面的人物像，透過虛構的小說文類表述了真實的社會現實。〈淡水河心中〉發表於 1951 年 7 月號的《展望》，<sup>36</sup>佐藤春夫讀了之後，大為讚賞，認為「應該尊重其新鮮的文體和兼具自然科學家與文學家之獨特構想，期待今後陸續有新作發表。」<sup>37</sup>

---

<sup>36</sup> 〈淡水河心中〉，《展望》1951 年 7 月號（東京：筑摩書房），頁 95-99，後來收入《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 年）。近年出版的丁景唐編選，《陶晶孫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編，《陶晶孫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年），以及曹亞輝、王華偉譯，《給日本的遺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 年）皆沒有收錄〈淡水河心中〉，這篇作品迄今沒有中文翻譯。本文是根據發表在《展望》的文本。

<sup>37</sup> 佐藤春夫，〈陶晶孫先生が遺著のために〉，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 年），頁 3。

就小說文體而言，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呈現出與同時期的日文小說不同的書寫模式，以曾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作為書寫的場域，進一步重新爬梳一殉情事件，正如同佐藤春夫的評論一般，陶晶孫的小說中不僅有文學者陶晶孫的細膩的小說敘事，同時從推理情節的鋪陳也展現了科學家陶熾追根究底的心理。對陶晶孫這位精通日文的小說家而言，他以〈淡水河心中〉為名展開的小說書寫，其中「心中」一詞的使用隱含了作者深刻的含義，日文的「心中」即為中文的「殉情」，也就是相愛的男女為了見證其真愛而一起尋死之意，然而小說雖以「心中」開頭，全篇卻是透過戰後初期臺灣女性與外省男性的交往而逐一暴露戰後社會的省籍議題，終究此件被浪漫化的「心中」事件在小說中被重新改寫並以刑事事件結尾，從全篇小說的敘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此使用「心中」之詞所富含的深刻反諷意味。小說中的敘述者：智芙，為外省籍但具有日文背景的臺灣「過客」，作者透過這位心理學研究室助教的觀看者視野，將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殉情事件小說化，並以此展開小說的敘事，通過智芙與心理學教授兩人的對話勾勒此一事件，呈現出現實與虛構交織的文體，增添此篇小說的趣味性，同時也透過智芙的觀看者視角書寫臺灣，並藉此事件反思當時客居臺灣外省人的心理，〈淡水河心中〉雖然是一則社會事件的改編之作，然而作者透過此一事件所書寫的戰後臺灣圖像，卻清楚地指涉出當時存在於社會上的矛盾，特別是外省與本省之間的隔閡，以及深埋於臺灣的日本記憶。

小說開頭便以臺灣的山林、河流、建築交織出整體樣貌，主角智芙記憶了從上海飛抵臺北的臺灣印象：「左邊的大屯山、右邊的觀音山，就是臺灣入口的地標，夾在中間的淡水河看起來很像飛機

跑道。這是臺灣的玄關」，「仔細看看地面，荷蘭人建造的好像童話故事般的城堡上飄揚著英國國旗，城堡下的地面上是日本砲兵陣地遺留下來的縱橫交錯的道路」。<sup>38</sup>從這段地理圖記的敘述中可以窺見主角智芙的觀看視域，對這位上海來臺的青年而言，臺灣雖是重歸「祖國」之地，然而卻是充滿了異國情調的「異域」，平坦的臺地、終年煙霧迷濛就像蠻荒地區一般的高聳山脈、椰子樹、淡水河的傳說，一一地點綴了臺灣的異國氛圍，對於智芙這位具有日本經驗的外省青年而言，臺灣的混雜性吸引了這位青年的注目。作者透過這些臺灣印象的展示記錄了臺灣屢遭奴役的象徵，從而也暗示了「復歸祖國」的臺灣社會中所隱含的複雜殖民記憶，以及與新來的統治者之間必定存在的隔閡。小說中也提及了大陸與臺灣認知思考上的迥異：

在日治時代，他們不喜歡被稱為「臺灣人」，反而喜歡「本島人」的稱呼，所以現在也不想被稱為「臺灣人」。其實，「本島人」的說法才是指當地人吧？這麼想的他不能理解中國內地人說：「我是山東人，你是臺灣人」的心理。<sup>39</sup>

此處提及的思考差異也點出了戰後初期臺灣民眾與大陸來臺人士屢起爭執的核心，由於彼此歷經了五十年的斷裂，加上日本在臺所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的影響甚深，整體而言，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語言與習慣都還延續日治時期的生活，其思維邏輯可說尚未脫殖民化，後又有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激化了原本溝通不良的

<sup>38</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5。（原文日文，筆者譯）

<sup>39</sup> 同上，頁95-96。（筆者譯）

省籍問題。小說中心理學教授曾語重心長地歎道：「一個民族會害怕另一個民族。」一語道出戰後初期臺灣與大陸雖然在政治上得以統一，然而對這些來臺的外省統治者而言，臺灣人終究是「異族」的存在。〈淡水河心中〉的青年學士智芙可視為作者陶晶孫的化身，因為具有日語能力與日本經驗使得他得以深入臺灣社會，這位貧窮的外省青年最常活動的地方除了命案的發生地：十三號水門之外，還有一般臺灣民眾活動的地域：「圓公園」，<sup>40</sup>他雖不懂臺灣話，但是由於臺灣民眾都夾雜著日語對話，因此他也能理解對話的內容，「圓公園」可視為智芙進入臺灣社會的玄關處，就在市井熙攘的街談巷語中，這位跨界的「考察者」拼湊了臺灣圖像。陶晶孫筆下以這位臺灣見證者智芙作為一位「中介」的角色，企圖讓此社會事件以多元的角度被呈現，作者透過這位跨越了語言障礙的跨界者塑造出一種有別於新聞報導等官方公共輿論的世界，亦即「圓公園」中流傳的關於此事件的臺灣民間輿論反轉了官方報導的真相，形成了一種臺灣民眾間流傳的「真實」，透過「傳說」、「流言」，〈淡水河心中〉這篇虛構的小說同時承載了兩種「真相」，同時也有效地解構了官方的一言堂。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無論是語言或思維仍承襲日治時期的模式，特別是出身良好且受過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其所受到的日本式馴化更為完整，除了作為一位良好女性該有的教化之外，這些女

---

<sup>40</sup> 圓公園即為現今的「建成圓環」，位於臺北重慶北路與南京路的交叉口。1908年由日本規劃為公園，稱為「圓公園」。1943年美軍轟炸臺灣之際，日本人將圓環挖成大蓄水池以作消防設施，光復後，圓環被填平，由攤販進駐成為繁華的商園，於2006年之際被拆除改建，現已不復當時的繁華景象。

性同時也注重生活趣味的培養。在過往的臺灣社會中，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千金小姐們通常在家族的安排下會有一段門當戶對的婚姻，或嫁給醫生成為「先生娘」，或嫁給商行的二代成為「阿娘仔」（少奶奶），總之是透過家族之間的「緣談」（說媒）而成的姻緣。然而，隨著戰爭結束，復歸中國的臺灣社會也起了變化，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開始參與社會，與隨著國府來臺的外省男子有了接觸契機，與外省男子之間的戀愛事件也時有所聞。這群新來的外省統治者取代了日本人的地位，在臺灣占有優勢的社會位階，光鮮的外表、彬彬的談吐、標準的國語（對臺灣人而言），以及對女性特有的殷勤都能輕易地擄獲臺灣女性，國語的使用成為這群新來的統治階層的權力象徵，然而，戰後來臺的外省籍人士中，如吳濁流筆下的范漢智，後以范新生之名在臺灣成為新貴，玩弄臺灣女性之人也都不勝數。現實事件中的張白帆，對陳素卿而言不僅是一位理想的伴侶，同時也是人生的導師，他象徵了陳素卿自身想像的美好未來，失去這位人生的引導者也意味著她未來的崩解，因此她選擇了死亡。此件在當時社會被浪漫化並加以傳誦的現代版「烈女傳」，在陶晶孫的小說中，作者將此殉情事件一轉為犯罪事件，同時也明確地指出：「她（吳少貞）的愛意對內地人是很有魅力。」道出了本省女性對外省男子的憧憬，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幻想，與其說是愛上了這位男性，不如說是這位男性身上的特質滿足了本省女性的想像。同樣的幻想在《波茨坦科長》中也多有描述：

她忽然想起光復當時的心情，祖國！唉。那是較自己父母還親的話。她想出了是那個感情凝結起來成為對丈夫的憧憬

的。唉！自己到底也是……。<sup>41</sup>

小說主角玉蘭，這位憧憬祖國且沉醉於光復榮光的本省女性，一面對於終究能擺脫殖民地而回歸祖國懷抱的臺灣感到無比幸福，一面因戰爭而耽誤的青春年華以及對愛情的幻想，在遇到范漢智這位理想對象後便一一將自身的期待投射於其中，在情感的激化下，過度美化了這些來臺的外省青年，而忽略了包裹在幻想背後的現實。

〈淡水河心中〉透過揭穿陳不凡的假學士面貌戳破戰後初期部分外省來臺人士經過包裝的外在，同時諷刺了當時欲替此事件立碑作銘的外省名士，並點出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思考，在這篇以日文寫成的小說中，這群寓居臺北的外省籍高級知識群以文言體讚譽陳素卿，宛如焦仲卿夫妻，又有如杜鵑啼血、精衛銜石填海，此種層層疊疊為烈女明志的悼文在通篇日文的文章中猶如戰後初期包裝華麗的外省男子一般，諷刺地顯現了整個殉情事件猶如層疊的語言包裝，是一種仿造現實的虛構表現。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戀愛事件，其中潛藏的疑點以及部分在臺外省人士的心態卻在陶晶孫的小說中一一揭露。

小說透過智芙與教授的對談開啟了情節，以多重視角記錄此案件，由多層敘事拼湊出事件的輪廓，同時當案情由殉情案一轉為刑事案之際，這位「跨界者」也犀利地記錄了各方的反應，這一篇書寫臺灣的〈淡水河心中〉表述了戰後初期的各層心理。首先是心理學教授的心態，臺灣女性與外省男性的戀愛事件引發了這位暫居

<sup>41</sup> 吳濁流，《波茨坦科長》，頁 54。



臺灣的年輕教授之浪漫情調，特別是這位殉情案女主角吳少貞的望族出身，以及男主角陳不凡的外省出身，皆符合了其異國情調的浪漫想像，同時吳少貞留下的遺書中所使用的「臺灣女孩寫不出來的國語白話文」也滿足了這群暫居臺灣的「過客」們教化臺灣之幻想，對戰後初期來臺執教的年輕教授而言，這起事件的浪漫性點綴了其無聊的客居生活。其次是大學校長<sup>42</sup>的反應，此事件見報當天，校長立刻提筆，草就一文：「世間雖多貞女，吾等邊陲之地，猶見如少貞者。見其遺書曰，少女純情，不怪郎無情，僅將其妻比之狐狸精。相戀不成則盡節，淡水河畔殉我身，云云。吾等於此承日人統治之後，而為邊民之先導之時，如何稱頌少女之純情？余提議吾等有志之士，於北投山麓，俯瞰淡水之地立碑，以誌貞女少貞殉節之紀念。」<sup>43</sup>這起原本單純的戀愛事件經過校長這位經學大師之文後，成為臺灣版本的烈女傳，是一種具有政治意圖的作法，試圖透過此事件安撫蠢動的臺灣社會，同時也隱含告誡的意涵。此外，此事件也提供了一般來臺的普通外省民眾茶餘飯後的消遣，小說中寫道：

兩、三天之間，謳歌少女的折頁在街上氾濫。有的印上吳少貞的照片，用美女來說故事；有的用獵奇的手法，畫出自殺現場的寫生圖。歌本也作出來了。那是等著回大陸時，無聊的人們寫給一樣無聊的人們閱讀的安慰作品。但是，這些事和臺灣的人們無關。<sup>44</sup>

<sup>42</sup> 《展望》版〈淡水河心中〉把校長和院長的稱謂混用，而「創元社版」全部統一為校長，今照「創元社版」。

<sup>43</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6。（筆者譯）

<sup>44</sup> 同上，頁97。（筆者譯）

從中可以得知，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輿論基本上是採取複線式的傳播，外省來臺人士依靠著中文報章取得訊息，另一方面，臺灣本地人士，除了少數有過大陸經驗的臺灣人之外，依靠的資訊來源主要是日文，此外，就是靠著像「圓公園」這類的大眾輿論場地流傳，跟統治階層可以說是以一種既交集又平行的方式汲取社會資訊。因此當事件牽涉到兩方之際，故事便在兩方間透過不同的線索、立場被加以重構，〈淡水河心中〉透過這位可以跨越語言的青年學者，巧妙地勾勒了兩方的視野，同時也暗喻了這則愛情故事中的虛構意識。

上述從教授到大學校長乃至於一般外省民眾對於此事件的認知主要具有兩種層面，一是大眾化的異國情調的浪漫傳說，一是從教育、政治目的出發，可以說這位出身良好的臺灣女性為外省男子的殉情事件，滿足了作為新統治者的外省族群們的征服慾望。然而就在事件由自殺轉為他殺，由浪漫傳說成為犯罪案件之際，這位教授與校長不約而同改變態度，教授說道：「噯，事情沒鬧大就好了吧。從前，生蕃會為了這種事獵取許多人頭。」校長也一改「很浪漫」之稱呼，而大呼自己被愚弄，至於街頭的折頁、歌本、小報等都在一天內消逝無蹤，針對此事件，作為統治階層的陶晶孫在小說中也指出：

當內地人完全沒責任時，如果只有內在的恐懼，就可以讚美少女的浪漫。然而，如果要擔負起實際的責任時，就不能說那種話了。<sup>45</sup>

<sup>45</sup> 同上，頁98。（筆者譯）

智芙從臺灣社會的玄關「圓公園」中得知了事件的真相：

少貞不是自殺的，而是他殺，屍體被人用手拉車拉到淡水河棄屍，那個車伕已經落網。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警察很厲害，陸續抓到嫌犯。「好像被鬼纏身」，其中一個人夜夜作惡夢。因為替外省人丟棄屍體，而覺得很害怕，每個晚上都夢見亡靈。<sup>46</sup>

透過「圓公園」的耳語相傳，作者向讀者展示了事件的另一面，意即此「心中」事件的真相原來竟是一件詐欺式的情殺事件，在外省族群圈中盛傳的浪漫愛情事件原來僅是這群人的想像與傳誦，作者藉由臺灣市井之言解構了此烈女傳的形塑敘事並且狠狠地諷刺了一群以道德為名的外省級知識分子。針對此一事件的破案，民眾的評論是「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警察很厲害」，顯示了過去深刻的殖民記憶，作者巧妙地展現了臺灣重層社會的迥異，一是操著新統治者「國語」的族群，在自己的族群圈中想像著臺灣，恐懼著臺灣，另一則是操著舊統治者的「國語」，自成系統。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所書寫的臺灣，不僅是臺灣風土的描摹，同時也刻劃記錄了國府來臺的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所呈現的不協調面貌，正如文中智芙面對著民族與民族間的紛爭說道：「每個民族都覺得只有自己最偉大。事情就這麼簡單，卻沒有人明白。」<sup>47</sup>就戰後初期的外省族群而言，臺灣人與其差別恐怕不僅是地域出身的差異而已，而是為異族統治過的「異民族」之存在。

---

<sup>46</sup> 同上，頁97。（筆者譯）

<sup>47</sup> 同上，頁99。（筆者譯）

## 六、結語

陶晶孫的此篇臺灣書寫完成於日本，這篇小說可以說是此位「跨界者」的四年臺灣觀察記，見證了戰後初期混亂且重層的社會樣貌與意識型態。〈淡水河心中〉不只是陳素卿殉情事件的再現改寫，而是融合了作者陶晶孫對臺灣的理解，以及對戰後初期來臺外省人士心理的揣摩而成。他的另一篇同時期完成的日文散文〈蘭花的驛變——一位護理長的故事〉<sup>48</sup>（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也生動地記錄了戰後初期臺灣社會之怪現狀，尤其是部分臺灣人如何與外省統治階層結合，名利雙收的模樣，其中特別記述了其任職醫院中一位臺灣出身護理長，在政治變動中如何迅速換回臺灣名字，順利地以旅美歸國的菁英身分與外省族群合流，掌握權力的過程。這位護理長在日治時期和一般日本女性並無兩樣，並且因為聰明伶俐而取得日本老師歡心，原本採用日本名字的她，在戰爭結束後馬上恢復臺灣姓名，同時因上任局長不懂日文，權充局長翻譯的她便一躍進入權力核心。陶晶孫也感嘆說道：「為了效忠統治者，不顧反對，一意孤行，結果成功的只有她。明明是本省人，但卻不能為本省同胞做事，實在很可惜。」<sup>49</sup>

吳濁流在《波茨坦科長》以及另一篇小說〈狡猿〉中對於臺灣本地人如何迅速與統治階層結合的樣貌有生動的描寫，《波茨坦科長》中玉蘭的好友蕙英便是其中一例：

<sup>48</sup> 〈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看護學》1951年2月號，後收入《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年），本文根據收於《日本への遺書》的文本。

<sup>49</sup> 同上，頁86-87。（筆者譯）

蕙英和玉蘭同是「鷗會」（二戰時，日人組織台人高女畢業生當特種護士之會）會員，在特別看護婦時代一同被派遣到香港過，回台後蕙英升為「鷗會」的幹事，勇敢的活躍著。出征軍人的歡送，遺族或傷病兵的慰問，獻金運動等，成為皇民奉公會的別動隊，常在台上大聲疾呼地向民眾演說。那時的蕙英真是黃金時代。被目為臺灣女性的代表，芳名常出現於報章。可是時代使她的心境一變。以前她每天早晨在日本神壇前祈禱，如今神壇撤去，換上孫中山先生的遺像。而且不知在甚麼時候把日本的服裝也丟棄，換上華美的旗袍，這就是所謂光復姿態。同時陪伴她走路的人不是日本兵而是我國的軍官。<sup>50</sup>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中，不乏這類具有時代敏感度的人士，陶晶孫在〈蘭花的驟變——一位護理長的故事〉一文中也指出：「大體而言，她們這些精明的人理論上不會發現什麼，但多少都會察言觀色。」<sup>51</sup>除了這些快速轉換身分的臺灣女性外，吳濁流的〈狡猿〉中以戲謔的口吻諷刺了臺灣光復後社會中出現的「光復鄉紳」，小說中的江大頭在日治時期是一位不學無術成天被日警取締的地方流氓，光復後，搖身一變為鄉民代表，同時因為接收大量日產，而累積了大筆財富，後又用錢買得中醫執照。小說中說道：「是的，是的。本省是錢做人，不擇手段搶來的也好，只要有錢就有人尊敬。」<sup>52</sup>因為光復初期接收日產的混亂，除了來臺接收的外省統治

<sup>50</sup> 吳濁流，〈波茨坦科長〉，頁19。

<sup>51</sup> 《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頁80。（筆者譯）

<sup>52</sup> 吳濁流，〈狡猿〉，收於《波茨坦科長》，頁79。

層外，也給了一些本省人大發「光復財」的機會，這些人在戰後初期成為統治的外省階級與本省人之間的橋梁，然而，由於素行不良而不被本省民眾尊敬，反而助長了統治階層與民眾之間的隔閡與誤解。這群臺灣出身的本省人正如陶晶孫所感嘆的一樣，同為本省人卻無法為本省人著想，只想成就自己個人的成功，戰後初期的臺灣交織著因時代改換而出現的種種風景，族群間的誤解、位階上的隔閡，以及一群等著榨取戰後初期資源的投機分子。

從陶晶孫的臺灣書寫中，可以看出臺灣特有的南國風情與生活於這塊土地的人們，在已定住日本的陶晶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此，他也說道：「日本統治時代下的南海寶島上，日本人只知道教導種砂糖，卻忘了讚賞這塊土地的美麗，這是錯的。……我想藉此傳達生長在那塊島上的智慧、美麗與熱情。」<sup>53</sup>對陶晶孫而言，這個島嶼雖然僅是他游移與跨界人生的一站，然而卻能深刻觀察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浮動與變化，並透過其作品記錄了所感。

從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到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都點出了戰後初期部分外省男子對臺灣女性的玩弄心理，以及部分臺灣女性對外省男子的自我理想投射之想像。從〈淡水河心中〉中可以看出陶晶孫企圖透過陳素卿的殉情事件揭開當時部分來臺外省青年與權貴的心態，透過對現實事件的逆寫，諷刺當時輿論刻意型塑出陳素卿殉情案的浪漫色彩所淡化的省籍衝突，以及揭開這些浪漫敘事背後的政治操弄。另外，〈淡水河心中〉與殉情的社會新聞及其變成新聞事件的後續發展，有文本上的結構對稱關係：新聞的陳素

<sup>53</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 87。（筆者譯）

卿與張白帆↔小說的吳少貞與陳不凡；新聞的評論與投書↔小說的對談；現實社會的公共輿論↔小說的圓公園；現實社會的臺大校長與教授↔小說的臺大教授與助教等。甚至，殉情事件最後發展成臺大校長、教授們投書中的「今見此事，昧昧思之，則遠古神話，頓識其義矣」，新聞事件在媒體形成的公共論壇與文教指導者們的推波助瀾下，變成了以今釋古，由俗歸雅的爱情神話。就文本文類的跨界而言，何為真實、何為新聞、何為虛構、何為小說，似已難辨。陶晶孫的小說，逆寫了比小說更像小說的殉情社會新聞。而作為民間輿論的「圓公園」，變成了逆轉的關鍵，逆轉了由新聞媒體的報導、評論、投書，乃至編入教科書、民眾讀物等一系列的浪漫教化敘事，「圓公園」成為了真實民間的輿論場所，以對抗以教化為目的的公共輿論所塑造的重重堆疊文字包裹。〈淡水河心中〉的「圓公園」，讓跨界者陶晶孫敏銳地察覺到戰後隨著國府的再中國化政策而形成的分界線，一條存在於臺灣社會中結合了省籍、語言與公共（官）／民的分界線。同時似乎陶晶孫也暗示著，這一條界線的存在，並非只是單方面學習新統治者的語言與文字如同殉情者一般，即可跨越。畢竟，即便善語能文，卻終也淪為波臣，難逃一死。更不用說存在於官方輿論與市井街談巷議之間的鴻溝了。

## 附錄、陶晶孫〈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情〉）

黃英哲譯、涂翠花校訂

從空中飛過來時，左邊的大屯山、右邊的觀音山，就是臺灣入口處的地標，夾在中間的淡水河看起來很像飛機跑道。這是臺灣的玄關，飛機繞了臺北一圈，然後降落在松山機場。這就是從上海飛臺北時的路線。

仔細看看地面，荷蘭人建造的好像童話故事般的城堡上飄揚著英國國旗，城堡下的地面上是日本砲兵陣地遺留下來的縱橫交錯的道路。這些都是臺灣人民幾度易主，受到多國奴役的象徵。

大屯火山脈和中央山脈彼此逼近的地方稱為江頭，<sup>54</sup> 地形非常狹隘。淡水河通過這個玄關注入大海。河水流域經過日本的整治，河岸築起二十尺高的堤防，處處設有水門，洪水來襲時，城鎮不會淹水。

當年輕的學士智芙第一次經過這個玄關，來到這個鎮上的學院擔任助教時，就特別喜歡這水門下的河畔。望著對岸的觀音山，從那裡延伸出一望無際的平坦的桃園臺地，在三十度仰角的高度上，一片煙霧迷濛。就像熱帶蠻荒地區的山脈一樣，他看得毛骨悚然。眼前的淡水河在兩岸留下寬廣的砂地。傳說在這條河混濁的期間，就會一直天下太平。他是心理學家，對於政治家採取這種愚民政策，覺得很憤慨。他一個人在這片砂地、水門和堤防旁邊漫步，有時也抬頭看看寫著「十三號水門」的地方。

---

<sup>54</sup> 江頭：日本人對「關渡」的稱呼。（譯者註，以下皆同）



在他的研究室裡，幸好教授很年輕，對待他就像朋友一樣。他坐在沒有時間限制的研究室裡，眺望著椰子樹冥想。有時會想起學校的種種行政瑣事，才趕走那些煩人的念頭，卻又想起臺灣人的矛盾心理。在日治時代，他們不喜歡被稱為「臺灣人」，反而喜歡「本島人」的稱呼，所以現在也不想被稱為「臺灣人」。其實，「本島人」的說法才是指當地人吧？這麼想的他不能理解中國內地人說：「我是山東人，你是臺灣人」的心理。

教授進來了，很愉快的樣子。

「喂，林君，<sup>55</sup> 有你會感興趣的事。你的吳小姐出事了，因為你不理她，所以在十三號水門上吊自殺了。」

「啊？」

連智芙學士也大吃一驚。確實有一位吳小姐，也曾經有人起鬨說吳小姐喜歡他。到現在還是常常有人拿這件事來取笑他，吳小姐可能也聽到這種閒話了吧。他並不知道當事人吳小姐是不是對自己有意思，可是有人起鬨時，他也一副煞有其事的樣子。不過，她不可能因為這樣就去上吊。總之，她的死不關他的事。那位吳小姐是臺灣人，某望族的千金，也是有名的聲樂家，經常在中山堂演唱。

智芙想到這裡，才發現如果真的和自己有關係，教授就不會用「你會感興趣」的說法。就像往常一樣，是故意尋他開心吧。

「都上報了。你沒看報紙啊？吳少貞在水門下面上吊，屍體被發現了。她身上有一封寫給陳某人的遺書。好文章。是臺灣女孩寫

---

<sup>55</sup> 君：連接在姓氏後面的稱謂。現代日本男性常用來稱呼親近的同輩或晚輩。

不出來的國語白話文。她父母來領走，已經火葬了。事情還沒完。剛才去校長室時，聽說在事情見報當天，我們院（校）長提起筆，馬上就寫出一篇文章。我沒背下文句，好像是『世間雖多貞女，吾等邊陲之地，猶見如少貞者。見其遺書曰，少女純情，不怪郎無情，僅將其妻比之狐狸精。相戀不成則盡節，淡水河畔殉我身，云云。吾等於此承日人統治之後，而為邊民之先導之時，如何稱頌少女之純情？余提議吾等有志之士，於北投山麓，俯瞰淡水之地立碑，以誌貞女少貞殉節之紀念』之類的句子。院（校）長是經學大家，所以寫這種文章。不過，大人物身邊也少不了馬屁精，就有人拿著那篇文章到處募款。這都是我聽來的事。雖然我不懂犯罪學，可是我覺得那封遺書的文章，也有奇怪的地方。總之，三天之內有這種進展，我覺得很驚訝。話說回來，就算你是個學者，可是不知道社會上這二、三天發生的事，也很令人驚訝。」

「對了，你對你的吳小姐有什麼看法，說真的。」

教授緊迫盯人，智芙倒了咖啡。

「那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臺灣人民的祖先都是出外討生活的人，所以沒有官僚的後代，而且地主的出頭也很不尋常；日本教育培育出一流的性格，擁有複雜的心理，青年男女都有某種奇特的微妙之處，所以對政治家而言，是一種可怕的存在吧。」

智芙以朋友的態度說道，教授也贊成他的說法。

「你說對了，院（校）長的頭腦是政治家的頭腦，而不是教育家的頭腦。臺灣女孩是為了中國內地人自殺的。因為日本人搶走了

生蕃<sup>56</sup>女孩，生蕃就起來作亂。後來，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個民族會害怕另一個民族。貞節是障眼法，其實是一種政策。我告訴你，立碑這種滑稽的事，真的會實現的。」

他們喝一喝咖啡。

「不過，你是怎麼了？」

教授還不放過他。

「沒怎麼樣啊。在這裡發呆。這島上景色優美，又暖和，而且光線充足。看著那個很蠻荒的桃園臺地，就覺得飛機好像會像雲彩一樣，從觀音山頂飛下來。這麼一來，淡水河好像就會變得澄清了。我們不能再這樣坐著不動了，颱風好像就要來了。您也一樣吧？對了，那件自殺案是怎麼回事？」

「聽說當事人吳少貞是桃園人，本來在製片廠工作，對方是名叫陳不凡的員工。反正就是她失戀自殺了，可是以臺灣女孩來說，她的遺書寫得太好了，所以讓中國內地人大為感動。文章令人感動。比如說，我小時候刻的印章，拿給爸爸看，爸爸說難看死了。我就說：『爸爸，是我自己刻的哦。』結果爸爸稱讚我刻得好棒。就像這樣。」

教授說道，歪著頭想了一會兒。

心理學研究室安靜無聲。一位教授，一位助教，還沒有其他學院的麻煩事，二個人悠閒地走過校園回家去。

---

<sup>56</sup> 生蕃：現在稱為「原住民」。為突顯歷史背景，所以保留原文，無不敬之意。

二、三天之間，謳歌少女的折頁在街上氾濫。有的印上吳少貞的照片，用美女來說故事；有的用獵奇的手法，畫出自殺現場的寫生圖。歌本也做出來了。那是等著回大陸時，無聊的人們寫給一樣無聊的人們閱讀的安慰作品。但是，這些事和臺灣的人們無關。

智芙很窮，卻還是上街去。他沒錢進去閃著霓虹燈的店裡吃喝，所以走向有「圓公園」之稱，其實是霸占了圓環的攤販街，那裡的大鍋子裡煮著肉和油豆腐。他不懂臺灣話，可是那裡的客人夾雜著日語說話，所以他聽得懂。他在那裡的五寸大的椅子上坐下來。日治時代，大學生都會來這裡，所以臺灣人沒有戒心，反而和他說話。

他大聲地咬著水煮的豬耳朵，一邊聽著街談巷語，聽到驚人的消息。少貞不是自殺的，而是他殺，屍體被人用手拉車拉到淡水河棄屍，那個車伕已經落網。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警察很厲害，陸續抓到嫌犯。「好像被鬼纏身」，其中一個人夜夜作惡夢。因為替外省人丟棄屍體，而覺得很害怕，每個晚上都夢見亡靈。

智芙摸黑回家，走過一條街，又轉進一條街。他呼吸著夜晚清爽的空氣，一邊分析起來。只是流言嗎？還是另有實情？他想不出來。

教授出現了。

「喂，抓到犯人了。」

「車伕嗎？」

「什麼？不是，是姓陳的。」

「哦？」

教授說明經過。聽說陳不凡自白說，是吳少貞叫他去淡水河畔，然後逼他一起自殺。他只好騎腳踏車回製片廠拿繩子過來，一起上吊自殺，可是他卻臨陣逃脫。不過，警察好像還有其他的想法。

智芙覺得自己的分析好像有了一些進展。

「聽您這麼說，是上吊呢？想要上吊呢？還是幫助上吊？或是謀殺呢？我們沒有任何憑據。不過，我有種種疑問。那封遺書實在很奇怪，臺灣的女學校只用日語教學，她畢業以後，就算再怎麼用功，戰爭結束後也寫不出那麼好的文章，而且想法也不一樣。可是那是在她身上找到，又鑑定出是她的筆跡，所以無從辯駁。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她父母為她舉行日本式的火葬這一點，我一直想不通。」

「有道理。你的分析，我也想了很多，我同意你的說法。」

警察公布消息後，第二天，街上氾濫成災的折頁、小報、歌譜、畫報，都在一天之內消失無蹤。當內地人完全沒責任時，如果只有內在的恐懼，就可以讚美少女的浪漫。然而，如果要擔負起實際的責任時，就不能說那種話了。民眾真是可畏。不久之後，警察從陳不凡口中問出了事實。

淡水河畔是他們二人出雙入對的地方。警察沒問他們如何談戀愛的，不過，她以為陳不凡是學士，而愛上他。因為工作關係，每次要在她所編輯的折頁上寫短文時，她都請陳不凡修改。如果有人讚美她的短文，她就很高興。這種作法是中國科舉時代的遺風，請

別人修改文章之後，再謄寫一遍，就覺得那是自己的文章。她的愛意對內地人是很有魅力，可是陳不凡還有別的女人。那個女人的政治力量當然比臺灣女孩有力，一發現自己有少貞這個情敵，就和不凡閃電結婚，然後同居，還把少貞從製片廠調到別處去。到最後，少貞和不凡的幽會也愈來愈困難，苦惱的女孩在家鄉和城鎮之間奔波。去陳家，那裡有別的女人；一回到家鄉，父親又勸她去相親。心慌意亂的結果，為了拒絕相親，好留住不凡的愛，她先假造遺書向父親表明自殺的決心。當然也請不凡替她修改，她謄寫之後，就收在懷裡。接著和不凡的談判陷入僵局，她想強迫他在淡水河殉情。

這就是她身上有遺書的原因。但是男人始終很奸詐。不久之後，除了在淡水河的石壁上上吊之外別無他法時，他心生一計，用繩子的兩端各綁住二人的脖子，然後把中心點綁在石壁凸出的石塊上，那樣子掉下去的話，就好像水井打水用的繩桶一樣。可是跳下去時，他突然抱住那個石塊，逃過一死。所以只有女孩送命。事情的始末就是如此而已。他自己解開繩子，逃走；然後又折回來，想解開女孩脖子上的繩子，因此她的身體就掉到堤防下面去了。不過，她的確已經死了。他改變主意，再把繩子綁回她的脖子上，然後跑掉。所以，雖然她是縊死的，卻橫躺在那裡。到隔天早上，人們來通知他時，他佯裝不知情，又跑去那裡撫摸著屍體流淚。明明是春天，卻裹著薄薄的圍巾，遮掩脖子上的些微擦傷。

教授來到研究室。

「我想說現在沒什麼好浪漫的了。我跟你說，原來女孩的父母

不相信中國大陸來的人，所以勸她去和別人相親。對那女孩來說，這是很傷腦筋的事；換句話說，她後來就變得不太正常了。她父母盡快把她火葬，是為她著想。噯，事情沒鬧大就好了吧。從前，生蕃會為了這種事獵取許多人頭，甚至還發生過警察、軍隊、機關槍、飛機、毒氣實驗那些事哪。」

\*

把一流的政治性應用在戀愛上的不凡，把少貞的遺書修改得很好。但他沒想到遺書會公諸於世，由於他教少貞把妻子說成狐狸精，因此，他的妻子去探監過一次，給了他五圓之後，聽說了遺書的事，就再也沒去看過他了。據說，幸好法官判他十年刑期，所以他大概可以逃過這個妻子的凌辱吧。

智芙在研究室裡。他很窮，所以去圓公園大聲咬豬耳朵，傾聽臺灣的聲音。在空氣清爽的通風的研究室，冥想著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每個民族都覺得只有自己最偉大。事情就這麼簡單，卻沒有人明白。

「我的青春就這樣一年又一年流逝了。」

這麼想著，他又夢見飛機像雲彩一樣從淡水河上空飛下來。不過，發生那件事以後，他就不去水門了。

\*

離開基隆，開往香港去的船，通過淡水河河面南下。

在那艘船的甲板上有一個男人，那是給不凡假學士證的男人脫

逃的身影。他是窮途潦倒的重慶人。他和不凡不一樣，手上握有逃走的門路。警察追緝得愈來愈緊，他就悠哉地逃走了。

校長以前稱讚「很浪漫」，接著就保持沉默，忍氣吞聲。可是（假學士的）事件快燒到自己的尾巴了，他不愧是政治家，跳出來聲明：「我只是被他愚弄了」，轉移反對派日復一日的攻擊。

對淡水河來說，這只不過是到現在為止，為自己殉身的許多屍體中的一具罷了。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 第五章

# 國民性改造的構想

許壽裳與臺灣，1946-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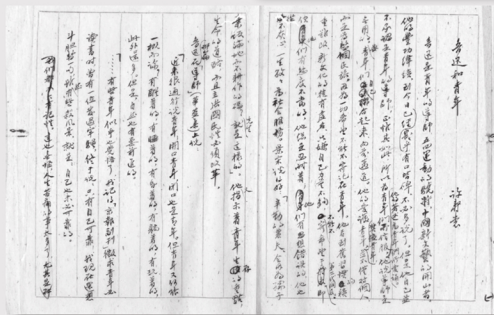
臺大出版中心



5-1 1927、1928年之交，許壽裳在南京任大專學院秘書、參事、秘書長，與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時的留影。（北京魯迅博物館前副館長陳漱渝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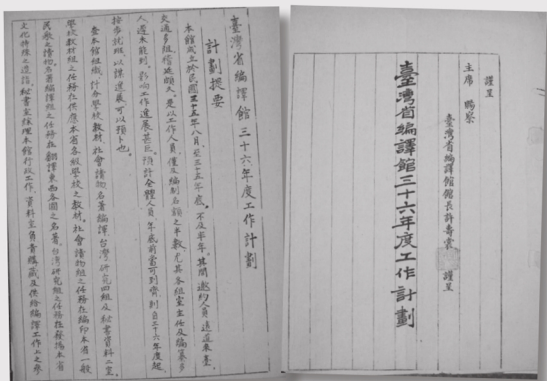
5-2 1946年5月1日的〈陳儀致許壽裳電報〉，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的陳儀，從臺灣打電報到南京，給時任國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的許壽裳，請他來臺主持編譯機構。



5-3 1946年，許壽裳撰〈魯迅和青年〉。







謹呈  
主席 蔣 鈞 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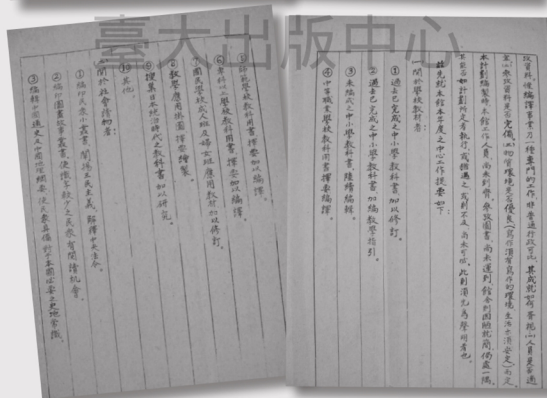
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 謹呈

## 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劃

### 計劃提要

本館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度，不及半年，其間逾期負遠近來臺交通多阻，修繕頗久，是以工作人員，僅及編制名額之半數，尤其各組室主任及編纂多入選本館則，影響工作進展甚巨。預計全體人員，年底前當可到齊，則自三十六年度起，按步就班，以謀進展，可以預卜也。

查本館組織，計分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台灣研究四組及秘書資料二室。學校教材組之任務，在供應本省各級學校之教材，社會讀物組之任務，在編印本省一般民衆之讀物，名著編譯組之任務，在翻譯東西各國之名著，台灣研究組之任務，在整理本省文化發展之過程，秘書室處理本館行政工作，資料室負責整理或提供編譯工作之參考資料。



改資料，唯編譯室另有一種專門的工作，非普通行政可比，其成就如何，胥視人員是否適宜，以參政資料是否充備，而切實環境是否優良（其所謂環境者，指有良的環境，生活清潔之由，又本計劃編製時，本館工作人員，尚極少，參政圖書，尚甚遲到，餘全則困難尤甚，傷感，不至如此計劃，始有執行，或極端之不利，不及此言也，此則須見為聲明者也。

謹將本館本年度之中心工作提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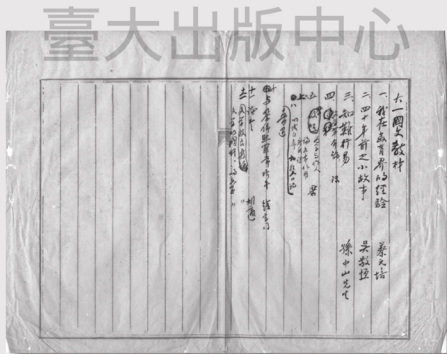
- ① 關於學校教育：
  - ① 過去已完竣之中小學教科書，加以修訂。
  - ② 過去已完竣之中小學教科書，編修編輯。
  - ③ 未結之中小學教科書，陸續編輯。
  - ④ 中學職業學校教科書，擇委編輯。
- ② 關於社會讀物：
  - ① 編印民衆小叢書，闡揚民主主義，解釋民生主義。
  - ② 編印國畫故事叢書，使兒童之民衆，有閱讀機會。
  - ③ 編輯之進史，心術，經濟，使民衆，在編印本國歷史之地理常識。
- ③ 關於名著編譯：
  - ① 關於名著編譯，擇委編輯。
  - ② 關於名著編譯，擇委編輯。
  - ③ 關於名著編譯，擇委編輯。
  - ④ 關於名著編譯，擇委編輯。
- ④ 關於台灣研究：
  - ① 關於台灣研究，擇委編輯。
  - ② 關於台灣研究，擇委編輯。
  - ③ 關於台灣研究，擇委編輯。
  - ④ 關於台灣研究，擇委編輯。
- ⑤ 關於秘書資料：
  - ① 關於秘書資料，擇委編輯。
  - ② 關於秘書資料，擇委編輯。
  - ③ 關於秘書資料，擇委編輯。
  - ④ 關於秘書資料，擇委編輯。

5-6 1947年，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所呈「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劃」。





5-7 許壽裳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時攝。(翻拍自陳漱渝主編《現代賢儒——魯迅的摯友許壽裳》)



5-8 1947年6月，許壽裳轉任臺大教授兼中文系首任主任，他所擬的大一國文教材清單。

## 一、前言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莠），浙江紹興人。1899年，入紹興中西學堂就讀，同學有沈光烈、胡豫、馬禛光、蔣夢麟等人。1900年，轉入杭州求是書院，受業於宋平子門下。1902年9月，以浙江官費赴日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普通科學習日語，其後結識同是浙江官費留學的同鄉魯迅和陳儀，此後三人的深厚友誼至死不變。1903年，主編浙江同鄉會誌《浙江潮》，鼓吹反清革命，影響中國留學生甚鉅。1904年3月，自弘文學院畢業，並再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史地科就讀，1908年畢業。這其間，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於日本成立，身為光復會會員的他，也加入了同盟會。同時，與從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退學的魯迅等人計劃掀起文藝運動。此外，在1908年時，又與魯迅等人跟從滯留日本的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

1909年返國從事教育工作，辛亥革命後，應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的教育部工作，與魯迅共事一段時間，隨著遷都，許壽裳也跟著教育部的轉移遷往北京，擔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長。此後，直到抗日軍興為止，先後歷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要職。

1937年，抗日軍興，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在西安成立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受聘為西安臨時大學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1938年，西安臨時大學因戰亂轉移到漢中，改名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雖兼

任這所大學的法商學院院長，但因受到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干涉，憤而辭去院長之職，專任史學系教授。1939年，西北聯合大學改組為西北大學時，許壽裳辭職，同年冬天，前往雲南，再度成為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因戰禍，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到雲南的澂江）。1940年春天，應私立華西協合大學（成都）的邀請，以庚款講座教授身分前去執教。1941年夏天辭去華西協合大學，赴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秘書，重回公務員生活。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壽裳擔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旋應時任長官公署長官的好友陳儀之邀，前往臺灣擔任編譯館館長，委以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二二八事件後因長官公署的改組，陳儀離職，編譯館撤廢，許壽裳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隔年2月18日於國共內戰方酣中的臺灣大學教員宿舍遇害，<sup>1</sup>其死因至今尚未被完全證實。從許壽裳的個人史中，可以清楚明白許壽裳生命中的最後兩年是在臺灣渡過，本文旨在追尋許壽裳臺灣時代的足跡，解明二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既連續又斷裂的擺盪年代，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奮鬥軌跡。

## 二、許壽裳的赴臺

### （一）教育文化背景

臺灣自1895年因甲午戰敗，被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

---

<sup>1</sup> 關於許壽裳的遇害，當時臺灣省警務處的正式發言是，1948年2月18日夜，原編譯館工友高萬俤潛入許宅欲行竊，被許壽裳發現，故行兇。詳見《臺灣新生報》（1948年2月23日），以及〈案情經過〉，收於《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悼念許壽裳先生」，頁34-36。許壽裳逝世後，國民政府曾明令褒揚許壽裳，詳見《新生報》（1948年6月27日）。

民地以後，日本當局為了方便殖民統治，遂實行同化政策，普及初等教育，推廣日本語。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強力推行同化政策，利用國家機器將日本文化移植臺灣，透過各級學校教育將日本國家意識與國民意識強加灌輸予臺灣青少年。此同化政策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全面抗戰之後，更是變本加厲，日人在臺進一步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中文報紙發行與臺灣民間宗教信仰，在全臺各地設置皇民鍊成所，企圖以軍國主義思想將臺灣人塑造成「皇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部分臺灣人被日本化而認同了日本，亦是極其自然之事。關於臺灣人的日本化，著名作家葉石濤（1925-2008）回憶，二戰結束時，他甚至連臺灣話也不會說，因而斷言當時，臺灣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日本化了。<sup>2</sup> 儘管這個數字只是他個人的主觀感受，卻在相當程度上提示了日本戰敗前後當時臺灣人的日本化情況。

1945年，二戰結束前夕的臺灣，日本語普及率大約達百分之七十，當時臺灣人口有六百萬，換句話說，日本語的使用人口最少有四百二十萬。<sup>3</sup>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光復初期，中國當局對於派往臺灣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人，不能不考慮他的教育背景，也就

---

<sup>2</sup>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29卷4期（1991年12月），頁158。有關臺灣人的日本化，尚可參考著名人類學家、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金關丈夫（戰後仍留任在改組後的臺灣大學任教）的回憶。從他的敘述中，可以充分理解當時臺灣大學裡的臺灣人學子心情：「他們已經體認到自己和日本文化是切割不斷的。雖然誰也沒講開，卻可以感覺得出他們甚至已經把日本當作自己的故鄉。我們當然能夠明瞭他們的心情，但也莫可奈何。」金關丈夫，《孤燈的夢》（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年），頁297。

<sup>3</sup> 張良澤，〈台湾に生き残った日本語—《国語》教育より論ずる〉，《中国語研究》第22號（日本：采華書林，1983年6月），頁17。

是說需要有留學日本的教育背景，通曉日本語，對於日本文化有某種程度的理解，即所謂的「知日派」，才能夠推展工作。許壽裳之所以被聘請到臺灣從事文化工作，也是因為具備上述條件。其實不只是許壽裳，當時在臺灣主持教育文化工作者，也皆有相同背景，茲列表如下：

表四：於光復初期主持臺灣教育文化工作者

職務	姓名	出身學校	出身地
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	范壽康	東京帝國大學	浙江上虞
臺灣大學校長	陸志鴻	東京帝國大學	浙江
臺灣大學教務長	戴運軌	京都帝國大學	浙江
師範學院院長	李季谷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浙江紹興

資料來源：章子惠，《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出版社，1947年）。

## （二）和陳儀的關係

陳儀（1883-1950），字公俠（亦作公洽），與許壽裳、魯迅同是浙江紹興人。1902年留學日本，最初進成城學校、陸軍測量學校就讀。1907年7月，轉入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1908年11月，以二十二期生畢業。返國後，陳儀往軍界、政界發展，歷任兵工署署長、軍政部次長、代理軍政部部长、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戰後，他之所以被任命為長官公署長官，除了與他曾任福建省主席的經歷有關外，也與他的留日背景不可分割。戰後，當陳儀被任命為長官公署長官，延攬來臺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人選時，自然會想到他的好友許壽裳。

1946年5月1日，陳儀從臺灣打電報到南京給時任國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的許壽裳：

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復。<sup>4</sup>

接到陳儀電報後，許壽裳頗為猶豫，5月4日，他寫給友人謝似顏如下的信：

得公洽兄密電，略謂「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弟意能避光復後之臺灣，非不甚願，惟所云擬設機構，既未悉其詳情，弟個人復有種種牽制，中以經濟困難為第一，躊躇莫決。<sup>5</sup>

5月13日，陳儀又再度從臺灣寄了親筆私函給許壽裳：

電、信都收到。

兄願來臺工作，很高興。臺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之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臺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語言文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的關係，多不適用。臺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於臺灣人的。第一要編的是中小學文史教本（國定本、審定本完全不適用）；第二要編的是中小學教師的參考讀物，如中學教師、小學教師等月

<sup>4</sup> 〈陳儀致許壽裳電報〉，1946年5月1日。收於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5。

<sup>5</sup> 《許壽裳書信集》（杭州：浙江文藝，1999年），頁214-215。

刊；第三為宣達三民主義與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如辭典等。這是就臺灣的應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覺到中國現在好書太少了，一個大學生，或者中學教師要勤求知識，非讀外國書不可。不但費錢，而且不便。我常有「譯名著五百部」的志願，我以為中國必須如以前的翻譯佛經一樣，將西洋名著翻譯五、六部部過來，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學生，有該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讀。……

為了右面的五種工作，我擬設一編譯館，臺灣總督府規模宏大，惜大半被毀於空襲，為留紀念計，擬以三年工夫，把他修復起來，作為臺灣省文化館，其中包含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體育館，而編譯館亦在其內，合為五館。該館直隸長官。教育處舊有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可併入，編制預算，俟兄到後再定。

這樣的工作，為臺灣、為全國，都有意義，望兄花五年工夫來完成他。<sup>6</sup>

從這封私函能夠知曉，許壽裳經過短暫考慮後，最後還是答應了陳儀的聘請。同時從這封私函也能理解陳儀對光復後臺灣文化重建工作的熱情與理想，對編譯館的業務予以很大期待，同時也為編譯館的組織和工作內容，描繪了藍圖。

許壽裳的赴臺，除了好友陳儀的力邀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其女兒許世瑋有以下證言：

---

<sup>6</sup> 〈陳儀致許壽裳私函〉，1946年5月13日。《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10-17。

一九四六年初夏，父親從重慶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

他對我們說，南京的政治空氣對他不合適，所以接受了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到臺灣去擔任編譯館館長。

……

父親所以到臺灣，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臺灣是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實現他的夙願，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寫作。<sup>7</sup>

《魯迅傳》的撰寫確實是魯迅歿後，許壽裳長年所想。從1940年10月19日的日記即可得知：

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于簡略，不慊于懷，思為作傳，則又苦于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sup>8</sup>

從上述可以了解許壽裳赴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臺灣光復後，國府對臺灣文化的重建，需要有留日背景，對日本文化、日本語有某種程度的了解與造詣的人才赴臺從事文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與陳儀的深厚關係。傳統中國社會是非常重視同鄉、同窗的關係，所以陳儀才力邀他來臺擔任編譯館館長。再者，就是許世瑋所

<sup>7</sup> 許世瑋，〈憶先父許壽裳〉，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1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05-307。

<sup>8</sup>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54。



一九四六年初夏，父親從重慶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

他對我們說，南京的政治空氣對他不合適，所以接受了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到臺灣去擔任編譯館館長。

……

父親所以到臺灣，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臺灣是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實現他的夙願，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寫作。<sup>7</sup>

《魯迅傳》的撰寫確實是魯迅歿後，許壽裳長年所想。從1940年10月19日的日記即可得知：

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于簡略，不慊于懷，思為作傳，則又苦于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sup>8</sup>

從上述可以了解許壽裳赴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臺灣光復後，國府對臺灣文化的重建，需要有留日背景，對日本文化、日本語有某種程度的了解與造詣的人才赴臺從事文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與陳儀的深厚關係。傳統中國社會是非常重視同鄉、同窗的關係，所以陳儀才力邀他來臺擔任編譯館館長。再者，就是許世瑋所

<sup>7</sup> 許世瑋，〈憶先父許壽裳〉，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1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05-307。

<sup>8</sup>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54。

畫綱要〉共分第一通則、第二內政、第三外交、第四軍事、第五財政、第六金融、第七工商礦業、第八教育文化、第九交通、第十農業、第十一社會、第十二糧食、第十三司法、第十四水利、第十五衛生、第十六土地等十六大項。<sup>12</sup>可視為接收臺灣的藍本及其後長官公署時期的治臺政策。

該綱要中，牽涉到戰後臺灣文化重編者，有第一通則第四條：

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毒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sup>13</sup>

及第八教育文化第五十一條：

日本占領時期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誣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sup>14</sup>

編譯館的設立，在上述〈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第八教育文化的第五十一條已經明確列記。編譯館是於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而許壽裳則於成立之前的6月25日抵臺。從上述「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及陳儀寫給許壽裳的信函中，可以得知編譯館的設立是其來有自，他是陳儀構思中臺灣文化重建計畫中的一環。從它的直隸長官公署，不隸屬教育處，<sup>15</sup>就可知其在陳儀心目中的重要性。

<sup>12</sup>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1989年12月），頁49-57。

<sup>13</sup> 同上，頁49。

<sup>14</sup> 同上，頁54。

<sup>15</sup> 楊乃藩，〈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傳記文學》55卷6期（1989年12

編譯館成立後，長官公署即將原來隸屬於教育處的「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及「編審室」併入編譯館，除了取代其原有的職責外，並將人員納為編譯館的工作班底。

在陳儀的構想與許壽裳的籌劃下，編譯館分為：<sup>16</sup>

1. 學校教材組
2. 社會讀物組
3. 名著編譯組
4. 臺灣研究組

人員編制分為四級，即編纂、編審、幹事、助理幹事。

學校教材組，是以編撰教科書為主，由於接收原教育處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的班底，略具雛形，許壽裳延攬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窗程環來臺任編譯館編纂兼該組主任，當時擬編書目計有：<sup>17</sup>

1. 光復初等小學教科書
2. 光復高小教科書
3. 光復山地國民學校教科書

---

月），頁87。〈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表〉，《臺灣光復廿年》（臺北：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年10月），頁參-1。

<sup>16</sup> 《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6月），頁K85-K89。

<sup>17</sup> 同上，頁K85。

4. 光復初中教科書
5. 光復高中教科書
6. 光復師範教科書
7. 光復職業學校教科書
8. 國民學校成人班及婦女班教科書

社會讀物組，負責編輯一般性的民眾讀物，許壽裳延攬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窗謝似顏來臺任編譯館編纂兼該組主任，並羅致其北京女師大的學生到館工作。社會讀物組所編輯的民眾讀物，總稱為「光復文庫」，其編印目的是：「編選許多社會讀物來供應本省的一般民眾（包括中小學教師、大中學學生、公務員以及家庭婦女、農工商各界在內），使他們對於祖國的文化、主義、國策、政令等一切必需的實用的知識，明白了解。」<sup>18</sup>意即介紹中國國內書籍，編譯淺顯讀物，以為一般教育之輔助，同時提供民眾中文讀物，期以替代日文書籍。<sup>19</sup>

名著編譯組，負責翻譯學術名著與文學名著，目的在於藉著閱讀名著，以啟發中、大學生之研究興趣與培養其中文能力。此構想，可能受到日本的影響，因為日本大量翻譯世界名著出版，藉以提升國民文化水準。陳儀、許壽裳滯日期間頗長，對此情形，必有所知。許壽裳延攬了昔日魯迅創立之文學團體「未名社」的重要成員俄國

<sup>18</sup> 許壽裳，《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臺北：臺灣書店，1947年），頁2。

<sup>19</sup> 當時編譯館各組擬編譯、出版的詳細書目，請參考《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頁K86-K90。

文學家李霽野，由李霽野來臺任編譯館編纂兼該組主任。李霽野又邀請了中國近代文學史家李何林（本名李竹年）、翻譯家金瓊英、劉文貞等人來臺工作。

臺灣研究組，負責對臺灣歷史文物作系統性的研究，主要是整理、翻譯，並繼續戰前日本學者的臺灣研究。許壽裳認識到為了進行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所謂繼續日本人的臺灣研究，除了繼承日本學者的研究風氣外，也透過日本人的臺灣研究與臺灣研究組的臺灣文獻整理編譯，更加能夠理解臺灣，有助於編譯館和長官公署的文化重建工作之展開。許壽裳延攬臺灣本地出身的楊雲萍任編譯館編纂兼該組主任，並又徵用原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原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臺灣民俗學家池田敏雄及畫家立石鐵臣等日人到館工作。

編譯館成立時，陳儀即立刻指示：

編譯館雖分四組，雖然四組工作都重要，但在明年（1947），尤其在上半年，希望特別注重中小學教科書一類。過去教育處所編中小學課本，據一般試用的結果，多半嫌太深，教學都覺困難，希編譯館就已編各書檢討一下，或修改，或另編，務使適合於國語國文程度尚不及各省學生的本省學生，此種新教本望於暑假前編竣，俾暑假後可以應用。一面望編教本的參考書，或教學法，以供教員之用。至於編輯人員，各學校教員中如有富有教學經驗，及編輯能力的，亦可請其參加。（台卅五字第一四七號通知）。<sup>20</sup>

<sup>20</sup> 《臺灣年鑑》，頁 K85。

可知編譯館的工作重點，還是偏重於編輯適合臺灣學生的教科書，提升臺灣學生的中文程度。但是，當時許壽裳也面臨重大困境，主要是五十年間，臺、中之間的文化隔絕與語言障礙。從他寫給許廣平（魯迅妻子）的信中（1947年4月19日），可以了解他所面臨的難題：

此間辦事困難，其最大障礙是在語文的隔閡，因台胞均說日語，看日文，對於國語、國文程度太低，現雖注力於此，收效尚甚少也。<sup>21</sup>

此外，編譯館本身也有先天限制，他曾指出：

本省的編譯工作，可以說是一種從頭做起的工作，其他部門，其他機構，都有事業可以接收，唯有編譯事業，無法接收，同時也不應該接收。<sup>22</sup>

他自謂是以一種拓荒者的精神，去從事編譯工作。

## （二）臺灣省編譯館的撤廢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事件後，4月22日，國府行政院會決定將長官公署裁廢，改組為省政府，並更換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改派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對此，國分直一也感嘆道：陳儀的去職與魏道明的就任，意味著「歐美派」官僚與

<sup>21</sup> 〈許壽裳先生書簡鈔〉，《新文學史料》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69。

<sup>22</sup> 許壽裳，〈臺灣省編譯事業的拓荒工作〉，《臺灣月刊》第3、4期合刊（1947年1月），頁61。

學者將要取代活躍於戰後初期臺灣的「知日派」官僚與學者。<sup>23</sup>同年5月11日，陳儀離臺，5月15日，魏道明抵臺履新。隔日，召開省政府委員會第一回政務會議，決議撤廢編譯館，其業務由省政府教育廳接管，<sup>24</sup>編譯館自成立以後，僅十個月即被撤廢。許壽裳在編譯館被撤廢的翌日5月17日於日記記下：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日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于台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sup>25</sup>

編譯館撤廢的原因省政府並無明確說明，當時編譯館的名著編譯組編審李何林，在日後曾指出編譯館的即刻廢止之決定，係魏道明從南京帶來的國民黨CC派之指令，因為許壽裳經常反對CC派主導的法西斯教育政策。<sup>26</sup>編譯館的設立，於法的層面來說，是陳儀利用行政長官的立法權，制定臺灣省單行法規，因而在制度上是相當脆弱的，當陳儀被更換時，編譯館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更何況當長官公署撤廢改組為省政府時，臺灣行政機構也全面進行再調整，編譯館的撤廢也有可能只是整個新設省政府行政機構調整的一環。

<sup>23</sup> 國分直一，〈戰後台灣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界—主として中国内地系学者の動きについて—〉，《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年），頁9。

<sup>24</sup>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47年5月17日），頁16。

<sup>25</sup> 《許壽裳日記》，頁401。

<sup>26</sup> 李何林，《李何林選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52。

1947年6月24日，編譯館改組為編審委員會，由教育廳接管，當時負責移交的編譯館編纂章微穎，曾證言：

移交中，除已印成圖書二十餘種外，計有稿件三百餘萬言，皆編譯初成或尚未完成。<sup>27</sup>

隔日6月25日，館長許壽裳在日記上寫下：

來台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sup>28</sup>

編譯館從設立（1946年8月7日）到撤廢（1947年5月16日），為期不到一年，其主要的成果是刊行二十餘種的圖書與編寫教材，以及完成了三百萬餘字未完成的稿件，此成果也包括了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關於臺灣研究組的部分，詳見下一章的討論。

#### 四、許壽裳與臺灣文化協進會

##### （一）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立與目的

臺灣文化協進會（以下簡稱協進會）是在1946年6月16日，於臺北成立的文化團體。其成立宗旨是：

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

<sup>27</sup> 章微穎，〈36年（1947年）6月，臺灣省編譯館結束，爰賦短章呈菲翁師座〉，許壽裳家屬提供。

<sup>28</sup> 《許壽裳日記》，頁407。



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sup>29</sup>

在〈成立大會宣言〉裡，它宣稱：

民主的奔流，澎湃著全世界。新的文化的建設，為整個人類的努力的目標。而我臺灣正河山再造，百廢待興。當此瞬間，舉本省的文化界的人員，首次結集，我們感覺的無限的興奮，感慨和責任過去的歷史，鼓勵我們新的決意，現在的事實，提示我們新的方案。我們忘卻我們的菲陋和綿力。建設民主的臺灣新文化！建設科學的新臺灣！肅清日寇時代的文化的遺毒！三民主義文化萬歲！<sup>30</sup>

從其成立宗旨及成立宣言，可以了解其成立目的，是鑑於臺灣和中國五十年的隔離，造成文化和語言的隔閡，故結集臺灣文化界人士，致力剷除日本文化的影響，建設民主的臺灣新文化和科學的新臺灣。協進會於同年9月15日，創刊了機關刊物《臺灣文化》，<sup>31</sup>並展開一連串的音樂、美術、文學、中國語等運動。

從協進會的組織名單來看，可以得知它是一個半官方的組織，甚至可說是長官公署的外圍團體。協進會重要成員中，有三位是原臺灣調查委員會的關係者（臺灣文化協進會組織名單見表五）。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協進會的成立與編譯館的設置，都是作為自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以來，到長官公署時代，所構思的執行臺灣文化重建政策中的一環。

<sup>29</sup> 〈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1卷1期（1946年9月），頁28。

<sup>30</sup> 〈臺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宣言〉，同上，頁28。

<sup>31</sup> 《臺灣文化》截至1950年12月停刊為止，共發行了6卷27期，計26冊。

表五：臺灣文化協進會組織名單

職務	姓名	官職	其他
理事長	游彌堅	臺北市長	原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
常務理事	吳克剛	臺灣省立圖書館館長	臺灣大學教授
	陳兼善	臺灣省博物館館長	
	林呈祿		東方出版社社長
	黃啟瑞	臺北市教育局長	
	林獻堂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理事	林茂生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臺灣大學教授
	羅萬俤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范壽康	長官公署教育處長	
	劉克明	臺灣省教育會監事	
	林紫貴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兼宣傳處長
	邵冲霄	行政長官公署參議	
	楊雲萍	行政長官公署參議	兼協進會編輯組主任
	陳逸松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陳紹馨		臺灣大學教授兼協進會研究組主任
	徐春卿	臺北市參議會參議員	
	林忠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原臺灣調查委員會專員
	連震東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長	
	許乃昌		兼協進會總幹事
	王白淵		兼協進會教育組、服務組主任
	蘇新		兼協進會宣傳組主任
常務監事	李萬居	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兼副議長	原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
	黃純青	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	
	蘇維梁	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	
監事	劉明朝	國民大會代表	
	周延壽	臺北市參議會議長	
	吳春霖	臺北市參議會參議員	
	謝娥	國民大會代表	

資料來源：《臺灣文化》1卷1期（1946年9月）；前揭《臺灣時人誌》；陳鳴鐘、陳興唐，《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

另一方面，協進會的機關刊物《臺灣文化》，執筆者網羅了戰前臺灣頗具聲譽的本土作家，如王白淵、吳新榮、楊守愚、劉捷、呂赫若、廖漢臣、黃得時等。此外，也可以經常看到當時來臺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如許壽裳、臺靜農、李何林、李霽野、雷石榆、黎烈文、黃榮燦、袁珂（即袁聖時）等。可以感覺出是一本溝通意識、交流意識非常強烈的雜誌。

而事實上，《臺灣文化》刊登的作品，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還是較為偏多，特別是有關中國新文學的介紹。臺灣本地作家作品較少的原因，最主要還是未能以熟練的中文表達，創作有限。此外，《臺灣文化》還闢有「文化動態」欄，專門報導中國新文學作家，如茅盾、田漢、郭沫若、胡風、歐陽予倩等人的一舉一動。而且《臺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還是「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因此，從整體看來，它的關心還是偏重在中國新文學。以致於當時有讀者批評：「《臺灣文化》，每找不到臺灣文化。」<sup>32</sup>但是，從上述諸點，可以了解協進會認為臺灣文化的重建，必須吸收中國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故在《臺灣文化》大量介紹中國新文學。

## （二）許壽裳與協進會的關係

如前所述，編譯館和協進會可說是當時長官公署構思的臺灣文化重建的兩大支柱。二者之間，關係非常密切，例如當時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同時也兼任協進會理事、編輯組主任，有

<sup>32</sup> 〈編後記〉，《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頁28。

一段時間負責編輯《臺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臺灣歷史講座」也邀請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楊雲萍與國分直一當主講人，《臺灣文化》主要執筆群除了許壽裳以外，還有謝似顏、楊乃藩、繆天華、李何林、李霽野、袁聖時等人，他們皆是編譯館的同仁。

前面提及協進會認為臺灣文化的重建，需吸收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因此，必然會想到借重許壽裳。例如，協進會就曾委請許壽裳策劃「中國現代文學講座」的文學活動，許壽裳邀請李何林、臺靜農、李霽野、雷石榆等人擔任講師，講題各為「中國新文學發展概略」、「新舊文學之演變」、「西洋文學之介紹」、「詩歌」。臺靜農、李霽野是昔日魯迅創立之文學團體「未名社」的成員，李何林與「未名社」成員也過從甚密，雷石榆曾是「左聯東京支部」重要成員。來臺後，他們自然而然會在許壽裳的號召之下凝聚一起，致力於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傳播。

從《臺灣文化》不時強調「本誌受到許壽裳先生的特別的好意與指導」、<sup>33</sup>「許壽裳是我們青年的導師」，<sup>34</sup>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遇害後，同年5月，《臺灣文化》還特別出版了「悼念許壽裳先生」專號（三卷四期）。在〈編後記〉中也表明「本誌的追悼許先生，不是因為小誌曾荷先生的特別的愛護，和好意，我們深知先生的逝去，是我國文化界的重大損失，尤其是本省的文化、學術，正期待先生的指導、幫忙，和栽植。」<sup>35</sup>可見許壽裳在當時不只是

<sup>33</sup> 楊雲萍，〈近事雜記〉（十三），《臺灣文化》3卷3期（1948年4月），頁23。

<sup>34</sup> 〈編後記〉，《臺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3。

<sup>35</sup> 〈編後記〉，《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頁28。

協進會與《臺灣文化》的精神支柱，同時對臺灣文化界而言更是巨大的存在。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對協進會的存續也造成很大影響。事件中，協進會主幹之一的林茂生、徐春卿遇害，宣傳組主任蘇新逃亡中國大陸。《臺灣文化》的主要臺灣本土作家也有多人遇難，例如，作家吳新榮、協進會教育組兼服務組主任王白淵被捕坐牢。以許壽裳為中心的來臺大陸作家也同樣陷入困境，許壽裳於事件隔年遇害於臺大教員宿舍，李何林、李霽野、雷石榆則相繼被迫離臺，黃榮燦隨即於1950年代初開始的「白色恐怖」中，被捕而死於獄中，呂赫若亦在白色恐怖期間不幸於山中遇難。之後，隨著中國大陸作家的離臺，協進會的各项文化活動也幾乎停頓，失去了當初成立時的志向與熱情。

## 五、許壽裳與臺灣的魯迅傳播

### （一）許壽裳的魯迅研究

如前所述，許壽裳與魯迅同是浙江紹興人。二人自1902年，日本留學時代以來，到1936年魯迅逝世為止，一直維持著深厚的感情。許壽裳曾回憶：

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東京訂交的時候，便有縞帶紵衣之情，彼此互相關懷不異於骨肉。<sup>36</sup>

<sup>36</sup> 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頁1。

魯迅逝世後，基於對好友的深切懷念，許壽裳才開始正式研究魯迅。這種真摯友情，成了許壽裳研究魯迅的動力。<sup>37</sup> 許壽裳所掌握的材料，既豐富，且可信。正如許廣平所說，許壽裳與魯迅「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sup>38</sup> 因此，他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所以，許壽裳有關魯迅研究的著述，成為魯迅研究的重要基本文獻，常為研究者重視、引用。

許壽裳有關魯迅研究的著述，結集成書出版的有《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及遺著《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

上述三書，只有《亡友魯迅印象記》是完整的著述，其餘二書則是將散見各處的文章，整理結集成書的。《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寫作是許壽裳來臺之前即開始進行，而完成是在他來臺灣以後的事情。此外《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與《我所認識的魯迅》所收錄的文章，將近有一半也是他來臺灣之後才寫成的作品。《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其中有六篇文章，重複收錄在《我所認識的魯迅》裡。

以下將許壽裳在臺時期的重要著作、講演活動列表於下：

---

<sup>37</sup> 周蕙秀，〈談許壽裳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8月號，頁53。

<sup>38</sup> 許廣平，〈《亡友魯迅印象記》讀後記〉，收於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3。

表六：許壽裳臺灣時期著作及講演活動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946	6.25	抵達臺北。
	8	撰〈臺灣省編譯館的設立〉，刊載於《現代週刊》2卷11期（1946年9月3日）。
	8.23	撰〈孔子的生平事略及其學說〉，刊載於《現代週刊》2卷12期（1946年9月10日）。
	9.5	在臺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演講〈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刊載於《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2卷4期（1946年10月）。
	9.12	撰〈俞曲園先生的教育功績〉。
	9.23	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演講〈第二誕生期和第三誕生期〉，《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8、9章。
	9.26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0章。
	9.30	撰〈魯迅的精神〉，刊載於《臺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
	10	撰〈魯迅的德行〉，刊載於上海《僑聲報》（1946年10月14日）、臺中《和平日報》（1946年10月21日）。
	10.6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1、12章。
	10.14	撰〈魯迅和青年〉，刊載於臺灣《和平日報》（1946年10月19日）。
	10.15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3、14章。
	10.19	撰〈臺灣省編譯事業的拓荒工作〉，刊載於《臺灣月刊》3、4期合刊（1947年1月）。
	10.29	撰〈魯迅的人格和思想〉，刊載於《臺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
	10.31	撰〈新臺灣與三民主義的教育〉。
11.25	撰《亡友魯迅印象記》。	
11.26	撰《亡友魯迅印象記》。	
11.30	在省立師範學院演講〈魯迅的人格及其思想〉。	
1947	1.2	撰〈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刊載於《中等教育研究》創刊號（1947年4月）。
	1.15	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兩位成功的開國元勳〉，刊載於《文化交流》一輯（1947年1月）。
	2.13	撰〈摹擬與創作〉，刊載於《臺灣文化》2卷7期（1947年10月）。
	2.18	在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
	2.19	撰〈第二誕生期和第三誕生期——告臺灣省青年〉。
	3.16	撰〈祭大嫂范夫人文〉。

1947	3.22	《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脫稿，臺北臺灣書店出版（1947年4月）。
	3.26	題臺靜農藏〈魯迅講演稿手跡——娜拉走後怎樣〉。
	4.1	撰〈光復文庫編印的旨趣〉、《臺灣學報》發刊詞。
	4.30	撰〈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刊載於《新生報》（1947年5月4日）。
	5.4	為《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作序，《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由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1947年6月）。
	5.26	《亡友魯迅印象記》脫稿，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1947年10月）。
	6.3	為臺灣大學所編之《敦煌秘藉留真新編》作序，收於《臺灣文化》2卷6期（1947年9月）。
	6.5	撰〈俞曲園先生的思想〉，刊載於《臺灣文化》2卷4期（1947年7月）。
	7.28	撰〈魯迅的避難生活〉，刊載於《時與文》2卷6期（1947年10月）。
	8.1	撰〈中國民族精神的中心〉，刊載於臺灣《和平日報》（1947年8月3日）；〈魯迅和我的交誼〉，刊載於《臺灣文化》2卷5期（1947年8月）。
	8.22	〈讀了《敦煌秘藉留真新編》之後〉，刊載於《學藝雜誌》17卷9號。
	9.30	撰〈魯迅的遊戲文章〉，刊載於《臺灣文化》2卷8期（1947年11月）。
	12.5	在臺北市外勤記者進修會演講〈中國新文藝創造者魯迅〉，徐子記錄，題為〈許壽裳話魯迅〉，刊載於《中華日報》〈中華週報〉20號（1947年12月8日）。
	12.13	撰〈王通和韓愈〉，刊載於《臺灣文化》3卷1期（1948年1月）。
12.20	撰〈新年展望和（臺灣大學）校歌歌詞〉，刊載於《國立臺灣大學校刊》7期（1948年1月）。	
12.21	〈對於本省今後語文教育的一點意見〉刊載於新生報、撰〈三百年前臺灣破荒的偉人沈光文〉。	
1948	1.16	〈研究國學應走的途徑〉，刊載於《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8期。
	1.21	〈敦煌秘藉留真新編研究——尚書盤庚，微子二編〉脫稿。
	1.29	撰〈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刊載於《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

資料來源：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黃英哲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22（北京：中國文聯，1989年）；許壽裳未出版著作。



從許壽裳臺灣時期的著作及講演活動中，得知許壽裳在臺期間，五回的演講中有兩回是關於魯迅，三十七篇的著作中有十六篇是關於魯迅，因此魯迅的研究及其思想的傳播介紹，可以說是許壽裳在臺演講與著作活動的重心。許壽裳在臺灣如此地積極講演魯迅、書寫魯迅，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與臺灣文化重建的構想有密切關係。

許壽裳關於臺灣文化重建的構想，在其〈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可看出端倪。

誰都知道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千年來的封建遺毒，創造一個提倡民主，發揚科學的文化運動，可說是我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劃時代、開新紀元的時期。雖則牠的目標，至今還沒有完全達到，可是我國的新生命從此誕生，新建設從此開始，牠的價值異常重大。我想我們臺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牠的價值和任務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巨，更迫切啊！<sup>39</sup>

因此可以理解許壽裳的臺灣文化重建構想，即是在臺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宣揚民主、科學的五四中國新文化運動精神，注入新的文化內容，重建臺灣文化。

當時行政長官公署也認識到，為了臺灣文化重建，臺灣需要

---

<sup>39</sup> 許壽裳，〈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新生報》（1947年5月4日）。

展開類似「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時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在題為〈如何改進臺灣文化教育〉的電臺廣播詞中，慨嘆「臺灣一向沒有足與世界比美的文化運動，即如五四運動一類的活動從沒有發生過，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更不消說了」。<sup>40</sup>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新生報》之社論〈論本省文化建設〉也指出：

民主與科學，是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來，瀰漫內地的一種新文化精神。……但當這一劃時代的新生精神在內地激蕩，根本改造著古老文化，並發展成為一種以民主與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時，本省正處於日本統治之下，無從與之接觸而起同樣的變化。<sup>41</sup>

戰後初期，在臺灣掀起類似「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進行臺灣的文化重建，此一構想在長官公署內部可說有某種程度的共識，許壽裳的想法可以從當時這種思潮中來理解。但是，許壽裳認為戰後臺灣需要的不只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還要進一步提倡實踐道德，發揚中華民族主義，以建設一個具有新生命、新文化的臺灣。至於如何在臺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許壽裳的構想是傳播魯迅思想，將魯迅思想與臺灣文化重建做有機結合，以魯迅傳播作為臺灣「新的五四運動」之起爆劑。

## （二）許壽裳的魯迅傳播

許壽裳於 1946 年 6 月 25 日抵達臺北，同年的 10 月 19 日恰是

<sup>40</sup> 宋斐如，〈如何改進臺灣文化教育〉，《新生報》（1946 年 1 月 14 日）。

<sup>41</sup> 〈論本省文化建設〉，《新生報》（1946 年 6 月 19 日）。

魯迅逝世十週年忌日，他在《和平日報》發表了〈魯迅和青年〉，這是他抵臺後，發表的第一篇有關魯迅的文章，緊接著又在同月21日的《和平日報》發表〈魯迅的德行〉，在隔月的11月1日發行的《臺灣文化》（1卷2期）「魯迅逝世十周年特輯」上，發表〈魯迅的精神〉。之後，又在隔年1月的《臺灣文化》（2卷1期）發表〈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在上述文章中，許壽裳極力介紹魯迅的思想和精神的根本。例如在〈魯迅的精神〉一文中，對魯迅的精神做了概括性的總結，他說抗戰到底是魯迅畢生的精神、魯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話說，便是戰鬥的精神，這是為大眾而戰，是有計畫的韌戰，一口咬住不放的。<sup>42</sup>在〈魯迅的人格和思想〉一文中，指出魯迅是青年的導師、是民族文化鬥士，他暴露了中國民族性的缺點，揭發了歷史的黑暗，其人格的偉大和聖潔在於其擁有真誠、摯愛、堅貞、勤勞，並強調魯迅的思想本質是人道主義，其方法是戰鬥的現實主義。<sup>43</sup>在〈魯迅的德行〉一文中，則再三闡述魯迅的德行特點是誠愛、勤勞、堅貞、謙虛。<sup>44</sup>此外，在〈魯迅和青年〉一文開頭就說：

魯迅是青年的導師，五四運動的驍將，中國新文藝的開山者。他的豐功偉績，到今日幾乎已經有口皆碑，不必多說了。但是他自己並不承認是青年的導師，正惟其如此，所以為青年們所信服，他的著述為青年們所愛誦。他說導師是無

<sup>42</sup> 許壽裳，〈魯迅的精神〉，《臺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頁2。

<sup>43</sup> 許壽裳，〈魯迅的人格和思想〉，《臺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3。

<sup>44</sup> 許壽裳，〈魯迅的德行〉，《和平日報》（1946年10月21日）。

用的，要青年們自己聯合起來，向前邁進。……他又指示著青年生存的重點，生命的道路，而且主張國民性必須改革。……魯迅常說國民性必須改造，否則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口號雖新，革命必無成功。革命者只有前進，義無反顧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一文中說道：「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國民性可改造於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裡，以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於無物的」。以上這些話，至今還是很適切很需要的。<sup>45</sup>

從上述許壽裳的論述中，可以理解許壽裳來臺後，認為戰後臺灣最需要的是民主、科學、道德實踐、中華民族主義，而這些精神可以集中從魯迅身上學習到。許壽裳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在臺灣掀起「新的五四運動」，而也因為許壽裳的魯迅傳播，帶動了五四新文學中社會主義文藝精神延伸到臺灣，影響了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但是上述的魯迅論述中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訊息，即是許壽裳意圖透過魯迅傳播呼籲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性，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必要，是自魯迅和許壽裳相識於弘文書院之後，二人共同關心的課題，他們再三討論後，得出一個結論，一致認為中華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言之，即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其最大最深的病根是兩次奴於異族，而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sup>46</sup> 中國國民性改造的課題始終是許壽裳的終極關懷，即使到了抗日戰爭勝利後也是一樣，在 1945 年 5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

<sup>45</sup> 許壽裳，〈魯迅和青年〉，《和平日報》（1946 年 10 月 19 日）。

<sup>46</sup> 詳請參考北岡正子，〈もう一つの國民性論議—魯迅・許壽裳の國民性論議への波動—〉，《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10 號（1989 年 3 月）。

件投降時，他曾在8月15日的日記上寫下「厚生能泯貧和富，進德端由愛與誠。」<sup>47</sup>的詩句。對許壽裳而言，掙脫日本異民族統治後的臺灣文化重建和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國民性改造是密切相連的緊急課題。

## 六、結語

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抵臺後，在隔天召開的省務會議上，即決議裁撤編譯館，而許壽裳在5月15日收到臺灣大學送來的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聘書。6月，許壽裳轉任臺大教授兼中文系首任主任，他人生的最後歲月可說是在這裡渡過的。當時臺大中文系的教員有教授許壽裳、魏建功、臺靜農、羅庸（未到），副教授吳守禮、黃得時。<sup>48</sup>爾後，經過許壽裳與時任臺大校長的陸志鴻再三交涉，8月下旬李何林也到中文系任副教授，之後又加入教授喬大壯。許壽裳逝世後，喬大壯短暫續任中文系系主任（1948.3-1948.7），之後由臺靜農主持系務長達二十年（1948.8-1968.7），在臺大中文系的草創時期，許壽裳與臺靜農之間的一脈相傳，我想是不能忽略的。

許壽裳在二戰後臺灣光復初期，臺灣與中國既連續似又斷裂的擺盪年代渡臺，橫亙其前的是一大堆社會、歷史、文化難題。但是他卻沒有抱著高姿態的征服者心態和中華文化沙文主義的優越感，而是實事求是地致力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不管其在編譯館時

---

<sup>47</sup> 《許壽裳日記》，頁303。

<sup>48</sup> 〈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名單〉，《臺大同學會會員名錄》（1947年8月1日），頁27。

代或是短暫的臺灣大學時代，我們都看到他的奮鬥身影，以及緊守著「誠與愛」信念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雅姿態。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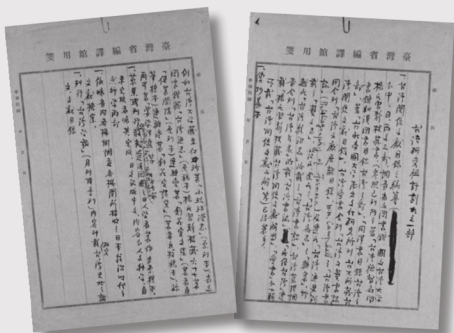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 歷史斷裂中的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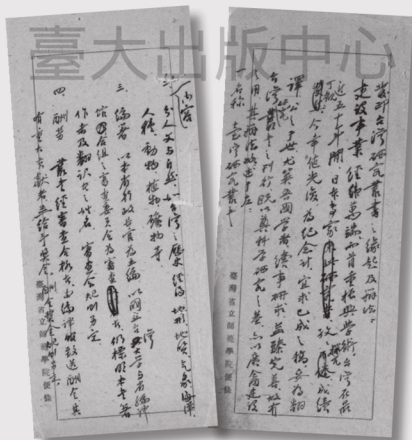
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

臺大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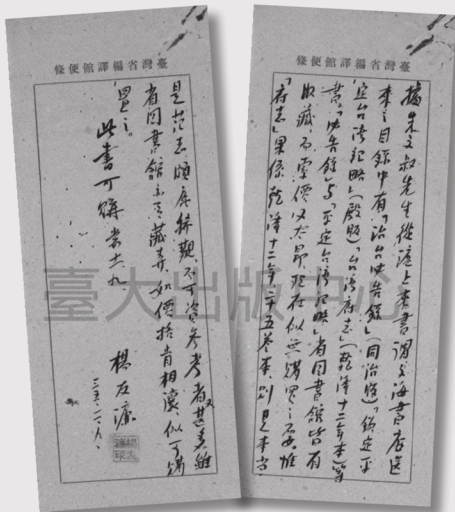




6-1 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工作計劃書。



6-2 許壽裳手書「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



6-3 楊雲萍（楊友濂）手書有關購買臺灣古籍的意見。



## 一、前言

臺灣史學界咸認為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長期受到壓抑，一般的看法是，臺灣研究從戰後一直到 1960 年代時仍未受到重視，直至 1970 年代才開始起步。<sup>1</sup> 因此普遍認為直至 1970 年代為止，臺灣研究命脈是藉由民間團體來傳承，主要是臺灣文化協進會的《臺灣文化》(1946-1950)、《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1948-1955)、臺灣風物社(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臺灣風物》(1950-)以及文獻委員會關係刊物及其作者群的支持，<sup>2</sup> 然而，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草創期間，主要持續臺灣研究的力量真的是民間團體的「臺灣學」嗎？究竟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是如何展開？並且是否曾經被制度化成為一種官方支持的「臺灣學」呢？如果有的話，這種制度化的官方臺灣研究機構之濫觴為何？又是在何種歷史的機緣與脈絡之下登場的呢？

早在 1980 年代，日本學者若林正文即曾指出「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政府之臺灣研究機構的出發點」，<sup>3</sup> 指出了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官方臺灣研究機構的濫觴。本文旨在釐清擔任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之臺灣文化認識與臺灣研究組設置，及以其為核心的戰後初期臺灣的臺灣研究之展開，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角度探討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脈絡。並且進一步追蹤編

<sup>1</sup> 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88。

<sup>2</sup> 同上，頁45-88。若林正文，〈（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Ⅱ」解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號（東京：綠蔭書房，1982年），頁58。

<sup>3</sup> 若林正文，〈（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Ⅱ」解題〉，頁108。

譯館撤廢後，臺灣研究組臺籍成員與日籍成員的去向，釐清戰後臺灣與日本之臺灣研究的開展概況。

## 二、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之設立

### (一) 陳儀的臺灣接收與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構想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重歸中國版圖。日本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強力推行同化政策，將日本文化移植臺灣，並透過各級學校教育將日本國家、國民意識強加灌輸予臺灣青少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同化政策更加變本加厲，日人在臺進一步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中文報紙發行與臺灣民間宗教信仰，在全臺各地設置皇民鍊成所，企圖以軍國主義思想將臺灣人塑造成「皇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部分臺灣人被日本化而認同日本，亦是極其自然之事。<sup>4</sup>因此，對國府而言，接收臺灣後當務之急的課題是如何盡速使臺灣和臺灣人「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

1945年8月29日，國府特任陳儀為戰後臺灣統治機構——長官公署的行政長官，負責接收臺灣。光復後臺灣的接收工作，可以分成政治、經濟、文化三個範圍來思考，當時陳儀政府稱之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心理建設」。所謂的「心理建設」即

<sup>4</sup> 有關臺灣人的日本化，可以參考著名人類學家、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金關丈夫（戰後仍留任在改組後的臺灣大學任教）的觀察。他回憶臺灣剛光復時臺灣大學裡的臺灣學子的心情是：「他們已經體認到自己和日本文化是切割不斷的。雖然誰也沒講開，卻可以感覺得出他們甚至已經把日本當作自己的故鄉。我們當然能夠明瞭他們的心情，但也莫可奈何。」金關丈夫，《孤燈の夢》，頁297。

是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

陳儀在 1945 年的除夕夜，以〈民國 35 年度工作要領〉為題，透過收音機廣播作了以下發言：

明年的工作可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心理建設三大端。其原則依據委員長核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

政治建設在實行民權主義，其要點在使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略）

經濟建設的要旨在增強生產，提高生活。（略）

心理建設在發揚民族精神，而語言、文字與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臺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臺灣同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明年度心理建設工作，我以為要重視文史教育的實行與普及。<sup>5</sup>

至於「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心理建設」的具體作法，陳儀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方針〉報告中，也作了詳細說明。而 1946 年度「心理建設」的具體作法，陳儀在報告中說明道：

心理建設在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意識，此為以前日本所深惡痛嫉，嚴厲防止，而現在十分需要者。其主要工作，第一、各校普設三民主義、國語國文與中華歷史地理等科，加多鐘點。並專設國語推行委員會，普及國語之學習。第二、增設師範學院、師範學校，大量培養師資。第三、各

<sup>5</sup> 〈民國 35 年度工作要領——34 年除夕廣播〉，《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 1 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 年 5 月），頁 41-45。

級學校廣招新生以普及臺胞受教育之機會。第四、對於博物館、圖書館、及工業、農業、林業、醫藥、地質等實驗、研究機構力求充實，以加強研究工作，提高文化。第五、設置編譯館，以編輯臺灣所需要各種書籍，並著重中小學教科書之編輯。<sup>6</sup>

從以上能夠得知，落實光復後臺灣「心理建設」，執行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編譯館的設置是其重要的一環，而編譯館的設置構想，早在1945年3月頒布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第八教育文化的第五十一條已經明確列記，1946年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方針〉報告中，陳儀也正式將編譯館的設立納入其中。編譯館底下設有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和臺灣研究組。其中，學校教材組的任務是編纂適合臺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師範教育的學生中文程度的教科書，以此來推展中國語文教育，並透過教育內容灌輸臺灣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社會讀物組的任務則是編輯大眾讀物「光復文庫」，藉由「光復文庫」的普及來推廣中國語文，此外，藉著「光復文庫」之文化內容，進行中國文化的移植工作。名著編譯組的任務則是翻譯世界名著、名作，其目的是希望透過閱讀這些名著、名作的中文譯本，擴展大學生及研究者的視野，激發其研究心。臺灣研究組的任務在於整理、翻譯並接收日本學者所遺留下來的臺灣研究成果。<sup>7</sup>關於編譯館的籌設構想，陳儀邀請同鄉好

<sup>6</sup> 《中華民國36年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計劃》（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年4月），頁4。

<sup>7</sup> 關於陳儀之臺灣文化重建政策及其執行機構，詳見黃英哲，《「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

友許壽裳來臺主其事，期待同鄉好友與自己一起投入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

## （二）許壽裳的赴臺及其臺灣研究構想

1946年5月1日，臺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從臺灣打電報到南京給時任國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的許壽裳：「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復。」<sup>8</sup>希望許壽裳能接掌編譯館。

許壽裳從5月1日接獲陳儀電報，經一番考慮後決定接任主掌編譯館的工作，到6月25日抵臺為止，從其日記中得知他做了一些準備。5月28日的日記記下「信百川，託查示國立編譯館組織及工作」，<sup>9</sup>6月16日的日記記下「得國立編譯館鄭康寧信坵組織條例及工作概況」，<sup>10</sup>6月20日的日記記下「得柏如寄來公務人員行為要領、婦女課本、戰時民眾訓練教材三種」。<sup>11</sup>赴臺之前，許壽裳即參考國立編譯館的組織與工作，構思編譯館的組織與工作內容，許壽裳遺留的編譯館關係原始資料中，有一件標題為「（編譯館）經費及人事」的文件，該文件是寫在「上海合資會社祥昌洋行」信紙的背面，推測是在上海等飛機飛臺前寫下的文件，該文件中關於編譯館的工作具體內容列了六項「一、小學教科書，二、中學教

<sup>8</sup> 〈陳儀致許壽裳電報〉，1946年5月1日。收於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5。

<sup>9</sup>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頁350。

<sup>10</sup> 同上，頁353。

<sup>11</sup> 同上，頁354。



科書……，三、中學教師參考用書……，四、字典……，五、推行政令及訓練公民之書本……，六、專門書之譯著，蒐羅臺灣現有之特殊研究及資料（如語文、史地、政治經濟、教育、自然科學、農業、工業等）或加整理綜合，或就原著翻譯。此類書籍之編纂，不獨可供臺灣施政之參考，且必為一般學術界所需要。」<sup>12</sup>可見許壽裳在抵臺之前，已有在編譯館開展臺灣研究的構想。6月25日，許壽裳抵臺，7月2日《工商日報》報導了許壽裳抵臺將任編譯館館長的消息，報導中謂許壽裳對中央社記者稱該館工作擬以下列五種為中心，即①編製中小學國語歷史教科書，②編製中小學教師參考書，③編製一般讀物，④編製字典，⑤選擇世界名著。此外並擬與臺大合作，從事臺灣與其資源之研究。<sup>13</sup>

7月3日，許壽裳將編譯館組織大綱及預算呈給陳儀，次日即得陳儀已交付審查的回覆。此時許壽裳提交的〈臺灣省編譯館組織大綱草案〉中，提出編譯館要設置教材、叢書、譯著、臺灣研究、南洋研究五組，及資料、辦公二室。<sup>14</sup>8月2日，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編譯館組織規程〉，確定編譯館內設置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和臺灣研究組，以及資料室、祕書室。<sup>15</sup>8月7日，編譯館公印確定，編譯館正式成立，臺灣研究也正式列為編譯館的工作重點。

<sup>12</sup> 《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19-21。

<sup>13</sup> 〈許壽裳來臺將任編譯館長〉，《工商日報》第2版（1946年7月2日），收於《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29。

<sup>14</sup>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大綱草案〉，《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30-33。

<sup>15</sup>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規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秋字（民國35年8月2日），頁499-564。

### 三、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成果

#### (一) 許壽裳的臺灣文化認識

編譯館在成立後第三天的8月10日，館長許壽裳在記者會上，針對編譯館的主要工作做了以下說明。

本館設立的要旨不外兩點：第一、促進臺胞的心理建設，臺灣教育，向稱普及，一般同胞大抵至少受過六年或八年的教育，這種情形在各省是少見的。可是臺胞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對於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本館的使命，就要供應這種需要的讀物。

第二、對於全國有協進文化、示範研究的責任。臺灣的學術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以有為各省模範的資格。

(略)過去本省在日本統治下的軍閥侵略主義，當然應該根絕，可是純粹學術性的研究，卻也不能抹殺其價值，我們應該接收下來，加以發揚光大。如果把過去數十年間日本專門學者從事臺灣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譯和整理，編成一套臺灣研究叢書，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

根據上述這兩項旨趣，本館的工作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臺灣研究四組。前兩組是實現第一項旨趣的，後兩組是實現第二項旨趣。1. 學校教材組，為供應各級學校之教材。2. 社會讀物組，編撰主旨則於國民發展。(略)3. 名著編譯組，(略)就本省環境說此組，最初之工作，應特別注重(一)民主教養讀物。(二)民生教養讀物。(三)

科學技術修養讀物。(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史實。(五)最近將來國際情勢之演變等。4. 臺灣研究組，現在吾等之計畫則(一)臺灣文獻目錄編纂。(二)善本書之印行。(三)搜集並刊印日本專家之名作。(四)調查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加以整理研究。(五)刊行臺灣學報發表研究作品等。<sup>16</sup>

值得注意的是，許壽裳在記者會上的公開發言中並未否定日本所遺留下的學術文化，同年9月15日，在一場對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學員的講話〈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中，他更進一步公開表示：

臺灣在文化上至少有兩種特點，這是各省所沒有，同時也可為各省作模範的：

一、有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臺灣農業發達，教育普及，工業也有基礎，民生主義容易實現。實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良好基礎。這是臺灣文化的第一點特色。

二、是豐富的學術研究：……臺灣有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是日人的示範作用，也可說是日人的功績。日本雖然是侵略國家，但他們的學術我們需要保留，需要全國學者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作為我們建國之用。日人對臺灣的研究很多，他們的著作也很豐富。已經出版的不說，原稿已寫好未出版的還不少，因為不久有一部分日本學者將遣送回國，希望能拿出來，我們把它翻譯校訂付印貢獻給社會，還有材

<sup>16</sup> 《民報》第2版（1946年8月11日）。

料已找好，但尚未寫出的，也希望能寫出來。他們對臺灣的研究如：地形、植物、氣象、礦產以及人文各科等等都有分門別類的研究，很有成績，如植物一門，就有三十多種書籍，關於動物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過去發生「鼠疫」即有跳蚤、老鼠等研究專書出版。這不但是我國各省所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很少有。這種寶貴的材料，我們不能不注意而忽略。而且要好好保持，繼續發展。這是我國學術的光彩，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也是臺灣文化的第二點特色。<sup>17</sup>

從許壽裳的談話可知其臺灣文化認識，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目的，即是為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加以整理編譯，使其成為此後發展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有用材料。換言之，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之中文化與資料化以挪用，而此構想在抵臺前即已萌芽。許壽裳自抵臺後，即積極地處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成果，其7月11日的日記即記下「晚至現代周刊社談，與達夫（陳兼善，時任臺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博物館館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剛，時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圖書館館長）、廷英（馬廷英，時任臺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談台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sup>18</sup> 7月24日之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康，

<sup>17</sup> 許壽裳，〈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2卷4期（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1946年10月），頁244-245。

<sup>18</sup> 《許壽裳日記》，頁359。

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台灣關係誌料小解》。<sup>19</sup>戰後初期，來臺從事接收工作的中國官僚，如陳儀、長官公署處長范壽康、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等人大都是具有日本留學經驗的「知日派」，在從事接收工作與臺灣文化重建時，也將日本的學術文化之接收納入視野。長官公署在接收臺灣後，1945年11月3日，隨即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徵用日本技術人員與學術研究人員。<sup>20</sup>此日本學術研究人員的徵用，可以說是為了方便接收日本的學術文化而採行的政策。

關於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意義，在留用日人這方，也有清楚的認知。曾被編譯館徵用為編審，在臺灣研究組工作的著名臺灣史前史、考古學者國分直一（1908-2005），於1949年返回日本後，隔年春天即在《東洋史研究》上發表〈戰後臺灣之史學民族學界〉一文，文中指出「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有其應當給予注目的意義，它是以日本文化的接收和強化翻譯陣容為目標，意圖某種程度完成日本時代未竟的研究，將其成果提供予學界。」<sup>21</sup>國分同時又指出，中國接收臺灣後設立的編譯館，其業務不僅僅是如日本時代文教局編譯課所進行的教育關係讀物之編輯工作，還有以

---

<sup>19</sup> 同上，頁361。

<sup>20</sup> 詳細請參考湯照勇，〈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臺籍、羅致外省籍及徵用日人（1945.10-194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卷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1991年）。

<sup>21</sup> 國分直一，〈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主として中国内地学者の動きについて—〉，《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年），頁4。

廣大民眾之教化為目的，編譯、翻譯介紹外國名著，其中尤以臺灣研究為其主要工作，規模是相當大的。館長許壽裳東京高師出身，是一位非常誠實樸素的老學者。<sup>22</sup>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作為「知日派」一員的許壽裳，其對臺灣文化與日本學術文化的認識並不持否定態度。

## （二）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

許壽裳邀請了時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楊雲萍擔任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sup>23</sup> 楊雲萍（1905-2000），出身臺北士林的富裕家庭，1921年入學臺北第一中學校，在學中，創刊文學雜誌《人人》，之後前往東京留學，1928年畢業於日本大學文學部預科，

臺大出版中心

<sup>22</sup> 同上，頁3。

<sup>23</sup> 楊雲萍任職編譯館的經過，從許壽裳日記可具體得知，許壽裳是在7月9日先與洪炎秋見面（《許壽裳日記》，頁358），7月25日同洪炎秋（臺灣出身，時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連震東（臺灣出身，時任臺灣省參議會秘書長）一起和楊雲萍會面（《許壽裳日記》，頁361），楊雲萍隨後即擔任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在稍後的回憶中也提及出任經過：「臺灣光復，游彌堅先生（時任臺北市長）設立臺灣文化協進會，創刊《臺灣文化》月刊，《內外要聞》旬刊，由我主編。協進會辦公的地方，在市中山堂三樓。有一天，洪炎秋先生突然來訪，說許壽裳季蕻先生要和我見面，……我們一見如舊，……他詳細說明編譯館的目的，規模以及人員的待遇。……他說在北京時，已經看過我的中日文著作。要我參加編譯館，看到我的名片，知道我是長官公署參議，又說可以兼任。對於他老先生的熱情和誠懇，我立即答應。」〈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卷4期（1981年10月）。楊氏在戰後，立即於《民報》（1945年10月14日至16日）發表〈文獻的接收〉（上）（中）（下）一文，呼籲國府接收臺灣時，除了物資、器材、建築、設備以外，對於圖書、檔案等文獻，更當要有十二萬分的考慮。楊氏特別呼籲要注意接收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臺北帝國大學的檔案文獻、圖書，據聞他被聘為長官公署參議與發表此文有關，而許壽裳所以會邀請楊氏擔任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則和洪炎秋、連震東的引薦大有關係。

1931年畢業於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在文化學院的在學期間，他受教於名小說家、評論家菊池寬、小林秀雄、川端康成等人。返臺後，活躍於臺灣文化界，發表多篇與臺灣文學、臺灣歷史相關的文章。

臺灣研究組的具體工作內容是什麼呢？根據〈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劃〉，臺灣研究組的工作計劃列出如下：

1. 編印臺灣文獻目錄。
2. 編行臺灣研究叢書，內容分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民俗、宗教、農業、工業、動物、植物、氣象、地質、醫學各項。
3. 翻印臺灣昔時文獻。
4. 臺灣先史時代遺跡之發掘與研究。
5. 臺灣民俗研究。
6. 臺灣高山族語言研究。
7. 出版臺灣學報。
8. 編著臺灣地理。
9. 編著臺灣史。
10. 調查本省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
11. 編行臺灣經濟年鑑。
12. 其他。<sup>24</sup>

從上述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看來，除了臺灣研究資

---

<sup>24</sup> 見〈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劃〉，《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158-159。

料的調查復刻之外，其研究範圍更包括了今天所謂的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學門，可以說是跨領域的「臺灣研究」，是全方位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臺灣學」研究。臺灣研究組自成立以後，立即積極展開工作，而其具體的工作內容，當時的報紙也都予以報導，例如 1946 年 9 月 7 日，《人民導報》報導編譯館計劃將臺灣省圖書館中所藏之《臺灣通志》稿本加以校訂後出版；<sup>25</sup> 1946 年 12 月 6 日，《民報》報導編譯館臺灣研究組赴新竹縣苑裡及後龍底兩處挖掘先史遺跡。<sup>26</sup> 1947 年 5 月，以時任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馬廷英為團長的「蘭島（蘭嶼）科學調查團」，組織了臺大醫學院、理學院、農學院、文學院，以及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氣象局等單位的學者專家赴蘭嶼作調查時，編譯館也派國分直一作為調查團的一員，參與蘭嶼調查工作。<sup>27</sup>

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可說非常繁多，理想目標也很崇高。其成員主要由哪些人組成呢？根據 1946 年 12 月長官公署編印的《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其中所列的人員有編纂楊雲萍、鄭桓、淺井惠倫（1895-1969），編審梁嘉彬、張常惺、國分直一，幹事池田敏雄、廉新生、張樑標、賴子清。<sup>28</sup> 從上述名單中，可得知臺灣研究組一開始從其他機關爭取

<sup>25</sup> 詳見報導〈編譯館校印 臺灣通志〉，《人民導報》（1946 年 9 月 7 日）。

<sup>26</sup> 詳見報導〈挖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1946 年 12 月 6 日）。

<sup>27</sup> 國分直一，〈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查〉，《臺灣考古民族誌》，頁 336-355。

<sup>28</sup>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



的留用日本人員有國分直一、池田敏雄和淺井惠倫。此外，「二二八事件」後，大部分的留用日本人員多被遣送回國，在被遣送前夕，根據《台灣引揚·留用記錄》中所收入的文件〈日僑留用實況調查報告 臺灣省編譯館員日僑一同〉（1947年3月31日），列出當時臺灣研究組任用之留用日本人名單及工作職稱，名單上除了國分直一、池田敏雄、淺井惠倫之外，還有編纂素木得一、編審樋口末廣、編輯立石鐵臣、助理幹事竹下萬吉、竹下律子、助理員片瀨弘。這些留用人員戰前的專長與其在臺灣研究所擔任的工作如下：南洋言語及臺灣原住民語專家，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擔任人文科學方面之研究工作，特別是平埔族的語言研究；考古學、臺灣史前史專家，前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擔任臺灣史前史的研究，發掘採取臺灣史前時代的遺跡；臺灣的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擔任臺灣本地人的民俗資料和舊慣資料的分類整理；另外，臺灣的昆蟲專家，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素木得一，擔任熱帶、亞熱帶資源及昆蟲相關文獻目錄之編纂和自然科學方面之研究工作；標本製作版畫家立石鐵臣，擔任史前時代資料的圖版製作與裝訂編輯；前南方資料館司書（圖書管理員）樋口末廣擔任世界各處刊行中的臺灣關係文獻之綜合目錄的編纂；此外，又從臺灣省圖書館調來該館留用之日籍人員竹下萬吉、竹下律子，擔任素木得一的助理。<sup>29</sup> 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所任用之留用日本人，除了學者專家外，也有圖書館專門人才，楊雲萍的意圖相當明確，他認為日本人遺留下來的研究成果固然要接收，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圖書文獻資料更要接收。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頁108-109。

<sup>29</sup> 《台灣引揚·留用記錄》第9卷，頁78-94。

關於臺灣研究組留用的日本人人選，有部分人選是由楊雲萍推薦的，據其回憶：

編譯館留用三位日人，都由我推薦，而由許館長決定的。一位是臺北帝國大學的淺井惠倫教授。他是語言學者，多年來研究臺灣和南洋原住民的語言。一位是國分直一先生，研究臺灣先史學。一位是立石鐵臣先生，畫家。這些日人的「專門」，相當「特殊」，可是壽裳先生都決定留用。<sup>30</sup>

從楊雲萍的證言可以得知臺灣研究組的日本人成員，至少有三位是由楊雲萍推薦的。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研究組的主任楊雲萍及日本人的國分直一、淺井惠倫、池田敏雄、立石鐵臣都是戰前《民俗臺灣》雜誌的同仁，在戰爭末期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臺灣的抗日運動又遭壓制，臺灣人的言論機關幾乎全被收編的情形下，臺灣知識分子依附在一批較能理解臺灣的日本學者、文化人之下，以日本人名義發行《民俗臺灣》，研究、記錄臺灣的風俗習慣。戰後，在國府推行臺灣文化重建政策下，加上擔任館長的許壽裳對於日本學術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以及楊雲萍的號召、規劃，因而再度集合了這批對臺灣有充分研究的日本學者、文化人，並將他們納入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由中、臺、日三地的有識之士與學者共同為整理保存戰前的臺灣研究而努力。<sup>31</sup> 在這個過渡期中，也呈現了一種戰前戰後臺灣研究的人與知識生產的連續性。

<sup>30</sup>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頁 29。

<sup>31</sup> 詳細請參考松永正義，〈《許壽裳日記》をめぐる〉，《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通信》34 號（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4 年 3 月）。

### （三）臺灣省編譯館的廢止與臺灣研究組的成果

1947年，臺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事件後，同年4月22日，國府行政院會議通過撤廢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以魏道明為主席。同年5月11日，陳儀離臺。

國府決議撤廢長官公署時的同月24日，許壽裳即向陳儀提出辭呈，陳儀不受。5月15日，魏道明抵臺後，在翌日召開的省務會議上，即決議裁撤編譯館，距其成立，不到十個月。

關於編譯館被撤廢的原因，當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李何林指稱這是魏道明從南京帶來的CC派之指令，因為許壽裳經常批評CC派主導的法西斯教育政策。<sup>32</sup>

另一說法，編譯館的設立可說完全出自陳儀的構想，「人存政存，人亡政亡」，陳儀的被撤職，相對地也可說註定了編譯館被裁撤的命運。況且，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後，在行政組織上，又作了新的調整。例如，統計室、會計處改組為主計處，宣傳委員會改組為新聞處，而編譯館則改組為編審委員會，納入教育廳管轄。<sup>33</sup>因此，可知陳儀的離職與長官公署的改組，才是編譯館被撤廢的主要原因。

編譯館從設立（1946年8月7日）到撤廢（1947年5月16日），為期不到一年，其主要的成果是刊行二十餘種的圖書與編寫教材，以及完成了三百萬餘字未完成的稿件，此成果也包括了臺灣研究組

<sup>32</sup> 李何林，《李何林選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52。

<sup>33</sup> 《民國四十一年臺灣年鑑》（臺北：公論報社，1954年12月），頁16-18。

的工作成果。究竟臺灣研究組的具體成果為何？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1月18日編譯館編的工作概況中，關於臺灣研究組的研究概況表列如下：

表七：臺灣研究組編譯鈔校書目

書名	內容	編譯者	字數	完成時期
《琉球亡國實錄》	原書名《琉球見聞錄》，一名《廢藩事件》，係琉球舊藩士喜舍場朝賢所著，於琉球滅亡史實記載甚詳。	梁嘉彬	3萬	1947年1月
《過去日人在臺灣之科學活動及成績》	就生物、醫學、農學、工礦、地質等各部門敘述過去日人在臺之著作、發明及建設。	張常惺	5萬	1946年12月
《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	臺灣全志向無索引，編此以便稽考。	賴子清	4萬	
《瘧疾特論》	瘧疾在臺灣醫界十分重要，本書係臺大醫學院教授森下薰所著，立論精闢，原文約九萬字。	廉新生	9萬	
《臺灣昆蟲誌》	以世界所產昆蟲約四十萬之分類為基礎，關於各目各科的特徵、對於臺灣產的昆蟲，每屬記一種藉以說明全體。	素木得一		
《高山族語言集成》	上篇內容為平埔蕃語： ① Suiraya 祭歌、② 校訂荷蘭 Utrecht 大學所藏新港語字典稿本、③ 已告死滅之平埔蕃語殘存資料、④ Kabaran 語之語彙及語法、⑤ Pazeh 語之語彙及語法。  下篇內容為高山蕃語：① 各方言之語法、② 比較語言學的研究。	淺井惠倫 孫建中		上篇：1947年3月 下篇：1947年10月

《臺灣先史時代之研究》	實地調查臺灣先史時代之遺跡、採集資料，研究其文化及考究其系統。	國分直一	15萬	1947年10月
《臺北盆地之農家》		國分直一 張樑標		
《臺灣民俗研究》	記福建系臺灣人的個人生活上的諸種儀式，分產育、成年、婚姻、葬禮四部。	池田敏雄 張樑標		
《臺灣通志》	原書為清代蔣師徹、薛紹元等編纂，全四十卷，編纂之時值臺省淪陷，此書尚未完成，原稿藏省圖書館，由本館借鈔一遍並加校勘及標點符號。			
《小琉球漫誌》	原書為清代朱仕玠（筠園）所著，凡十卷，記本省風物，詩文俱佳，存者極少，本館向臺大圖書館借鈔，已加標校。			
《使署閒情》	原書為清代六十七（居魯）所輯，計四卷，搜集本省藝文甚眾，多為方志所未載，經本館向楊氏習靜齋借鈔。			

表八：《臺灣學報》第一期篇目

書名	內容	編譯者	字數	完成時期
《臺灣書志考》	為臺省經籍考之一部，仿朱氏經義考、謝氏晚明史籍考之例，於本省典籍目錄加以考證，以為臺灣研究之助。	楊雲萍	3萬	1946年12月

《明末旅日華僑甲必丹李旦與鄭芝龍》	原書係臺大教授岩生成一之論文，對於近世初期臺灣史之貢獻極大。	岩生成一 鄭桓	3 萬	1946 年 12 月
《射人》		金關丈夫 張樑標		
《後龍底及苑裡先史遺跡發掘預報》		國分直一		
《通論澳門琉球在歷史上條約上的地位》		梁嘉彬		
《臺灣先史時代鞋形石器攷》		國分直一 張樑標		
《鼠族驅逐論》		青木文一郎 張樑標		
《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		池田敏雄 張樑標		
《體育之起源演進及今後趨勢》		謝似顏		
《Utrecht 大學所藏臺灣平埔蕃語彙》		淺井惠倫 孫建中		

資料來源：〈臺灣省編譯館工作概況 民國 36 年 1 月 18 日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 280-284，收於《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頁 K89-K91。

從以上列表可以清楚了解當時臺灣研究組的具體工作內容，除了挖掘先史遺跡、編譯鈔校臺灣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外，還準備出版學術刊物《臺灣學報》。編譯者中不乏傑出學者，其中淺井惠倫為前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言語學講座教授，岩生成一為南洋史教授，金關丈夫為醫學部解剖學教授，素木得一為昆蟲學、養蠶學講座教授，並與青木文一郎先後擔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長。張樑標為臺北帝大史學科畢業文學士，為日治時代史學科出身臺籍二人之一（另一為柯設借）。除了發行《臺灣學報》之外，還計劃編行「臺灣研究叢書」，〈臺灣學報發刊辭〉與〈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且都已寫就。在〈臺灣學報發刊辭〉上，許壽裳指出：

本館職在編譯，為研究臺灣，發揚學術計，刊行這「臺灣學報」。

在日本統治臺灣時代，曾有許多學者作臺灣學術上的研究，成書頗多，可備觀覽，我們對於這些日本人的著作，當分別觀察。有一部分係受日本傳統觀念，及帝國主義色彩，曲學阿世，歧誤至多，此等言論不容留存，應當嚴詞糾正，廓清塵霧。更有一部分稿係潛心研究，純粹精密，有相當價值，也當採取精華，發揚擴大。總之，我們對於這些著作，或有用，或無用，須嚴密選擇。學術本無界限，凡日本人所已研究而內容完美者，我們不妨取用，不必重疊研求，多費時間；日本人所研究尚未完成，或欠圓滿者，我們可以捨短取長，酌量修訂，更有目前建設所必需，而從前尚未研究者，我們分別緩急，就能力所及，確實研求。……

本館編輯「臺灣學報」，其目的即就上述的專門學術的論著中，分別登載，尤其關係臺灣文化的特殊造詣。<sup>34</sup>

關於計畫中編行的「臺灣研究叢書」，其緣起，他寫道：

建設事業經緯萬端，而首重振興學術。臺灣在最近五十年間，日本專家孜孜探究成績可觀。今幸光復，為紀念計，宜求已完成之稿妥為翻譯，公之于世，尤冀吾國學者續事研究，益臻完善，故有臺灣研究叢書之刊行，既以奠科學研究之基，亦以廣全國建設之用。<sup>35</sup>

由許壽裳親自撰寫的〈臺灣學報發刊辭〉與〈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內容可以得知，臺灣研究組之所以能有豐碩的具體工作成果，實應歸功身為館長的許壽裳對日本學者的臺灣研究之正面肯定。1947年6月24日，編譯館改組為編審委員會，由教育廳正式接管，8月，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對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親自作了總結。

省編譯館已報撤銷，此乃當局的方針，曾在館裡服務的我個人；雖有些感慨，可是，不想說什麼，何況「撤後是非誰管得」！

只將我直接關係的臺灣研究的一些成就的一部分（除素木博士的論文，先前已送寄臺灣大學，餘皆移交教育廳的。）列舉於下，一用以紀念諸同仁的心血，一用以供對臺灣的文化

<sup>34</sup> 許壽裳，〈臺灣學報發刊辭〉，《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299-301。

<sup>35</sup> 許壽裳，〈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同上，頁302。



和歷史有關懷的人士的參考。

《隋代琉球確非臺灣考》，梁嘉彬著

《明末旅日甲必丹李旦與鄭芝龍》，岩生成一著，鄭桓譯

《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國分直一著，張樑標譯

《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同著，同譯

《臺北盆地之農家》，同著

《鼠族驅除考》，青木文一郎著，張樑標譯

《射人》，W Eberhard 著，金關丈夫譯註

《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池田敏夫（雄）著，張樑標譯

《Utrecht 大學所藏臺灣平埔語彙》，（淺）井患倫著，孫建中譯

《瘧疾特論》，森下薰著，廉新生譯

《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賴子清編

《臺灣昆蟲相》，素木得一著

《臺灣氣象》，鄭桓編譯

《過去日人在臺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張常愷著

《臺灣文治，武備沿革史略》，金溟若著

《石器圖譜》，立石鐵臣畫

上列的，除一二篇外，餘皆完成的，有的是達數十萬言的巨著。日籍人員除岩生，森下，金關，青木四博士外，餘皆是

館內的人員；就是岩生博士等的著作，也皆是未發表過的新稿。此外還有《臺灣通志》，《小琉球漫志》，《使署閒情》等的傳抄和校勘及《臺灣關係文獻目錄》的編輯。

編譯館之成立期間不及十個月，而實際工作的時間，除籌備的時間，和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只有五六個月而已。可是，一切已是過去了，又何所用其眷念哉！只希望教育廳當局，對於上列的著述的發表和刊行，有了誠意的考慮。（僅將此小節，呈給陳公洽，許季葦兩先生。）<sup>36</sup>

從楊雲萍親自對臺灣研究組所作的總結，除了能夠理解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外，也能夠側面理解日本人留下的臺灣研究成果。

#### 四、臺灣省編譯館撤廢後臺灣研究組人員的去向

編譯館撤廢後，隔年的1948年6月，臺灣省政府成立臺灣省通志館繼續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sup>37</sup>其後，1949年6月，臺灣省通志館又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此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儼然成為1949年以後，一個在大學之外，官方的文獻編輯業務、學者、業餘的民間文化人士的臺灣研究集結點，在光復後數十年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在國府的歷史意識「中國史化」之下的「地方史」型態存在著。2002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又改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制度上依然是上述的隱形延續。編譯館臺灣研究

<sup>36</sup> 楊雲萍，〈近事雜記〉（六），《臺灣文化》2卷5期（1947年8月），頁12。

<sup>37</sup> 臺灣省通志館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工作內容與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有許多重疊處，詳細請參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組的研究及編譯成果，在編譯館解散後，部分曾發表在當時由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的《臺灣文化》。<sup>38</sup>此外，臺灣研究組徵用的日本學者，如國分直一、池田敏雄，也將當時的成果帶回日本，日後在日本出版或學術刊物上發表。<sup>39</sup>

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抵臺後，在隔天召開的省務會議上，即決議裁撤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魏道明抵臺同日即收到臺灣大學送來的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聘書。6月，許壽裳轉任臺大教授兼中文系首任主任。當時臺大中文系的教員有教授許壽裳、魏建功、臺靜農、羅庸（未到），副教授吳守禮、黃得時。<sup>40</sup>爾後，經過許壽裳與時任臺大校長的陸志鴻再三交涉，8月下旬編譯館名著編譯組編審李何林（李竹年）也到中文系任副教授，之後又加入教授喬大壯。

草創時期的中文系，許壽裳除了每週授「文字學」之外，還在中文系裡籌設「古代文學」、「近代文學」、「文字學」、「語音學」、「中國學」五個研究室，規定系內教授除授課外還必須加入

<sup>38</sup>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中縣管埔遺跡調查豫報〉，《臺灣文化》5卷1期（1949年7月）；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卷1期（1950年1月）。

<sup>39</sup> 國分直一，《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年），《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年），這兩本著作收錄了部分編譯館時代的調查研究成果。編譯館時代有關臺灣人產育習俗的研究，池田敏雄在返日後發表，池田敏雄，〈福建系台湾人の妊娠祈願及び妊娠察知に関する習俗〉，《民族学研究》第18卷第1-2號（1954年3月），〈福建系台湾人の出産習俗〉，《民族学研究》第19卷第2號（1955年9月）。

<sup>40</sup> 〈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名單〉，《臺大同學會會員名錄》（1947年8月1日），頁27。

一個研究室，自擬專題進行研究，定期提交研究報告。此外，為了統一臺大全校大一國語文教材，會同中文系教師，選編全校大一國語文教材《大學國語文選》與《大學國文選》。<sup>41</sup>許壽裳為了統一臺大全校大一國語文教材，注入不少心血，在他隔年2月18日去世的十一天前，還在中文系召集了臺大校本部及法、醫學院全體國語文教師暨中文系教師，召開國語國文教學會議。<sup>42</sup>

許壽裳晚年的臺灣行旅，突遭不測，<sup>43</sup>提早結束，和許壽裳關係深厚的臺大中文系教授臺靜農（1902-1990）為他的臺灣時代事功做了以下註腳：

晚年主持臺省編譯館，在短短的時間中，卻有了不少的成

<sup>41</sup> 《大學國語文選》後來於1947年12月，由臺灣大學教務處出版組出版。詳請參考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2月），頁225-260。《大學國文選》似乎沒有出版，根據許壽裳的遺稿〈大一國文教材〉所列的篇目，我們可以得知計畫中的《大學國文選》的篇目是：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吳敬恆〈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孫中山〈知難行易〉、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梁啟超〈為學與做人〉、梁啟超〈論文章作用〉、梁啟超〈新民說〉、魯迅〈吶喊自序〉、魯迅〈狂人日記〉、錢玄同〈與黎錦熙羅常培書〉、胡適〈讀書〉、胡適〈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

<sup>42</sup> 賀霖，〈許壽裳先生在臺灣〉，收於《許壽裳紀念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55。林姿君，〈臺灣大學的語文學教育及其相關問題初探（1945-196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66。

<sup>43</sup> 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在臺大宿舍遇害。關於許壽裳的遇害，當時臺灣省警務處的正式發言是，1948年2月18日夜，原編譯館工友高萬俸，潛入許宅欲行竊，被許壽裳發現，故行兇。詳見《新生報》（1948年2月23日），以及〈案情經過〉，收於《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悼念許壽裳先生」，頁34-36。許壽裳逝世後，國民政府曾明令褒揚許壽裳，詳見《新生報》（1948年6月27日）。

績，但是那樣平實而宏遠的工作，往往不盡為人所了解，甚至先生的友人也說老頭子脾氣大，可是先生並不因此感到寂寞或沮喪，這正是先生勇于負責就事論事的精神。先生之在臺灣大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遇害之前一日，還是苦心的籌畫國語問題、國文問題，以及圖書的整理。

先生治學以弘通致用為主，觀其所為文，皆以教育的精神出之。編譯館草創，百忙之中，猶著《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一書，淺見之徒，或以為這種通俗書，用不著先生自己動筆，而先生卻正視著廣大的臺灣青年群的需要，認為這才是自己的責任，故深入淺出的給他們以完善的課本。可惜現在大家只知中日語法混淆的困難，卻未注意已經解決了許多問題的這一小書。<sup>44</sup>

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經過許壽裳的再三奔走交涉，1948年9月，轉任臺大歷史系教授，並隨即開授「臺灣史」課程，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高等學府開授「臺灣史」課程的學者（楊氏還開授「明史」、「南明史」、「歷史哲學」等課程），直到1977年退休為止，他一直教授這門課程。楊雲萍的臺大教學生涯，為臺灣培養不少臺灣史研究人才，<sup>45</sup>努力使「臺灣史」脫離「鄉土」、「溢美」、「偏差」、「好奇」的層次，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接續戰

<sup>44</sup> 臺靜農，〈追思〉，《臺灣文化》3卷4期（1948年5月），頁20。

<sup>45</su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前所長許雪姬、同研究所研究員黃富三與陳秋坤（均已退休），故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前國史館館長林滿紅、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已退休），皆是楊雲萍於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指導的學生。

前也延續戰後的「臺灣史」研究，<sup>46</sup>這正也是許壽裳的心願。臺灣研究組的編纂淺井惠倫、素木得一、幹事池田敏雄返日，編審國分直一、編輯立石鐵臣轉任臺大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舊稱土俗人種學教室）副教授與講師，負責戰火下瓦礫堆中殘存的標本與考古資料的整理記錄，直到1949年才返日。幹事賴子清（1894-1988），1948年7月轉到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任職，隔年7月轉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協纂，其後擔任嘉義縣政府文獻委員會顧問，致力地方志和漢詩編輯，曾編有《嘉義縣志》、《彰化縣文化誌》及多冊漢詩集。<sup>47</sup>編審梁嘉彬（1910-1995），於1937年二十七歲時即以《廣東十三行考》一書享譽史學界，編譯館時代，則專心致力琉球史的研究，其後任教東海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等校，特別於琉球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中留下重要研究成果。

值得注目的是臺灣研究組徵用的日本學者在返回日本後，活躍於日本學界，對戰後日本的臺灣研究也發揮影響和傳承的功能，尤其是淺井惠倫和國分直一。淺井惠倫返日後，先後任職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金澤大學教授、南山大學教授，栽培後進，並任日本言語學會評議員、日本民族學會理事，引領學界；淺井惠倫於1969年去世，傳承其臺灣原住民語言研究的學者土田滋（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後來總結淺井惠倫的學術成就有二：（1）作為

<sup>46</sup> 詳細請參考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7年6月），頁62-65。

<sup>47</sup> 許雪姬等，〈王世慶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91。

語言學者，是世界第一位將雅美族（達悟族）等臺灣原住民諸語言構造、傳說釐清的學者，（2）採錄了即將消失的平埔族群諸語言，且將大部分的貴重採錄卡片帶回日本（現收藏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sup>48</sup> 國分直一在返日後，先後任東京教育大學教授、熊本大學教授、梅光女學院大學教授，並且展開極為旺盛的學術著述活動，其著述與學術關心橫跨整個東亞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與民俗學，而其學術研究出發點是源自於臺灣時代的累積。<sup>49</sup> 另外，素木得一（1882-1970）在返日後也活躍於昆蟲學界，曾任日本應用昆蟲學會會長。池田敏雄（1916-1981）返日後，先在島根新聞社工作，其後轉到著名出版社「平凡社」工作，活用其臺灣時代與編譯館時代的臺灣民俗調查研究經驗，成為該出版社民俗學部門、民族學部門的著名編輯。<sup>50</sup>

## 五、結語

戰前，帝國日本在亞洲，包括殖民地臺灣的調查研究活動，按其目的與屬性可大致分為六類。（1）文獻調查、資料收集。（2）物產、軍事要地調查。（3）舊慣、習俗調查（包含民族調查）。（4）市場、經濟情形調查。（5）經濟計畫立案調查。（6）華僑、華人

<sup>48</sup> 土田滋，〈（人と学問）浅井惠倫〉，《社会人類学年報》第1卷第10期（東京：東京都立大学社会人類学会，1984年5月），頁18。

<sup>49</sup> 安溪遊地、平川敬治，《遠い空—国分直一、人と学問》（福岡：海鳥社，2006年），頁309。國分直一著作目錄收於該書〈國分直一略年譜〉，頁299-307。

<sup>50</sup> 詳細請參考〈池田敏雄年譜〉，《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號，頁169-177。

調查。<sup>51</sup> 因為有上述的調查活動，當日本戰敗時，已累積相當龐大數量的研究成果。<sup>52</sup>

1945年10月，國府派陳儀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臺灣文化重建政策。包括陳儀在內，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時代在臺灣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大陸來臺官員與學者，以「知日派」占多數，因而較能理解日本遺留的臺灣研究之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當時，擔任臺灣文化重建機構之一的編譯館館長許壽裳，也大聲疾呼對於日本所遺留下具有學術性的研究應該接收，並將之編譯成中文，意圖作知識的再生產，使其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換言之，將日人的學術文化研究「中國化」的挪用策略，也正符合「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臺灣文化重建方針。為此，許壽裳在編譯館設臺灣研究組，並任命臺灣出身，活躍於戰前及戰後初期，對臺灣文史方面頗有研究的楊雲萍擔任研究組主任。

臺灣研究組主要工作是接收，甚至也可說是繼承戰前日本人留下的臺灣調查文獻資料與臺灣研究，並將其「中國化」，與現今臺灣的一部分臺灣研究之努力「去中國」或「去日本」大相逕庭。在

<sup>51</sup> 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氏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4。

<sup>52</sup> 關於戰前日本在臺灣的學術研究成果，人類學研究部分請參考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1884-1952）》（東京：勁草書房，2005年），頁227-293。史學研究部分請參考吳密察，〈殖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收於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頁293-339。醫學研究及農業研究部分請參考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285-413。



楊雲萍的推薦下，臺灣研究組徵用的一批日本學者，正可擔任最佳輔佐角色。從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成果來看，除了作史前史跡發掘，也進行田野調查，以及文獻資料鈔錄、復刻、編譯，其研究範圍囊括今天所稱的「臺灣學」、「臺灣研究」，它同時也是戰後臺灣，作為政府機構的臺灣研究——「臺灣學」之出發點。臺灣研究組主要成員楊雲萍、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皆是戰前《民俗臺灣》的同仁，同時也是至 1970 年代為止維繫戰後臺灣研究命脈的重要民間刊物《臺灣文化》、《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臺灣風物》的重要執筆作者。

編譯館撤廢後，臺灣研究組的主要工作內容由臺灣省通志館繼承。1950 年代以後，國分直一在臺北師範學校時代的學生王世慶（1928-2011），任職於臺灣省通志館（即臺灣省文獻會），王世慶繼承師學，為臺灣文獻的保存研究貢獻良多；國分直一在臺北師範學校時代的另一學生劉茂源（1926-2005），日後留學熊本大學與九州大學，其後任教梅光女學院大學，繼承國分直一之臺灣考古學研究。臺灣研究組的日本工作人員，除了國分直一、立石鐵臣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而後於 1949 年返日，其餘皆在 1947 年返回日本，這批日本學者在返回日本後，對戰後日本的臺灣研究也起了傳承作用。1949 年，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及臺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另一位留用日本學者宮本延人返國後，其研究工作由臺灣出身的陳紹馨、陳奇祿、宋文薰繼承。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則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擔任南明史與臺灣史的教學，至 1977 年退休。從戰前到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在知識生產上，在制度與人員方面，就是以這種微妙的方式，在斷裂中繼承與

展開。而這過程中，許壽裳的關鍵性角色是不容忽視的。1990年，日本民族學會為當時已經高齡八十二歲的國分直一拍攝訪問影像紀錄時，問及和戰後來臺的大陸學者有沒有密切的交往，國分直一立刻回答說：「我無論如何要提及的是許壽裳先生，他擔任館長的編譯館，其功能很像臺灣總督府的編譯館（文教局編輯課），不只是專門資料的編譯，更是為教化一般民眾。還有設立臺灣研究組，聘請詩人同時也是研究者的楊雲萍為組長，在臺灣研究組留用日本人，留用了池田敏雄、我以及淺井惠倫，此外也留用了理學部昆蟲研究室的素木得一。……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sup>53</sup> 透過國分直一的訪談，可以得知許壽裳對戰後初期臺灣研究起了統合作用。因此，在論及戰後臺灣研究史時，許壽裳的存在不應當在意識型態的夾縫中被遺忘。

臺大出版中心

---

<sup>53</sup> 國分直一，〈台灣研究者の群像〉，《遠い空—国分直一、人と学問〉，頁248-249。

臺大出版中心

# 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 第七章

# 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

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臺大出版中心



7-1 施叔青《她名叫蝴蝶》（「香港三部曲」之一，洪範書店，1993）封面。



7-2 施叔青《遍山洋紫荊》（「香港三部曲」之二，洪範書店，1995）封面。



7-3 施叔青《寂寞雲園》（「香港三部曲」之三，洪範書店，1997）封面。

## 一、前言

1997年香港面臨又一次的歷史巨變，璀璨的東方明珠再度成為政治交易籌碼，姑且不論「回歸」在香港造成的衝擊，至少，透過施叔青「三部曲」的撰寫，可以清楚地體察出作者身為一位「外客」的焦慮心境。十六年的香江歲月，施叔青既是過客，卻儼然又已成為在地人，這種特殊的存在使她得以別於其他的香港作家，處於特殊的觀看位置。<sup>54</sup>施叔青於1994年返臺，2000年又移往美國紐約定居，在香港回歸大限的逼迫下，施叔青以文字圖繪香港，奮筆經營「香港故事」小說系列，汲汲地想為香港銘刻歷史紀錄，「香港三部曲」的完成讓施叔青在創作上又締造個人的新里程碑，作者橫跨了香港自開埠以來的百年歷史，並大膽地選擇以一位妓女的家族史來對應龐大的歷史洪流，這樣的選擇視野頗耐人尋味。

然而，在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的出版正式取得「香港文學」封號之際，其豐富的生命歷程也讓她在文學的展現上顯得特殊，其生於臺灣，輾轉美國，又寓居香港，再回到臺灣，最後選擇以紐約作為棲居之所的旅居生活，與她的寫作緊緊相扣。因此，施叔青所撰寫的著作「香港三部曲」的完成，其間所囊括的素材，除了作家對於香港歷史的大量涉獵外，還摻雜作者自身豐富的生命情調，此外，也隱藏了作家個人對於香港風情的鑑賞視野，藉由施叔青對於香港的爬梳整理，不難發現「三部曲」中帶著一股濃厚的異國情調，

<sup>54</sup> 日本學者從香港文學史的脈絡來討論施叔青，將施叔青定位為屬於香港文學第三世代的「南遷作家」，或是香港文學中的「外來作家」。詳見西野由希子，〈香港小說概觀—施叔青の作品を通し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18號（1999年4月）。金文京，〈香港文學瞥見〉，收於可見弘明編，《香港および香港問題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1年）。



其呈顯的究竟是何種觀看視野？又或是如王德威所提問的：「施對香港的摩娑撫弄，究竟是寫出了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怨懟與糾纏、壓迫與共謀，還是只是虛張異國情調，因之墮入雙重『東方主義』而不自知？」<sup>55</sup> 要釐清施叔青的香港，必須先正視「香港三部曲」的敘述視野，究竟施叔青的位置在何處？是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透過她所說的香港故事，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來思考這個議題。<sup>56</sup>

本文企圖處理的是施叔青運用多重敘述模式間所欲呈現的香港圖像，並進一步探索施叔青這種類型的臺灣作家，在異鄉香港與故鄉臺灣所譜成的「香港三部曲」，究竟應該置放在文學史上的何種位置？是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值得進一步的追索，身為「異鄉客」的作者，透過香港歷史的捕捉，如何完成自我想像中的「東方之珠」？本文將透過施叔青的敘述進行討論，並嘗試釐清施叔青筆下的敘述視野與香港建構。

## 二、異鄉客的香港史：城市地圖的銘刻

香港，一處百川匯流之所。香港作家也斯曾說：「香港是沒有

---

<sup>55</sup>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291。

<sup>56</sup> 廖炳惠在論述施叔青的位置時提出：「就作家的身份與文化、地理認同來說，算是出入港台的雜揉混成，乃亦港亦台的小說家。」詳見廖炳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中外文學》24卷12期（1996年5月），頁91。施叔青亦港亦臺的身分的确是她在定位上的難處，有鑒於此，筆者欲在其書寫「香港三部曲」的敘述視野上，繼續探究臺灣文學的有效範圍究竟能有多大延展向度？

什麼記憶的，香港是一個失憶的城市。」<sup>57</sup> 實際上筆者以為，香港並非沒有記憶，其特殊處正在於它的城市結構所呈載的豐富面向，因此香港並非失憶而是充滿太多的記憶，許多事件的發生使得香港這座城市應接不暇，因此隨意撿拾的記憶片段皆可化成一段刻骨銘心的香港故事，施叔青筆下摹畫的香港圖像，正是其中的區段。面對九七的到來，港人的政治熱忱突然高張，香港前途也以前所未有的熱度被討論著，這座居於南海之濱、珠江口之東的城市，因地利之便，百年來吸引了西洋與東洋的目光，在世界近代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殖民地的特殊處境，將香港形塑成一座奇異之都。

施叔青在此地體驗著變換多彩的香江歲月，「九七」的熱度逼使作家開始琢磨描繪這座城市地圖，在歷史之中攫取事件，幻化成作家眼中的香港。施叔青在三部曲的書寫過程中，展露了一種鳥瞰香港的敘述視角，在〈維多利亞俱樂部〉的訪談稿中，作家提出欲以「寫實主義的手法」來寫小說，<sup>58</sup> 三部曲在寫作策略上的運用，是欲以大量的歷史事蹟堆砌確定三部曲的「寫實性」，這方面李小良在論及施叔青的三部曲寫作時也指出：「施叔青已發表的三部香港長篇……，就比較著力寫香港的人和事，創作手法大有回歸寫實的傾向，並結合歷史事實續續，企圖整合一香港歷史，……。」<sup>59</sup> 在歷史資料的取材上，她參考了林有蘭的《香港史話》以及葉靈

<sup>57</sup> 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5。

<sup>58</sup> 關於施叔青寫作手法上的轉折，參見施叔青，〈我寫《維多利亞俱樂部》〉，《聯合文學》100期（1993年2月），頁98-99。

<sup>59</sup> 李小良，〈「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187。

鳳的《香港方物誌》，<sup>60</sup>此外，小說中引經據典處處可見，並加入許多史籍文獻出版資料，以證明其真，如「艾米麗從書架上抽出一本燙金的精裝書《香港植物誌》，作者喬治·班遜姆，出版時間1861年。」<sup>61</sup>「『說到無知，』自稱對醫學頗有涉獵的保羅·安德森爵士提起帕臣醫生的一本著作：《英吉利國新出痘奇書》。帕臣醫生在廣州完成這本著作，時間是一八〇五年，……將近一百年了，聽說這本書還在廣州翻譯成中文。可是，你們看，這可憐的人……無知，是的。」<sup>62</sup>諸如此類的出版史料知識的告知，在三部曲中出現頻繁。作家在歷史資料的堆砌中有一個期待，即讓讀者認同她的香港史寫作的真實性，從而進行她對香港史的敘述。然而，透過這些寫實的史料，施叔青的敘述手法也就此展開，前二部曲的寫作視野基本上是挾著她對香港史的考證，而進行其鳥瞰式的寫作。施叔青選擇以一位「南唐館」妓女——黃得雲的發跡史作為其銜接歷史書寫對象，透過現實主義的面具，在她對黃得雲以及一幫殖民者的描繪中，所展現的其實更多是她對香港的想像，以及「東方主義」的凝視。

### （一）由島至島：施叔青眼中的香港

究竟香港這顆匯聚東西文化的璀璨之珠如何成為施叔青的創作源泉？作家談論她由臺灣到香港的心靈轉折時說道：

在那華洋雜處的殖民地，東、西文化不僅在此交會，而且產

<sup>60</sup> 簡瑛瑛訪，〈女性心靈的圖像：與施叔青對談文學／藝術與宗教〉，《中外文學》27卷11期（1999年4月），頁119-137。

<sup>61</sup> 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臺北：洪範書店，1993年），頁122。

<sup>62</sup> 同上，頁209。

生奇妙的平衡，我很快找到了安適的位置，一邊以外來者新鮮的眼光，運用天生好奇心從容的觀察琢磨這五光十色的所在，也沒有拒絕介入這吃盡穿絕的資本主義社會。<sup>63</sup>

在施叔青的眼中，多元文化融雜的香港都會充滿了華麗與冒險，這也刺激了作家與生俱有的好奇心。正因為她外來客的特殊身分，加上赴港之後與香港的上層社會交流頻繁，在香港視角的選取上，她選擇從被殖民者（黃得雲）、上層社會中殖民者與高等華人的活動（如亞當·史密斯、屈亞炳、西恩·修洛、狄金遜、溫瑟、王欽山、馬臣士），以及敘事者（香港某藝術中心亞洲節目主任等）的社交活動進入香港歷史，因此三部曲中的香港歷史，在「酒會」、「垂著絲絨窗簾的音樂室聆聽小提琴、鋼琴演奏」，以及衣香鬢影中被鋪陳出來。施叔青在周遊了東、西各地之後，趕在九七之前完成的三部曲，讓她塑造了一座心中的城市。香港的文化是多元的，認同也是多元的，在這華洋雜處的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架構中，香港都會的認同始終是種模糊的概念。<sup>64</sup> 1970年代末期，施叔青從臺灣這座小島出發到人欲橫流、五光十色的華麗之都，她既觀察又介入殖民地這個吃盡穿絕的城市，從臺灣到香港的空間移動，直接也影

<sup>63</sup> 施叔青，〈追逐成長〉，《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11月），頁181。

<sup>64</sup> 蔡榮芳在解讀香港的認同問題時，提出了身分與國家認同的五點基本概念，包括先釐清身分認同的多層次性，接著點出國家認同是這多層次的其中一點，並就歷史上的家族、鄉土、民族、國家等層次加以界說，更點出政治思想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變動性，最後他說明：「政治上認同一個國家，並不等於認同它的政府」，這多少解答了長期以來，香港華人夾在中國與英國之間的矛盾心理。詳見《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275-295。

響作家在寫作視野上的調整。

綜觀施叔青截至目前為止的寫作變革，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sup>65</sup>其少女時期的創作，擅於以現代主義的技巧挖掘探索複雜幽暗的人心糾葛，此時期的作品大致以其故鄉鹿港為背景，這座略帶古意的小鎮在施叔青的筆下化為一幢幢古老的陰影，老邁的小鎮充滿了詭異荒誕的禁忌，這也成為施叔青在第一階段創作中的基調。<sup>66</sup>到了1970年代，臺灣逐步擺脫禁錮、壓抑的意識，社會與群眾間充滿了久經禁忌後想一吐為快的氛圍，施叔青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的變動，更以臺灣新女性的前衛姿態面對文壇，從少女蛻變為女人的過程中，作家開始轉換書寫視野並投射女性自身的經驗，以婚姻議題描寫時代變遷下，女性面對家庭以及生活價值觀的轉折，在這一階段中施叔青創作空間的放大，挹注了她在異國的所見所感，小說中雜糅了許多關於西方的景物文化，並注意到擺盪在東西文化間臺灣女性心靈的轉折與矛盾。<sup>67</sup>隨著施叔青的再度遷移，其香港經驗儼

---

<sup>65</sup> 本文對施叔青小說的創作分期，參見賀安慰，《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sup>66</sup> 施叔青早期的創作以《約伯的末裔》（臺北：仙人掌出版社，1969年）、《拾綴那些日子》（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中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代表，在這些短篇小說中，施叔青以1960年代盛行的現代主義技巧營造陰森詭誕的小說氛圍，在死亡、鬼魂、夢境中遊移，挖掘人性中的黑暗面，少女時期的施叔青沉浸在鄉野奇談的怪誕世界中，並以其特殊的敏感想像經營情慾與死亡的生命議題，奠定了其獨特的病態小說美學。

<sup>67</sup> 施叔青在1970年代告別了少女時期，同時也告別了顛倒幽暗的語言文字，這時期的創作以《牛鈴聲響》（臺北：皇冠出版社，1975年）、《琉璃瓦》（臺北：時報出版社，1976年）及《常滿姨的一日》（臺北：景象文庫，1976年）（後改題為《完美的丈夫》〔臺北：洪範書店，1985年〕）為代表。施叔青的生命在此時期產生了大變動，作者負笈美國，歷經結婚而返臺執教，其漫長的流動歲月以及生命的豐富體驗，對她的作品造成了頗大的影響。

然又一次影響了她的寫作視野。在此之前，施叔青剛結束一段臺灣文化的懷舊之旅，臺灣舊文化的不受重視以及遭受的毀壞，震撼這位紐約異鄉客的心靈，懷著舊文化消逝的恐懼，施叔青動筆寫下了《琉璃瓦》，記錄臺灣舊文化的片段，<sup>68</sup> 這種對於歷史消逝的危機感，在香港九七之前又可以再一次從施叔青的文字中窺見。

1977年，施叔青從臺灣至香港，此時正值香港經濟上百花齊放之際，金融業、觀光業以及酒店事業的蓬勃，使得香港經濟到達了鼎盛的巔峰時期，真正成為一座幻象之都。施叔青任職香港藝術中心並負責節目策劃，基於這個因緣，作家開始出入香港上流社會，周旋於殖民地的統治者與上流華人之間，真正見識了香港物質文化的極致，並開始了她對香港殖民地統治階層的觀察，也奠定了其後撰寫「香港三部曲」的基本視野。從1981年起，施叔青撰寫了「香港故事」系列，記錄她在香港生活點滴，從中也表述其在香港的見聞與所感，到了1988年，施叔青結束以女性觀點出發的「香港故事」系列，並投入報導文學的行列之中，走訪大陸來港的新移民，作家在訪談時說到：受到這次「穿街走巷、回到人群的經歷」的影響，<sup>69</sup> 她轉移了關注的焦點，開始思索香港歷史的議題，1989年「六四事件」的刺激，讓施叔青開始正視撰寫香港歷史小說的構想，她說：

「六四」槍聲一響，對我個人和創作是個重要的轉換點，我認同了旅居十多年的香港，自願與六百萬港人共浮沈，參與

<sup>68</sup> 施叔青說道：「『琉璃瓦』是我下鄉尋找古物，目睹人們是怎樣糟蹋這些寶貴的遺物，在一種很迷亂的心情底下動筆的。」見〈序〉，《琉璃瓦》。

<sup>69</sup> 施叔青，〈我寫《維多利亞俱樂部》〉，頁98-99。。

每一次遊行示威，中共屠城的事實令我因一己的無力而沈沈，經過長時間反思，我不得不回到原來的位罫，只是比以前更為執著。我應該用筆來作歷史的見證。<sup>70</sup>

歷史進程中血淋淋的事件，在香港造成了莫大的撼動，不僅來自於對中國的曖昧情境，其中還牽涉到敏感的回歸問題，中共的血腥鎮壓激發了港人的反共情緒，處於香港的施叔青當然感受到這股猛烈的反彈情緒，鑑於香港回歸日期的逼近，施叔青一貫的懷舊情緒再度興起，也認知到香江風華即將產生變貌。基於為歷史留紀錄的抱負與企圖，施叔青撰寫了〈維多利亞俱樂部〉，作家意識到短篇小說處理歷史視野上的侷限，因而擬以長篇小說來總括其香江十年的歲月。「香港三部曲」的書寫便是在這篇長篇小說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施叔青參照了香港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重新建構心中的百年香港，在首部曲《她名叫蝴蝶》的「序」中，施叔青以「蝴蝶，我的黃色粉蝶，我的香港」召喚她心中建構的香港，作家用蝴蝶作為香港的表徵，以英國殖民者、妓女、殖民地土流社會的活動穿插作為小說的基調，呈現出一種衣香鬢影式的歷史敘述，即使小說的主角：黃得雲出身寒微，然而作者突顯的是華洋相遇後「東方主義」式的描寫氛圍，如亞當·史密斯對於南唐館的黃得雲那種既愛又憎、一廂情願的東方想像。施叔青的香港浮世繪中嵌合了許多自身的經歷，在看遍上流社交圈吃喝玩樂的享樂主義之後，「香港三部曲」呈現的視野也是從上流社交圈出發，寫出殖民社會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的驕傲與脆弱，以及百年香港殖民史中的變革。從作家寫作視野的定調，可以窺見施叔青欲以白人心靈描繪來檢視

<sup>70</sup> 施叔青，〈我的蝴蝶——代序〉，《她名叫蝴蝶》，頁2。

殖民者心態的逆寫殖民企圖，在香港歷史記憶與文學書寫間，施叔青敘述了這座喧鬧之島物質生活發展的歷史過程，並從小說中見證了這種世故、征利的港式生活形態。<sup>71</sup>

## （二）虛構與歷史：重建百年香港

施叔青撰寫「香港三部曲」的視野是宏大的，挾帶著殖民末世巨變的心理，作家不諱言地道出，其欲建構香港歷史小說的願望。香港的迷人之處，在於它那借來的時間，有了時限的逼迫，香港的繁華也綻放得特別亮麗。<sup>72</sup>然而，這種具有歷史抱負的系列創作，對於作家而言顯然是種艱難的挑戰，如何在已經設定的框架內呈現讓讀者驚豔的主題，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課題，即施叔青如何在其預設的歷史架構中脫困？這也成為「三部曲」系列創作過程中一直廣為讀者疑惑之處。「香港三部曲」的書寫視野奠基於〈維多利亞俱樂部〉中大法官黃威廉的家族史勾勒，欲以「家族史」的建構對照香港發展的大歷史，在記實與虛構間創造出作家眼中的香港。

施叔青參照了香港歷史的重大事件，發揮豐富的想像力欲搭建一座百年城市，作家說明其撰寫「香港三部曲」的苦心：

下筆之前，遍讀有關史話、民俗風情記載，凡是小說提到的街景、舟車、建築風貌，英國人維多利亞風格的室內布置，

<sup>71</sup> 簡瑛瑛訪，〈女性心靈的圖像：與施叔青對談文學／藝術與宗教〉，頁182。

<sup>72</sup> 黃錦樹認為施叔青寫作「香港三部曲」，其出現的時機以及存在的意義有多重象徵性，和香港的特性有密切的關聯，筆者同意此說，並欲藉由其指出的象徵意涵繼續深入討論。詳見黃錦樹，〈寂寞雲團評介〉，《中國時報》42版（1997年7月31日）。



妓寨的陳設，那個時代衣飾審美、民生飲食，中、西節慶風俗，甚至植物鳥蟲，我都刻意捕捉鋪陳，也不放過想像中那個年代的色彩、氣味與聲音。我用心良苦地還原那個時代的風情背景。<sup>73</sup>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作家拼貼了這些歷史素材所勾勒出的香港風情圖，也未必是現實中的香港，<sup>74</sup> 施叔青筆下銘刻的香港浮世繪只是香港萬象中的一層切面。經由作家的筆耕，香港的歷史素材已經和其筆下的人物融為一體，「想像」的運用，給了作家的大歷史敘述一個脫困的窗口，讓她得以遊走在現實與虛構間，以寫實的筆觸融合其創作生涯中所累積的寫作技巧，並開一個後殖民敘述道路，鋪陳小說的進展。從鹿港、臺北、紐約走來的異鄉客，以一種既介入又疏離的眼光建構香港。施叔青十六年的香江生活濃縮成為筆下的百年香港，誠如白先勇所言：「『香港的故事』在施叔青筆下充滿了新鮮與浪漫色彩，帶著幾分傳奇的成分，甚至可稱為『香港傳奇』。」<sup>75</sup> 施叔青選擇以黃得雲的生命史對應香港的歷史大事記，加深了「香港三部曲」的傳奇意涵，尤其在前面二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中，個人史與歷史大事件嵌合得相當

<sup>73</sup> 施叔青，〈序〉，《琉璃瓦》，頁3。

<sup>74</sup> 何謂香港？何謂香港作家？李小良曾對香港文學與作家提出其見解：「施叔青的『香港』，畢竟是『她的』香港，跟本體的『香港』（存在嗎？），或『真正的香港人』（怎樣才算是呢？）想像的『香港』，可能存在很大的差異，而這差異又可能是想像世界中的必然吧——文本生產不就是差異的蕃衍嗎？」李小良，〈「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頁186。

<sup>75</sup> 白先勇，〈香港傳奇——讀施叔青「香港故事」〉，收於施叔青，《韭菜命的人》（臺北：洪範書店，1989年），頁4。

成功，也更突顯黃得雲的不凡之處，施叔青本欲以其虛構之人物依附著重大的歷史事件，跟隨著時代往前，基本上還是一種線性的敘述視野，問題是書寫了二部曲之後，突然醒覺只經營了十八年，在回歸的時間壓迫下，施叔青在終曲《寂寞雲園》中，展露了跳躍的手法，在時空的錯置、並置間重組了黃得雲祖孫四代的恩怨情仇，並藉以終結作家的香港史。<sup>76</sup>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踵繼著張愛玲書寫〈傾城之戀〉的餘味，同樣對於時代變動有著敏銳的嗅覺。張愛玲筆下的香港是上海人的香港，她說道：「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義的地方」，<sup>77</sup>張愛玲明確地表述了自己觀看香港的位置，同樣地，施叔青雖立志書寫記錄香港的歷史圖像，然而在其撰寫的「香港三部曲」中卻無可避免地夾雜了作家周遊列國的混雜記憶，而其中的一個記憶片段更是來自臺灣。施叔青在語言的擇取上，以中文作為書寫的傳遞，而不選取以廣東方言與複雜的殖民地用語來表現，這種陳述方式讓作品多了普遍的意涵，同時也給了生活於相同語境下的臺灣讀者一個介入香港的視野，施叔青使用的懷舊語言與刻意營造的閨怨閒愁，某種程度上也滿足臺灣讀者對於香港神祕又多彩的幻想。黃得雲一家四代的情愛傳奇建構在香港百年的歷史上，施叔青以《廣東史誌》、《新安縣誌》、〈1941年開埠報告〉、鼠疫、房屋策略、填海工程、醫藥政策、

---

<sup>76</sup> 參見施叔青，〈自序〉，《寂寞雲園》（臺北：洪範書店，1997年），頁1-2。

<sup>77</sup> 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臺北：皇冠出版社，1995年），頁57。

石塘咀開闢史、九廣鐵路通車、沙基慘案、罷工事件等史實為線，串起黃得雲的家族誌，以「香港三部曲」的傳奇家族史對應香港的傳奇開港史。作家在前面兩部曲中，貫穿了她所謂的「懷舊情懷」，更刻意以「古豔淒惋的文體」來訴說百年香港，作者雖提到她是故意使用文風來製造距離感，使小說讀來更像「凝視一幀古風泛黃的照片」，<sup>78</sup>然而，這種寫作角度的經營卻讓施叔青更加陷入張愛玲式的敘述口吻。施叔青在三部曲的序曲中，對於訓練黃得雲成為名妓的鴿母倚紅的書寫，奠定了前二部曲中昏黃、鬼氣、蒼涼的小說氛圍：

伸出床沿擱在酸枝大方凳上的那雙腳，看出是個女人，一雙黑緞繡鞋，鞋底嶄新，躺著的人似乎從沒下來走過路。鞋面繡的一對紫鳳凰，黃得雲覺得眼熟，三舅媽生孩子死去，入棺時腳上穿的壽鞋……<sup>79</sup>

延續了作家早期鬼氣的敘述氛圍，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中繼續以這種幽暗手法經營小說書寫，然而，與以前不同的是賦予了更多寫實參照，寫盡了島上的喧嚷繁雜，張愛玲筆下「繡在屏風上的鳥」（〈茉莉香片〉）化成施叔青筆下黑繡緞鞋上的紫鳳凰，更加添頹靡之色，這也是張派作家對於張愛玲式的蒼涼美感的繼承，施叔青繼張愛玲之後重說「傾城之戀」，不僅是日本占領下的淪陷之島，更是即將回歸中國的「陷落」之島。對照終曲的《寂寞雲園》，由於久居幕後的敘述者突然顯身，在氣氛的營造下，施叔青不復前二部曲的說書扮演，而是站在幕前交代黃得雲一生的傳奇，

<sup>78</sup> 施叔青，〈序〉，《琉璃瓦》，頁4。

<sup>79</sup> 《她名叫蝴蝶》，頁11。

顯現出施叔青亟欲跳脫出張氏手中的「戰前香港」的企圖。

### 三、「日不落國」的殖民幻影：施叔青的後殖民寫作策略

終曲《寂寞雲園》以「女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的重重一跤，使得一切變得無法挽回」<sup>80</sup>做結尾，總結了作家對香港歷史的書寫，也將時序永遠停留在回歸前夕。<sup>81</sup>三部曲的橫跨時空之旅止於「大限」前，施叔青透過小說道出曾經是「日不落國」的帝國窮途。作家在「香港三部曲」中的明顯企圖在於以「後殖民」逆寫殖民帝國的雄心，以殖民者的身分現身說法，從白人的內心獨白中審視其身為殖民者的優越與矛盾，並以華／洋、殖民者／被殖民者、男／女這種由種族、階級、性別的二元對立陳述角度呈現，作家想透過小說中的層層鋪寫來指涉殖民者對於殖民地一廂情願的幻象建構。

#### （一）東方想像：蝴蝶的誕生

「香港三部曲」中的靈魂人物無疑是那位擺花街南唐館名妓黃得雲，這位「豔淫巾釵，珠鏘玉搖」的名妓一生見證了殖民地的開拓與繁榮。黃得雲是蝴蝶的化身，而蝴蝶也代表了香港，「香港三部曲」的首部曲：《她名叫蝴蝶》，結合了黃得雲、蝴蝶與香港，

<sup>80</sup> 施叔青，《寂寞雲園》，頁 228。

<sup>81</sup> 「施叔青適時而準確地掌握了九七陰影下的香港精神和現實，無關愛憎憂歡，作者只要有耐心爭逐，這樣的故事可以一直寫下去，寫到香港不再是香港，仍然不動心、不傷情。」詳見〈是顛覆？還是追逐？——施叔青集序〉，收於施叔青，《施叔青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頁 9-13。筆者以為，施叔青將「香港三部曲」的時序喚停在九七前夕，關鍵在於對香港的處境無法不動心、不傷情，愛憎憂歡構築了施叔青小說中的感染氛圍，對於回歸的沉重，作家選擇了相當諷諧的一幕來終結，也終結其對香港耕耘了八年的歷史圖像。

使小說展現了多種層面的影射意涵，也飽滿了殖民地的意象，作家說道：

我找到了地道的香港特產，精緻嬌弱如女人的黃翅粉蝶。<sup>82</sup>

施叔青以黃翅粉蝶隱喻了香港，同時也以蝴蝶構築了她的香港。十三歲的黃得雲從東莞被綁至香港，終而成為擺花街的青樓豔妓，作者將黃得雲這位妖媚多姿的妓女擬像為香港的化身，從出身到調教的過程完全依附著香港殖民史的形成，包括了學習夷語、不穿中國束胸等等，黃得雲雖是妓女，然而卻是為西洋訂作的妓女，作者在書寫之中暗喻了殖民地（香港）迎合殖民母國（英國）的適應過程，其中更以男／女二元對比的方式突顯身為男性的殖民者，如亞當·史密斯、西恩·修洛、道格拉斯·懷特的角色，正如施叔青自己所明言的：「深入白人統治者的內裡，審視殖民者的諸般心態。」<sup>83</sup> 作家以其後殖民經驗與眼光描摹了黃得雲與這群殖民者的情愛糾葛，也揭示出擺盪在東／西方下的香港處境。

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施叔青對東方情調的再顯，揣摩了西洋的東方視野，效法普契尼（Puccini）《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秋秋桑之角色，將黃得雲形塑為富含東方想像的神女，其中黃得雲所處的南唐館也是依據西方的眼光擺置而成：

牆上掛著臨摹的山水古畫，屋角立著景德鎮的粉彩花瓶，沙發發絲絨躺椅之間，青花骨凳、硬木桌交錯，古玩擺件堆的滿

---

<sup>82</sup> 施叔青，〈序〉，《琉璃瓦》，頁3。

<sup>83</sup> 同上，頁2。

坑滿谷，當中少不了鴉片煙榻。<sup>84</sup>

擺放於妓院中的古畫、古董及代表東方徹底陷落的鴉片煙榻，為的是創造西方眼中的「東方」，施叔青筆下與黃得雲糾葛得最為緊密的兩個男人：亞當·史密斯與西恩·修洛，各自帶著對東方的想像前來。

對於懷抱冒險精神渡水到港，以拓荒者自居的青年亞當·史密斯而言，殖民地的落後滿足了其身為維多利亞女王尊榮下泱泱大國子民的虛榮心及種族的優越性，半山道山頂的洋人特區在殖民地複製著日不落國的榮耀，在點綴著東方情調的維多利亞時期客廳中，坐在桃花心木綠絲絨的椅墊上，邊品味著香港這座海上舞臺，邊宣揚英國的跨國大業是亞當·史密斯的終極目標。對東方充滿偏見的亞當·史密斯，以其偏見建構了一個心目中的東方：

蝴蝶，我的黃翅粉蝶。……黃翅粉蝶在異鄉人的懷中得到新生。<sup>85</sup> 蝴蝶，我的黃翅粉蝶。……他是她的統治者，她心悅誠服地在下面任他駕馭。<sup>86</sup>

這些英國異鄉客一廂情願地認定自己是殖民地唯一的救贖，裡面隱藏著西方對東方自以為是的想像。亞當·史密斯在窮山惡水的殖民地上建造他的後宮，在黃得雲居住的成合坊唐樓中，史密斯裝扮起心中的東方，由「紅紗宮燈、飛龍雕刻、竹椅、高几、瓷瓶、白綢

---

<sup>84</sup> 《她名叫蝴蝶》，頁 20。

<sup>85</sup> 同上，頁 61。

<sup>86</sup> 同上，頁 63。

衫黑綢褲的順德女傭所組合成的中國」。<sup>87</sup> 施叔青在首部曲中即進入亞當·史密斯的內心，並且再現香港殖民情境，此外更披露了深植於殖民底層中對殖民地的種種歧視，包括了種族、性別、文化等意識型態的對比，頗具有逆寫殖民的態勢。

同樣的殖民偏見，施叔青從不同的角度切進西恩·修洛的內心，帶著對東方傳統的夢幻懷想，西恩從充滿陰鬱的英國夢魘中來到香港，在這座陽光燦爛、充滿奇花異草的熱帶城市中遇見殖民地上的黃色粉蝶。弔詭的是，呈現在西恩眼中「真正的」香港，原來僅是一種東方想像，裝飾黃得雲紅磚樓房的鏤空花窗、紫壇、黃梨木家具、太師椅、茶几、雲石屏風這股古色古香的中國情調，正是複製前清進士府邸的模樣，加上順德女傭及黃得雲身上穿著頗具東方韻味的銀紅絲織短襖，以及領口上棲附的黃色粉蝶紐結，都饜足了西恩的東方情懷。

然而，就在施叔青大發功力筆耕「三部曲」中的這兩位主角的同時，不知作家是否太過沉溺於替她筆下的黃色粉蝶敷彩，亦或是太過進入這兩位白人的內心世界，而忽略了自己在小說中營造的多元對話方式。小說口吻一下闡述亞當的內心幽微，一下又站在西恩的位置，下一會兒則又跳回黃得雲身上，到了終曲《寂寞雲園》時，這種敘述上的跳置、並置手法運用得更為頻繁。值得注意的是，當敘述角度跳回黃得雲時，在訴說的口吻上並未突顯黃得雲身為被殖民者的女性身分，從黃得雲的裝扮以及住所的陳設擺置上可窺見濃厚的東方情調塑造，這顯然與作者形塑黃得雲獨斷果決的強人性格

---

<sup>87</sup> 同上，頁 63。

有所落差，身為被觀看者的黃得雲是為了觀看者而呈現這種東方情調？又或者，身為敘述者的作家也掉進東方主義的想像之中？

作家對於亞當、西恩、道格拉斯的內心掙扎做了鉅細靡遺的描寫，作為殖民者的西方優越感在面對東方誘惑時所產生的自我憎惡以及對被殖民者的仇視心理。在第一部中，來自於殖民母國的亞當·史密斯這個原本對東方充滿冒險精神的青年，因來到這百廢待興的小島而落至罪惡淵藪不得救贖。帶著殖民者的驕傲、持著向殖民地示威的心情前來的史密斯，原本的意圖是想讓島上的土著「嚇的以為惡鬼從天而降，抱頭鼠竄。」<sup>88</sup>然而，在瘟疫的肆虐下以及懷鄉的歲月裡，殖民地的人事開始與這位統治者有了接點，瘟疫肆虐下的末世感，使得這位殖民者與黃得雲所代表的香港相遇了，這個女體成為「永遠的引誘」導致統治者的白人墮入行淫的淵藪。史密斯以主人的心態檢視這個隸屬於他的女體：「他是她的統治者，她心悅誠服地在下面任他駕馭」，<sup>89</sup>然而，這種駕馭具有反噬性，就在殖民者駕馭了這個被殖民的女體後，殖民者也反被其駕馭了。黃得雲所布置的東方情調，黃得雲與史密斯的交歡反噬了史密斯：「那個被他踢過的女人，雙眼發光，反轉過來騎在他身上。史密斯感到被侵犯了，試著掙脫，女人卻插進他的血肉裡，和他連在一起，變成他的一部分。……在放蕩的惡行過後，他躺在那裡，比以前更感到孤獨。他意識到身體的某一部分已經不屬於自己，他控制不了它。他出賣自己的感官，做不了自己完全的主人。」<sup>90</sup>他間接地被

---

<sup>88</sup> 同上，頁 57。

<sup>89</sup> 同上，頁 63。

<sup>90</sup> 同上，頁 70。



同類所遺棄，在此殖民地成為破壞統治者信仰與純潔的劊子手。

身為統治者的權威受到了威脅，因此摧毀甚至仇視被殖民者成為再度確立自己權威的最佳途徑，作為統治者的史密斯最終搗毀自己一手建造的東方後宮，一方面又向代表西方聖潔瑪麗亞的艾米麗尋求救贖，最終複製了所有殖民者的冷酷。施叔青在此雖然點出了殖民與被殖民相互制約的概念，然而除了展現殖民者的價值觀外，並沒有對於這個價值觀進行反論述，或者透過多音對話戳破統治者的殖民心態，因此此逆寫殖民論述並未顛覆殖民論述。另外，黃得雲這個作為被統治者的女體，她的姿態是迎合的，作為被殖民者而言，黃得雲的逆來順受，未免有其「東方主義」式的看法，即「香港三部曲」在作者「逆寫殖民」過程的過度求工刻畫下，也不免墮入殖民者的東方觀看窠臼中。

## （二）上帝／女王：信仰的絕對性

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幻影中，維多利亞女王的神聖性可以等同於上帝，殖民地的信仰規範中，女王的權威性與規範力皆同於上帝，殖民者帶著各式的意識型態來到殖民地，並以這套殖民規範約束殖民地的化外之民。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中除了對於兩性、殖民／被殖民的描寫外，其中更大量描繪西方宗教的身影，是有鑑於西方宗教與殖民勢力的同步介入，因此「三部曲」的書寫中特別提出，宗教信仰的傳播確立同時也宣示著殖民政權的根深柢固。挾著捍衛宗教的正義姿態，英國殖民者們在遙遠的東方理所當然地殺戮「異教徒」，藉以宣告帝國的偉大，<sup>91</sup> 施叔青「逆寫殖民」的最大目的

<sup>91</sup> 霍布斯邦在其《帝國的年代》指出：「上帝的成功卻是帝國主義進展的函

即是突顯帝國主義背後所隱藏的侵略擴張意圖。施叔青以鼠疫與亂世帶出西方的宗教建構以及殖民者的優越心態，《她名叫蝴蝶》中的牧師湯瑪斯，對於香港大瘟疫流行的唯一解釋是因為這些異教徒不信仰耶穌，<sup>92</sup> 使得災難降臨，這是罪有應得，對於這些自以為優越的白人殖民者而言，其信仰的至高性絕對無庸置疑，殖民地的異色人種渾身帶著滿盈的罪惡，等待救贖。喪生於鼠疫之下的潔淨局總辦狄金遜對殖民地華人詛咒著：「這般和畜生沒有兩樣、在地上爬的土著，髒到入骨，這遭天譴的種族」，<sup>93</sup> 印證著白人自以為是的文明觀，唯有信主才能得到永生。

殖民地的教堂具有幾種功用，一是成為阻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標界，當亞當·史密斯沉溺在黃得雲的東方情調中時，羅馬天主教堂塔樓的十字架閃著警告的光輝，讓這位殖民地青年自覺陷入永恆的罪惡深淵，只能喃喃唸著：「祂與我同行，祂誨我諄諄，祂說我

---

數。」「帝國的年代不僅是一個經濟和政治現象，也是一個文化現象。地球上少數『已開發』地區的征服全球，以藉著武力和制度，藉著示範和社會轉型，改變了人們的意象、理想和希望。」歐洲人將有色人種的社會基本上定義為落後、卑賤，必須接受真正文明的洗禮，將其視為征服的對象，而代表唯一文明的正是接踵而來的商人、傳教士和攜帶槍砲的武裝士兵，殖民母國與屬國之間是極為不對稱的，宗教正意味著文明，這也是殖民帝國在想像「他者」文明時的基本概念。詳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賈士衛譯，《帝國的年代》（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81-121。

<sup>92</sup> 實際上除了基督教的信仰外，同時期的天主教勢力是足以與基督教抗衡的，西方的宗教勢力在殖民地還是彼此互爭正統，在此作家無暇細訴，而以一个西方宗教概念來對應中國的民間信仰。李志剛，〈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收於王慶武編，《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頁746-749。

<sup>93</sup> 《她名叫蝴蝶》，頁52。

只屬祂一人……」<sup>94</sup>的聖詩，以減輕罪惡。二是成為殖民者的社交場所，在基督的光輝下，文明的色調展現在這群既造作又虛偽的高等洋人間，以自以為是的殖民眼光睥睨殖民地上的異色人種。三則代表異色人種的唯一救贖之道，湯瑪斯牧師反覆地唸著：「感恩吧，孩子，耶穌用祂的血來洗清人類的罪惡」，<sup>95</sup>充滿了意欲救贖這些異教徒的悲憫情懷，他對華人教友最常講述的是耶穌的奇蹟故事，並且重述主耶穌顯靈，其受感東來的事蹟，他藉由翻譯聖經為其神職正名，竭力反對尊孔祭祖，因為他確信東方的儒教體系是有欠缺的，言行間充滿了西方的傲氣，以及西方觀看的偏差。實際上這又落入一廂情願的西方帝國迷思中，雖然傳教士們隨著鴉片戰爭渡海傳教，然而以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其宗教信仰相當地混雜，呈現儒、釋、道的混融狀態，此外還有民間信仰的流傳，土地信仰、神誕活動在港人社會中非常頻繁，並藉由廟宇的建立進行一些社團活動，凝聚民間力量，<sup>96</sup>在《遍山洋紫荊》中，施叔青特將姜俠魂與軍功戲的民間信仰活動串連起來，藉此突顯姜俠魂的民間色彩。

對於殖民者的描寫，施叔青展露了其慣常使用的對比手法，如對湯瑪斯牧師的形象描繪，以矮小、樸素浮現臘光的虔誠信徒模樣對照其妻潘朵拉的臃腫豐滿、好嚼舌根，並以其住所的華麗奢侈對照這位神職人員假神之名行不義之事的事實。同時，施叔青並藉筆下的華人教徒：李提摩太、屈亞炳之眼，點出殖民者在殖民地以宗教為名的收編事實。李提摩太自小即接受基督教義，在思想上受到

<sup>94</sup> 同上，頁 71。

<sup>95</sup> 同上，頁 72。

<sup>96</sup> 參見王廣武編，《香港史新編》（下），頁 783-856。

一定的西化，然而出門時必定著長袍馬褂，是典型生活於中西文化衝突中的知識分子，當湯瑪斯牧師斬釘截鐵地判定瘟疫的盛行是來自於對異教徒的懲罰，李提摩太卻從馬可福音中找到另一種解釋：「耶穌基督屬於民眾，屬於受排斥、沒有權勢、一無所有的人民。」<sup>97</sup>此也點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眼中的宗教意涵所存在的落差。這是作家在詮釋香港時所意識到華／洋間的信仰衝突以及對處於夾縫位置華人的注意，在宣揚落實女王即基督的政教合一信念的同時，作家在小說中點明這種信仰價值的荒謬。

英國的基督無法撫慰香港的人民，而大王廟、天后廟中的神祇塑像也救贖不了深眼高鼻的英國殖民者。對於處於上等階級的西方洋人而言，宗教與文明是一體的，他們帶著文明與宗教前來救贖這些低下落後的異色人種，以悲憫包藏殖民帝國的大斧，這種自以為是的文明觀，在殖民地造成了信仰上的衝突，殖民地本身具有其長久的風俗信仰及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這些規範因為殖民帝國強勢的介入遭到一定的拆解，下層民眾的信仰基礎一般還是相當本土而牢固，最大的衝突當屬介於華／洋之間的知識分子，這些具有知識的華人受到西方教養的影響，一方面認同了西方的科學文明，一方面則也思考本土如何與西方融合的問題，如李提摩太之流。顯然施叔青在描述香港之際，意識到存在於香港中間階層分子心靈上的認知焦慮與矛盾。殖民者所堅持的一元化價值信仰判準，在屈亞炳身上更突顯其荒謬，這位華人通譯在教會辦的收容所中長大，教會的偽善在他身上銘刻了印記，他臉上的麻子就是這群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洋人傑作，同時他也看穿白種牧師、信徒把他們對維多利亞女王

<sup>97</sup> 《她名叫蝴蝶》，頁78。

的敬意和上帝的旨意混淆在一起施壓華人，這種具有統治收編意味的意圖。宗教與女王背後強大的武裝軍隊強化宗教與女王的真理意涵，也排斥殖民地異國文明的存在可能性。小說中明言：

「南京條約」裡兩項條款並列：「英國商人可在中國各地販賣鴉片，傳教士可在中國各地傳道。」鴉片商、傳教士組成的隊伍並肩入侵，由軍隊來保衛他們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利益。在大英帝國深謀遠慮擴張的陣營裡，傳教士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他們利用教堂、學校和醫院來換得文化統治和華人的靈魂。<sup>98</sup>

由此可知，西方殖民帝國的拓展是建立在對「他者」歷史的消解與改寫之上，而宗教正是其運用最為得力的工具，藉由宗教與帝國中心（女王）的合流，終可達到神化與收編「他者」的統治目的。

### （三）主導／宰制

施叔青直入白人統治階層的內心，如亞當·史密斯、西恩·修洛，卻也沒有忘記書寫殖民地男性的內心糾葛，如屈亞炳、姜俠魂，成功地點出殖民與被殖民間的各種矛盾。「香港三部曲」對於西方的東方想像多有著墨，從《她名叫蝴蝶》到《寂寞雲園》，其中重複被討論的議題正是「東方想像」的問題，黃得雲與孫女黃蝶娘成為一種互文的註解，四代的情愛糾葛，架構在東／西方的想像框架之間。此外，作家對於宗教、文化、知識、科學等東／西意識型態上的對比，更是煞費苦心，透過對比的陳述，「香港三部曲」的歷

---

<sup>98</sup> 同上，頁73。

史敘述基本上成形，然而，作家卻又不滿於單面的歷史進程紀錄，所以更加專注刻畫黃得雲個人的生命史與其家族史，意欲藉由女性與城市作類比的參照。<sup>99</sup>

在施叔青的筆下，可以清楚地窺見主導與宰制這組命題基本上是一種渾融的相互滲透狀態，在這裡施叔青點出了一個後殖民中相當重要的課題，即宰制與被宰制之間所存在的不是一組單向的箭頭，而是相互影響的概念，自以為文明高等的英國統治者，某種程度上也受制於低等的華人。「香港三部曲」中，英國殖民者一貫秉持著種族優越政策，堅持雜交是一種罪惡與道德淪喪，小說中的菲立浦爵士大放厥詞地說道：

一個優秀的品種和一個低劣的品種雜交，只會把優越的弄糟，這是普通常識。再想想看離婚生下的子女一定退化，只配給白人統治，當奴隸。<sup>100</sup>

對殖民者而言，一旦種族雜交被允許，等於混雜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分際，則殖民神話將面臨消解的命運。雖然種族政策一直在殖民地中實行，然而，面對占據了香港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華人大眾，殖民者某種意義上是隔離了自己。可以說殖民者一直生活於自身的矛盾中，就統治的權威性而言，如亞當·史密斯與黃得雲這種既宰制又反被宰制的影響機制，亞當的男性殖民權威對應了

---

<sup>99</sup> 王德威認為施叔青藉由一個妓女的發達史來參看香港的命運，實際上是個老套的招數，然而從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上來衡量作品，則也有其獨到之處。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頁 290-291。

<sup>100</sup> 《她名叫蝴蝶》，頁 114。

黃得雲的女性東方殖民，原是絕對的支配操縱，然而，小說中可以看出亞當也受制於他的東方殖民，這種對立結構，到了黃理查與英格麗則身分上有了顛倒，殖民者的英格麗受到被殖民者黃理查的掌控，而另一方面，黃理查也受控於英格麗，施叔青設置了兩個對應的架構，在陳述殖民操縱時也顛覆了殖民，質疑了殖民體系中單向的掌控權，從黃得雲的生命史可以清晰地看見這位殖民地的低下女性，女性軀體成了其向上的籌碼，從這種反宰制的過程中，又可見到「香港三部曲」中對於性別、階級的顛覆意圖。

除了身分階級間的殖民矛盾之外，施叔青也告知了殖民者自身真實生命與刻板身分間的衝突，如殘酷的道格拉斯·懷特上校，其對於殖民地的殘酷態度其實受到殖民地人民的期待視野的影響，原本他僅是想警告一頭滋事的水牛，然而殖民地的人民等著看白人警察射殺水牛的好戲，騎在馬背上的懷特，在幾百隻眼睛觀看及鼓動的壓力下，選擇了「正確」扮演殖民者的角色，以手上象徵殖民武器威權的來福槍舉槍射死了一頭不會比馬危險的水牛，他扮演了馬來人要他扮演的英雄統治角色，也戴上了他們為他量身訂作的面具，成為無情的殺戮統治者。<sup>101</sup> 作者一面形塑了一位「成功」的殖民者，一面又以亞當·史密斯作為對比，亞當無法清晰分割主觀情感與刻板殖民印象，因此，他成了永恆的異鄉畸零人，不見容於統治階層，卻又不見得被華人接納，作家在此指涉了一個混融的概念，以此解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消長問題。<sup>102</sup>

<sup>101</sup> 施叔青，《遍山洋紫荊》（臺北：洪範書店，1995年），頁54-56。

<sup>102</sup> 張小虹指出，「殖民權力本身的『含混』（ambivalence），不是單方面政經的掌控與監視，而是從『顯性』東方主義的二元對立批判跨渡到『隱性』

施叔青奮力想藉由一位妓女的發跡史來對應龐大的歷史發展脈絡，進一步突顯整個香港在殖民地處境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互宰制的荒誕感。就三部曲的架構而言，她在呈現後殖民情境上的用心是成功的，每個遇到黃得雲的英國統治者，無論或憎或愛都跟黃得雲有一段複雜的糾葛，這個矛盾不僅來自於黃得雲的妓女身分，更大的可能是黃得雲的被殖民者身分——一位低等的黃種異教徒。種族的差異以及身分的不同都是作家在書寫「後殖民」議題中最佳的例子，當然在氛圍的營造上，也成功地突顯出香港社會上下層的落差。然而，施叔青寫黃得雲如何進入殖民者的上層社會的過程中，如與亞當·史密斯的交往以及與西恩·修洛似有若無的情愫的開展，黃得雲的嗔、怒、喜都與現實生活有關，在性格的塑造稍嫌平面，也就是身為被殖民者的黃得雲關心的似乎僅是最基本的現實溫飽方面，心靈上的空虛都是由於肉體上的匱乏所導致，筆者以為施叔青在此，雖是強調其「後殖民書寫」，然而，卻不經意地流露作者的「東方主義」。在黃得雲被殖民的身分上，讀者不易窺見其心靈上的掙扎，而僅是一心一意培養兒子進入統治者的世界，以統治者的判準作為其價值觀的來源，這個部分一直延續到她的孫女黃蝶娘的描寫，祖孫兩人利用天生的本錢在白人社會中攫取利益，向白人社會靠攏，扮演白人眼中的東方美女以討好統治者。在此，施叔青忽略了殖民地的複雜性，三部曲中唯一代表對殖民政府反叛的力量——姜俠魂，也僅以驚鴻一瞥的姿態從小說中一躍而過，作用不大，這也成為三部曲中較為遺憾之處。

---

東方主義的幽微繁複、潛意識和欲望的糾結。」見氏著，〈殖民迷魅——評施叔青《遠山洋紫荊》〉，《中國時報》43版（1996年1月7日）。



#### 四、文學史的位置：臺灣？香港？

關於「香港三部曲」的文學位置，究竟該置放於臺灣文學或是香港文學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目前並未有定論。廖炳惠將施叔青定義為「出入港台的雜揉混成，乃亦港亦台的小說家」，<sup>103</sup> 日本學者將施叔青定為香港文學中「第三世代的南遷作家」，<sup>104</sup> 香港方面，黃繼持將施叔青定義為「旅港的臺灣作家」，<sup>105</sup> 鄭樹森在對〈香港文學的界定〉一文中也提出將小說家施叔青置放在香港文學的脈絡中，<sup>106</sup> 中國方面出版的《香港文學簡史》也將施叔青置放在「過渡期香港文學」來定位。<sup>107</sup> 就以上諸位學者所持的看法，施叔青所創作的「香港故事系列」以及「香港三部曲」在廣義的香港文學定義上，是屬於香港的。討論香港文學向度的學者認為，香港文學既可以是「出現／產生在香港的文學」，也可以是「植根／屬於香港的文學」。<sup>108</sup> 施叔青在香港文學的位置被廣義的文學定義所包括，因

<sup>103</sup> 廖炳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頁 91。

<sup>104</sup> 西野由希子，〈香港小說概觀—施叔青の作品を通して—〉，頁 33-48。

<sup>105</sup> 見黃繼持，〈香港小說的蹤跡——五、六十年代〉，原載於《香港小說選 1948-1969》（1997年）。後收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著，《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27。

<sup>106</sup> 鄭樹森認為，香港文學有狹義與廣義兩種，廣義的包括過港的、南來暫住又離港的、僅在臺灣發展的、移民外國的。對於廣義香港文學的含括範疇可謂相當寬廣。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收於《追跡香港文學》，頁 53-55。

<sup>107</sup> 見施建偉、應宇力等著，《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164-265。

<sup>108</sup> 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收於《追跡香港文學》，頁 91-102。

此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在廣義的香港文學定義下是屬於香港文學的一部分。對此，李小良也指出：「『香港作家』這一名號，本來就是一個混雜的身分符號。」「『香港文學』的非絕對單語性和『香港作家』這身分的含糊和混雜，更增加了『香港文學』在文化交涉和意義生產的張力」，<sup>109</sup> 在這個論點下，他同意從「廣義」上來認同施叔青是一位香港作家。由上述可知，香港文學與香港作家的定義是相當不易的，對施叔青的文學定位上，筆者較認同廖炳惠的說法，就整個華文語圈而言，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系列不僅是香港文學更是臺灣文學的部分，臺灣作家施叔青旅居香江書寫的香港故事，不僅是香港文學的部分，更應歸入臺灣海外作家的行列之中，因此，三部曲既是香港文學，同時也是臺灣文學的部分。此外，從施叔青長時間與臺灣文壇的密切互動以及作品在臺灣讀者群所造成的迴響上看來，施叔青的「三部曲」可視為臺灣文學的部分。

學者們將施叔青歸於廣義的香港作家，其作品在香港地位的確立，來自於書寫香港歷史的豪志，讓長期政治冷感的香港讀者產生的驚訝效果，奠定了其作品作為香港文學的基礎。究竟何謂香港？我們用國家來界定臺灣，但是卻用城市來界定香港，定位上的不同連帶地也混淆了其認同的判定，城市是多元的、是包容的，更無所謂國族，對於重商主義發展到極致的港島，商品文化美學主導著文化意識，都會生活的好處在於提供許多可能的認同標準，<sup>110</sup> 文學上的書寫也是如此，所有書寫香港、生活於香港的作家與作品都含括

<sup>109</sup> 李小良，〈「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頁 183-184。

<sup>110</sup> 梁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頁 153-169。

在香港文學的範疇中，香港作家有也斯的香港城市敘述，有鍾曉陽的都會現代人愛情糾葛，以及劉以鬯對時代及人性的反省書寫，多重的判準讓臺灣作家施叔青成為香港作家的一員。《寂寞雲園》中影射了香港繁華的歷史，就如雲園一般即將衰頹消解，文中作者也藉由終曲來訴說對回歸的無奈：

政論家們呼應這種論調，大聲疾呼：忘記「九七」。一覺醒來，「九七」問題依然存在。……六百多萬港人將何去何從，只能照著掌舵者既定的方向前行，他們對命運操縱在別人手中感到既憂心又無奈。<sup>111</sup>

作家在小說中道出身為政治籌碼的香港之無奈，以及殖民者僅重視利益交換的絕情。回溯香港百年歷史中，曾經要求回歸中國的言論相當罕見，即使在 1925 至 1926 年的大罷工期間，港民也僅就改善英國殖民統治、廢除民族歧視等方面加以訴求，在漫長的殖民地時空中，絕大多數的港人選擇了在殖民地地上謀生，因為認同的是這塊土地，中國在「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上硬要香港的回歸，終究也僅止於想像。<sup>112</sup>

施叔青在香港這塊借來的時空中撰述著變動城市中的三部曲，用筆見證了香港一百五十年，作者說她讓「香港三部曲」作了一個最像終結的終結，即在它註銷歷史的前夕停住，永遠停留在歷史性的一刻間，施叔青在家鄉臺灣完成了「三部曲」的終曲，透過距離，

---

<sup>111</sup> 施叔青，《寂寞雲園》，頁 230。

<sup>112</sup> 詳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 年）。

作家放縱其對香港的描繪，以文字浮世繪的樣貌展現在讀者面前，這是施叔青面對「流逝」這個命題的回應方式，殖民時光的流逝代表了作家港居生活的流逝，害怕物是人非的情境流轉，施叔青以外客的身分，道出了回歸前人心的擺動與社會的浮盪。作家的香港書寫，無形中也拓展了臺灣文學的向度，書寫異鄉的臺灣文學作品，在臺灣文學史上也應給予一定的位置。

## 五、結語

總觀「三部曲」的敘述，既是替香港寫歷史，同時也替臺灣文學史寫歷史，臺灣文學史的向度，藉著作家的香港描述又向外延伸了一步，整個華語文圈透過類似施叔青的香港書寫，臺灣文壇與香港文壇有了共同的聯繫，這也是「三部曲」在文學史上最大的意義。作家趕在九七之前為她的香江記憶作了註記，也藉此凍結了十六年的港居生活，「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抒解了作家在香港回歸前的焦慮，同時也揭示了她觀看香港的角度。「香港三部曲」所造成的轟動，一方面是這位臺灣作家為異地香港寫史的壯志，一方面還是緊扣當時九七的回歸熱潮，筆者藉由「香港三部曲」的分析，從作家的書寫中解讀敘述香港的位置。基本上，施叔青是站在局外人的鳥瞰觀點來介入香港的，作家耐心地面對香港殖民地風情以及混融的華洋雜處情境逐一解套，與香港保持著既緊密又疏離的關係。

王德威指出施叔青有意無意間會洩漏她觀看香港的高姿態，透過《寂寞雲園》中的敘述者（我）現身說法，利用黃蝶娘這個煙幕，作家說了一個她的香港故事。<sup>113</sup> 姑且不論她的鳥瞰高姿態，就其撰

<sup>113</sup> 王德威，〈異象與異化·異性與異史——施叔青論〉，《跨世紀風華：當

寫「香港三部曲」的文化視野便值得記上一筆，作者長期處在「越界」生活情調上，因而在選取寫作視角時不免展現其觀看的高姿態，由於過度心繫香港的後殖民矛盾情境，因而選取白人的視角，欲採用逆寫殖民的手法，由於對於種族／階級／性別等論述不夠深刻，因而難免流於片面。然而就其所具備「放眼天下」的視野而言，出身於臺灣的作家中，還未曾產生像施叔青如此特殊擺盪於島與島之間的「異鄉客」，身為作家，施叔青不但描述了成長的家鄉——臺灣，也書寫了異鄉——紐約，更記錄了飄盪之島——香港的歷史，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sup>114</sup>以施叔青這位臺灣作家所書寫的香港歷史三部曲小說而言，在臺灣文學史的書寫過程中應該被討論，這其中還牽涉到許多臺灣出身的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定位問題。當臺灣文學的定位問題，已逐漸進入論定之際，施叔青以及許多海外的華人作家都該被納入臺灣文學的範疇中進行討論。換言之，臺灣文學的收容界線應當是開放的，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一方面是書寫香港，一方面也引介了臺灣讀者去窺見香港，因此香港三部曲的敘述視野是既內又外的，對於上等洋人階層而言，施叔青深入了其東方視野頗有敏感度，然而，在總體的語言建構上，基本上施叔青正在對臺灣人訴說一段香港傳奇故事，她訴說的對象是臺灣人，也許香港人無法接受她的香港故事，<sup>115</sup>然而，臺灣讀者應該頗能心領

---

代小說 20 家》（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269-289。

<sup>114</sup> 林耀德說：「身為一個臺灣作家的施叔青願意將近年來的絕大部分光陰投注在對於香港歷史和生態的關懷與觀察，這當然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個文化事件。」見氏著，〈歷史的負擔——評《遍山洋紫荊》〉，《自由時報》34 版（1996 年 2 月 3 日）。

<sup>115</sup> 關於施叔青的香港故事，余光中、王德威以及廖炳惠，在文中大多給予肯定的評價，認為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香港。對此，倫敦大學博士生關詩珮從

神會這一段臺味十足的香港文學，不論是現代主義的蝙蝠或是後殖民的蝴蝶，<sup>116</sup> 施叔青對於香港文化的摹寫，可視為作家對於異文化的一種重新想像與再造，就此，筆者以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必須置放於臺灣文學的脈絡下，並可視為作者透過香港經驗，傳遞臺灣讀者另一種的書寫經驗。

## 臺大出版中心

---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後殖民顛覆策略及身分認同來討論施叔青的顛覆策略是否成功，文中指出施叔青並未顛覆殖民論述，並且在她的文章中，無法「使人覺得她與香港有種『休戚與共』的歸屬感。」見關詩珮，〈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後殖民顛覆策略及身分認同〉（香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的傳承與開拓——四十週年校慶研討會，2003年10月30日）。

<sup>116</sup> 張小虹，〈祖母臉上的大蝙蝠——從鹿港到香港的施叔青〉，《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頁186-189。

臺大出版中心

## 後記

我不是一個積極的人，天分也不高，只是謹守著「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的信念。2007年出版專著《「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之後，又陸續寫了一些論文在臺灣的學術刊物發表，或是被收入專書裡，從沒有認真考慮要集結成書。但是，這兩、三年每回遇見施淑老師、梅家玲教授時，她們總是鼓勵我應當將過去已發表的論文整理成書，年輕友人陳偉智先生也是經常鼓勵我該將舊稿整理成書的一人。當我打起精神把舊稿整理、部分加筆改寫後，偉智成了我的第一位讀者，閱讀我的舊稿，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我要特別感謝偉智，還有也要深深感謝內人的鼓勵與幫忙潤稿，沒有他們的鼓勵、協助，就沒有這本小書的誕生，在此向他們表達我最高的謝意。

多年來我對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的衝突與疊合的研究取向相當關心，努力探究屬於臺灣、中國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也許與我個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有關。1985年4月27日，好友筱峰開著車子，偕同炎憲兄、佳音兄、鄭瑞明老師送我到桃園機場，開始了我的臺灣越境與入境日本的留學生活。當時日本的大學學風保守，博士學位尚未開放，在毫無把握、毫無信心的情況下，炎憲兄鼓勵我說：「不用害怕，不用擔心，有



些留學生到最後怎樣拿到博士學位，自己也不知道。」若干年後，我除了是屬於自己不知道怎樣拿到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之外，外加怎樣覓得教職的，自己也不知道。離臺三十年，從老留學生（留學時我虛歲二十九歲）到所謂的「教授」的歷程彷彿一場夢。留學之前，我即對戰前前往中國發展的臺灣文化人產生興趣，碩士班時受到彭（伊原）澤周老師的啟發，對戰後來臺的中國文化人也產生極大興趣。1990年春，為了研究的需要，首度越境日本前往中國，踏著張深切的足跡，尋訪廣州、北京，並透過北岡正子老師與秦賢次先生的好友，著名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先生的聯絡介紹，到天津拜訪已是耄耋之齡的「未名社」（1920年代魯迅發起的文學團體）成員，即戰後短期來臺，任職編譯館、臺灣大學的著名俄國文學翻譯家李霽野先生，老先生知道我的來意後，非常懷念地談了不少當年臺灣往事，且親手抄錄了魯迅集離騷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鶉鴂之先鳴」送我，意義深長，老先生的殷殷熱情與溫馨令我終生難忘。爾後，又因陳漱渝先生的聯絡與介紹，在臺北聯絡到許壽裳先生的次男許世璠先生，對我日後的研究生涯影響很大。在此，誠摯地再向陳漱渝先生致謝。

1997年開始任教愛知大學，愛知大學的前身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戰前也有來自殖民地臺灣的臺灣人就讀該校，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畢業生有部分從事諜報活動，使得該校的性質與定位變得有點複雜，因為與中國的淵源，愛知大學與中國的學術交流極其頻繁。這十多年來，因工作上與研究上的關係，讓我不斷地越境，往返於日本與臺灣、中國之間。「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不知不覺間，我自身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有東京、

臺北、上海、北京、天津、大連等地，不受一地所侷限，和我近幾年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相互重疊。而我所關心的人物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現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我的現實人生也正如他們，隱沒在歷史的角落裡。

最後，我要感謝王德威教授百忙之中抽空為這本小書寫序，2001至2002年王德威教授接受我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那一年的學術收穫很多，包括接受新的學知刺激與經歷了「九一一」，有接近作家施叔青的機會，同時也結識了在哥大客座教書的廖炳惠教授和在哈佛大學研究的張小虹教授，開闊了我的研究視野，對我的後半段人生的研究生活影響很大，在此也一併向他們致謝。此外，也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資深編輯紀淑玲小姐，她極為專業的編輯經驗，令我十分佩服。

以下是各章原刊出處：

#### 故鄉與他鄉

##### 第一章 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自傳作品所呈現的人生軌跡

原刊張深切，《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社，1998年。

##### 第二章 楊基振及其時代：從日記看一位臺灣知識分子從戰前到戰後的心理轉變

原刊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此文是節錄改寫自黃英哲、許時嘉合撰，〈《楊基振日記》導讀〉，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

臺北：國史館，2007年。

###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

#### 第三章 〈藤野先生〉到臺灣：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

原刊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 第四章 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像

原刊《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

臺大出版中心

###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

#### 第五章 國民性改造的構想：許壽裳與臺灣，1946-1948

原刊黃英哲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 第六章 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

原刊國史館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2年9月。

### 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第七章 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原刊《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臺北：中外文學雜誌社，2004年12月。

對我而言，這是一本經過多年思索、沉澱的成果，也希望透過這本小書的整理，呈現這幾年我個人對臺灣文學、臺灣文化史的觀察視角。

附記：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諸多指正與寶貴意見，同時也感謝臺大出版中心接受此書的出版。這本小書是筆者參與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戰後臺灣歷史多元鑲嵌及主體創造」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此向該計畫主持人許雪姬教授致謝。書中珍貴照片的提供者——文經社吳榮斌社長、《文訊》封德屏社長、楊宗義先生、陳漱渝先生、蕭振鳴先生，在此也一併致謝。

臺大出版中心

## 參考文獻

不著撰人

- 1945 〈創刊の辞〉，《新聲》創刊號（臺北：新聲月刊社，1945年12月26日）。
- 1946 〈挖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1946年12月6日）。
- 1946 〈許壽裳來臺將任編譯館長〉，《工商日報》第2版（1946年7月2日）。
- 1946 〈臺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宣言〉，《臺灣文化》1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9月）。
- 1946 〈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1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9月）。
- 1946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1946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規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秋字（民國35年8月2日），頁499-564。
- 1946 〈編譯館校印 臺灣通志〉，《人民導報》（1946年9月7日）。
- 1946 〈關於處理臺灣人產業之意見書〉，《新臺灣》創刊號（北平：

新臺灣社，1946年2月15日）。

1947 《中華民國36年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計劃》（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年4月）。

1947 《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6月）。

1947 《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1947年8月）。

1947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47年5月17日）。

1947 〈臺灣省編譯館工作概況 民國36年1月18日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收於《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6月）。

1947 〈編後記〉，《臺灣文化》2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1月）。

1948 〈案情經過〉，《臺灣文化》3卷4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8年5月）「悼念許壽裳先生」。

1948 〈編後記〉，《臺灣文化》3卷4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8年5月）。

1950 〈人性的控訴——哀陳素卿之死〉，《新生報》第9版「新生副刊」（1950年1月18日）。

1950 〈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第2版（1950年1月14日）。

- 1950 〈殉情女化癡情灰 陳素卿遺體昨已火葬 張白帆今日為她開弔〉，《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5日）。
- 1950 〈殉情女灰置法藏寺 致祭靈堂雖無弔唁幛聯 但有更多的眼淚與嘆息〉，《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6日）。
- 1950 〈淡水河邊水門下 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書信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4日）。
- 1950 〈傅斯年等昨發起 補葬陳素卿女士 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9日）。
- 196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表〉，《臺灣光復廿年》（臺北：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年10月）。
- 1982 〈池田敏雄年譜〉，《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號（東京：綠蔭書房，1982年10月）。
- 1986 〈張秘書上蔣委員長呈文〉（1944年4月15日毛筆原件，黨史會藏），轉引自呂芳上，〈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光復〉，《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5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9年12月）。
- 1993 〈是顛覆？還是追逐？——施叔青集序〉，收於施叔青，《施叔青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丁景唐編選

- 1995 《陶晶孫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上杉一男

1946 〈文化人の信義—日文雑誌《新聲》編集者に問ふ〉・《新生報》第4版（1946年1月9日）。

也斯

1993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土田滋

1984 〈（人と学問）浅井恵倫〉・《社会人類学年報》第1卷第10期（東京：東京都立大学社会人類学会，1984年5月）。

中島利郎編

2000 《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

1999 《陶晶孫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

公論報編

1954 《民國四十一年臺灣年鑑》（臺北：公論報社，1945年12月）。

天嘯叟鄭烈

1950 〈弔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第6版「中央副刊」（1950年1月20日）。

木山英雄

1978 《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戦争時代の周作人》（東京：筑摩書

房)。

王白之

1950 〈看陳素卿遺書感想〉，《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6日）。

王德威

1998 〈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2 〈異象與異化·異性與異史——施叔青論〉，《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7 《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臺北：麥田出版社）。

王賡武編

1997 《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書店）。

北岡正子

1989 〈もう一つの国民性論議—魯迅・許壽裳の国民性論議への波動—〉，《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10號（1989年3月）。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

2010 《許壽裳日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北岡正子、黃英哲

1993 〈《許壽裳日記》解說〉，《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

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研究中心)。

末廣昭

2006 〈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氏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

白先勇

1988 〈香港傳奇——讀施叔青「香港的故事」〉，收於施叔青，《韭菜命的人》（臺北：洪範書店）。

伊藤虎丸

1995 〈解題 戦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東方書店）。

安溪遊地、平川敬治

2006 《遠い空—国分直一、人と学問》（福岡：海鳥社）。

池田敏雄

1954 〈福建系台湾人の妊娠祈願及び妊娠察知に関する習俗〉，《民族学研究》第18卷第1-2號（1954年3月）。

1955 〈福建系台湾人の出産習俗〉，《民族学研究》第19卷第2號（1955年9月）。

西野由希子

1999 〈香港小説概観—施叔青の作品を通して—〉，《お茶の水

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 18 號（1999 年 4 月）。

西澤泰彦

2000 《満鉄—「満洲」の巨人》（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佐藤春夫

1952 〈陶晶孫先生が遺著のために〉，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

吳密察

2005 〈殖民地大學とその戦後〉，收於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吳濁流

1948 《ポツタム科長》（臺北：學友書局）。

1977 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臺北：遠行出版社）。

1988 《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

呂赫若

1947 〈冬夜〉，《臺灣文化》2 卷 2 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 年 2 月 5 日）。

坂野徹

2005 《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1884-1952）》（東京：勁草書房）。

宋斐如

1946 〈如何改進臺灣文化教育〉，《新生報》（1946年1月14日）。

李小良

1997 〈「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

李有成

2013 《離散》（臺北：允晨文化）。

李何林

1985 《李何林選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李東華、楊宗霖編校

2007 《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杜聰明

2001 《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下）（臺北：龍文出版社）。

言采薇

1950 〈陳素卿死有遺憾乎〉，《新生報》「新生副刊」第9版（1950年1月23日）。

周蔥秀

1990 〈談許壽裳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8月號（北

京：魯迅博物館）。

松永正義

1994 〈《許壽裳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通信》34 號（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4 年 3 月）。

林姿君

2007 《臺灣大學的語文學教育及其相關問題初探（1945-196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林耀德

1996 〈歷史的負擔——評《遍山洋紫荊》〉，《自由時報》34 版（1996 年 2 月 3 日）。

河原功編

1997 《台灣引揚・留用記錄》（東京：ゆまに書房）。

金文京

1991 〈香港文學瞥見〉，收於可兒弘明編，《香港および香港問題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

金關丈夫

1977 〈陶熾博士のことども〉，《福岡医学雑誌》1952 年 12 月號，收於氏著，《南方文化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1979 《孤燈の夢》（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49 〈臺中縣營埔遺跡調查豫報〉，《臺灣文化》5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9年7月）。

1950 〈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50年1月）。

後藤新平

1965 〈滿洲經營策梗概〉，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2卷（東京：勁草書房）。

施叔青

臺大出版中心

1969 《約伯的末裔》（臺北：仙人掌出版社）。

1971 《拾綴那些日子》（臺北：志文出版社）。

1975 《牛鈴聲響》（臺北：皇冠出版社）。

1976 《琉璃瓦》（臺北：時報出版社）。

1976 《常滿姨的一日》（臺北：景象文庫）。

1985 《完美的丈夫》（臺北：洪範書店）。

1993 〈我寫《維多利亞俱樂部》〉，《聯合文學》100期（1993年2月）。

1993 《她名叫蝴蝶》（臺北：洪範書店）。

1994 〈追逐成長〉，《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11月）。

1995 《遍山洋紫荊》（臺北：洪範書店）。

1997 《寂寞雲園》（臺北：洪範書店）。

施建偉、應宇力等著

1999 《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柯慶明

2009 〈五四：印象與體驗〉，《文訊》總283號（2009年5月）。

若林正文

1982 〈（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Ⅱ」解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號（東京：綠蔭書房，1982年10月）。

范力

2002 《中日「戦争交流」研究—戦時期の華北經濟を中心に》（東京：汲古書院）。

音

1950 〈陳素卿之死〉，《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6版（1950年1月20日）。

夏濤聲

1945 〈《新聲月刊》発行に寄せて〉，《新聲》創刊號（臺北：



新聲月刊社，1945年12月26日）。

#### 國分直一

1979 《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1981 〈終戦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査〉，《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1981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界—主として中国内地学者の動きについて—〉，《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1981 《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2006 〈台湾研究者の群像〉，收於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国分直一、人と学問》（福岡：海鳥社）。

#### 國立臺灣大學編

1947 〈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 張小虹

1994 〈祖母臉上的大蝙蝠——從鹿港到香港的施叔青〉，《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11月）。

1996 〈殖民迷魅——評施叔青《遍山洋紫荊》〉，《中國時報》43版（1996年1月7日）。

#### 張希哲

1975 〈記抗戰時期中央設計局的人與事〉，《傳記文學》27卷4期（1975年10月）。

張良澤

1983 〈台湾に生き残った日本語—《国語》教育より論ずる〉，《中國語研究》第二十二號（日本：采華書林，1983年6月）。

張深切

1998 〈我編導《邱罔舍》一片的動機與目的〉，收於《張深切全集》卷7《邱罔舍》（臺北：文經社）。

1998 《張深切全集》卷1《里程碑》（上）（臺北：文經社）。

1998 《張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下）（臺北：文經社）。

1998 《張深切全集》卷3《我與我的思想》（臺北：文經社）。

1998 《張深切全集》卷4《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臺北：文經社）。

1998 〈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收於《張深切全集》卷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臺北：文經社）。

1998 〈戰爭與和平〉，收於《張深切全集》卷11《北京日記·書信·雜錄》（臺北：文經社）。

張愛玲

1995 〈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臺北：皇冠出版社）。

梁秉鈞

1995 〈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

梅家玲

2010 〈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2月）。

章微穎

1947 〈36年（1947年）6月，臺灣省編譯館結束，爰賦短章呈弗翁師座〉，許壽裳家屬提供。

許世瑋

1984 〈憶先父許壽裳〉，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1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許雪姬

1991 〈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29卷4期（1991年12月）。

2007 〈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7年6月）。

許雪姬訪問

1994 《口述歷史5——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等

2003《王世慶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壽裳

1946〈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2卷4期(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1946年10月)。

1946〈魯迅和青年〉，《和平日報》(1946年10月19日)。

1946〈魯迅的精神〉，《臺灣文化》1卷2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11月)。

1946〈魯迅的德行〉，《和平日報》(1946年10月21日)。

1947《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臺北:臺灣書店)。

1947〈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收於《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1947〈臺灣省編譯事業的拓荒工作〉，《臺灣月刊》第3、4期合刊(1947年1月)。

1947〈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新生報》(1947年5月4日)。

1947〈臺灣學報發刊辭〉，收於《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1947 〈魯迅的人格和思想〉，《臺灣文化》2卷1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1月）。

1947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

1983 〈許壽裳先生書簡鈔〉，《新文學史料》第二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許壽裳書信集》（杭州：浙江文藝）。

#### 許壽裳編

1947 《大學國語文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出版組）。

#### 許廣平

1955 〈《亡友魯迅印象記》讀後記〉，收於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陳三井

1985 〈臺灣光復的序曲：復臺準備與接收〉，《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

#### 陳映真主編

2005 《迎回尾崎秀樹》（臺北：人間出版社）。

#### 陳怡真

2004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陳漱渝

- 1990 〈坍塌的堤防——魯迅著作在臺灣〉，《魯迅研究月刊》  
1990年8月號（北京：魯迅博物館）。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

- 1989《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

陳儀

- 1946 〈民國35年度工作要領——34年除夕廣播〉，《陳長官治  
臺言論集》第1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  
年5月）。

- 1946 〈陳儀致許壽裳電報〉，1946年5月1日，〈陳儀致許壽裳  
私函〉，1946年5月13日。收於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編，  
《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陳蕙貞

- 1946 〈叫び—中國少女より〉，《讀賣報知》（1946年2月14日  
至15日）。

- 2005（1947）《漂浪の小羊》（臺北：南天書局）。

- 2015《漂浪的小羊》（王敬翔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陶坊資

- 1998 〈陶晶孫年譜〉，收於張小紅編，《陶晶孫百歲誕辰紀年集》  
（上海：百家出版社）。

### 陶易王

1998 〈父親在臺灣〉，收於張小紅編，《陶晶孫百歲誕辰紀年集》（上海：百家出版社）。

### 陶晶孫

1951 〈淡水河心中〉，《展望》1951年7月號（東京：筑摩書房）。

1952 〈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原文登於《看護學》1951年2月號，後收入《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

1952 《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

2008 曹亞輝、王華偉譯，《給日本的遺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傅斯年

1967 《傅斯年選集》第9冊（臺北：文星書店）。

### 景白和王白

1950 〈陳素卿死得有價值嗎？〉，《中央日報》第4版（1950年1月16日）。

### 游鑑明

2005 〈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

湯熙勇

1991 〈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臺籍、羅致外省籍及徵用日人（1945.10-194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卷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賀安慰

1989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賀霖

1992 〈許壽裳先生在臺灣〉，收於《許壽裳紀念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黃英哲

臺大出版中心

2006 〈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臺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6年11月）。

2007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

2010 《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編

2010 《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黃繼持



1997 〈香港小說的蹤跡——五、六十年代〉，收於《香港小說選 1948-1969》。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

1998 《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楊乃藩

1989 〈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傳記文學》55 卷 6 期（1989 年 12 月）。

楊基振

2007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臺北：國史館）。

楊達

1983 〈臺灣作家の七十七年—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文藝》第 22 卷第 1 號（東京：河出書房，1983 年 1 月）。

楊雲萍

1945 〈文獻的接收〉（上）（中）（下），《民報》（1945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

1947 〈近事雜記〉（六），《臺灣文化》2 卷 5 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 年 8 月）。

1948 〈近事雜記〉（十三），《臺灣文化》3 卷 3 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8 年 4 月）。

1981 〈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卷4期（1981年10月）。

達妮

1950 〈愛情，你怎樣處理？——從陳素卿之死想起一個故事〉，《新生報》第9版「新生副刊」（1950年1月17日）。

廖炳惠

1996 〈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中外文學》24卷12期（1996年5月）。

臺靜農

1948 〈追思〉，《臺灣文化》3卷4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8年5月）。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復刻版《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風林書房，1969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

194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臺灣新生報編

1947 《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

臺灣藝術雜誌社編

1943 〈戰時下における読書界の諸問題〉，《台湾芸術》第4卷第10號（台湾芸術社，1943年10月）。

齊如山

1950 〈兩個理由——關於改葬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第6版「中央副刊」（1950年1月24日）。

歐素瑛

2006 《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蔡榮芳

2001 《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鄭仁佳

1997 〈陶晶孫（1897-1952）〉，《傳記文學》70卷5期（1997年5月）。

鄭梓

1988 〈國民政府對於「收復臺灣」之設計——臺灣接管計劃之草擬、爭議與定案〉，《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9期（1988年7月）。

鄭翼宗

1992 《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

#### 魯迅

1937 鹿地亘等譯，《大魯迅全集》（東京：改造社）。

1945 譯者不詳，〈小說 藤野先生〉，《新聲》創刊號（臺北：新聲月刊社，1945年12月26日）。

1947 楊逸譯，中日文對照《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

#### 賴和

1943 〈高木友枝先生〉，《臺灣文學》3卷2期。

#### 賴明弘

1954 〈臺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臺北文物》3卷3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龍瑛宗

1946 〈名作巡禮 阿Q正傳〉，《中華日報》第4版「文藝」（1946年5月20日）。

2006 〈最近文學界一瞥〉，《東寧新報》旬刊（1946年1月21日），收於《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6冊（臺北：南天書局）。

#### 簡瑛瑛訪

1999 〈女性心靈的圖像：與施叔青對談文學／藝術與宗教〉，《中外文學》27卷11期（1999年4月）。

關詩珮

- 2003 〈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後殖民顛覆策略及身分認同〉（香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的傳承與開拓——四十週年校慶研討會，2003年10月30日）。

嚴安生

- 2009 《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もう一つの中国人留学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

蘇崇民

- 1999 山下睦男等譯，《滿鐵史》（福岡：葦書房）。

Anderson, Benedict

- 1999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

Didier, Béatrice

- 1987 西川長夫、後平隆譯，《日記論》（*Le journal intime*）（京都：松籟社）。

Hobsbawm, Eric J.

- 1997 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臺北：麥田出版社）。

U

- 1945 〈台湾の文学界〉，《新聲》創刊號（臺北：新聲月刊社，1945年12月26日）。

# 索引

## 人名索引

T · O 91

T · T 91

U 94

一劃

一氏義良 37

二劃

入田春彥 87

三劃

上杉一男 95, 97, 98, 103

也斯 234, 260

土田滋 223

小田信秀 91

小林秀雄 208

山中樵 206

山家亨 39

川端康成 208

四劃

內山完造 120

木山英雄 23

毛子水 115, 116

毛澤東 64, 65

片瀨弘 210

王世慶 226

王白淵 180, 182

王西彥 110

王克敏 53

王芃生 170

王芸生 170

王添燈 68

王德威 8, 234, 261, 267

五劃

丘念台 170

北岡正子 266

市村榮 206

田漢 180

白先勇 242

白崇禧 68

立石鐵臣 174, 210, 211,  
223, 226

六劃

成仿吾 118

有島武郎 32

池田敏雄 174, 209-211,  
220, 223, 224, 226, 227

竹下律子 210

竹下萬吉 210

老舍 88

西蒙娜·西蒙 (Simone  
Simon) 60

七劃

佐藤とみ 118

佐藤春夫 86, 120, 132, 133

佐藤操 118

何永 40

何灼華 3

何畏 118

何基明 40

冷孤原 117

吳三連 59

吳守禮 190, 220

吳克剛 205

吳金川 59

吳敦禮 65

吳新榮 180, 182

吳濁流 viii, 49, 126-129, 136, 141-143

呂運亨 28

呂赫若 130, 180, 182

宋文薰 226

宋平子 163

宋斐如 68, 187

尾崎秀樹 87

李小良 235, 259

李有成 8

李何林（李竹年） 174, 176, 180-182, 190, 212, 220

李金鐘 59

李香蘭 60

李霽野 122, 174, 180-182, 266

杜聰明 121-123

汪精衛 3

沈仲九 170

沈光烈 163

沈剛伯 115, 116

沈從文 88

谷川徹三 3

貝埃提斯·狄迪耶  
（Beatrice Didier） 69

八劃

兒玉源太郎 50

周一鸞 170

周作人 38, 86

岩生成一 216, 218

松枝茂夫 88

板垣退助 25

林旭屏 68

林有蘭 235

林快青 40

林忠 121

林茂生 68, 182

林桂端 68

林連宗 68

林朝榮 65

林無双 91

林維金 28

林語堂 91

林獻堂 25-27

河上徹太郎 120

邱罔舍 40

- 邱賢添 122
- 金溟若 218
- 金瓊英 174
- 金關丈夫 123, 216, 218
- 長塩 25
- 九劃
- 涂翠花 145
- 後藤新平 49, 50
- 施叔青 vii, 12, 233-248, 250-263, 267, 269
- 施淑 265
- 柯設借 216
- 柯源卿 124
- 柯慶明 124
- 洪元煌 33
- 洪式閏 122
- 洪炎秋 38-40, 59, 65
- 洪緝洽 28
- 洪耀勳 65
- 胡風 180
- 胡適 86
- 胡豫 163
- 若林正丈 197
- 范力 54
- 范壽康（允臧） 205, 206
- 茅盾 88, 180
- 郁達夫 88, 118
- 十劃
- 倉石武四郎 120
- 夏目漱石 32
- 夏濤聲 91, 93, 170
- 孫中山 142
- 宮本延人 226
- 徐春卿 182
- 秦賢次 266
- 秦木得一 210, 216, 218, 223, 224, 227
- 草野心平 120
- 袁珂（袁聖時） 180, 181
- 馬廷英 121, 205, 209
- 馬忠泰 4
- 馬禛光 163
- 十一劃
- 國分直一 174, 175, 181, 206, 209-211, 218, 220, 223, 224, 226, 227,
- 堂ノ脇光雄 37
- 張小虹 267
- 張月澄 29
- 張玉書 25
- 張旭昇 57
- 張我軍 38, 59, 65
- 張延生 120
- 張星賢 59
- 張常惺 209, 218
- 張深切 vi, vii, 10, 14, 23-42, 59, 65, 266
- 張愛玲 243, 244
- 張資平 118
- 張碧蓮 57
- 張厲生 170



- 張樑標 209, 216, 218  
梁永祿 65  
梁嘉彬 209, 218, 223  
梁龍元 121  
梅家玲 265  
淺井惠倫 174, 209-211, 216, 223, 227  
烹齋 117  
章太炎 163  
章微穎 177  
章錫琛 205  
莊長恭 121  
許乃昌 28  
許世瑋 168, 169  
許世璜 266  
許雪姬 267-269  
許壽裳 (季葦、季勳) vii, viii, 12, 14, 88, 122, 163-191, 197-227, 266  
許廣平 175, 183  
郭沫若 86, 118, 119, 124, 180  
郭頂順 40  
郭琦元 119  
郭德欽 29  
野田正彰 3  
陳天錫 65  
陳文彬 3, 4  
陳立夫 164  
陳奇祿 226  
陳炘 68  
陳芳之 121  
陳建功 121  
陳重光 59  
陳兼善 (達夫) 205  
陳偉智 265  
陳啟修 48  
陳啟清 57  
陳紹馨 226  
陳新彬 31  
陳漱渝 266  
陳儀 (公俠、公洽) vii, 12, 68, 163, 164, 166-168, 170-176, 198-202, 206, 212, 225  
陳蕙貞 (陳真) viii, ix, 3-6, 8  
陶晶孫 (陶熾、陶熾孫) vii, viii, 11, 14, 109-144  
陶藏 117  
陸志鴻 121, 190, 206, 220  
十二劃  
傅正 58  
傅斯年 115, 116, 121, 122, 132  
喬大壯 190, 220  
彭華英 28  
彭澤周 (伊原澤周) 266  
植田富士太郎 79, 91, 94, 99  
游彌堅 170  
焦仲卿 116, 137  
程璟 172  
菊池寬 208

- 黃克立 40
- 黃英哲 v, ix, 145
- 黃烈火 59
- 黃得時 180, 190, 220
- 黃朝琴 170
- 黃榮燦 180, 182
- 黃繼持 258
- 十三劃
- 廉新生 209, 218
- 楊乃藩 181
- 楊守愚 180
- 楊基振 vi, viii, 10, 14, 47-72, 267
- 楊梁氏雙 47
- 楊紹喜 47
- 楊遠 36, 87, 88, 103
- 楊雲萍 88, 174, 180, 181, 183, 207, 209-211, 217, 219, 222, 225-227
- 楊肇嘉 47, 59
- 溥儀 51
- 葉石濤 165
- 葛敬恩 170
- 詹淑英 52
- 雷石榆 122, 180-182
- 雷震 57, 58
- 十四劃
- 廖炳惠 ix, 258, 259, 267
- 廖漢臣 180
- 漢斯·沙克斯 (Hans Sachs) 119
- 臺靜農 122, 180, 181, 190, 220, 221
- 齊世英 57
- 齊如山 116
- 十五劃
- 劉子英 58
- 劉文貞 174
- 劉光華 121
- 劉金狗 206
- 劉茂源 226
- 劉啟光 40
- 劉捷 180
- 德田秋聲 32
- 德富盧花 32
- 樋口末廣 210
- 歐陽予倩 180
- 潘漢年 3
- 蔡元培 163
- 蔡孝乾 28
- 蔡邦華 121
- 蔡惠如 27, 28
- 蔣中正 (蔣介石、蔣主席) 5, 30, 71, 91, 170
- 蔣勻田 57
- 蔣夢麟 163
- 鄭倉 68
- 鄭桓 209, 218
- 鄭瑞明 265
- 鄭樹森 258
- 鄭翼宗 122, 123

魯迅 vii, 10-12, 79-81, 86-88, 91, 94-99, 101-104, 163, 166, 169, 173, 180-183, 186-189, 266

黎烈文 122, 180

#### 十六劃

賴子清 209, 218, 223

賴和 35, 36

賴明弘 34, 36

錢宗起 170

錢歌川 122

龍瑛宗 87, 88, 103, 126

#### 十七劃

繆天華 181

謝似顏 167, 173, 181

謝南光 170

謝雪紅 28, 40

謝廉清 28

#### 十八劃

瞿絡琛 121

豐子愷 88

魏建功 122, 190, 220

魏道明 175, 176, 190, 212, 220

#### 十九劃

羅宗洛 120, 121

羅庸 190, 220

羅翥 28

藤野嚴九郎 79

#### 二十劃

蘇子衡 59, 65

蘇步青 121

蘇新 4, 5, 182

蘇薌雨 115, 116

臺大出版中心

## 名詞索引

- 一劃
- 一九四九年的大分裂 vi
- 二劃
- 七七事變 34
- 九一一事件 ix
- 九一八事變 34, 48, 51
- 九七 235, 237, 239, 260, 261
- 二二八事件 v, viii, 4, 10, 23, 40, 57, 58, 67, 71, 131, 132, 134, 148, 164, 175, 182, 210, 212, 213, 219
- 《人》 33
- 《人人》 207
- 《人民導報》 4, 209
- 《人間與地獄》 41
- 八路軍 63-65, 70, 71
- 三劃
- 三一獨立運動 26
- 三菱商事 48
-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266
- 上海臺灣青年會 28, 29
- 《亡友魯迅印象記》 183
- 大日本婦人會 127
- 大正民主思潮 86
- 大同學院 51
-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19, 125
- 大東亞戰爭 61, 127
- 《大魯迅全集》 79, 86-88, 95, 96, 99, 103
- 《大學國語文選》 221
- 《工商日報》 202
- 四劃
- 《不如歸》 32
- 中日友好 11, 95, 99, 101, 103, 104
- 中日文化協會 125
- 中日戰爭 v, 23, 37, 53, 127, 198
- 《中央日報》 110, 112, 115
- 《中國文藝》 23, 36-39
-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 vii, 11, 119, 120
- 中國革命同盟會 163
- 中國國民性改造 vii, 12, 189, 190
- 《中華日報》 4
-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53
- 五七幹校 4
- 五四運動 26, 86, 116, 186, 187
- 《公論報》 197, 226
- 《六三法》 26
- 六四事件 239
- 天才少女作家 3, 4, 6
- 太平洋戰爭 60
- 幻燈事件 99
- 支那廢物 5

- 文本流通 vii, 10  
 文革 4  
     《日本への遺書》 120  
 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 (NAPF) 34  
 日本銀行 48  
 日僑管理委員會 89, 90, 103  
 日滿支經濟圈 53
- 五劃  
 北平臺灣同鄉會 65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vii, 12, 88, 198, 225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 v, vi, 9, 265  
     《台灣引揚・留用記錄》 210  
 左聯東京支部 122, 181  
 平社 28  
 未名社 79, 173, 181, 266  
 本土情懷 vi
- 《民俗臺灣》 211, 226  
 〈民國35年度工作要領〉 199  
 民族主義 vi, viii, 23, 27, 32, 34, 36, 39, 42, 187, 189  
 《民報》 128, 209  
 《生死門》 41  
 白色恐怖 vii, 11, 182  
 白話新文學運動 86
- 六劃  
 光復文庫 173, 200  
 光復會 163  
 全球化時代 8  
 再殖民 viii  
 安田保善社 48  
 《自由中國》 57, 58  
 自由主義 vi  
 西來庵事件 viii, 3
- 七劃  
 《我所認識的魯迅》 183  
 《改良書房》 33
- 八劃  
 《亞細亞孤兒》 viii  
 《和平日報》 39, 188  
 東方主義 234, 236, 240, 249, 250, 257  
 東西冷戰 v  
 《東洋史研究》 206  
 治安維持法 30  
 《波茨坦科長》 (ポツタム科長) 127, 128, 136, 141, 143  
 《邱岡舍》 40, 41  
 《金色夜叉》 32  
 《雨夜花》 40
- 九劃  
 南京條約 254  
 《南音》 34

- 南音社 34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48, 49
- 後殖民 viii, 8, 10, 12, 13, 242, 245, 246, 255, 257, 262, 263
- 後殖民現象 vi
- 「後遺民」文學論述 8
- 皇民化運動 134, 165, 198, 211
- 皇民奉公會 142
- 皇民鍊成所 165, 198
- 香港三部曲 vii, 12, 233-260, 263,
- 香港文學 233, 234, 258-260
- 香港作家 233, 234, 259, 260
- 十劃
- 《展望》 120, 132
- 桔梗俱樂部 127
- 《浙江潮》 163
- 特高 37
- 草屯炎峰青年會 33
- 草屯炎峰青年演劇會 33
- 《荔鏡記——陳三五娘》 41
- 高砂寮 27
- 《鬼神末路》 33
- 十一劃
- 啟新水泥公司 55, 56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19
- 國民學校令 25
- 國共內戰 v, vi, 65, 164
- 《婚變》 41
- 《張深切全集》 267
- 《接木花》 31, 32
- 〈淡水河心中〉 vii, 11, 109, 110, 117, 125, 132, 133, 135, 137, 139-141, 143, 144, 145
- 清國奴 5, 7, 26
- 移民 8
- 《莽原》 79
- 陳蕙貞文藝出版後援會 4
- 十二劃
- 創造社 118, 124
- 《朝日新聞》 3
- 《朝華夕拾》 79
- 朝鮮臨時政府 29
- 殖民 vii, 8, 12, 13, 94, 99, 116, 125, 134, 140, 165, 198, 205, 234, 240-242, 245, 246, 248-256, 260-262
- 殖民現代性 v, vi
- 筆記事件 98
- 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華北交通） 52-56, 70
- 華北開發株式會社（華北開發） 53, 54
- 《開羅宣言》 170
- 開羅會議 170

十三劃

勤勞挺身隊 127

意義生產 vii, 10, 259

《愛強於死》 33

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19

《新生報》 95, 103, 187

新(的)五四運動 88,  
186, 187, 189

《新臺灣》 65, 66

《新聲》 vii, 11, 79, 88-  
97, 99, 101-104

《暗地》 31, 32

《楊基振日記》 267

十四劃

滿洲國 vi, 14, 37, 51, 52,  
67

滿鐵 49-52, 70

《漂浪的小羊》 viii, 4, 6

《福爾摩沙》(フォルモ  
サ) 34, 49

臺中一中學生運動事件  
30

臺韓同志會 29

《臺灣文化》 178, 180-  
182, 188, 197, 220, 226

臺灣文化協進會(協進  
會) 177-183, 197, 220

臺灣文化協會 27, 33, 34,  
86

臺灣文學 viii, 36, 189,  
208, 234, 258, 259, 261-  
263, 269

《臺灣文學》 34

《臺灣文藝》 23, 34, 36,  
49

臺灣文藝作家協會 34

臺灣文藝協會 34

臺灣文藝聯盟 23, 33-37

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  
34

臺灣民主運動 vi

臺灣民眾黨 34

《臺灣民報》 86

臺灣共產黨 34

臺灣同化會 25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34

臺灣自治協會 23, 28, 2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19,  
22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v

臺灣省通志館 219, 223,  
226

臺灣省編譯館(編譯館)  
vii, 12, 164, 168-178, 180,  
181, 190, 198-227, 266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大綱  
草案〉 202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規  
程〉 202

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  
(臺灣研究組) 12, 172,  
174, 177, 180, 181, 197,  
198, 200, 202, 203-211,  
213, 216, 217, 219, 220,  
222, 223, 225-227

臺灣研究叢書 203, 208,  
216, 217

《臺灣風物》 197, 226

- 《臺灣時報》 79, 91
-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  
170, 171, 200
- 《臺灣通志》 209, 219
- 《臺灣新文學》 36
- 臺灣話文運動 86
- 臺灣演劇研究會 23, 31-33, 37
- 〈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 186
- 臺灣調查委員會 170, 178
- 《臺灣學報》 216
- 臺灣總督府 24, 27, 28, 34, 49, 91, 168, 206, 227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27
- 臺灣藝術研究會 34, 49
-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27, 30, 86
- 語言翻譯 vii
- 十五劃
- 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23, 29, 30, 37
- 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 29
-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  
183
- 《魯迅選集》 79, 86-88, 95, 99, 103
- 十六劃
- 戰後臺灣歷史多元鑲嵌及主體創造 269
- 《歷程》 120
- 遺民 8
- 十七劃
- 《薛平貴與王寶釧》 40
- 韓戰 v, 120
- 《舊家庭》 33
- 十八劃
- 轉向聲明 30
- 轉型正義 viii
- 十九劃
- 離散社群 8
- 〈藤野先生〉 vii, 10-12, 79, 80, 88, 89, 91, 92, 94, 95, 97, 99, 101-104
- 〈關於處理臺灣人產業之意見書〉 66
- 〈關於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 66
- 二十劃
- 盧溝橋事變 52, 165
- 二十一劃
- 二十二劃
- 《讀賣報知》 4
- 《讀賣新聞》 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 黃英哲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6.06  
面；公分. -- (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研究篇；8)

ISBN 978-986-350-165-7(平裝)

1. 知識分子 2. 傳記 3. 臺灣文學 4. 文化研究

782.248

105010014

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 研究篇8

## 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Diaspora and Border-crossing: Intellectuals Moving across the Strait

作 者 黃英哲

叢書主編 梅家玲  
總 監 項 潔  
責任編輯 紀淑玲  
協力編輯 張凱喻 蔡佳慧 傅安沛  
美術編輯 李文琪

發行人 楊泮池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6年6月  
版 次 初版  
定 價 新臺幣320元整

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10617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 23659286 傳真：(02) 2363-6905  
臺北市10087思源街18號澄思樓1樓  
電話：(02) 3366-3991-3轉18 傳真：(02) 3366-9986  
<http://www.press.ntu.edu.tw>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 2518-0207  
臺北市10485松江路209號1樓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ISBN：978-986-350-165-7

GPN：1010500903

DOI：10.6327/NTUPRS-9789863501657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 臺灣文學與 文化研究叢書

主編：梅家玲（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 文獻篇

1. 許壽裳日記（1940~1948）  
許壽裳著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編
2. 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  
許壽裳著 黃英哲編
3. 蘇維熊文集  
蘇維熊著 蘇明陽、李文腳編
4. 吳坤煌詩文集  
吳燕和、陳淑容編
5. 漂浪的小羊  
陳蕙貞著 王敬翔譯

### 研究篇

1. 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王德威著
2. 性別、政治與京劇表演文化  
王安祈著
3. 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  
三澤真美惠著 李文腳、許時嘉譯
4. 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  
劉亮雅著
5.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  
王惠珍著
6. 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  
李育霖著
7. 「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  
邱貴芬著
8. 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黃英哲著

# 漂泊與越境

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Diaspora and Border-crossing:

Intellectuals Moving across the Strait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在日本、臺灣、中國東北、華北、香港等地，不受一地所局限。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爾後隨著敗戰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越境的軌跡，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ISBN 978-986-350-365-7



9 789863 501657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GPN : 1010500903 定價：新臺幣320元

# 漂泊與越境

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Diaspora and Border-crossing:

Intellectuals Moving across the Strait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在日本、臺灣、中國東北、華北、香港等地，不受一地所局限。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爾後隨著敗戰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越境的軌跡，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ISBN 978-986-350-365-7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GPN: 1010500903 定價：新臺幣320元